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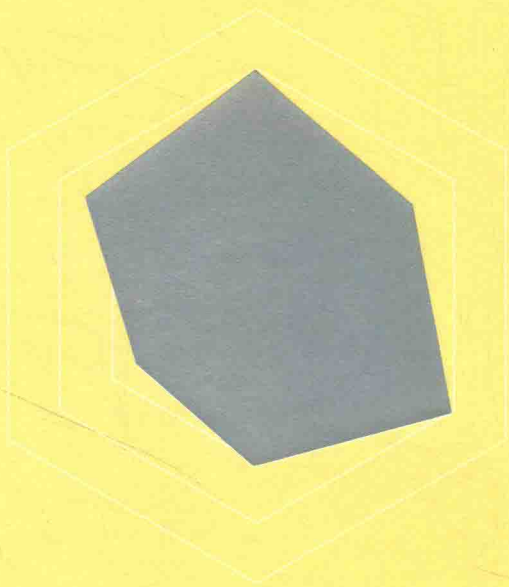
倾向与可能丛书

全球化时代

无政府主义者与反殖民想象

[美]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 著

董子云 译



The Age of Globalization

Anarchists and the Anticolonial Imagination

Benedict Anderson



1917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倾向与可能丛书

全球化时代

无政府主义者与反殖民想象

[美]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 著

董子云 译

The Age of Globalization

Anarchists and the Anticolonial
Imagination

Benedict Anderson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全球化时代：无政府主义者与反殖民想象 / (美)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著；董子云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8

ISBN 978-7-100-16664-5

I. ①全… II. ①本… ②董… III. ①政治哲学

IV. ① D0-0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220626 号

权利保留，侵权必究。

全球化时代：无政府主义者与反殖民想象

〔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 著

董子云 译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

有 限 责 任 公 司 印 制

ISBN 978-7-100-16664-5

2018 年 10 月第 1 版

开本 880×1240 1/32

201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张 12.5

定价：75.00 元

THE AGE OF GLOBALIZATION: Anarchists and the Anticolonial Imagination

by Benedict Anderson

Copyright © Benedict Anderson 2005, 2007, 2013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8 Shanghai Sanhui Culture and Press Ltd.

Published by The Commercial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这是所有经线上的人们都共同持股的世界。

我们食人族必须帮助这些基督徒

魁魁格

致敬赫尔曼·梅尔维尔

纪念土屋健二

献给健一郎、卡萝尔和亨利

致谢

撰写本书期间，许多人和机构给予了我宝贵帮助。其中，我首先要感谢弟弟佩里。他不仅不辞辛劳地搜集材料，帮我拓宽和加深思考，而且自始至终都在对我的写作提出细致而富有见地的批评。其次要感谢的，是施蕴玲和安贝斯·奥坎波(Ambeth Ocampo)。我也希望向以下诸位表达深深的感谢：帕特里奇奥·阿比纳雷斯(Patricio Abinales)，罗纳德·贝坦(Ronald Baytan)，罗宾·布莱克本(Robin Blackburn)，卡琳娜·博拉斯科(Karina Bolasco)，乔纳森·卡勒(Jonathan Culler)，埃文·丹尼尔(Evan Daniel)，尼尔·加西亚(Neil Garcia)，本杰明·豪克斯-刘易斯(Benjamin Hawkes-Lewis)，卡尔·列维(Carl Levy)，福亚德·马基(Fouad Makki)，弗兰科·莫雷蒂(Franco Moretti)，白石隆，梅根·托马斯(Megan Thomas)，土屋健一郎，梅森直之，王超华，汪晖，苏珊·沃特金斯(Susan Watkins)，乔斯·维比索诺(Joss Wibisono)，以及托尼·伍德。有四个机构向我开放了珍稀史料，它们是：阿姆斯特丹的国际社会史研究

所，菲律宾国家图书馆，菲律宾大学图书馆以及马尼拉雅典耀大学（尤其是帕多·德·塔维拉文库的工作人员）。对于上述这些机构的友情支持，我不胜感激。

目录

致谢	i
导言	001
1 序幕：公鸡的蛋	013
新科学	017
地方性知识的财富	022
森林兄弟	025
特别之美	027
比较性反思	035
2 那里	041
超越民族的图书馆	044
石榴里的硝化甘油	048
巴尔的摩的遗产？	050
同种疗法的学生	052

那里	058
福楼拜和一位未来的杀人犯	060
未曾尝试过的快感	064
法语的奢华	068
书写复仇	070
鲁道夫的孩子	072
笑与自杀	075
合作与模仿	079
3 俾斯麦和诺贝尔：全球性的阴影	081
通往欧洲	086
俾斯麦与新的帝国主义地理学	100
黑旗	105
权贵的西班牙	122
修会：被剥夺与剥夺	129
黑色的翅膀	132
亲密伙伴	136
首次归国	138
流亡者民族主义内部的分裂	142
遗失的藏书？	156
解释《煽动者》：洲际主义和预言	161
调换	164

让我们跳拉瓦肖	168
谜一样的微笑	179
4 审判小说家	183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问题	184
康拉德国度	188
菲律宾协会	192
第二次回国	197
热带的西伯利亚	204
马蒂的起义	208
黎萨尔去古巴?	218
新的形势	220
离开达皮丹	225
最后的旅程	231
马尼拉的韦勒主义	237
三种思考	243
5 蒙胡伊克	249
塔里达的圣战	250
巴黎走向激进	257
比利时工人党与《萌芽》	267
德雷福斯事件	269

安的列斯爱国者：贝坦西斯博士	274
安焦列洛：从福贾到圣阿格达	281
进入大旋涡	290
往东去，年轻人	300
谁是敌人？	302
一位全球化的绅士	308
布卢门特里特	312
安的列斯人	314
日本人	318
与中国的联系	327
帕瓦：战争的国际化	330
马拉泰斯塔在马尼拉	333
西边的晚霞：伊萨贝洛·德·洛斯·雷耶斯	342
东边的晚霞：马里亚诺·庞塞	344
后记	349
参考文献	351
索引	359

导言

仰望热带旱季没有月亮的夜空，可以看到闪耀的群星。¹ 星星固定不动，连接它们的只有人的想象，还有可见的黑暗。这场景极具静谧之美，所以需要动番脑筋才能想到，群星其实永远在狂乱地运动着；它们无可逃避地处在各种重力场当中，在中间积极运动，也处处受无形力量的驱使。比较研究的方法便带有这种占星术般的优雅，比如我就曾借此将“日本”与“匈牙利”、“委内瑞拉”与“美国”、“印度尼西亚”与“瑞士”的民族主义并列而论。每一个对象都在发出各自稳定而独有的光彩。

当夜空降临革命中的海地，此时的夏尔·勒克莱克将军正统率着黄热病流行的波兰军队。他们是拿破仑派来重建奴隶制度的。就在不远处，他们听到敌军正在歌唱《马赛曲》和《一切都会好！》（Ça ira！）。这简直是种羞辱，拒绝执行屠杀黑人俘虏的命令是他们做出的回应。¹ 苏格兰启蒙运

¹ 这段动人的描述，可见 C. L. R. James, *The Black Jacobins*, rev. ed. (New York: Vintage, 1989), pp. 317-18。

动对塑造美国反殖民起义有决定性意义。西班牙裔美洲民族主义独立运动与自由主义、共和主义的普世主义浪潮密不可分。浪漫主义、民主、唯心主义、马克思主义、无政府主义，乃至后来出现的法西斯主义，无不被认为拥有向全球伸展、连接起各个民族的特征。民族主义是其中化合价最高的元素，以不同方式、在不同时间与其他各个元素相结合。

2 本书是一次政治天文学的试验，也许梅尔维尔（Melville）会用这个词。它试图描绘世界各地的激进民族主义之间的无政府主义重力。伴随着第一国际的解散以及 1883 年马克思的逝世，无政府主义这个元素以它一向以来的多样形式，主导了拥有国际主义自我意识的激进左派。无政府主义在年轻一代产生了一位富有说服力的哲学家克鲁泡特金（年龄比马克思小 22 岁），还有一位有趣而极具魅力的活跃分子兼领袖马拉泰斯塔（Malatesta，年龄比恩格斯小 33 岁），令马克思主义主流无可企及。但还不止于此。纵然无政府主义常常借用马克思高耸的思想大厦，但在一个真正的工业无产阶级主要局限于欧洲北部的时代，无政府主义运动并没有轻视农民和农业劳动者。以个人自由的名义，它向“布尔乔亚”作家和艺术家开放，这在当时体制化的马克思主义当中是没有的。就像它敌视帝国主义那样，它对“卑鄙的”“非历史的”民族主义（包括殖民世界的那些）也没有理论偏见。无政府主义者还更加迅速地利用了那个时代规模空前的跨洋迁移。马拉泰斯塔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待过四年——对于从未出过西欧

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来说，这是难以想象的。五一劳动节是为了纪念 1887 年在美国被处决的无政府主义（而不是马克思主义）移民。

本书关注的时期是 19 世纪最后几十年，为此还有其他几个理由。新世界的最后一次民族主义起义（古巴，1895 年）和亚洲的第一次民族主义起义（菲律宾群岛，1896 年）几乎同时发生，这并非偶然。古巴和菲律宾同是著名的西班牙全球帝国最后仅存的重要殖民地。两地的原住民即古巴人（以及波多黎各人和多米尼加人）和菲律宾人不仅互通有无，而且还有着重要的民间联系，在一定程度上协调各自的行动——世界历史上第一次出现这种全球性的协作。最终，起义相继在几年内遭到行将成为世界霸主的美国的同等残酷的镇压。不过，奥连特（Oriente）和甲米地（Cavite）破碎的山村之间没有直接的协作，而是通过“代表”从中穿针引线；尤其重要的是巴黎的代表，其次是香港、伦敦和纽约的代表。中国民族主义者在报纸上读到这些消息，热切地关注古巴和菲律宾的消息——还有菲律宾人也曾学习过的反对英帝国主义的布尔民族主义斗争——从中学习如何“干”革命、反对殖民主义、反对帝国主义。菲律宾人和古巴人在不同程度上发现，他们最可靠的盟友是法国、西班牙、意大利、比利时和英国的无政府主义者——他们这么做各有各的理由，常常并非出于民族主义。

这些协作之所以成为可能，是因为 19 世纪最后 20 年见

3 证了——我们不妨称之为——“早期全球化”的开端。电报发明以后迅速得到许多改进，跨洋海底电缆也铺设完毕。全球的城市人民很快就对电报习以为常。1903年，西奥多·罗斯福向自己拍发了一封环球电报，在九分钟之后收到。¹1876年万国邮政联盟成立，大大加速了信件、杂志、报纸、照片和书籍在全球的可靠投递。安全、迅捷而廉价的蒸汽船使国家与国家、帝国与帝国、大洲与大洲之间有了大规模移民的可能，史无前例。日益细密的铁路网络在国家和殖民地边界内运送数以百万计的人和商品，偏远的内陆得以相互连接，并通达港口和首都。

在1815—1894年这80年间，世界大体处于保守的和平之中。美洲以外，几乎所有国家都是专制或者立宪的君主制。三场最漫长、最血腥的战争发生在世界体系的边缘——中国和美国的内战，黑海北岸的克里米亚战争，以及60年代巴拉圭与其强邻之间的可怕斗争。俾斯麦压倒性地击败了奥匈帝国和法国，迅如闪电，没给自己带来多少人员损失。欧洲在工业、金融、科技和财政资源上的巨大优势，使得帝国主义在亚洲、非洲和大洋洲无人能挡，只有印度的叛乱是特例。资本也迅速地、颇为自由地穿越现存的国家 and 帝国边界。

但是，19世纪80年代以降，人们已经开始感受到初步的

1 用电报传照片略晚于本书所涵盖的时间段。1902年，德国科学家阿尔弗雷德·科恩证明了这样做的可行性。1911年，伦敦、巴黎和柏林之间已经有了有线传真回路。

震颤，它预兆着日后我们有着各自记忆的那场地震——第一次世界大战。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在 1881 年被投掷炸弹的激进分子暗杀，这些人称自己为“人民意志党”（The People's Will）；在接下来的 25 年间，又有一位法国总统、一位意大利国王、一位奥地利皇后和一位王储、一位葡萄牙国王和他的继承人、一位西班牙总理、两位美国总统、一位希腊国王、一位塞尔维亚国王，以及俄国、爱尔兰和日本的势力强大的保守派政治家被杀。当然，暗杀失败的次数要比这多得多。无政府主义者实行了最早也最引人注目的暗杀活动，但民族主义者不久也紧随其后。多数事件导致的直接后果是各国颁布大批严酷的“反恐怖主义”立法，实行就地处决，（公共和秘密的）警察还有军队采用刑讯的做法也日趋平常。但那些暗杀者——有些可谓是早期的自杀式爆炸袭击者——认为自己此举是在通过新闻机构、报纸、宗教进步主义者、工人阶级还有农民组织等，向全世界的观众表演。

迟至 1880 年，帝国主义竞争仍主要发生在英国、法国和俄国之间，而后进国家如德国（在非洲、东北亚和大洋洲）、美国（在太平洋对岸和加勒比海内部）、意大利（在非洲）和日本（在东亚），正日益使帝国主义的竞争加剧。抵抗运动同样正展现出更现代、更有力的面貌。19 世纪 90 年代，西班牙不得不派出有史以来最大的军力，穿越大西洋，以图粉碎古巴的马蒂（Martí）起义。在菲律宾群岛，西班牙顶住了一场民族主义起义，但未能将其击败。在南非，布尔起义

震动了大英帝国老迈的身躯。

本书的主角们正是游走于这样一个舞台之上。也许这样说会更生动一些：读者将会在阿根廷、新泽西、法国和巴斯克人故乡碰到意大利人，在海地、美国、法国和菲律宾碰到波多黎各人和古巴人，在古巴、法国、巴西和菲律宾碰到西班牙人，在巴黎碰到俄国人，在比利时、奥地利、日本、法国、英国和中国香港碰到菲律宾人，在墨西哥、旧金山和马尼拉碰到日本人；在伦敦和大洋洲碰到德国人，在菲律宾和日本碰到中国人；在阿根廷、西班牙和埃塞俄比亚碰到法国人，等等。

从原理上讲，选取任何一个地方都能研究这个广阔的地下茎网络——研究俄国最后肯定会研究到古巴，研究比利时会想到埃塞俄比亚，研究波多黎各也不能忽视中国。但本书这项特别的研究之所以从菲律宾开始，有两个简单的理由。首先，我和菲律宾关系很深，20年来断断续续对它有所研究。其次，在19世纪90年代，菲律宾虽然身处世界体系的边缘，但它一度短暂地扮演过世界性的角色。还有一个次要的理由，就是我能够接触到菲律宾的材料。研究所关注的三位人物，都出生在19世纪60年代初，彼此年龄相差不过三四岁，生活在复印、传真和网络尚未降临的宗教时代。他们著述颇丰——书信、小册子、文章、学术研究和小说。他们用的是落笔后无法修改的钢笔和墨水，写在被认为保存寿命近乎永久的纸上。（美国档案馆至今仍拒绝接受任何复印

材料，因为20年后它就会变得模糊不清；也不接受电子格式的材料，因为技术创新的生猛步伐，电子材料甚至很快就会无法读取或者读取成本非常之高。）

尽管如此，一项走过里约热内卢、横滨、根特、巴塞罗那、5
伦敦、哈勒尔、巴黎、香港、斯摩棱斯克、芝加哥、卡的斯、太子港、坦帕、那不勒斯、马尼拉、利托梅日采、西礁岛和新加坡的研究，再怎么肤浅，也需要有自己的组合叙述风格。这种风格有两个核心要素：第二个要素是（历史学意义上的）爱森斯坦的蒙太奇，而第一个要素是查尔斯·狄更斯和尤金·苏（Eugène Sue）所创作的连载小说（roman-feuilleton）。因此，读者需要想象自己在欣赏一部黑白电影，或是阅读一部未竟的小说，它的结局超出了这位疲惫小说家的视野。

做一名好读者还有一项负担。在19世纪晚期，还没有什么丑陋的、贬值的“国际语言”。菲律宾人跟奥地利人写信用的是德语，跟日本人用的是英语，相互之间用的是法语、西班牙语或者塔加洛语（Tagalog），字里行间透露出最后那种国际语言——典雅的拉丁语的人文熏陶。他们当中有人懂点俄语、希腊语、意大利语、日语和汉语。将电报传遍全球也许只是几分钟的事，但真正的交流需要有掌握多语种之人真诚、坚实的国际主义。菲律宾人的领袖在这样一个巴别塔式的世界如鱼得水。政敌的语言同时也是他们私人之间所讲的语言，在菲律宾却只有不到5%的人能够听懂。塔加洛语是马尼拉及其周边的土著语言，大部分菲律宾人都听不懂，

对于国际交流无论如何都没有用处。许多操其他地方语言(尤其是宿雾语和伊洛卡诺语)的人更倾向于说西班牙语,即便在菲律宾这种语言是精英或者菲奸身份的明显标记。为了让读者最生动地体会到这个已经消失的多语世界,本研究引用的都是不同语言的原文,这些人就是用不同的语言相互交流并与非菲律宾人交流的。(除特别指出外,本书中所有的翻译都是我所做。¹)

本书的方法和目的决定了它的形式结构。它的起点明确地(也许有点随意地)定在19世纪80年代那安静、偏僻的马尼拉,随后逐渐向欧洲、美洲和亚洲发散,直至走到一个甚至比开头更为随意的结尾,未能得出任何看似适宜的“结论”。它锁定(不知这是不是确切的描述)了三位知名的菲律宾爱国者,他们都是19世纪60年代早期出生的年轻人:天才小说家何塞·黎萨尔(José Rizal),开创性的人类学家也是爱好争论的记者伊萨贝洛·德·洛斯·雷耶斯(Isabelo de los Reyes),以及协调组织者马利亚诺·庞塞(Mariano Ponce)。

第一、二两章是对两本不同寻常的书做比较研究:分别是伊萨贝洛的《菲律宾民俗学》(*El folk-lore filipino*, 马尼拉, 1887年)和黎萨尔谜一般的第二部小说《煽动者》(*El Filibusterismo*, 根特, 1891年)。它们将探究:(1)人类学

1 本书中,凡是末尾带有*的句子或段落,即为作者对非英语的外语文献的翻译,涉及语种有西班牙语、法语、德语等等。——编者注

家伊萨贝洛如何公开地利用当时欧洲民族学者和民俗学者的作品，加上自己在当地的研究，来破坏宗教和世俗殖民当局的思想声誉；(2) 小说家黎萨尔如何移花接木，借用法国、荷兰和西班牙前卫文学的关键人物，创作了一部煽风点火的反殖民小说，这样一部欧洲以外的殖民地人写的小说，也许在史上还是头一回。 6

接下去的一章从业余的文学批评转向政治领域。《煽动者》仍是讨论的主要话题，但黎萨尔于1882年到1891年间在欧洲的阅读和经历，以及他精彩的第一部小说《不许犯我》(*Noli me tangere*)造成的效应(他因此成了菲律宾人抵抗殖民统治的标志，也使他受到许多位高权重之人的仇视)都将会被考虑在内。这一章也会讨论在西班牙的菲律宾活动家之间尖锐化的政治矛盾。《煽动者》相比它之前的那部《不许犯我》，堪称是全球化小说。它里边的角色不再是简单的西班牙人和他们统治的土著，而是将来自法国、中国、美国乃至(有些人怀疑)古巴的游士也包括在内。俾斯麦在欧洲和东亚撒下的阴影、诺贝尔发明的工业爆炸物、俄国的虚无主义，还有巴塞罗那和安达卢西亚的无政府主义，无不在其中显露。

第四章涵盖了黎萨尔从1891年回国到1896年底被处决之间的那四年时间，主要探讨的是古巴的变革以及佛罗里达和纽约的古巴移民群体的变革。这些变革使马蒂得已于1895年计划和发动一场武装革命起义(他的后继者花了巨大代价，

成功击退了前来镇压的规模庞大的远征军)。这场革命拉开序幕前一周不到,在中日战争中获胜的日本刚刚和清政府签订了《马关条约》。根据《马关条约》,东京接管了台湾,使第一个亚洲霸权离吕宋岛北海岸只有一天的航程。黎萨尔曾计划在婆罗洲(Borneo)东北部建立一个菲律宾殖民地,但这个计划以流产告终。这一章的很大一部分会用来写他的这个计划,以及他和地下党卡提普南党人的紧张关系(后者于1896年发动了一场反抗西班牙人的武装起义)。

第五章的内容最为复杂。就在卡提普南起义爆发前两个月,战时巴塞罗那发生了由无政府主义者策划的最为血腥的爆炸事件。总理卡诺瓦斯(Cánovas)的保守政权对此的回应是在城内实行宵禁,大规模逮捕左翼分子,在阴暗的蒙胡伊克(Montjuich)要塞进行了惨无人道的刑讯。克里奥尔古巴人、无政府主义者塔里达·德尔·马尔默尔(Tarrida del Mírmol)是受关押者中值得注意的一位。获释后他前往巴黎,在那里发动了一场反对卡诺瓦斯政权的斗争。这场斗争的不同寻常之处在于,它主要是通过《白色杂志》(*La Revue Blanche*)的文章展开的。当时,《白色杂志》是法国、也许也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前卫刊物。塔里达在黎萨尔遭处决前不久动笔的一长串文章,将在古巴、波多黎各、巴塞罗那和菲律宾群岛的残酷镇压串联起来。笔杆子的斗争迅速通过无政府主义报刊传遍欧洲,传到了大西洋对岸,并很快得到了其他许多进步主义组织和杂志的强力支持。在巴黎,他主

要的盟友有费利克斯·费内翁（Félix Fénéon）和乔治·克列孟梭（Georges Clémenceau）：费内翁是《白色杂志》的主心骨、出色的艺术和戏剧批评家，还是一位坚定的反帝国主义无政府主义者，也曾毫不犹豫地亲手引爆过炸弹。克列孟梭也是一位坚定的反帝国主义者，巴黎公社时期做过蒙马特市长，结识了许多被监禁过的无政府主义者，作为记者和政客的他致力于为工人谋权利。在1897年秋爆发的德雷福斯事件当中，两人都扮演了关键性角色。

随后，该章转而考虑1897年8月9日年轻的意大利无政府主义者米歇尔·安焦列洛（Michele Angiolillo）暗杀卡诺瓦斯的背景。这起事件预告了西班牙帝国在次年的崩溃。关键人物是拉蒙·贝坦西斯（Ramón Betances）博士，这位神奇的波多黎各人密谋安的列斯群岛殖民地的独立，是西班牙和贪婪的美国的敌人。拉蒙博士本人并非无政府主义者，但他的事业最具活力的欧洲盟友，是意大利和法国的无政府主义者。最后两个大的章节以黎萨尔的密友马里亚诺·庞塞的活动，以及伊萨贝洛·德·洛斯·雷耶斯为主轴。1896年秋，庞塞溜出西班牙，不久就成为菲律宾革命政府在外交和宣传方面的关键人物，先后在香港和横滨活动。庞塞与菲律宾人还有各种外国人的书信往来颇引人注目——他的足迹遍布墨西哥城、新奥尔良、纽约、巴塞罗那、巴黎、伦敦、阿姆斯特丹、上海、东京和新加坡。本书将对他的书信进行分析，考量显示出他的影响的各种迹象，尤其是在日本以及

旅日华人群体中有哪些反映。另一方面，伊萨贝洛在卡提普南起义不久就被囚禁，最终被送往巴塞罗那的蒙胡伊克监狱。在那里他与室友们结识——一群加泰罗尼亚无政府主义者，并备受他们的感染。回到马尼拉，面对新的美国殖民政权，正是他最先将克鲁泡特金、马克思和马拉泰斯塔的著作带入他的祖国。他实践了无政府主义者们传授给他的经验，在菲律宾组织起了第一个真刀真枪的、激进的总工会。

我只想再说一点。如果读者发觉书中的故事与我们这个时代有若干相似和共鸣，这个感觉并没有错。2004年纽约的共和党大会由数千警察和其他“安保”人员保卫，大都会警察局长告诉记者，危险不是来自共产主义者，甚至不是来自激进的穆斯林，而是来自无政府主义者。几乎就在同一个时候，芝加哥竖起了干草市场无政府主义殉难者的纪念碑。《纽约时报》自鸣得意地评论道，落成典礼引燃的“激情到现在才总算完全平息了下来”。确实，美洲真是一个大洲。

1

序幕：公鸡的蛋

9 1887年，马德里的菲律宾博览会上，土人（indio）伊萨贝洛·德·洛斯·雷耶斯的西班牙语巨著手稿《菲律宾民俗学》赢得了银奖。那年他23岁，居住在殖民地城市马尼拉。不约而同地，也就是在那一年，他的同胞何塞·黎萨尔（当时25岁）在欧洲北部周游了一番后，在柏林出版了他颇具煽动性的第一部小说《不许犯我》。这本书最终使他在1896年成了殉难者，后来又使他永久地成为菲律宾的国父、第一位菲律宾人。

伊萨贝洛是谁？¹

1864年7月7日他出生在吕宋总主教所在的海滨城市

1 尽管伊萨贝洛有着漫长而光荣的生涯——这些方面本书的最后一章会有讨论——还没有人为他写过恰如其分的专业传记。接下来所讲述的他的少年生活，出自他长子 José de los Reyes y Sevilla 的作品，*Biografía del Senador Isabelode los Reyes y Florentino, Padre de los Obreros y Proclamador de la Iglesia Filipina Independiente* (Manila: Nueva Era, 1947), pp. 1-6; José L. Llanes, *The Life of Senator Isabelo del los Reyes* (从《马尼拉编年史周刊》1949年7月24日、31日和8月7日的文章重印的专著), pp. 1-6; 以及国家历史研究所 (National Historical Institute) 的 *Filipinos in History* 第二卷 (Manila: NHI, 1990) 中他所撰写的条目, pp. 137-9。



伊萨贝洛·德·洛斯·雷耶斯（右，坐者）

维甘。这座城市与越南隔南海相望，至今仍富有吸引力。他的父母属伊洛卡诺族，这个族的族人在那个年代大多是文盲。不过，他母亲利昂娜·弗洛伦蒂诺（Leona Florentino）显然是一位有点水准的诗人，所以在马德里还有后来的博览会上，都展出过她的诗歌，供西班牙人、巴黎人还有圣路易斯人赏读。¹这样的成就并没能挽救她的婚姻，伊萨贝洛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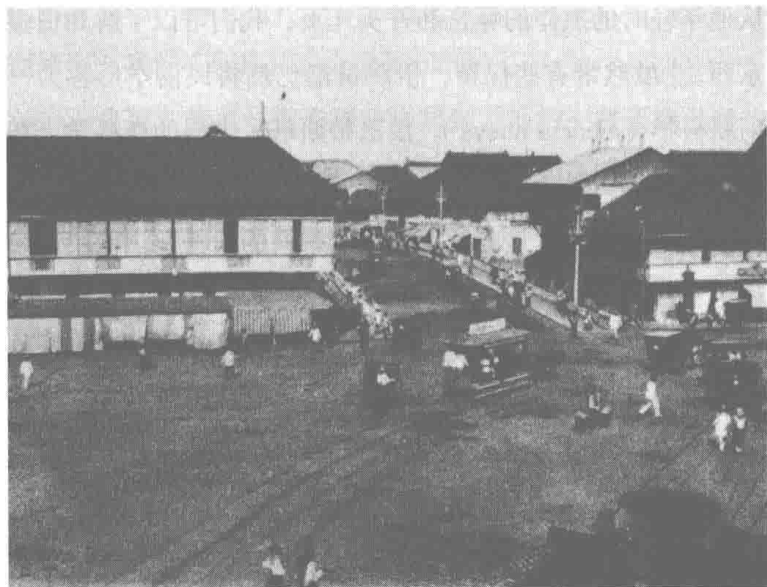
10

¹ 根据利昂娜·弗洛伦蒂诺的半官方迷你传记，她1849年4月19日出生于维甘的一个富裕家庭。她父母的姓是相同的，也许有表亲关系。他们也似乎（转下页）

岁大时就被寄养在一位富裕的亲戚梅纳·克里索洛戈（Mena Crisólogo）家中。克里索洛戈后来把他送入了奥古斯丁修会开办的地方神学院的附属语法学校。似乎是半岛上的西班牙修士品行不端，引发了这个孩子对天主教修会的仇恨。这仇恨贯穿了他的一生，对他的生涯也有着严重的后果。1880年，16岁的他逃往马尼拉，很快就在拉特朗圣若望学院（Colegio de San Juan de Letrán）取得了本科学位；之后，他在古老的道明会圣托马斯教会大学学习法律、历史和古文书学。圣托马斯大学是当时整个东南亚唯一的一所大学。

- 11 在此期间，伊萨贝洛的父亲离世，他不得不自力更生。他投身到新兴的报界，为差不多所有马尼拉的报纸撰稿，甚至在1889年出版了自己的报纸《伊洛卡诺人》。这份报纸据说是第一份纯粹用菲律宾方言出版的报纸。但在只有十来岁的时候，伊萨贝洛曾在马尼拉的一份西班牙语报纸《西班牙大洋洲》（*La Oceanía española*，创办于1877年）上读到一则消息，呼吁读者投稿，开拓一种叫作民俗学（*el folk-lore*）的新科学，并配上了简单的做法介绍。他旋即联系了西班牙人编辑，后者给了他一套“民俗学书籍”，要他写写伊洛卡诺人的习俗。两个月后伊萨贝洛便动手了，此后不久他就开

（接上页）都是何塞·黎萨尔的外公的近亲。她是个早慧的孩子，10岁便开始写诗，用的是伊洛卡诺语和修士老师教她的西班牙语。她14岁时出嫁，16岁时生下了伊萨贝洛。可惜的是，她去世时年仅35岁，留下了五个孩子。参见 National Historical Institute, *Filipinos in History*, vol. 5 (Manila: NHI, 1996), pp. 141-2。



马尼拉岷伦洛广场，约 1890 年

始发表文章——写到的不仅有伊洛卡诺人，还有他妻子的老家马拉翁（在马尼拉周边），中吕宋省的三描礼士省，以及他所说的宽泛意义上的菲律宾民族学。民俗学写作成了他毕生怀有巨大热情的几件事之一。

新科学

问题自然而然就是——为什么？民俗学，对于一位在 19 世纪 80 年代接受宗教教育的当地青年来说，意味着什么？

从他年轻时的杰作的导言和开头几页，我们可以了解到很多东西。¹虽然带有些保留，伊萨贝洛仍然将民俗学形容为一门新科学（*ciencia nueva*）。詹巴蒂斯塔·维科的新科学，在米舍莱还有其他人的推动下，在19世纪中叶风行世界。伊萨贝洛这里也许就是有意识地回应维科的新科学。他用菲律宾语和西班牙语向他的读者解释道，“民俗学”一词——他巧妙地将其翻译为民间知识（*el saber popular*）——是1846年英国古物研究者威廉·汤姆斯（William Thoms）新近于伦敦《雅典娜神庙》（*Athenaeum*）杂志上发表的文章中提出的。世界上第一个民俗学社团也方才于1878年在伦敦建立——不过是他开始研究的六年以前。²法国到1886年才跟进，此时伊萨贝洛正开始写作。一如往常，西班牙人此次在思想上又被打得措手不及；轮到他们的时候，他们不假思索便将英语词汇引入西班牙语，造出了“民俗学”。伊萨贝洛正开始让自己与走在前面的英国比肩，比亦步亦趋的半岛首府走得更高、更远。他就像是世界科学飞速进步的弄潮儿，而在这之前，土著能有这样的成就是难以想象的。就如他自己所说，“在这块偏远的西班牙殖民地，文明之光只是微微

1 此后主要会引用1889年Tipo-Lithografia de Chofré y C于马尼拉出版的原始文本。有需要的时候，这个文本将会与最近的一个重印本比照，并配有Salud C. Dizon和Maria Elinora P. Imson的英语译文（Quezon City: University of the Philippines Press, 1994）。以下英译本简称Dizon-Imson。这个新译本虽然是很有价值的尝试，但美中不足的是有数百处误译，提供的西班牙语文本也有若干讹缪。

2 *El folk-lore filipino*（以下简称EFF），p. 8.

闪着光亮”。¹他又在几个方面强化了 this 看法，考察这些方面可以对我们有所启示。

一方面，他早早就在序言中提到，他的一些研究已经被翻译成德语——当时德语是高级学术思考的语言——并发表在《外国》(*Ausland*)和《全球》(*Globus*)杂志上。他称这两份杂志是欧洲在此领域的领头羊。《菲律宾民俗学》还富有见地地讨论了盎格鲁-撒克逊学者对于这门新科学的地位的看法，礼貌地暗示他们比半岛上的那些西班牙民俗学者要严肃得多。他评价“乔治·福克斯勋爵”犯了概念性的错误，将民俗学与神话学混为一谈；还有一些西班牙当代学者犯了类似的错误，混淆了神话学与神谱学 (*theogony*)。² 做此番评价的时候他一定颇为得意。

13

另一方面，这门科学的新颖性，有着特别的、殖民的一面，也被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他将此书献给“半岛上给予我各种关注的西班牙民俗学者” (*Los folkloristas españoles de la Peninsula, que me han dispensado toda clase de atenciones*)。伊萨贝洛热情地在序言里谈起西班牙的“同行”——帝国首都的《西班牙民俗学》(*El Folk-Lore Español*)和《马德里自由教育公报》(*Boletín de la Enseñanza Libre de Madrid*)杂志还有塞维尔的《民俗学公报》(*Boletín Folklórico*)杂志的编委们——他们使他在进行研究的同时了解半岛上的研究

1 *EFF*, p. 19.

2 *Dizon-Imson*, p. 30.

动态。

这些同行的（可以说）半岛性（Peninsularity），还有他们的研究的半岛性，时常为学界所诟病。伊萨贝洛对此没有明说，但（确切地）暗示了殖民地的西班牙人或者克里奥人并没有在菲律宾做任何类似的研究。这当然也就意味着，他可以标榜自己远远走在了殖民地主子的前头，正在开拓这门新兴的普世科学。为了解释这一特殊的局面，伊萨贝洛做了精巧的布置——当然是迫于由神职人员主导的殖民地当局的暴力和反动。他讲述了自己在马尼拉报界与一位倾向自由主义的医师（几乎是半岛人无疑）同时也是一位业余文学家的人物之间的往来。这位医师以阿斯托尔（Astoll）为笔名向地方上的报纸供稿，两人之间的交流颇为文雅。¹ 这样他就可以引用这位半岛人的话，说他欣赏伊萨贝洛的勇气和想象力，但对他面对殖民地内那种压倒性的冷漠、懒惰和思想麻木究竟有多少成功的机会感到深深的悲观。“这里只有茅草和莫拉菲荆（Molave）——当地两种坚韧的野草——在疯长。”² 最终，阿斯特尔绝望地断绝了两人的交往。伊萨贝洛曾间接地发问，为什么“某些团体”（指的是修会）没有任何贡献；而此时的他评论道，在此时局之下，“小心谨慎无法改变现状”。可见，伊萨贝洛认为自己是在将现代欧洲的

1 伊萨贝洛认定他是何塞·拉卡勒·伊·桑切斯（José Lacalle y Sánchez），圣托马斯大学的医学教授。EFF, p. 13.

2 EFF, p. 14.

光亮带到殖民地，照亮殖民地政权的思想黑暗。

新颖性还以另一个面貌出现在《菲律宾民俗学》当中，这是和科学的理念相关的。序言中对于民俗学研究是否具有科学地位的大争论，有极其有趣的讨论。伊萨贝洛开心地注意到，半岛民俗学家中有一派迫不及待地想要把民俗学变成一门理论科学，以至于很快他们都无法相互理解了——这也

14

就为亟需的国际讨论打开了道路；而在这场国际性的讨论中，盎格鲁-撒克逊学者显得更谦虚也更务实。还有一些西班牙民俗学家处在另一个极端，他们只是些多愁善感的收集者，把正在消失的习俗和观念收集起来，供未来的人们建造陈列过去事物的博物馆。伊萨贝洛说明了他眼中的民俗学是什么以及他如何看待其社会价值。首先，它为重构菲律宾被殖民前的过去提供了机会，并且是唯一的机会。因为在菲律宾群岛，前西班牙时代的遗迹和碑铭缺失，书面记录也几乎没有。（后来黎萨尔也曾试着做过同样的事，却发现除了从征服时代早期西班牙官员的记录中探究言外之意以外，别无他法。）严肃地研究习俗、信念、迷信、谚语、绕口令和咒语等，可以从中看出他所说的“原始宗教”在前西班牙时代的情况。但是——在这一点上，这位年轻的伊洛卡诺人与业余的风俗研究者（*costumbristas*）截然不同——他还指出了比较的重要性。他坦陈，做完研究以前，他一直相信，相邻的塔加洛人和伊洛卡诺人是不同种族（*razas distintas*），理由是它们有不同的语言、面相、行为，等等。但比较研究可以

证明他以前的观念有误，其实这两个民族明显是从同一个源头而来的。《菲律宾民俗学》这个标题的深意就在于进一步研究可以证明，这个群岛上所有土人，不论现在所说的语言多么繁多，不论他们目前的习俗和宗教派别多么不同，都有着相同的起源。这一切就意味着，殖民地的教会历史学家从16世纪西班牙征服开始叙述的做法并不正确，菲律宾群岛及其人民（pueblo/pueblos，他经常犹豫是否要用复数形式）的真实历史其实要悠久得多，因此不能被套在殖民这个框子里。

地方性知识的财富

在另一方面，伊萨贝洛也和许多半岛上的同行划清界限：这门新的科学不能也不应该局限于因为猎奇而去发掘。《菲律宾民俗学》最关注的是当代，尤其是民间知识（saber popular，伊萨贝洛生造的术语，今天我们会用“地方性知识”这个术语）。这种知识是货真价实的知识，而不是带有腐臭味、古物收藏含义的“传说”（lore）。他举了一个假设的例子，比如在他老家南伊洛卡诺附近的森林里，一个野人（selvaje）某天也许会（偶然，伊萨贝洛说）发现某种当地的水果比西班牙医学家费朗博士生产的药品更能有效地杀
15 灭霍乱杆菌。¹他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当时对于菲律宾群

1 Dizon-Imson, p. 24.

岛上几乎所有事物，人们都还没有形成严肃的科学知识。比如，几位奥古斯丁会修士编纂的《菲律宾植物志》（*Flora de Filipinas*）就还远远谈不上全面。¹ 土著人对于人药植物、对于花草和动物、对于土壤和气候变化的了解，都比殖民者要深入得多；而这容纳在民间知识中的庞大知识储备，尚未为世界所知。因此，菲律宾群岛不仅是个有着大量欧洲人所不知的异域事物的地区；岛上一般人所知道的、用他们自己的语言表达的，而西班牙人还不知晓的东西，日后还将会为人类做出巨大贡献。恰恰是菲律宾群岛的“未知性”，赋予了菲律宾民俗学以一种未来导向性，而这也正是半岛西班牙民俗学所必然缺失的特征。不过，同样也是菲律宾群岛这种活的具体性，使之与其他任何国家都能平起平坐，为人类提供些许助益。正是这个逻辑，才造就了后来的联合国。到目前看来，一切都是明明白白。也许是太过明白了吧。虽然伊萨贝洛写的主题光明磊落，但他的书还是掩藏着深意的。我们且从下面三个题目来考虑。

首先，伊萨贝洛怎样认识自己的身份？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首先有必要指出，西班牙语中 *filipino* 一词本身就含义模糊。在伊萨贝洛的青年时期，人们口中的这个形容词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意思：（1）属于、位于、来源于菲律宾群岛的；（2）混血，当地出生但位于“纯西班牙人”社会阶层的。

1 *Ibid.*, p. 11. 编辑者称，这本书经多人汇编，安德烈·纳芙修士编辑成书，由 *Plana y C* 于 1877 年在马尼拉出版。

Filipino 一词今天的意思，即一种土著的民族—种族，在当时并不存在。只需将伊萨贝洛序言中的一句话与最近两位菲律宾学者的英语翻译略做对比，就可以看到词义的变化之大。伊萨贝洛写道：“Para recoger del saco roto la organización del Folk-lore regional filipino, juzgué oportuno contestar al revistero del Comercio y, aprovechando su indirecta, aparenté sostener que en Filipinas había personas ilustradas y estudiosas que pudieran acometer la empresa.”¹ 这句话的字面意思是：“为了挽救菲律宾地区的民俗学组织，我认为回击《商业报》(El Comercio)的评论员正当此时。容我利用他的影射，坚持我的看法：在菲律宾群岛，开化而且有学问的、能够承担这项任务的人是存在的。”英译本的翻译完全犯了时代错误：“我要回答《商业报》的专栏作家的指责，以此为菲律宾民俗学的组织辩护；我斗胆认为，这项任务确实有菲律宾人学者可以胜任。”² 伊萨贝洛想的其实是某种包括菲律宾群岛地区在内的全球性的民俗学，说的其实是菲律宾群岛上的文化人（没有说具体种族）。英译本的译者忽略了“地区”一词，编织出一种菲律宾人的民俗学，又用新奇的“菲律宾人学者”替代了“开化人”。

1 EFF, p. 13.

2 Dizon-Imson, p. 18.

森林兄弟

伊萨贝洛在《菲律宾民俗学》中并没有称自己为“菲律宾人”。这种民族主义的用语在当时的殖民地还并不常见。更何况，*filipino* 恰恰指的是他并不是的一种身份：克里奥人（*creole*）。不过，他确实有用其他方式描述自己：比如，他有时候说自己是一名土著（但他从未用过带有贬义色彩的西班牙语词汇“*indio*”），有时候又说自己是伊洛卡诺人。他有一段话很值得注意。他说道：“说起爱国主义，报纸上不是常说，对于我而言，只有伊洛克人和伊洛卡诺人才是好的吗？……每个人都用自己的那种方式思考，来为自己的人民服务。我相信我现在就是在为阐明我的人民的过去做贡献。”不过，在另一处，他又坚称自己恪守客观性，以至于“为了科学而牺牲了自己对伊洛卡诺人的感情，使得他们抱怨我发表的都是他们最不具有吸引力的一面”。但幸运的是，“欧洲很多学者给了我热情的回应，他们说我抛开了受到误导的爱国主义，为研究伊罗戈——我亲爱的故乡——指示了方向，因为我为学者们提供了充裕的材料，以研究其史前史，和其他与这个……省份相关的科学话题 [原文如此]”。¹

黎萨尔那部愤怒的小说《不许犯我》以一篇非常著名的前言拉开序幕。在这篇致故乡的前言里，有这样几句话：

1 *EFF*, p. 18 and 17.

- 17 “我希望你幸福，因为你的幸福就是我们的幸福，我（为你的病痛）寻找最好的解药，我会像古人对待患者一样为你治疗：让他们坐在神庙的台阶上，这样每个前来求神问卜的人，都可以给个方子。”^{1*} 在他 1896 年被处决前的最后一首诗中，他同样讲到了亲爱的故乡。但他和伊萨贝洛说的是同一回事吗？

《菲律宾民俗学》的序言里，伊萨贝洛用一句美丽的话描述了自己：“森林人民的兄弟，埃塔人，伊各洛人还有庭吉安人。”* 这些所谓的原始人，在 20 世纪降临以前，大多不信基督教，很多人从未受西班牙殖民政权统治。他们一直生活在伊罗戈狭隘的海岸平原侧翼长长的山脉上。少年时代的伊萨贝洛一定曾看到过他们从山上森林下来，“穿着古怪”，用森林的物产交易平原上的商品。当时，有一种形式的伊洛卡诺语充当着大山脉（Gran Cordillera）的混合语。在伊萨贝洛的时代，不会有其他人用这样的话来说这些居住在森林中的人们，因为在他们看来，这些人居住在未被驯服的要塞里，完全与城市的、西班牙化的、天主教化的区域相隔绝。（而且那时伊萨贝洛没有称菲律宾群岛上其他任何族群为自己的兄弟。）这里我们开始看到，他是如何可能将自己家乡那块地方看作一个大民族和亲爱的故乡——因为这个概念以最具体的方式，让山中“野蛮”的异教徒与曾在马德里获过奖的

1 何塞·黎萨尔，《不许犯我》（Manila：Instituto Nacional de Historia，1978），标题页。

青年结为兄弟。我们在此也不难觉察出，为什么伊萨贝洛在其早期的民族主义活动中选择了民俗学，而没有选择小说或者报纸。民俗学——比较民俗学——使他能够跨越殖民地社会最深的裂痕。这道裂痕并不在被殖民者和殖民者之间——他们都生活在低地，都是天主教徒，彼此时时都在打交道。真正的深渊，在所有这些人与那些我们今天会叫作“部落少数”的人之间——那些正面临着被同化乃至灭绝的未来的山地人、游牧一刀耕火种的农民、“猎头族”等男女老少（这很有可能是一个暴力的过程）。因此，从民俗学这个威廉·汤姆斯创造的孩子，衍生出了一种新奇的兄弟关系；民俗学也为年轻的伊萨贝洛创造出了一个亲爱的故乡。

特别之美

这位菲律宾群岛的民俗学家，他的作品有何更深的意图呢？除了它为现代科学和重构“原始人”的特征方面所做的潜在贡献，我们可以找到三个具有鲜明政治特征的意图。首先，是地方文化复兴的可能性（希望）。伊萨贝洛在这里表现出的谨慎颇显机灵，他让阿斯托尔代表自己说道：

18

也许，民俗学可以为菲律宾诗歌 [poesía filipina] 提供源泉。这是一种受菲律宾主题所激发，诞生于菲律宾游吟诗人 [vates] 心中的诗歌。我已经能够

听到，那些曾大肆取笑你的人正发出嘲讽的笑声。但就让他们笑吧，因为他们也嘲笑了这个民族的天才 [ingenio] 的其他体现，然后就不得不摸不着头脑地对 [胡安] 卢纳和 [费利克斯] 雷苏莱西翁的桂冠顶礼膜拜。你今天告诉世人的这些传统和迷信活动，总有一天会给伟大的诗人，还有这富裕花园的特别之美的热心爱好者们以灵感。¹

在文中另一处，伊萨贝洛又引用了阿斯托尔的话说道：

在此之前，对土著人特征的描述仅仅是出自技艺拙劣的画匠之笔，而如果说德·洛斯·雷耶斯的研究和考察将各个族群联结成了菲律宾民族，那么，它对未来有多大的价值，我们可想而知。

伊萨贝洛在马尼拉发表的作品将使本土人 (naturales) 的文学和诗歌天赋出现大的繁荣，而那些笨拙的半岛人和克

1 *EFF*, p. 15. 我们后面还会提到这位胡安·卢纳 (Juan Luna, 1857—1899年)。他也是伊洛卡诺人，是西班牙殖民时期最著名的土著画家。他的《克利奥帕特拉之死》在1881年马德里的精致艺术展览会 (Fine Arts Exposition) 上得了银奖，《角斗士尸冢》在1884年的展览会上获得金奖，《勒班陀之战》则在1888年巴塞罗那的精致艺术展览会上获得金奖。费利克斯·雷苏莱西翁·伊达尔戈·帕提拉 (1853—1913年) 的成就只比胡安·卢纳略为逊色。伊达尔戈是塔加洛人，出生于马尼拉，和卢纳一样在那里长大。

里奥人将不得不稀里糊涂地俯首拜服。这便是反殖民民族主义者们的通常的希望和策略：将自己“提升”到与帝国主义者平等的地位。

伊萨贝洛的第二个意图应该是推翻反动教会在殖民地的统治。这个意图不动声色地体现在以“在欧洲发现的伊洛卡诺迷信”为题的一章当中。它以这样的脉络展开：

利用安达卢西亚的亚历杭德罗·吉乔特（Alejandro Guichot）博士和路易斯·蒙托托（Luis Montoto）博士，马德里的欧亨尼奥·德·奥拉瓦利亚·伊·瓦尔特（Eugenio de Olavarría y Huarte）博士，加泰罗尼亚的何塞·佩雷斯·巴列斯特罗斯（José Pérez Ballesteros）博士，阿斯图里亚斯的路易斯·吉内·亚利佛（Luis Giner Arivau）博士，葡萄牙的佩德罗索参谋长（Consigliere Pedroso）及其《葡萄牙人的民间传统》（*Tradições populares portuguesas*）一书还有其他人所搜集的民俗学素材，我做了一个列表，将我所知的过去几个世纪里西班牙人所带过来的迷信罗列出来。读者并不应该对这张表感到惊讶，因为在西班牙统治的早期，半岛上正时兴着最为荒谬的迷信 [las creencias más

absurdas]。 ¹

略带淘气地，这张列表开头是这样写的：

当公鸡步入老年，或者是在某人家中度过了七
 个年头，它们便会生一个蛋，这蛋会孵出某种绿色的
 蜥蜴，会杀死那家的主人；不过，葡萄牙人和法国人
 说，那蛋孵出来的是条蛇。如果是它先发现主人，那
 么主人就会死，但如果是主人先看到蛇，那就是蛇死。
 意大利人、英国人还有一些中欧人相信它孵出来的
 是一种蜥蜴状的妖怪。费若（Feijóo）神父说道：“确
 实，公鸡到年老的时候，真的会下蛋。”不过，葡萄牙
 人和伊洛卡诺人则认为，鸡蛋里是一只蜥蜴。 ²

1 EFF, p. 74. 伊萨贝洛连续加了脚注，给出了这些作者的著作：*El Folk-Lore Andaluz; Costumbres populares andaluzas; El Folk-Lore de Madrid; Folk-Lore Gallego; Folk-Lore de Asturias*。他也随意地提及了自己早先的一部作品，称其为“一部长篇的文学讽刺（largo juguete literario），这部书的标题为“菲律宾群岛上的恶魔：以我们的编年史为依据”（*El Diablo en Filipinas, según rezan nuestras crónicas*）。

2 EFF, p. 75. 他给出的出处有：佩德罗索那部之前引用过的作品；Rolland, *Faune populaire de la France*；Castelli, *Credenze ed usi popolari siciliani*；V. Gregor, *Notes on the Folk-Lore of the North-East Scotland*（原文如此）；Larousse, *Grande dictionnaire encyclopédique du XIX siècle*。从伊萨贝洛的脚注中可以看出，他能够阅读西班牙语以外其他几大罗曼语（法语、意大利语和葡萄牙语）以及英语。德语则似乎超出了他的范围，虽然我们后面会看到，它对于黎萨尔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语言。

还有很多这样的例子，读起来令人欲罢不能：“为了确保客人不会留在家里过夜，伊洛卡诺人会在客人的椅子上撒盐。西班牙人会在门后面竖着放一把扫帚，而葡萄牙人则会在同一个地方的长椅上放一只鞋子，或是往火里扔盐。”“卡斯提尔人和伊罗戈人一样，会把掉下来的牙齿扔到房顶上，这样新的牙齿会长出来。”“加利西亚人相信，如果猫洗脸了，那天就要下雨；伊洛卡诺人说，如果我们给动物洗澡，天就会下雨。”“加利西亚人说，要是猫到处疯跑，就会刮大风；菲律宾群岛的人则把猫换成了蟑螂。”最后：“伊洛卡诺人相信床头板不能朝东。但对于半岛人（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朝东是好的。但大家都同意，床头板朝南会带来霉运。”

不难看出伊萨贝洛为什么会因将这本书献给半岛的民俗学家而感到一种独特的愉悦（singular placer）。那些民俗学家为他提供的严谨的素材，可供他证明，如果殖民者对伊洛卡诺人的迷信嗤之以鼻的话，他们也应该认识到许多迷信是从他们那里舶来的：我们很容易地就可以在伊比利亚、意大利、中欧甚至英国找到与伊洛卡诺奇怪的民间信念相似的东西。 20

第三个目的是政治自我批判。伊萨贝洛写道，系统性地展示了民间知识以后，他想要证明，改革人民的观念和日常习惯时，必须带有一种自我批判的精神。他认为自己的作品所讲的东西“比简单地嘲讽自己的同胞（paisanos）要严肃得多”；他是希望当他们在看到自己被写到书里以后，会学

着去改正自己”。从这个角度看，民俗学会是摆在一个民族前面的一面镜子，好让他们在未来可以更稳当地在人类解放的道路上前行。所以，伊萨贝洛是在为一个半读者写作：一个是西班牙人，他是在用他们的语言写作；另外这半个是他自己的人民，他没有用他们的语言写作，而只有很少一部分人能读懂他的书。

在这项任务中，伊萨贝洛给自己的定位是怎样的？至此我们终于到了探究最有趣的部分。伊萨贝洛在他几百页的书里，几乎没有以伊洛卡诺人的身份说话，或者至少可以说他超然于自己的民族之外。在他的笔下，伊洛卡诺人总是用“他们”而不是“我们”来指代。比如：“那些伊洛卡诺人（los Ilocanos）相信，雷电所产生的火焰，只能用醋，而不能用水来熄灭。”更能体现这一点的是：

对于芒芒奇克究竟是什么，伊洛卡诺人无法给我们以完整的解答。他们说，根据天主教对恶魔的定义，芒芒奇克并不能算作恶魔。^{1*}

这里，伊萨贝洛将自己放到了世界民俗学者之中，从高处俯瞰“伊洛卡诺人”，而且还不动声色地将他们的迷信与“天主教徒”的相似信念区别开来。

1 Dizon-Imson, p. 32.

与此同时，好多段落有着颇为不同的调子。在开始呈现他的研究成果时，伊萨贝洛写道：

伊洛卡诺人，尤其是北伊罗戈人，在砍伐山中
树木以前，会唱如下诗句：

Barí, barí!

Dika agunget pári

Ta pumukan kami

Iti pabakirda kami

字面翻译过来，这几句话的意思是：Barí-barí 21
(伊洛卡诺语里的感叹词，西班牙语中没有对应)，
不要生气，伙计，我们也只是奉命行事。

在这里，伊萨贝洛又把自己坚实地放在了伊洛卡诺人的世界里。他知道这些伊洛卡诺语的意思，但他的读者并不能看懂：对于他们来说（这里的“他们”对伊萨贝洛而言不仅指西班牙人，而且包括其他欧洲人，以及群岛上的非伊洛卡诺土著），这样的体验是封闭的。伊萨贝洛是善良而严谨的人。他希望告诉外人有关这个世界的东西，但他并不是简单平滑地复述。读者常会撞见无法理解的伊洛卡诺语原文，后面才是一个翻译。更有甚者，有些词还没有翻译，就比如

barí-barí 这个西班牙语中没有对应的感叹词。这里边不仅是无法翻译的内涵，而且也许还有许多无法比较、难以共通的东西。

我敢肯定，伊萨贝洛担心自己的西班牙语不够完美，可能会受到那些“笨拙的画匠”还有“吹牛之人”的嘲笑。他也许同样清楚，自己正在使用的那种民俗学方法论，在民俗学体系中也许是不确切的，也许很快就会随着科学不断在全球大步前进时而被取代。但具体的他有 barí-barí，笼统的他有伊洛卡诺语这两颗定心丸。在这个层面是无人能够质疑他的。不过，他需要展现自己的王牌（至少展现一半）。这是揶揄者所享受的满足感：亲爱的读者，这里给你看的是伊洛卡诺语，但你们只能看到我允许你们看的部分；而有些东西你们实际上是看不到的。

伊萨贝洛还有第三种立场，这使问题变得更加复杂。他在关于“音乐、歌曲和舞蹈”的一章里如是写道：

Dal-lot 的歌词很值得了解一下。*Dal-lot* 有若干小节，每节有八行诗句，有着伊洛卡诺语独有的押韵方式，可见于下：

Dal-lang ayá daldal-lut

Dal-lang ayá dumidinal-lot.

我之所以把它录成文字给你们看，因为我不懂怎么翻译，甚至也不理解它的意思。即便我是伊洛卡诺人，它在我看来似乎也不是有意义的话。¹

但因为它是真正的伊洛卡诺特色，也许也因为这甚至是双语作者本人也迷惑不解的地方，所以仍然“很值得去了解”。伊萨贝洛就此打住，没有再做猜测。但他暗示了民间知识博大精深。

22

因此，我们看出三种难以自洽的处境：外部（他们无法给我们以完整的解答），内部（barí-barí 在西班牙语没有对应），以及内部之外（即使我本人是伊洛卡诺人，我也不清楚这对伊洛卡诺语叠句的意思；但我是在跟“你们”，而不是“我们”说话）。

比较性反思

从 18 世纪末到我们这个憔悴的世纪，民俗学研究都被证明是民族主义运动的基本资源——尽管它从未有意识地如此定义自己。在欧洲，它们为民间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推动力，尤其是在农民、艺术家、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与正统力量的复杂斗争中，将他们联结在一起。城市里的作曲家

1 *Ibid.*, pp. 258-9.

寻觅民间歌谣，城市诗人捕捉并改造了民间诗歌的风格与主题，小说家转而开始描写民间乡村。随着新近想象出来的民族共同体走向富有吸引力的未来，一个有用而真实的过去似乎比其他任何东西都更有价值。

通俗语言的印刷物几乎总是处在民俗学的中央。挪威民俗学家会用“新挪威语”（而不是丹麦语和瑞典语）来复原挪威的民间知识；芬兰人会用芬兰语写作，而不用瑞典语和俄语；这一幕在波西米亚、匈牙利、罗马尼亚、塞尔维亚等国家都反复重演。而即使是在并不完全如此的地方——比较鲜明的例子是爱尔兰复兴主义运动，它用的是盖尔语和许多爱尔兰人掌握得很好的殖民语言英语——人们的终极目标依然是民族自我复原、“唤醒”和解放。

初看之下，我们很容易被伊萨贝洛的尝试之特别性所触动，因为他正在为非本民族的人写作，用的是帝国的语言。而菲律宾群岛上，懂这门语言的土人只有大概3%，他的同胞伊洛卡诺人里面也许只有1%能明白。如果说，在欧洲，民俗学家主要是为了他们的同胞写作，为了向他们展现他们共同而真实的起源，那么可以说，伊萨贝洛主要是为了他所身处的这样一个早期全球化社会而写作——以证明伊洛卡诺人和其他土人完全有能力、有热情在平等和自主贡献的基础上进入那个世界。

伊萨贝洛的研究也使他的祖国有别于周边的许多东南亚地区殖民地。在其他殖民地，虽然也有一些作品产生，可以

不是很正规地归入“民俗学研究”的范畴，但它们大多是由教育良好的殖民地官员进行的——在那个从没有收音机和电视机的时代，他们的闲工夫实在太多了；他们的研究主要是为了帮助殖民地统治者，而不是供被研究的人群使用。独立之后，这些前殖民地国家的民俗学研究处在边缘地带，而在后殖民时代的菲律宾，民俗学研究就要好得多。为什么会是这样？答案也许在于，其他殖民地保存了大量前殖民时代的书面记录——王室编年史、佛教经书、寺院记录、苏菲派小册子（Sufi tracts）、宫廷文学等——正是这些东西为兴起的民族主义运动提供了本土资源和实实在在辉煌过去。偏远的菲律宾并没有强大、集权的文官政府的传统，受伊斯兰教和佛教的影响也非常之小，所以无须多少武力，大部分居民就皈依了基督教。从这个角度来看，民俗学是古代辉煌的替代品。

另一种解答（也许是更好的一种）在于19世纪伊比利亚帝国主义的本质。西班牙和葡萄牙虽然曾为世界的中心，但从17世纪中叶以后就不断衰落。失去了拉丁美洲以后，西班牙帝国大幅缩水——只占领着古巴、波多黎各、菲律宾群岛和里奥德奥罗（Rio de Oro）。整个19世纪，西班牙都在挣扎着实现从封建制的过去向工业现代性的转型，因而饱受内部倾轧的困扰。在很多西班牙人眼里，西班牙是个落后、迷信、几乎没有工业化的国家。这种看法流传很广，不仅是欧洲人，甚至在西班牙残余的几个殖民地的年轻知识分子眼

中都是如此。（这也就是为什么伊萨贝洛为自己的书出了德语版而感到得意，而后来其他殖民地的民俗学家则寻求在他们“自己”的帝国首都出版。）几乎未曾在西班牙飘扬过的启蒙运动的旗帜就这样展开。伊萨贝洛视自己为受过启蒙的人（*ilustrado*），德尼·狄德罗的曾孙；因此自然而然与半岛上一大批西班牙人并肩作战。从整体上看，这种跨越大洲的同盟在欧洲民族主义者中并不多见，因此，这位年轻的伊洛卡诺人将自己的书献给他在西班牙的同行似乎是十分正常的。

不过，与此同时，如我们所见，“落后的”菲律宾恰恰是19世纪东南亚唯一拥有一所名副其实的大学的殖民地——虽说这所大学是由立场极端的道明会所办。圣托马斯学校教过伊萨贝洛；伊萨贝洛的许多民族主义伙伴也是他的校友。这可以从根本上解释，为什么菲律宾在世纪末尾成为亚洲第一个发生民族主义革命的地方。

启蒙是通过“落后的”西班牙那并不落后的语言传到菲律宾的。这场启蒙的首推者（广义上的）因此都（至少）能说两种语言。（第一代菲律宾知识分子中有不少还在马尼拉学习了拉丁语和一点法语；如果他们出国深造，也许还会习得英语和德语。）我们无从发现他们对这门罗曼语有丝毫反感或者不信任，即便这门语言受阿拉伯语影响很大，是反动和启蒙共同的媒介。为什么会这样呢？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无疑，其中一个原因是，与在拉丁美洲大部分地区不

同，西班牙语在菲律宾从没有成为主要语言。当时的菲律宾通行着十多种主要的地方口语，这在今天也是一样；伊萨贝洛的著作中从来没有表露出他把西班牙看作对伊洛卡诺人的深刻威胁的想法。而且，在他看来，卡斯提尔语不仅是与西班牙，也是（通过西班牙）与所有现代性、科学和文明的中心对话的必要语言媒介。它与其说是一门殖民语言，不如说是一门国际性的语言。伊萨贝洛从没有考虑过他用西班牙语写作是否会背叛他的人民，或是被主导文化所吸收。这一点令人惊讶。我认为，他之所以会有这看似单纯的立场，是因为在19世纪80年代，菲律宾群岛未来的地位还看不确切，某种政治解放的前景在视野中仍若隐若现。

这种不稳定性与地方的情况当然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归根结底，其根源在于半世纪以前拉丁美洲的解放。西班牙是19世纪唯一失去了自己的帝国的列强。拉丁美洲成了近在眼前的被殖民者获得解放的例子。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情况，与20世纪的新世界全然不同。在彼时的新世界，西班牙语“永久性”地取得了对所有拉美土著语言的主导地位，同时也成为了同样“永久性”地受到压迫的美国少数族裔的语言。两者都看不到获得解放的可能。

尽管如此，如我上面所说，伊萨贝洛年轻时候的作品多有保留之处，是颇有启示意义的。这体现在他费力地在我和他们、我们和你们之间切换主语上。即便他是在为一个半听众写作的时候，他也总是想着两个听众。“他们所说的爱国

主义是一种高尚而神圣的情感；生来就没有这种情感的人是最糟糕的。”他写道。西班牙语对于他绝不是民族语言，而仅仅是国际语言。但是否有一种可以与之对立的民族语言呢？并不然。即使是使用人口最多的地方语言（北方的伊洛卡诺语，中部的塔加洛语，南部的宿雾语），也都是相对小的少数语言，它们的出版物也才刚刚发芽。他自己的那门语言，是否可以明确地与哪个祖国联系起来呢？一片假设的伊洛卡诺人之国？他从没有这样说过。此外，还有埃塔人和伊各洛人，它们有自己的语言，同时又是他的兄弟们。他在研究中也发现，那些塔加洛人与伊洛卡诺人并非“截然不同的种族”；但他作为这个真相的发现者，知道塔加洛人或者伊洛卡诺人里明白这一点的人还几乎没有。于是，在他23岁时，这种流动的状态将他带回到他成长的那个边界模糊的文化；他也自觉在某些地方超越了这个文化。因此，伊洛卡诺的民间知识（或者说文化）在它这位年轻的爱国者看来，是应该从外部来探究，同时又从内部去体验的。他要将之展现给全世界，但也想要予以纠正——当然，通过伊洛卡诺人自己的努力。他的母语伊洛卡诺语，因此成了某种需要去翻译，但有些部分无法被翻译的语言。在某些时候，它甚至悄然超出了这位年轻的、受过启蒙的双语作者清晰的视域。



27 究竟为什么说他看得很清晰呢？也许将伊萨贝洛的性情、经历和工作与他遥远的塔加洛表亲何塞·黎萨尔做个对比，可以让我们最好地了解其中缘由。这也正是本章要写的内容。

伊萨贝洛热情、务实、富有活力，但投入自省的精力并不多。他 20 岁时结婚，第一任妻子为他生了六个孩子，后来她在 1897 年初春不幸去世。（后来，他又相继娶了两任妻子，分别是西班牙人和中国人。这两任妻子都死于分娩，都生了九次孩子。）¹ 由于有一大家子要养，他拼命工作，从事文学和文化新闻报道、民俗学研究，也做各种小生意，都颇为成功，直到 1896 年菲律宾革命爆发。对于这个事件，他最初还只是个惊讶的观众。虽然他对修会的敌意是众所周知的，他写的东西却似乎从未让他陷入什么严重的政治麻烦。他是在殖民地首府混得不错的外省人，对自己的生活大体满

1 参见 Llanes, *The Life*, pp. 6-8, 13-15, 20-24.

意。一直要到 1897 年夏天他 33 岁的时候，他才去了欧洲。而且我们将会看到，此次欧洲之行完全是迫不得已——他被套上镣铐，送到了巴塞罗那蒙胡伊克要塞受拷问。他年轻时候所了解的欧洲，多是友好的学者、业余民俗学家和世界另一边的记者寄过来的信件、书籍和杂志。光辉的进步触手可及。

年长三岁的黎萨尔也不见得闭塞：他爱好沉思，敏感、时时自省，务虚而且很了解自己的天分。他也许在被处决的那个夜晚才结了婚，没有孩子。他 1882 年前往欧洲，此时他才刚过了 21 岁生日。接下来的 10 年里，大多数时间他都在欧洲居住——起先在西班牙，然后到法国、德国、英国和比利时。他语言天赋很强，习得了英语和德语，甚至还会点意大利语。无疑，他对于欧洲的了解，在深度和广度上都在他的国人之上。他在西欧职业民族学圈子里结交甚广，但他早期发表的著述主要是言辞优雅的争论文章，论述的是政治话题，有关他被殖民的祖国的状况。随后他变成了小说家，1887 年出版《不许犯我》，1891 年出版《煽动者》。这两部小说，也许是 19 世纪亚洲作者写的仅有的“世界级”作品。正可谓一夜之间，他成了国内最富争议的知名“土著”。

在有限的意义上讲，这两部小说堪称横空出世。在《不许犯我》之前，由菲律宾人写作的小说只有一部，而且写得

非常拙劣。¹但对于这两部小说的问世，我们如果从一个更宽广的背景来看，会发现情形颇为不同。

超越民族的图书馆

19世纪中叶以前，“好小说”的创作基本上都是法国和英国二元垄断。在此之后，帕斯卡尔·卡萨诺瓦所说的“世界文学共和国”的边界迅速向全球扩张。²梅尔维尔（生于1819年）的惊人之作《白鲸》面世于1851年，随后是略没有那么惊人的《骗子》（1857年）；冈察洛夫（生于1812年）的《奥勃洛莫夫》也在1857年出版，屠格涅夫（生于1819年）的《前夜》（1860年）和《父与子》（1862年）紧随其后。爱德华·陶威斯·德克尔（生于1820年）1860年发表的《马格斯·哈弗拉尔》（*Max Havelaar*），是第一部反殖民主义小说。1866年有陀思妥耶夫斯基（生于1821年）的《罪与罚》和托尔斯泰（生于1828年）的《战争与和平》。随后，第三世界开始崭露头角，巴西的马查多·德·阿西斯（Machado de Assis，生于1839年）写了《布拉斯·古巴斯身后回忆录》（*Memorias póstumas de Bras Cubas*，1882年）。与黎萨尔同

1 佩德罗·帕特尔诺（Pedro Paterno），长黎萨尔四岁，于1885年发表了《尼奈》（*Ninay*）。

2 Pascale Casanova, *La République mondiale des lettres* (Paris : Éditions du Seuil, 1999) .

时代的，有波兰的康拉德（生于1857年），孟加拉的泰戈尔（生于1861年）和日本的夏目漱石（生于1867年），不过他们的主要作品都不及这位悲剧的菲律宾人的作品早。从这个角度看，黎萨尔的作品算得上是早成的，但完全没有隐士般的魔力。

卡萨诺瓦颇为雄辩地指出，在历史上，世界文学共和国边缘的作家们，通过尝试闯入文学之都，以不同的风格挑战其预设，以形成自己的原创性。本章后面部分将大致叙述黎萨尔是如何、在何地完成了这项任务的。首先不得不承认，小说以外的证据相当不足。黎萨尔写有大量书信，而且令人惊讶的是很大一部分都保存完好。此外，他还有日记和各种有关文学问题的未出版作品。虽然如此，他通常对其他作家，尤其是小说家闭口不谈：他年轻时候用法语写过一篇短文，评论高乃依的原创性，后来又在柏林写过一篇短文（也是用法语，作于1887年），讨论都德的《庸人达达兰全传》（*Tartarin sur les Alpes*）；他对尤金·苏和陶威斯·德克尔有只言片语的评价，有几段赞赏席勒的话，还引用了海涅。¹

1 菲律宾国家图书馆有这两篇法语文学论文，以及一篇短文《圣枝主日》（写的是基督教作为穷人的宗教而兴起，及它落入富人手中之后的堕落）的微缩胶卷。《论皮埃尔·高乃依》这篇文章笔迹潦草，而且题目也未经雕琢，让人感觉是黎萨尔学生时代所写，不过这篇文章又很巧妙地引用了伏尔泰“出色的”《对高乃依戏剧的评论》（*Commentaire sur le théâtre de Corneille*）和莱辛的《汉堡剧作家》（*Hamburgische Dramaturgie*），这一点也许可以推翻前面的看法。另外两篇出自黎萨尔未发表的笔记，一篇是“Cuadernos de médica clínica”，还有一篇思考圣枝主日，从落款看当作于1887年的柏林。原稿似乎藏于芝加哥的埃耶尔图书馆。

两人藏书的记录可以间接地为我们提供一些线索。黎萨尔本人从欧洲带回菲律宾的藏书中，有夏多布里昂、A. 都德、大仲马（5）、雨果、勒萨热、苏（10）、伏尔泰、左拉（4）这些法国作家，英国作家布尔沃·利顿、笛福、狄更斯和萨克雷，德国作家歌德和霍夫曼，意大利作家曼佐尼，荷兰作家陶威斯·德克尔，还有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从他信中能看出他还读过安德森、巴尔扎克、赫布尔（Hebel）和斯威夫特。¹ 这个名单很可能无法充分反映他在欧洲读过的书，因为他明白，带回去的书会受到殖民地海关和警察的严格检查。但有一点并不会错，即这份书单体现出法语作品在他的小说阅读中处在多么核心的地位。

最近，医生同时也是杰出语文学家的特立尼达·帕多·德·塔维拉（Trinidad Pardo de Tavera）死后留下的书籍和文章已经编目完成，可供马尼拉雅典耀大学的研究者利用。黎萨尔与帕多是关系很亲近的朋友。1885—1886年，他在巴黎的七个月里，便曾在帕多富丽堂皇的住所里住过一阵子。

30 这一时期他开始创作《不许犯我》。帕多的书目里，法国作家主要有阿布（2）、亚当、巴尔扎克、班维尔（2）、巴

1 参见 Esteban A. De Ocampo, *Rizal as a Bibliophile* (Manila: Bibliographical Society of the Philippines, Occasional Papers, No. 2, 1960)。德·奥坎波不仅为这个现在已经不复存在的藏书编了目，而且还在其中加入了黎萨尔在书信中提及的书和作者。蒙19世纪晚期菲律宾史的权威安贝斯·奥坎波（与德·奥坎波没有关系）指点，我得知德·奥坎波的目录并不完整；黎萨尔手中还有大量未编入的图书卡，现藏于马尼拉的洛佩兹博物馆图书馆。



在帕多的公寓。后排左二为里萨尔

比塞、巴雷斯、比贝斯科、布尔热（2）、法莱尔（3）、福楼拜、弗朗士（5）、雨果、罗兰、莫泊桑（2）、莫里哀（6卷全集）、普雷沃和左拉，西班牙作家有阿拉贡、巴罗哈（2）、布拉斯科·伊巴内斯（10）、哈尔多斯（16）和拉腊，俄罗斯作家有安德列耶夫（6）、契诃夫（3）、陀思妥耶夫斯基（3）、高尔基（4）和屠格涅夫，盎格鲁-撒克逊作家仅有柯南·道尔（2）、哈加尔德（Haggard）、欧·亨利（4）、吉卜林、辛克莱尔和萨克雷（22卷全集）。我们再次看到，

- 31 法国作家占据了最主要的部分。¹ 两人藏书的主要差异在于，帕多的藏书里没有德语著作，而黎萨尔的藏书里几乎没有西班牙的书，这一点很是奇怪。

上述背景颇能反映一些东西，但还不具有决定性。因此，我们现在要看看黎萨尔的小说本身能体现出哪些内涵。这里边不乏令人惊奇之处。

石榴里的硝化甘油

在一定程度上，《不许犯我》可谓是一部现实主义风格的小说：它有精彩的讽刺，还扼要地描绘了 19 世纪晚期菲律宾殖民地社会。小说讲述了一位年轻富裕、名叫克里索斯托莫·伊瓦拉（Crisóstomo Ibarra）的混血儿，在欧洲留学多年后回到祖国。他立志娶儿时的青梅竹马玛丽亚·克拉拉（Maria Clara）为妻，并且在他的故乡开办一所现代世俗学校。小说结尾处，由于贪婪的修会人士所设计的反动阴谋以及殖民地当局的腐败无能，这些梦想都宣告破灭。玛丽亚·克

1 帕多活到了 1925 年。列出的 93 部虚构作品中，有出版社和出版日期的都来自 20 世纪——也就是在黎萨尔死后。只有四本书的出版时间在 1891 年黎萨尔回国之前。但有至少 30% 的书没有出版日期。帕多很有可能在回国前，丢下了他在巴黎攒下的书，或是送给了友人；回到马尼拉以后，他立刻重新购买了喜欢的书，也买了不少新书。因此，我们无法从雅典耀大学的目录得知，黎萨尔住在帕多那里的时候可能读过哪些书，但它却能让我们很清楚地看到帕多全球化的阅读喜好。值得注意的是，帕多的收藏几乎没有诗歌，也几乎没有古代的东西，而我们会看到，黎萨尔的藏书里这两者都有不少。

拉拉的真实身份是一位淫乱的方济各会修士的孩子，她因此隐居女修道院，不再露面，而伊瓦拉本人似乎被修会构罪，被当局当作革命者枪杀。¹

《煽动者》更是奇怪。读者渐渐发现，伊瓦拉根本没有死——他高贵的另一自我，埃利阿斯（Elias）牺牲了自己的生命而拯救了他。在古巴和欧洲游荡多年，作为珠宝商人积累了无数财富之后，伊瓦拉回到祖国。他用古怪的“西蒙”（Simoun）作为自己的化名，以一头白色长发、戴着遮住上半部分脸的深蓝色眼镜的憔悴形象出现在世人眼前。他此行的目的，是让已经腐化的政权更为腐化，直到它激起武装起义。他希望起义能够摧毁殖民体系，解放玛丽亚·克拉拉。一颗巨型硝化甘油炸弹被引爆是小说叙述的高潮时刻。这颗炸弹藏在一盏石榴外形的珠宝台灯里，引爆的场所是全体殖民地精英所参加的一场盛大婚礼上。玛丽亚·克拉拉在爆炸中丧生，西蒙受了重伤，在被逮捕前死在孤寂的沙滩上。菲律宾史上，没有任何“真实”事件可以与西蒙及其夸张的密谋相呼应。我们也许可以认为，这本小说是预言小说，时间设定在未来——尽管一个多世纪里将不会有其他菲律宾人如此描写未来。后面会证明为什么这样设想并非没有道理。而现在我们要问的是，究竟是什么启发了黎萨尔，让他以如此独特的方式写下了《不许犯我》的续集呢？

1 关于《不许犯我》我写过两篇论文，都重刊在我的《比较的幽灵》（London：Verso, 1998）一书当中，所以本文对此只做粗略讨论。

巴尔的摩的遗产？

32 我在1998年写的那本书中，误译了《不许犯我》开头一个精彩的词组：“比较的幽灵”（el demonio de las comparaciones）。年轻的伊瓦拉有过怪诞的体验。当他重新见到马尼拉破旧的植物园时，他发觉自己脑海里闪现出来的一直都是他在欧洲时常参观的大植物园。此时，黎萨尔就是用这个词组描述伊瓦拉的。仿佛，他再也不能简单地把眼前这熟悉的对象当作其本身来认识。但是，这幽灵在作者自己身上也大行其道。黎萨尔在巴黎和柏林写作，写的却是一位马尼拉那边（allà）的青年，而这位青年想着的又是……那边，也就是柏林和巴黎。¹我当时陶醉于这复杂的图景，却完全忽视了一件极为重要的事。《不许犯我》满是强烈的讽刺和诙谐的反思，但这句话最怪诞、最没有讽刺意味。

大约也就在那个时候，我的弟弟佩里也被这个词组所触动，写信告诉我它可能出自何处：马拉美（1842—1898年）题为“比喻的恶魔”（Le Démon de l’analogie）的散文诗。这首诗最初大概创作于1864年，此时黎萨尔只有三岁。1874年，这首诗以“倒数第二”（La Penultième）为标题，在《新世界杂志》发表，随后以最初的标题发表在1885年3月28日

1 有关这一摇摆不定的“那边”，参见我与乔纳森·卡勒的书信往来，收录于 Jonathan Culler and Pheng Cheah, eds, *Grounds of Comparison* (New York: Routledge, 2003), at pp. 40-41, 45-6, and 228-30。

的《黑猫》上。¹他提示说，黎萨尔也许是受这首诗的激发，因为就在三个月后，他住到了巴黎。

起初，我对此的反应是怀疑。尽管黎萨尔12岁进入雅典耀这所马尼拉耶稣会士的精英中学之后，就开始学习法语，但要他对付一篇如此难懂、如此深奥的文本，似乎不太可能。但到了后来，这个建议似乎有点看头。据称，马拉美的题目是以一种创造性的方式，向波德莱尔的《恶魔》（“Le Démon de la perversité”）致敬，而波德莱尔的《恶魔》翻译自埃德加·艾伦·坡的故事《悖理的恶魔》（“The Imp of the Perverse”）。²这个故事起先于1839年在文化荒原巴尔的摩发表，是坡的《怪异故事集》（*Tales of the Grotesque and the Arabesque*）的一部分，后来收入了波德莱尔译本的第二卷。³于是乎，就浮现出许许多多的可能性，形成了一个奇

33

1 合适的英译本，参见 Bradford Cook, trans., *Mallarmé: Selected Prose Poems, Essays and Letters*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56), pp. 2-4; 这个文本的尾注（第108—110页）包括了一部简要的出版历史。库克指出，它与埃德加·艾伦·坡（1809—1849年）“Berenice”的故事有显著的相似处。这则故事可见于艾伦·坡的《故事集》（*Tales*, Oneonta: Universal Library, 1930），第219—238页。

2 坡，《故事集》，第455—461页。也许读者还记得，坡的故事以第一人称讲述了一个设计了一起完美谋杀的人，他压抑不住向众人宣布自己的聪明才智的冲动，最终承认罪行。“imp”一词没有什么特别引人注意的地方，而且没有基督教色彩。翻译成法语最贴切的词语是 *lutin*。波德莱尔决定用 *démon* 一词，赋予 *imp* 以一个巨大而又古老的天主教光环。

3 波德莱尔翻译的艾伦·坡作品即1856年出版的《奇异故事》（*Histoires extraordinaires*）和1857年的《新奇异故事》。“*démon*”是第二部译作的开篇故事。这本书以及波德莱尔的导言，都收录在他的《全集》（Paris: Louis Conard, 1933）第七卷。《恶之花》的这位天才作者最初在1847年见到坡的作品，为之开（转下页）

怪的链条——从坡的心理神经质的恶魔，经过波德莱尔的半神学《恶魔》和马拉美古怪的诗歌灵感来源，到住在欧洲的殖民地人黎萨尔的政治想象。但黎萨尔有没有读过波德莱尔或者坡呢？不论是德·奥坎波的目录（参见前文第46页注释1），还是洛佩兹博物馆图书馆馆藏黎萨尔的卡片，都没有提到坡、波德莱尔和马拉美中的任何一位。

同种疗法的学生

接下去来了第二个机缘巧合：同性恋研究的领军人物、菲律宾大学的尼尔·加西亚（Neil Garcia），恰好将他文章的草稿寄到了我的办公室。加西亚自问黎萨尔是不是同性恋，又用福柯式的语言否定地回答了自己的问题：19世纪80年代菲律宾还不存在同性恋。而且，加西亚似乎觉得，黎萨尔作为来自第三世界的乡巴佬，在性的方面肯定是很单纯的。¹但这篇论文提醒人们注意《煽动者》里面《马尼拉类型》

（接上页）怀不已的他在之后16年里花了很多时间翻译坡的故事集。参见 Patrick F. Quinn, *The French Face of Edgar Poe* (Carbondale: 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1954), p. 9, 14 and 101.

1 对于在马尼拉成长、尚未成年的黎萨尔来说，有可能真的是这样。但在他的私人藏书中，出现了皮埃尔·德尔库尔的 *Le vice à Paris* (4th edition, Paris, 1888)，Dr P. Garnier 的 *Onanisme* (6th edition, Paris, 1888)，菲利普·里克尔 (Philippe Ricord) 的 *Traité des maladies vénériennes* (Brussels, 1836) 和筏蹉衍那 (Vatsyayana) 的 *Le Kama Soutra* (Paris, 1891)。这说明学习医学以及之后10年里读到的书让他颇晓风月之事。

(“Tipos Manileños”)一章当中的一小段话。¹在法国杂耍团惹人瞩目的首场演出上，刻薄的学生塔迪欧(Tadeo)给他的乡巴佬表弟灌输各种小道消息，各种有关观众当中马尼拉精英的丑闻。塔迪欧一度这样评论道：

那位有头有脸、穿着考究的绅士不是医生，而是特别的同种治疗师；他在任何事情上都采用同类相合的原则。那位和他一起来的年轻骑兵队长是他最喜欢的学生。*

34

这则小道消息没有挑明言下之意；更何况，听他讲话的是一个根本不懂拉丁语也不懂同种疗法(homeopathy)是什么意思的乡下孩子。他所暗示的同性性行为，超出了他这位表弟的理解范围。换言之，塔迪欧实际上似乎是在向更深谙世故的读者说话。

读者又是谁呢？在我查询了《煽动者》原始手稿的复印本后，这个问题变得更为迫切。因为我看到，黎萨尔首先写了如下这句话，后来又将它画去了：“profesa en el amor el

1 后面的那句拉丁语是把著名的格言“类病类治”(similia similibus curantur)做了诙谐处理。这句格言出自德国医生克里斯蒂安·弗里德里希·萨缪尔·哈内曼(Christian Friedrich Samuel Hahnemann)，他有一部标杆性的著作，黎萨尔藏有它的法语译本：*Exposition de la doctrine médicale homéopathique* (Paris, 1856)。José Rizal, *El Filibusterismo* (Manila: Instituto Nacional de Historia, 1990), p. 162。

princ... similia similibus gaudet.”¹ 如果说 princ 就是 principio 这个词的话，整句话就可以翻译成：“他在爱情上也践行同性相悦的原理。” Gaudet 在拉丁语中是一个感情色彩强烈的词语，表示愉悦、幸福甚至狂喜。不难看出黎萨尔为什么觉得这个表述更好。艺术上讲，它完全与塔迪欧玩世不恭的个性格格不入——塔迪欧从来没有讲到过“爱”（amor）。但从文化和道德上讲，这无疑爆了菲律宾修士的丑闻。另外，在殖民地时代晚期的马尼拉，是否真的有什么显赫人物，带着他帅气的军人男友，出现在大的公共场合呢？似乎不太可能。²（不过有一篇更早的史料值得注意。它描绘了十分明目

1 José Rizal, *El Filibusterismo*, facsimile edition (Manila: National Historical Institute, 1991), p. 157b (overleaf); -bus 上标, similia 结尾的 a 看似是 s 的改写。那么，作者最初的构思应该是语法正确的 similis simili。

2 不过，费利克斯·洛克萨斯（Felix Roxas）对 1877—1878 学年有过描写（当时黎萨尔 16 岁，还在雅典耀念书）。他回忆起当时男孩们在学习了维吉尔和费内隆之后，排演了一出奥林匹斯山男神女神的戏。这出戏应该是他们自己编的，因为维吉尔和费内隆都不是剧作家。[费内隆这位法国作家早年接受的是耶稣会教育，参与了反对詹森主义的斗争。雅典耀的男孩们之所以知道他，无疑是因为他的神学“小说”《忒勒马科斯》（*Télémaque*）。在 19 世纪 80 年代马德里的菲律宾学生圈子里，每个人都有一个好笑的外号，严肃认真、后来成为医生的伊西德罗·德·桑托斯（Isidro de Santos）当时的外号就是“年轻的忒勒马科（*Telémaco*）”。参见 Nick Joaquín, *A Question of Heroes* (Manila: Anvil, 2005), p. 44.]

不用说，剧中所有角色，无论男女都是由这些十来岁的男孩扮演。洛克萨斯写到，他们正值青春期，所以有些男生之间发展出了激情。事情发展到监护这些孩子的神父截获了一封正在递送的情书。参见 Angel Estrada 和 Vicente del Carmen 翻译的《费利克斯·洛克萨斯的世界》[*The World of Felix Roxas* (Manila: Filipiniana Book Guild, 1970)], 第 330 页。这本书是 1906 年到 1936 年间洛克萨斯用西班牙语为《争鸣》（*El Debate*）所写专栏的英文译本。

张胆的年轻男妓贸易。) ¹

而在另一方面，接下去一章里也有同样令人吃惊的段落，不过加西亚并没有提及。这一章的标题是“演出”（*La función*），讲述的是场群舞演出，以及各个人物对它的反应。有一幕演的是女仆、佣人和马车夫（*cochers*）在仆人区寻

1 为我们提供这则史料的，是可敬的波多黎各革命者、“安的列斯”民族主义者拉蒙·贝坦西斯博士。他在19世纪90年代中期成为古巴和菲律宾民族主义武装起义的关键，后面第五章将对此有所讨论。1877年，贝坦西斯在丹麦一块叫作圣托马斯的小殖民地（1917年作为维珍群岛的一部分卖给了美国）短暂停留，逃避西班牙殖民地当局的追捕。在此期间，贝坦西斯为《独立报》（*La Independencia*）写了两篇讽刺文章，标题是“马尼拉的自治”（*La autonomía en Manila*），刊载于9月29日和10月27日两期。《独立报》是住在纽约的古巴和波多黎各流亡人士的发声器。[摘自 Haraldo Dilla and Emilio Godínez, eds., *Ramón Emeterio Betances* (Habana: Casa de las Américas, 1983), pp. 205–10。编者对原文拼写做了“现代化”的调整。] 在第二篇文章中，作者如此嘲讽了新任菲律宾总督（1877—1880年）多明戈·莫里奥内斯（Domingo Morriónes）：“公主们给的津贴，他也肯定是笑纳了。马尼拉公主们的房子（妓院）就如同古巴的奴隶制，是‘受大主教批准的西班牙式制度’。出现在这些房子里的，确切说来不是公主，而是来自天朝的王子——中国王子——10到16岁的男孩子。他们像孔雀一样，坐着马车在街上招摇而行，举止透着女人气，穿的也近乎是女人的服装，恬不知耻地将同样恬不知耻、跟在他们（阴性）或者他们（阳性）后面的家伙们带到他们的房子里去。公主屋不过是另一种人口贩卖的形式，但它每年向市政府上缴4000比索。这个理由就足以让大主教先生反对将其关闭。有位愤慨的改革派克里奥律师对此表示抗议，他为他的愤怒和改革付出的代价就是被关到了马里亚纳群岛。但这个行当实际上赚不了多少钱；莫里奥内斯将公主、锁、股票还有桶交给修道士们也不无可能，毕竟他们很适合干这行。”*

如果这段话是真实的——4000比索听上去也不像是假币——那就意味着，16岁的黎萨尔在那边上学校的时候，就有这些华人娼妓在马尼拉招摇过市。他们都是大城市的少年学生，他的同学们不太可能不知道这回事。为此，如果马尼拉当时的市政档案还在的话，有必要做一番研究。

36 欢作乐。女仆很有可能是做饭的；用人的性别不是那么明显，也许是女佣。但马车夫肯定是男性，不会有错。不过，这三群人都是由女演员扮演，马车夫穿着女装，令人发笑。到了这章末尾，美丽的机会主义女混血儿保利塔·戈麦斯（Paulita Gómez）在观众中看到了这些日子正向她求爱的学生公子伊萨加尼（Isagani）。匿名叙事者描绘了她所感到的妒忌之情：

想到这些被称为车夫的女孩子也许会占据伊萨加尼的注意，保利塔感到越发沮丧。车夫这个词让她想起女修道院学校的姑娘之间所使用的某种称呼。她们用这个词来表示一种特别的感情。^{1*}

车夫是一个阳性名词；马车夫是“骑”在马上，所以有明显的性的意味。“特别的感情”指的是什么也就不难理解了。我们还能跟进一步推断，这里边还涉及某种性—社会学的现实，因为作者通过叙述者的评论，将这个法语词解释为少女们的暗语——请注意这里叙述者话锋一转，突然用了概括性的现在时态 *usan*（“她们”在彼此之间使用）。

有趣的一点是，这个段落在影印版里没有出现。也就是说，黎萨尔在最后才将这段插入进去。为什么呢？“同种疗法”和“马车夫”对于小说的叙述而言都无足轻重，也仅仅

1 *El filibusterismo* (1990), p. 173. 着重系原作者所加。

分别在这两处出现，之后就未再提及。随手之笔？似乎不太可能。专门为菲律宾人读者插入的段落？不无可能，但这里用的是很随意的笔调，而且在此之后一个多世纪，都不会再有菲律宾人作家用这种暗示指代男性或女性同性行为。¹ 另一个可能的解释则是，黎萨尔在写这些段落的时候考虑的是他的欧洲读者。²

1 有一部分原因在于美国殖民主义及其所建立的教育机器的影响。从教界以外请来的学校教师，还有（后来）像从波士顿和巴尔的摩这些地方来的天主教神职人员，其实完全不懂古典文学文化。但黎萨尔那一代人里由那些西班牙耶稣会士所培养出来的年轻人，都要接受训练以熟练地阅读古典拉丁语。德·奥坎波的书目就很清楚地体现了这一点。黎萨尔在卡兰巴图书馆藏有：凯撒、西塞罗、贺拉斯、李维、卢克莱修、奥维德、普劳图斯、塔西佗和修昔底德。（在书信里，黎萨尔也讲到了埃斯库罗斯、普鲁塔克、索福克勒斯和色诺芬，我怀疑他看的应该是这些作者著作的译本。）古典拉丁语诗歌没有受基督教影响，充满了对（人和神的）男性爱情关系的描绘或者提及。贺拉斯用幽默、维吉尔用柔情写下了他们爱过的少年。黎萨尔没有提到柏拉图，但难以想象他没有读过柏拉图的《会饮篇》。即便修道士们曾尝试检查这位菲律宾少年所读的书，他们也无法防止学生们想象那样一种不受基督教束缚的、高度文明的文化。美国人的到来关闭了这座通往神奇的古代世界的大门。（黎萨尔之后不会再有菲律宾作家拿有“好几个乳房”的以弗所的戴安娜开玩笑。）没有教养的北美人对黎萨尔之后几代人的损害，虽然令人感到遗憾，不过却很少受到注意。

2 我的论文“Forms of Consciousness in *Noli me tangere*,” *Philippine Studies*, 51:4 (2003), pp. 505–29 对这部小说的词汇做了统计学分析，提供了有力证据证明，黎萨尔的一部分写作对象是一般欧洲读者。最能说明这一点的是叙述者大量使用塔加洛语日常用语，作者为它们配上了西班牙语翻译。西班牙语翻译当然不会是为说塔加洛语的读者，或者久居殖民地的西班牙人看的。它主要写给不怎么了解菲律宾的欧洲人。作者插入那么多塔加洛语，有一部分的原因似乎是他希望让读者相信，虽然他有一个西班牙语名字，但他确实是个土生土长的知情人士。

那里

不管怎么说，黎萨尔提到了同种疗法，也在我不怎么真切的记忆中勾起了和声。我隐约记起一部同时提到同性恋和同种疗法的小说——怪诞、惊人、前卫的《逆天》(*À rebours*)。作者是半荷兰、半法国血统的小说家乔里-卡尔·于斯曼(Joris-Karl Huysmans, 1848—1907年)。16岁的时候我偷偷摸摸地半读过这本书。随后我发现，记忆只对了一半：同性恋内容有，同种疗法也有，但两者的语境基本没有联系。是黎萨尔巧妙地将两者放到了一起？但德·奥坎波那本小书以及洛佩兹博物馆的图书馆卡片里都没有于斯曼这个名字（这本书就连醉心于法国的帕多·德·塔维拉也没有收藏）。而且，《逆天》虽然早在1884年出版，西班牙语译本却迟至1919年才问世（由文森特·布拉斯科·伊巴内斯撰写前言），这已是黎萨尔去世很久以后的事了。¹第一个英语译本也差不多在那个时候出版。²如果黎萨尔真读过《逆天》，那他肯定只能读法语原版。也许，于斯曼和黎萨尔

1 瓦伦西亚的普罗米修斯出版社以“背面”(Al revés)为书名出版了于斯曼的《逆天》。

2 《逆天》最初于1884年5月由沙尔庞捷(Charpentier)在巴黎出版。参见罗伯特·巴尔迪克为自己的译文所作的导言, *Against Nature* (London: Penguin Classics, 1959), p. 10。我相信, 最早的英译本应该是 *Against the Grain* (New York: Lieber and Lewis, 1922)。这个版本信手删去了原书情色的段落, 导言也显得很油滑、不那么诚实, 因为其作者正是伪激进主义性学家哈弗洛克·埃利斯(Havelock Ellis)。他甚至弄错了原作的出版时间。之后的版本复原了被删去的部分。



乔里-卡尔·于斯曼

两人都把同种疗法和同性恋放到各自创作时间相差不到七年的小说里纯属偶然。不过，于斯曼的小说还是值得一读的。 38

《逆天》有着一个单身、远离世人的主人公——富裕、优雅的贵族德赛森特（Des Esseintes）。主导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的庸俗资产阶级、天主教教会的腐败、政客们见不得人的勾当、粗劣的大众文化等，令他感到相当沮丧，以至于逃避到了私人的小世界当中，搞起天马行空的美学：培养奇特的性经验、前卫的文学、洛可可式的古物收集，以及“中世纪的”

基督教神秘主义。他还为自己打造了一栋奇异而造价不菲的房子；其设计旨在驱逐自然，因为他将其视为已经过去的事物。比如，房子里没有真的花朵，而都是用罕见、奇特的宝石人造的；完全用宝石点缀的龟甲压得宠物龟奄奄一息。这不由得让人想到《煽动者》里的主人公西蒙，他的独特、财富和权力，正是来自倒卖稀有和古老的宝石。这里又是一个巧合？

也许是。但两部小说中还有关联性更强的地方。《逆天》里有长长的一章铺陈德赛森特前卫的文学偏好。那一章专门赞扬了于斯曼的密友马拉美，并且列了这位贵族最喜欢的书。作者特别提到了马拉美这位伟大诗人的《比喻的恶魔》（“Démon de l’analogie”）。¹ 他也提到了波德莱尔的《邪魔》（“Démon de la perversité”）和坡的译文。² 如果黎萨尔的法语还不足以驾驭散文诗原作的话，《不许犯我》里这个有趣的点子会不会直接来自他在《逆天》里读到的马拉美的作品？但于斯曼和黎萨尔两人的作品最为惊人的巧合，其实在于《煽动者》。我仅列举三点，都与不同种类的性行为有关。

福楼拜和一位未来的杀人犯

我们首先要讲的，是《逆天》中的一个场景。几乎没有

1 Joris-Karl Huysmans, *À rebours* (Paris: Fata Morgana, n.d., but c. 1904), p. 244.

2 *Ibid.*, p. 235.

性能力的德赛森特交了一位短期的情人。这是一位年轻的女口技演员。为了让自己进入状态，他购买了两座雕塑，一座是彩绘泥俑，雕刻的是经典传说中的奇美拉。奇美拉是神话当中的一只雌性怪兽，由狮子的脑袋、山羊的躯体和蛇的尾巴组合而成。另一座系黑色大理石雕成，代表着同样是雌性、同样残暴的斯芬克斯。这两座雕塑摆放在卧室尽头，只有幽暗的煤炉火的余光为之照明。德赛森特事先教他的情人为两尊雕像在坟墓中的对话配音，其中包括福楼拜在《圣安东尼的诱惑》（*La Tentation de Saint Antoine*）里的一句名言：“我寻找新的香水、更大的花朵、未曾尝试过的快感。”^{1*} 此刻，德赛森特的希望和计划实现了——他找回了自己的男子气。

《煽动者》的第十八章非常独特。它的标题是“欺骗”（*Supercherías*）。涉及的人物是西蒙和利兹先生，后者是一位熟练的美国魔术师，同时也是口技师。西蒙调教他的场景不由得让人联想起著名的一幕：哈姆雷特用演员来摇动他继父负罪的良心。² 利兹先生为古埃及男子木乃伊的脑袋配上了声音，讲述了数千年来在精于算计的神父手中所经历的各种

40

1 参见 Gustave Flaubert, *La Tentation de Saint Antoine* (Paris: A. Quentin, 1885)；这个文本收录于福楼拜《全集》第五卷。圣安东尼最后所受的折磨中，有一幕即他看到尼罗河河岸上，奇美拉和斯芬克斯这两大神话中的怪兽交谈的场景。奇怪的是，福楼拜认为斯芬克斯是雄性的。是不是因为这个词在法语语法当中是阳性的缘故？文中所引用的这句话是奇美拉所说的，第254页。

2 1884年4月26日，黎萨尔在马德里观看了《哈姆雷特》的演出。这一条记录可见于他的 *Diario en Madrid, 1 enero á 30 junio 1884*, in *Diarios y memorias. Escritos de José Rizal*, Tomo I (Manila: Comisión del Centenario de José Rizal, 1961), p. 127.

骇事——恰好复制了好色、奸诈的道明会神父萨尔维对年轻的伊瓦拉和他不幸的爱人玛丽亚·克拉拉所犯下的罪行。这位道明会士抵不住诱惑看了演出，看过这一幕他因陷入迷信的恐慌而昏厥。奇怪的是，利兹先生用一个词“斯芬克斯！”来召唤显然是男性的木乃伊脑袋。¹于斯曼笔下纯粹属于性和文学的角色，似乎在黎萨尔这里转换了性别，成为了心理和政治的角色。

接下去又发生了一件奇特的事。德赛森特在街上撞见了一位少年，并带他去了一家非常昂贵的妓院。²他付钱让凡达（Vanda）给这个少年启蒙。凡达是位经验丰富、善于魅惑的犹太妓女。男孩初尝风月之事不亦乐乎的时候，德赛森特正在与一位他很熟悉的夫人交谈。这位洛尔（Laure）夫人说道：

“所以你今天来不是为了自己……但这毛孩你究竟是哪里捡来的？”“在路上，我亲爱的。”“可你没喝醉吧。”这位老妇人嘟囔道。略加思索，她带着母亲般的微笑说道：“我明白了！你这调皮鬼，你是要年轻的。”德赛森特耸了耸肩：“你没说到点子上；哦！根本不是这样，”他说道，“真相是，我

1 Rizal, *El Filibusterismo*, p. 135. 就是说，利兹先生是福楼拜的崇拜者？

2 *À rebours*, pp. 103-6, 这是第六章的一部分，在哈弗洛克·埃利斯作序的1922年纽约版中被完全删去。

只不过在培养一个杀手。”*

否认了对这个男孩有任何性趣之后，他解释了自己的计划。他会花钱让这男孩和凡达学六个礼拜，到时再把他一脚踢开。到那时候，男孩已经有了性瘾，为了继续嫖妓就开始盗窃，最后成为杀手。德赛森特的终极目标是“为这个勒索我们的可恶的社会多培养一个敌人”。但是，这不过是一种道德/不道德层面和美学层面的姿态而已。多一个堕落的少年本身并不会让法国有什么改变。

但是，《煽动者》里的西蒙则想用他的计划去改变一切。41 年轻的医学学生巴西利奥的弟弟被教士谋杀，他母亲因此成了疯子。抗争中的巴西利奥感到无助，而西蒙这样跟他说道：

受到邪恶体制的迫害，我游遍了整个世界，日夜劳动，为的就是积攒一笔财富，好让我的计划成功。现在，我回到国内来摧毁这个体制，加速它的腐化，将它推向它正不知不觉猛冲过去的深渊——即便泪水和鲜血会为此流淌成河。那体制正在那儿，在自行走向毁灭，而我希望能在死前看到它在深渊底下粉身碎骨。^{1*}

1 *El Filibusterismo*, p. 46.

在此期间，他会用大量的财富进一步腐化整个“敲诈勒索”的殖民地秩序——让它更贪婪，让腐败更普遍，让暴行更可怖，让剥削更深入骨髓，让大洪水袭来。我们前面讲过，他最后的谋划是在一盏精致的胡伊斯曼斯式珠宝台灯中装入一大颗硝化甘油炸弹。这盏灯外形是个石榴，被放置在一场婚礼上。所有马尼拉殖民地高层官员都会参加这场婚礼。与此同时，巴西利奥挚爱的未婚妻朱莉为了不落入好色的卡马罗（Camarro）神父手中而自杀。现在，这个男孩已经做好了成为“这个邪恶的殖民地社会的又一个敌人”。他很快就相信了西蒙的话，认为要报自己的血海深仇，就应该去协助组织一场无情的屠杀，杀掉所有不支持“革命”的成年男性。¹这不是一种美学上的姿态，而是一个政治计划。它让我们想到，19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正是暗杀的高潮期，既绝望又怀有希望的无政府主义者在欧洲和美国实施了引人注目的暗杀。这里面的相互联系，将会在后面一章里详细讨论。

未曾尝试过的快感

最后，《逆天》里有一节讲到德赛森特在街上碰到了一位帅气的少年。之后的几个月里，他和这个少年有一段性关

1 *El Filibusterismo*, chapter 30, 33, 35.

系，作者概括地描写道：

德赛森特每每回忆起来就不禁开始颤抖；他从未承担过比这更诱人也更绝对的负担；他从未体会过与之相仿的危险，也从未感到过如此甜蜜的满足。^{1*}

42

这几句话不能脱离语境去理解。德赛森特是和于斯曼一样的异性恋，身后有一长串情人。与男孩的恋情让我们想到福楼拜笔下奇美拉的那句名言，他此时更像是在探求未曾尝试过的快感。

《煽动者》中没有与这一节对应的内容，小说里的西蒙看上去几乎是与性无缘的。不过，对优雅的“同种疗法”医师和他最喜欢的学生的描述（作者改掉了一半），这一点也许能提供一个背景。《逆天》讲到德赛森特对于诗歌有前卫的品味时，不仅给了马拉美最高的赞赏，而且还有保罗·魏尔伦（1842—1896年）；1903年小说再版，于斯曼为之写了序言，称如果阿尔蒂尔·兰波（1854—1889年）在《逆天》最初出版的那年发表了她的诗集的话，他当时也会给兰波以同样的赞誉。但兰波划时代的作品《彩图集》（*Les Illuminations*）在两年后的1886年才问世，正好赶在《不许

1 *À rebours*, pp. 146-8；本文所引用的段落见第147页。



位于屯唐的KNIL兵营，在爪哇三宝壟港南面的山上。1876年7月，兰波在脱队前曾在此服役两周

犯我》的前头。此时的兰波已经抛弃了诗歌，抛弃了欧洲。¹

1 人们通常将兰波逃离欧洲与他在亚丁做业务员（后来在哈拉尔为梅内利克做军火走私商）的那10年联系起来。但他第一次真正离开欧洲的旅行是在1876年，他作为荷兰殖民地军队的雇佣兵前往荷属印度群岛。无疑，他清楚三年前殖民地政权开始了征服亚齐人的计划，这个血腥的计划最终持续了30多年。6月20日，他从亚丁抵达巴伐利亚，在集中训练营过了两周，然后被送往中爪哇。到那儿两周后他脱离了军队，成功躲避了当局追捕；在和苏格兰船长进行了某种讨价还价之后，他坐上这艘人手不足的运糖船返回欧洲。他假扮成水手，化名“霍尔姆斯先生”，经由好望角，在90天劳累的航程之后抵达科克，随后于12月初出现在法国。他曾服役过两周的兵营在屯唐（在三宝壟港背后凉爽的山丘上），（转下页）

魏尔伦和兰波在 1870 年有过“声名狼藉”、极具争议的恋情，他们有些诗作明白地讲到了他们之间的性关系。魏尔伦是于斯曼的终生好友，而且，在前卫文学圈子里，鄙视资产阶级的、官方的、正统天主教的道德观被视为一种荣誉。¹1885 年后半年黎萨尔曾在巴黎居住。这个时间正处在《逆天》和《彩图集》分别引发轰动之间。后来，之所以他还曾时常访问巴黎，之所以《煽动者》中有男性和女性同性恋的暗示，很有可能是因为他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所浏览的巴黎图书和期刊的刺激。况且，女同性恋自巴尔扎克以来就在 19 世纪法国文学中很是时髦。可想而知，写这些段落也就是在声明自己属于卡萨诺瓦所说的“世界文学共和国”。 43

也许还有最后一点值得注意，即在《逆天》之前，于斯曼曾发表过描绘巴黎社会的文章——文中透露出他早期受文学教师左拉的影响——标题是“巴黎人类型”。即使不是在语调上，也至少在名称上，它与《煽动者》中讽刺的“马尼 44

(接上页) 至今仍完好无损。1879 年他回到亚丁。[感谢乔斯·维比索诺 (Joss Wibisono) 告诉我这条信息以及下面的参考文献。] 1882 年夏初，真纳号在亚丁停泊。它随后将驶入红海，开往欧洲。不妨想象一下，20 岁的黎萨尔在真纳号甲板上向 28 岁的兰波挥手，这会是多么美好的场景。参见 Graham Robb, *Rimbaud* (London: Picador, 2000), Chapter 25; Wallace Fowlie, *Rimbaud: A Critical Stud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5), pp. 51ff.

1 顺便值得一提的是，那时候的巴黎——与伦敦、柏林、巴塞罗那一样——已经有了组织化的地下男女同性恋酒吧和聚会点，爱好旅游的于斯曼也曾多次与同性恋朋友、作家让·洛兰去过。参见 Ellis Hanson, *Decadence and Catholicism*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chapter 2 “Huysmans Hystérique,” esp. at p. 149.

拉人类型”相呼应。而巧合的是，黎萨尔的第二部小说，与于斯曼又一颗前卫炸弹在同年出版。那颗炸弹，便是恶魔般的《那里》——西班牙语译名也不错：《那儿》（*Allá*）。

法语的奢华

于斯曼就差不多说到这儿，除了我还需说明的，《逆天》1884年5月面世后，凭借其惊世骇俗，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这本书尤其惹恼了天主教界，以及正派（*bien-pensant*）的资产阶级社会。¹14个月后，24岁的黎萨尔来到巴黎，一直住到1886年1月，而后前往德国。《逆天》仍然是这个城市讨论的文学话题。黎萨尔在巴黎做了什么，我们知之甚少。可以确信的是他听了一位后来十分出名的眼科医生的课。但他和亲近的菲律宾朋友住在一起，这些人里不仅有语文学家特立尼达·帕多·德·塔维拉，还有画家胡安·卢纳。后者比黎萨尔更早来到这座神奇的城市，法语也更熟练。²

1 于斯曼本人在1903年版序言中回忆道，这本书“如陨石般坠落到文学集市，既令人惊骇，也令人愤怒”。他描写了他所挑起的各种不同的、自相矛盾的敌意，可见于第25—26页。

2 黎萨尔的法语水平有待认真研究。他在《旅行日记，从卡兰巴到巴塞罗那》（*Diario de viaje. De Calamba à Barcelona*, 1882）的5月12日条中记录了他上船以后读的书：沃特尔·司各特（Walter Scott）的《昆丁·达威尔特》（*Quentin Durward*）的法语译本。司各特这本书词汇量大且复杂，所以读这本书要有较为过硬的阅读能力（即便不一定能用法语交流和书写）。参见Rizal, *Diarios y memorias*（前文第61页注释2曾引），第47页。但八年后，他从布鲁塞尔给密友、（转下页）

黎萨尔有一次说到，他在巴黎期间写作了《不许犯我》四分之一的内容。¹后来他认真地考虑要不要用法语写第二部小说，以此触及全世界的读者，马克西莫·维欧拉（Máximo Viola）的回忆录讲述了他和黎萨尔在柏林时候的事。维欧拉回忆道：

我认为用法语写作是不必要的奢华。当我问他这样做的理由，他向我解释道，万一《不许犯我》失败了，万一他的国人对这部作品的目标没有任何反应，那么他之后就将用法语写作。^{2*}

45

1890年7月4日，布卢门特里特向黎萨尔写信道：“我热切地期待着您将用法语写的大作；可以预见，它会激起巨大的轰动。”^{3*}当然，最终《煽动者》是用西班牙语而不是法语写的。它于1891年在根特付梓。离根特不过40英里，

（接上页）奥地利民族学家费迪南·布卢门特里特写了一封信。写信的时间是1890年6月28日，信中说他正在向身边最好的老师努力学习法语。参见 *Cartas entre Rizal y el Profesor Fernando Blumentritt, 1890-1896*, in *Correspondencia epistolary* (Manila: Comisión del Centenario de José Rizal, 1961), Tomo II, Libro 2, Parte 3, pp. 668-71。他学的只是说和写？

1 León Ma. Guerrero, *The First Filipino, a Biography of José Rizal* (Manila: National Historical Institute, 1987), p. 121。黎萨尔的巴黎生活，此书只花了两页篇幅。这也许是因为在这七个月里，黎萨尔给其他人（包括他的家人）所写的信特别之少。

2 See, Viola, *Mis viajes con el Dr Rizal*, in *Diarios y memorias*, p. 316.

3 信收录于 *Cartas entre Rizal y el Profesor Fernando Blumentritt, 1890-1896*, p. 677。

有个叫作奥斯坦德（Ostend）的城市。三年前的1888年，詹姆士·恩索尔（James Ensor）在这里完成了一幅无政府主义—革命绘画《基督降临布鲁塞尔，1889》（*Christ's Entry into Brussels, 1889*）。这幅画奇特而具有预见性，有着一种非常黎萨尔式的辛辣的社会讽刺、滑稽、浪漫主义和反叛。这无疑是个巧合，却很有意思。

书写复仇

在研究著名的荷兰作家爱德华·陶威斯·德克尔〔笔名穆尔塔图里（Multatuli），1820—1887年〕，还有他轰动一时的反殖民主义小说《马格斯·哈弗拉尔》（最初发表于1860年，于19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被翻译成德语、法语和英语）的时候，我突然有了一个很不同的想法。德克尔的这部小说，可以说是最早一部以具体的殖民地生活体验为基础的小说。且不说其他的，《马格斯·哈弗拉尔》讲的也是一位年轻、理想主义的英雄（类似于《不许犯我》的伊瓦拉）。他想要捍卫受压迫的土人，但到后来，腐败的殖民地官僚还有邪恶的土著首领联手实施了迫害，将他在政治和经济上摧毁了。这部小说可以理解为是陶威斯·德克尔对那些强大的敌人的反击。他们迫使他丢掉了殖民地公职，穷困潦倒地回国；而且，他们还在对爪哇农民进行着残酷的剥削。

1888年末，黎萨尔在伦敦读到了《马格斯·哈弗拉尔》。

他读的很有可能是那个不错的英译本。此时正值《不许犯我》出版不久，陶威斯·德克尔则已辞世。黎萨尔12月6日写信给布卢门特里特，他这样说道：

穆尔塔图里的书非常令人激动，我到手之后会立即给你寄来。毫无疑问，这本书比我自己的小说强太多。只不过，因为作者本人是荷兰人，所以他的批判没有我的那么有力。他那本书尽管只披露了爪哇岛上荷兰生活的一个方面，却比我的更有艺术性、更优雅。^{1*}

46

可见，即便两人的小说写作时间间隔四分之一世纪，黎萨尔仍然认识到他们的小说具有颇多相近之处。极有可能的是，这位年轻的菲律宾人从《马格斯·哈弗拉尔》中发现了一个榜样，告诉他如何写作一部有力的小说，以此进行反殖民主义的、政治的和私人的复仇。在接下来一章里，我会更具体地分析《煽动者》，对这个论点的论证也会在下面一章中进行。²

1 信收录于 *Cartas entre Risal y el Profesor Fernando Blumentritt, 1888-1890 in Correspondencia epistolar*, Tomo II, Libro 2, Parte 2, p. 409。

2 我们发现，1889年到1891年，由于殖民政权和道明会的联手，黎萨尔家道中落；他的父亲、他的哥哥帕西阿诺、两个妹妹还有妹夫都被流放到了群岛的偏远地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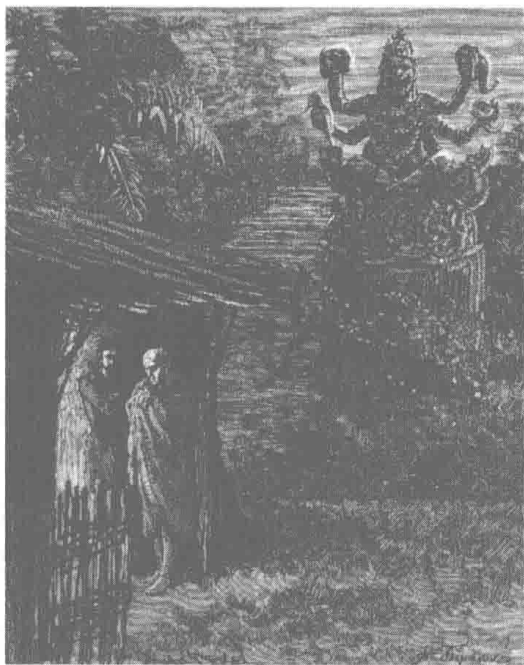
鲁道夫的孩子

保罗·文森写过一篇不错的论文，对《马格斯·哈弗拉尔》《不许犯我》还有《煽动者》做了详细比较。他还指出，陶威斯·德克尔鄙视当时的荷兰语文学世界，崇拜《堂吉诃德》和《项狄传》(*Tristram Shandy*)，也主要受到英语作家沃特·司考特和法语作家维克多·雨果、大仲马、尤金·苏的启发。文森还评论道，《马格斯·哈弗拉尔》和克里索托莫·伊瓦拉这两位英雄角色，显然都是通过不同的路径，从“社会主义者”贵族鲁道夫延续而来。鲁道夫是苏(1804—1859年)笔下的英雄，在1844—1845年轰动一时的《巴黎谜案》(*Les Mystères de Paris*)的主人公。¹就像黎萨尔和陶威斯·德克尔，苏起初也是个花花公子，但在1843年改变了政治信念，成了一位热心的(蒲鲁东派)社会主义者，积极地反对路易-拿破仑——法国帝国主义者中的大老虎。路易-拿破仑将其流放，使他贫困潦倒，最终在黎萨尔出生前三年去世。²

苏的成功得益于连载小说(romans-fuilleton)这一创新。他可以利用竞争性的报纸发表连载小说，这为小说家们创造

1 Paul Vincent, "Multatuli en Risal Nader Bekeken", *Over Multatuli*, 5 (1980), pp. 58—67.

2 关于苏这个人物，有一部诙谐、机智、热情的传记，参见Jean-Louis Bory, *Eugène Sue, le roi du roman populaire* (Paris: Hachette, 1962)。1989年，巴黎的罗贝尔·拉封(Robert Laffont)出版社出了他一千三百多页的小说，是最近不错的版本。



《游荡的犹太人》中的石版画，想象的爪哇景象

了庞大的新市场。（他的作品迅速有了欧洲各主要语言的译本。）报纸的发行商鼓励作者施展才华，有技巧地设置悬念，激发读者兴趣，放入异域元素，设计永不结束的悲剧爱情故事，写复仇、做讽刺，全景式地描写社会的各个层面——总之，尽一切手段将读者吸引住。写这种连载小说需要将多个情节放到一起（通常通过一个不知名姓、全知的叙述者实现），时常出现快速和突兀的转换，也往往带有一种说教的

民粹政治色彩。¹（不用说，这些连载小说在路易-拿破仑时期是最受打压的。）苏的第二部重量级作品《游荡的犹太人》（*Le Juif errant*）陆续于1845—1846年发表。这部小说特别让我感兴趣。小说结构向四面八方铺开，一位撒旦般的耶稣会士总摄全篇，他的触角甚至伸展到了西伯利亚、北美和……爪哇！²黎萨尔的小说几乎完全具备这些结构和主题元素，不过它们都未曾在报纸上连载。但我们可要记得，在他的藏书里，苏的书有10本之多，远远超过其他作家。当

1 参见 Charles Bernheimer, *Figures of Ill Repute: Representing Prostitution in Nineteenth Century Franc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p. 47; 以及 Paolo Tortonese, “La Morale e la favola: Lettura dei *Misteri di Parigi* come prototipo del *roman-feuilleton*” (mimeo, n.d.)。(感谢弗朗哥·莫雷蒂为我复印了这个文本。)埃米尔·德·吉拉尔丹 (Émile de Girardin) 是最先尝试连载小说的编辑。1836年，他在自己的报纸《出版报》(*La Presse*)上连载了巴尔扎克的《老姑娘》(*La vieille fille*)。

2 我可以看到的文本是1889年三卷本英译本，有一千五百多页，由 George Routledge and Sons 于伦敦和纽约出版。这个版本配有19世纪风格的插图，非常不错。耶稣会士手下有一位阴暗的荷兰殖民地商人，以及善于谋杀、从印度逃出来的暴徒。[1831年，东印度公司总督威廉·本廷克 (William Bentinck) 发动了灭绝暴徒的运动。这是一群职业强盗和杀手，受害者通常是被勒死。这是《游荡的犹太人》开始连载之前十年出头的事。]但蒲鲁东派社会主义者完全把荷兰人在印度群岛的统治当作理所应当。

黎萨尔告诉我们他用10比塞塔购买了这部巨著的西班牙语译本，在大仲马和贺拉斯的书上也花了2.5个比塞塔。参见他的 *Diario de Madrid*, in *Diarios y memorias*, 1884年1月6日条，第114页。1月25日，他记录自己刚看完这部书，并写下了这条犀利的评论：“这部小说有最精密的构思，是天赋才华与深思熟虑所诞生的独特的孩子。它因此让我吃惊不已。它并不像拉马丁那样用甜蜜的语言向读者说话。它我行我素，飞扬跋扈，让人神魂颠倒，但并不能令我哭泣。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变冷酷了。” * *Ibid.*, p. 118.

然，这并不就意味着他对这位前辈不加批判地接受。

另外一位连载小说大师是大仲马（1803—1870年）。他的《基督山伯爵》的主人公埃德蒙·唐泰斯，就仿佛是伊瓦拉和西蒙的合体。他的死对头设计毁了他的人生，让他在监狱里耗费了很多年光阴。出狱后，他伪装成基督山伯爵重新出现在世人眼前，一心要报仇雪恨。纯属巧合？不太可能。16岁的黎萨尔曾以笔名哈辛托（P. Jacinto）在1878年写了《一位马尼拉学生的回忆录》（*Memorias de un estudiante de Manila*）。书中他回忆了12岁时阅读《基督山伯爵》的感受：“它的对话耐人寻味，它的魅力令人愉悦，我就这样一步步跟随小说的英雄，看他怎样复仇。”^{1*}但苏和大仲马都不关心推翻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小说主角的复仇基本上属于一国之内的私仇。

笑与自杀

“西班牙母亲”呢？之前我们提起过，除了《堂吉珂德》⁴⁹以外，黎萨尔的藏书里再没有其他西班牙语小说；而在他的朋友、语文学家特立尼达·帕多·德·塔维拉的藏书中，西班牙语著作却有不少。这点不同的一部分原因在于两人生活的跨度不同。帕多的藏书中颇为醒目的布拉斯科·伊巴

1 *Ibid.*, p. 13.

内斯（1867年生）和皮奥·巴罗哈（Pío Baroja, 1872年生），与黎萨尔是同一代人，但一直要到黎萨尔去世后才有了名气。而帕多恰好比黎萨尔多活了30年。但这不能用于解释贝尼托·佩雷斯·哈尔多斯（Benito Pérez Galdós, 1843—1920年）的情况。哈尔多斯有西班牙的巴尔扎克之誉，常常被称为塞万提斯之后西班牙最伟大的小说家。苏之于黎萨尔，就如哈尔多斯之于帕多。哈尔多斯是极为多产的小说家，黎萨尔真的有可能从没有读过他的书吗？确实，他的大量著作都从未提及这位年长者的名字。但许多学者指出了《不许犯我》和哈尔多斯1876年（黎萨尔当年14岁）出版的《完美夫人》（*Doña Perfecta*）在情节上的相似之处。《夫人》从哈尔多斯的标准看是一部短篇小说，主人公是一位对政治一无所知的自由主义工程师；给他起名的姨妈是宗教狂热者，凭着背后教会的支持，她的狂热一步步摧毁了小说的主人公。《不许犯我》在各个方面都比这部小说要优秀得多。但是，我们绝不是不能揣测，黎萨尔脑子里想的只是这个“反殖民主义”计划，在自己的地盘上击败最著名的大都会作家；而同时，他当然不会承认自己有这样的想法。还有一点也许能让这个解释更为圆满。哈尔多斯虽然是自由主义者，对西班牙帝国主义却缄口不言。因此，反过来，黎萨尔作为菲律宾反殖民主义者，也对哈尔多斯无话可说。¹

1 1884—1885年间，莱奥波尔多·阿拉斯[Leopoldo Alas, 笔名克拉林(Clarín)]——长黎萨尔九岁——发表了其最为重要的小说《庭长夫人》(*La Regenta*)。(转下页)

但我们尚需琢磨黎萨尔那难以抑制的笑，这在反殖民主义文学中是非常少见的。这种笑——不仅见于犀利的警句和辛辣的讽刺，而且还洋溢于两部小说的字里行间，以至于读者常常想要笑出声来——无法溯源至雨果、大仲马、苏和哈尔多斯等任何一位作家，他们中没有人以引人发笑见长。陶威斯·德克尔确实可以写得滑稽死人，但黎萨尔在出版了《不许犯我》之后才读到他的书。黎萨尔的那种笑，一部分当来自殖民主义悲喜剧本身。《不许犯我》的结语里，这位25岁的菲律宾人写道：

50

由于我们的主角有好几位仍然在世，有的则已不知去向，所以，真要写一篇尾声是很难办的。出于公众考虑，我们很乐意让所有角色都死掉，从萨尔维神父开始，到维克多丽娜夫人，但这又是不可能的……让他们活着吧！终究，要去养他们的是国家，而不是我们。^{1*}

（接上页）这是一部强烈的反教权小说，透彻地研究了西班牙一个外省天主教城镇的社会生活。它引发了教界和“正派”圈子的狂怒。黎萨尔在1885年夏末去法国和德国之前，一直在马德里学习。所以他肯定知道这部小说，即使他可能没有时间阅读。但他的著作中从未有所提及。与加尔多斯的情况类似，他的沉默也许是故意的；但在帕多·德·塔维拉的藏书中也并没有《庭长夫人》的踪影，这个迹象也许更能反映些什么。

1 *Noli me tangere*, p. 350.

我在别处说过，作者这样地与读者、小说人物还有“现实”玩耍，在19世纪大多数严肃的欧洲小说中很不寻常；但这个特点一下子就让人想到马查多·德·阿西斯五年前出版的《身后回忆录》。¹小说都是从哪里来到了这位菲律宾人和巴西人手中。这是一样不可思议的进口品，居然和爪哇加麦兰音乐是绝配。

与此同时，我们知道，塞万提斯之后，黎萨尔喜欢的西班牙作家是马里亚诺·何塞·德·拉腊（Mariano José de Larra）。德·拉腊出生于1809年，在28岁时自杀。²他喜爱法语作品，是激进自由主义者。在他短暂的人生当中，他在新闻和小说那模糊的边界之间徘徊，政治也总是形影不离。嘲弄一切都可以，但远距离的事物是鞭长莫及的。拉腊对凶狠而反动的费尔南多七世统治下的马德里社会各阶层有欢快、鲜明的描绘，其中包括了对每个阶层不留情面的模仿。黎萨尔一定从中看到了应该如何模仿并超越他，为堕落的马尼拉殖民地社会写小说。

1 Benedict Anderson, *The Spectre of Comparisons* (London: Verso, 1998), p. 231.

2 1888年6月16日，黎萨尔在伦敦给密友马里亚诺·庞塞写了一封信，描述拉腊为“本世纪西班牙最伟大的散文作家”。更早些时候，他在4月30日从旧金山寄了一封信，讲到他曾请庞塞帮他买一套拉腊全集，邮寄到伦敦，但只收到了一套选集。在6月16日的信中，黎萨尔继续讲道：“对于伟大的作家，我习惯于收集他们的全集，所以我请求你把全集寄给我……不过，你寄来的这本我也会很高兴地留着，供日后比对不同版本。我这样做的理由是……我相信伟人的一切都值得学习，很难说他哪个方面绝对好，哪个方面绝对不好。”* *Epistolario Rizal ino*, Vol.2, 1887—1890 (Manila: Bureau of Printing, 1931), pp. 7-8, 12-14.

合作与模仿

风格是伊萨贝洛·德·洛斯·雷耶斯和黎萨尔作品之间的基本对比。在伊萨贝洛置身其中的全球民族学和民俗学研究的世界里，专业和合作是基本规范。模仿并没有被排除在这个世界以外，而是隶属于一个被所有参与者认为具有世界性的事业，他们为此做出各自的贡献。伊萨贝洛觉得将他的代表作献给西班牙的民族学同行并不奇怪，也自在地在脚注中引用英国、葡萄牙、意大利和西班牙的民俗学者。“同行”确实实可以说是研究他与欧洲关系时的关键词。

可是，小说家没有同事，小说这种题材的基本规范就是竞争。小说写作不论是在原创性和市场畅销性上都有深度的竞争。《不许犯我》有64个章节，其中几乎有五分之一都以题记开始。所谓题记，也许可以看作某种变相的脚注。但这些都出自诗人、剧作家、哲学家、《圣经》以及广阔而高深的俗语世界。题记有西班牙语、意大利语、拉丁语乃至希伯来语。没有一个题记出自小说家之笔。但毫无疑问，苏、拉腊、大仲马、陶威斯·德克尔、哈尔多斯、坡、于斯曼、塞万提斯等作家的影响时隐时现。黎萨尔的原创性在于他移植、组合和改造了他所读到的东西。¹ 如果本章的分析正确，

52

1 也许现在是合适的时机介绍1888年11月8日黎萨尔在伦敦写给布卢门特里特的一封信。他告诉布氏，菲律宾的问题实际上并不在于缺乏书籍。事实上上书商生意不错。就以卡兰巴为例，这是个只有五六千人的小城，却拥有（转下页）

我们就可以说，在他的小说中，坡一波德莱尔的小恶魔成了比较的魔鬼（*demonio de los comparaciones*），时时在被殖民土著知识分子的心头作祟。他重新塑造了大仲马的“持续对话”，将其变为有关如何走向自由的迫切辩论；苏的巴黎社会结构全景转变成了对殖民地社会顽疾的扼要诊断，等等。但最能体现黎萨尔的创造性的，莫过于他借用了于斯曼的前卫美学，做了根本性的改造，将其用于激发未来菲律宾青年反殖民主义民族主义者的政治想象。

（接上页）六家小图书馆。他自己家族的藏书超过了1000卷。“不过他们所卖的书大多是宗教和麻醉性的。许多人有小小的藏书，但不会很多，因为书非常之贵。人们阅读坎图[当时著名的意大利天主教作家、史学家]、洛朗[也许是指法国著名的化学家奥古斯特·洛朗]、大仲马、苏、维克多·雨果、埃斯克里希、席勒等。”* 参见 *Cartas entre Rizal y el Profesor Fernando Blumentritt, 1888-1890, in Correspondencia epistolary, Tomo II, Libro 2, Parte 2, pp. 374-80*。另外能反映国际化的一点也值得一提。显然，一千多本家庭藏书是黎萨尔的父母购置的。从黎萨尔寄回家的四封信里，我们可以看到他们所涉猎的文化十分广泛。这四封信写于1883年6月21日到8月2日他第一次去巴黎期间。他讲到去了巴黎圣母院，并因此想到了维克多·雨果的同名小说。他喜爱卢森堡宫里的提提安、拉斐尔和达芬奇的作品。他去过先贤祠，向卢梭和伏尔泰的陵墓顶礼膜拜。他逛过卢浮宫，轻巧地记录道这座宫殿有一部分在1871年被巴黎公社焚毁，还瞻仰了提提安·克雷吉奥斯（Titian Correggios）、雷斯达尔（Ruisdaels）、鲁本斯（Rubense）、牟利罗（Murillo）、维拉斯奎兹（Velasquez）、里维拉斯（Riveras）、凡戴克（van Dykes）、拉斐尔、达芬奇以及米罗的作品。他甚至去了格雷万（Grevin）博物馆，参观了雨果、“阿方索”·都德、“埃米利奥”·左拉、阿拉比（帕夏）、俾斯麦、加里波第、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和三世等人的蜡像。令人惊讶的一点是，他从未解释过这些名字，而且显然觉得没有必要去解释。他的父母已经非常熟悉这些人了。参见 *Cartas á sus padres y hermanos, in Tomo I of Escritos de José Rizal cited in note 25, pp. 90-106*。

3

俾斯麦和诺贝尔： 全球性的阴影

53 《煽动者》出版之际（1891年），黎萨尔业已在欧洲生活了近十年，也掌握了这块次大陆上的两大语言——德语和法语，此外也学会了一点英语。他在巴黎、柏林和伦敦都待过较长的时间。他将第二部小说的副标题定为“菲律宾小说”（*novela filipina*）是有很好的政治考量的，我们在后面会予以说明。不过，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可以用菲律宾形容的，应该是《不许犯我》；《煽动者》则完全算得上是一部世界小说（*novela mundial*）。前者的人物或是殖民者，或是被殖民者；而在后者当中，我们已经注意到了马尼拉的法国杂耍团，还有利兹先生——这位如假包换的美国佬（*verdadero yankee*），据说曾长期居住在南美，所以能说一口流利的西班牙语。“中国人”齐若佳（*Quiroga*）也是一位关键的人物。他非常富裕，计划为他的民族在当地建立一个领事馆。此外，书中随意提及的地方，有埃及、波兰、秘鲁、德国、俄罗斯、古巴、波斯、加罗林群岛、锡兰、马六甲、利比亚、法国、中国、日本，另外还出现了阿拉伯人和葡萄牙人，以及广州和君士坦丁堡。

可是，相比《不许犯我》那样被翻译成多国语言，在菲律宾广为人知，深受喜爱，《煽动者》相对而言没有如此受到注意。从某个层面上说，人们忽视它的原因不难理解。这部小说没有真正的英雄，而《不许犯我》里至少有一个（也许可以说有三个）。女性总是扮演次要角色，虽然是小说里的人物，但得到的描述很少，而《不许犯我》描述最为有力的三位人物，都属于黎萨尔所说的“美好的女性”。《煽动者》的主要和次要情节，无不是失败和死亡的故事，说教的调子更深，政治更占据中心，风格也更刻薄。也许可以说，这本书如果不是菲律宾民族之父所写，时至今日它在菲律宾也不会有多少读者，更不用说在其他地方了。不过，在许多方面，它都算得上是一部惊人的作品。它明显与19世纪80年代菲律宾殖民地社会的情况缺乏关联，这尤其让菲律宾知识分子和学者感到疑惑。因此，很多人倾向于依据作者在真实生活中对反殖民主义革命和政治暴力抱有的矛盾心理（这一点会在后文提及），从“道德”角度分析这部小说，不过，如果把文本看作全球的，而不仅是地方的，这些困难中至少有一些就迎刃而解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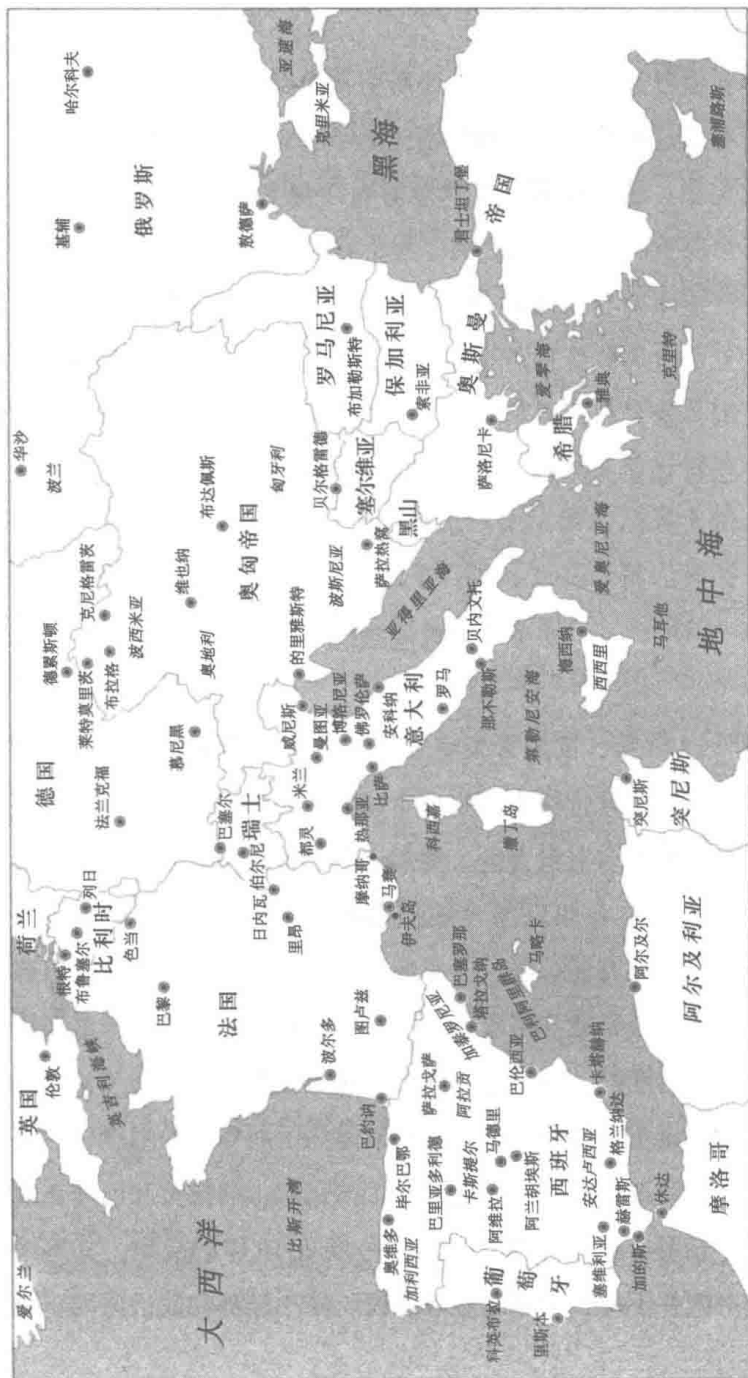
54

为了创造这样一种多中心的视角，就必然要采取蒙太奇的叙述技法。分析者必然要从青年黎萨尔1882年前往欧洲以前的政治经历出发。之后呢？我们可以发现三个交错的“世界”。第一个仅仅是时间上的世界，是俾斯麦主宰的1860—1890年国家间的世界体系。1866年，在克尼格雷茨，

普鲁士对奥匈帝国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之后又在1870年的色当大败法国。这两场战争不仅让俾斯麦的普鲁士成为欧洲大陆的主人、创建了德意志帝国，而且还终结了法国的君主制，摧毁了教皇的世俗权力，并启动了德国迟到的帝国主义计划，将目光指向非洲、亚洲和大洋洲。黎萨尔的《不许犯我》在柏林出版，距离这个世界仲裁者最终丧失权势仅有三年。而与此同时，在世界边缘，后德川幕府时代的日本，以及后内战时代的美国，正准备从不同方向，推翻欧洲的世界霸权。

第二个世界是全球左派。1871年出现了以后再也没有发生过的事情——当时象征着“世界文明之首都”的巴黎，落入了它的民众手中（巴黎公社的出现当部分归因于俾斯麦）。巴黎公社在全球引发回响。害怕巴黎公社支持者甚于害怕俾斯麦的法国政府，对公社实施了野蛮镇压。随后，马克思去世。这一连串事件为国际无政府主义兴起打开了道路。到19世纪末，无政府主义一直都是全球反对工业资本主义、独裁、大地产主义和帝国主义的主要媒介。对于这场高潮，瑞典商人—科学家阿尔弗雷德·诺贝尔无意间做了标志性的贡献：他发明了第一种几乎世界各个地方的受压迫阶级都能使用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第三个世界更为狭小，是日暮西山、奄奄一息的西班牙帝国。黎萨尔生在这个帝国。王位争夺战、民族—地区间剧烈的竞争、阶级矛盾以及各种意识形态冲突，让它的大都会



三个世界 I: 地中海

本身也已经四分五裂。古巴所引领的反殖民主义运动席卷了所有遥远的殖民地，从加勒比海经过北美一直伸展到太平洋的边缘，越发猛烈，也越发得到社会支持。而且与此同时，各个反殖民主义运动之间也开始有了严肃的往来。

本章对于《煽动者》的政治分析行将了结。越是深入，这三个世界的穿插就变得越是复杂，必须同时考虑西班牙、法国、意大利、俄罗斯、加勒比地区、美国和菲律宾——即使这样做会是对读者耐心的巨大考验，我们也不得不如此进行。

通往欧洲

1833年，西班牙发生了王位危机，引发了连续两场内战，一直到该世纪末都是这个国家的心病。是年，残暴而反动的费尔南多七世去世（费尔南多七世曾被拿破仑监禁和废黜，但1815年以后在“邪恶同盟”的支持下复辟），将王位留给了他仅有的孩子，三岁的小女孩伊莎贝拉。女孩来自那不勒斯的母亲成了摄政者。不过，费尔南多的弟弟卡洛斯拒绝承认新国王。他宣称，1830年公开废黜萨利克法（该法禁止女性继位）纯属操纵，目的就是为了剥夺他的继承权。于是，卡洛斯在极为保守的北方（纳瓦拉、阿拉贡和巴斯克地区）招募了一支军队，开启了一场近10年的战争，其终结是一纸并不那么牢靠的停战协议。出于经济和政治原因，摄

政者和她的圈子向自由主义者寻求支持，采取了一项影响深远的举措（为什么这么说我们会在后面看到）：没收所有大修会的财产。伊莎贝拉 16 岁时嫁给了“女人气的”卡迪斯公爵，不久就习惯于在别处寻欢作乐。成年后，她一改母亲的政策，受顽固保守派神职人员摆布，整个政权日益腐败、摇摇欲坠。

在这个政权倒台前的最后几个月里，1868 年 9 月，女王下令将一批共和派政敌流放菲律宾，关押在马尼拉湾戒备森严的克雷西多岛上。女王退位逃往法国的消息大快人心，一些富裕的、倾向自由主义的马尼拉克里奥人和混血人（包括华金·帕多·德·塔维拉、安东尼奥·马里亚·雷希多尔和何塞·马里亚·巴萨——后面两位日后成了黎萨尔的好友）为饱受迫害的囚犯们发起了一场公共募捐。¹1869 年 6 月，富裕的自由主义者、安达卢西亚将军卡洛斯·马里亚·德·拉·托雷（Carlos Maria de la Torre）接任总督一职。他邀请克里奥人和混血人到总督官邸为“自由”举杯，他还穿着平民的服装在马尼拉街头散步。这样的举动吓坏了西班牙殖民精英。他随后着手废除出版审查制度，鼓励言论和集会自由，停止了军队中的鞭刑。马尼拉邻接省份甲米地发生了农民叛乱，他则赦免了叛军，并将他们组建为一支特

57

1 William Henry Scott, *The Unión Obrera Democrática: First Filipino Trade Union* (Quezon City: New Day, 1992), pp. 6-7.

别警队，以此使之平息下来。¹次年，自由主义的海外大臣西斯蒙多·莫雷特（Segismundo Moret）发布法令，由国家接管古老的道明会圣托马斯大学，鼓励修士世俗化，同时向他们保证，如果他们这样做，各个教区仍然归他们自己掌控，而无须顾忌修会上级的意见。²同样的喜悦在古巴变成了一场长达10年的起义（1868—1878年）。在富裕的大地主卡洛斯·曼努埃尔·德·塞斯佩德斯（Carlos Manuel de Céspedes）干练的领导下，起义军一度控制了那个富裕的殖民地的东半部分。³

但是在马德里，（不怎么受欢迎的）萨伏伊的阿马德奥（Amadeo）继位，政治风向开始转变。⁴1870年12月，首相

1 Guerrero, *The First Filipino*, pp. 9–11.

2 John N. Schumacher, SJ, *The Propaganda Movement, 1880–1895*, rev. ed. (Quezon City: Ateneo de Manila Press, 1997), p. 7.

3 据格雷罗的观察，这场以一份不解除武装的停战协议而告终的战争，耗费了西班牙7亿比索，14万人伤亡（主要是疾病原因）。西班牙被迫许诺授予民众自治权，并进行其他改革，实施大赦。它还不得不与美国签订了一项耻辱的协议，允许古巴人取得北美公民权。*The First Filipino*, p. 283. 对于古巴的问题，本书会在第四章中做更详细探讨。

4 请注意，伊莎贝拉出逃所导致的继承权危机，成了普法战争的导火索。为寻找合适的替代者，西班牙内阁决定与莱奥波尔多亲王接触。莱奥波尔多亲王是普鲁士国王的远房表亲。有一位霍亨佐伦家族的人在马德里做国王，所能带来的好处俾斯麦自然看得一清二楚。所以他向莱奥波尔多施压，希望他接受这一邀请。消息泄露到巴黎，法国外交大臣一时急昏了头脑。他匆忙赶到了威廉一世正在度假的埃姆斯，不仅要求莱奥波尔多退出王位继承，而且要求普鲁士发布公开声明，保证今后不再有任何霍亨佐伦家族的人涉足西班牙王位继承。威廉一世不愿就这样被羞辱，因而断然回绝。俾斯麦在收到有关此次会面情况的电报后，加以修改，使巴黎的要求显得更专断，威廉的回绝也比实际来得更粗暴。这封修改（转下页）

胡安·普利姆·伊·普拉茨（Juan Prim y Prats）将军遭暗杀。这位将军是讨伐伊莎贝拉的统帅，之后又设计使阿马德奥继位。相应地，1871年4月，德·拉·托雷由保守派的拉斐尔·德·伊斯基耶多将军接替。德·伊斯基耶多中止了莫雷特的法令，随后又将传统上甲米地海军船坞工人所享受的劳役豁免废除。1872年2月20日，那里发生了叛变，七位西班牙官员被杀。叛变很快被镇压，但伊斯基耶多随后又逮捕了数百名克里奥人和混血人——俗人神父（secular priest）、商人、律师乃至殖民地的行政官员。¹最终，这些人大多被驱逐到了马里亚纳群岛及更远的地方（其中包括巴萨、雷希多尔和帕多）。但在一些保守派修士的教唆下，当局决定对三名自由派俗人神父进行一场公审，以此杀鸡儆猴。在草草审问之后，克里奥人何塞·布尔戈斯和哈辛托·萨莫拉，还有年老的华菲混血马里亚诺·戈麦斯在四万人眼前被当众绞死。帕西诺——比黎萨尔大10岁，很受黎萨尔喜欢的兄长——当时正寄居布尔戈斯家中。他因此不得不躲起来，再也无法接受任何正规教育。²

58

六个月后的9月2日，甲米地造船厂和军械库近1200

（接上页）后的电报公布后，产生的正是铁血宰相所希望的结果——路易-拿破仑愚蠢地对普鲁士宣战。

1 与那一代的其他人一样，伊斯基耶多相信土著没有能力独立发动起义。他们认为，使西班牙丧失美洲大陆帝国的，不是土著，而是克里奥人和混血人。这些人也被认为是塞斯佩德斯在古巴取得暂时性胜利背后的主要力量。

2 *Ibid.*, pp. 8-9; Guerrero, *The First Filipino*, pp. 3-6, 13.

名工人，发动了菲律宾历史上第一次有记录的罢工。许多人被逮捕、审问，但当局未能找到一个可以抓起来的主谋，最后只得将所有人释放。伊斯基耶多对这场不愉快的突发事件有所反思。威廉·亨利·司考特这样引用道：由于“如果没有某种马基雅维利式的领袖，一千多个人不可能想法一致”，所以这位将军断言“国际工人联合会的黑翼已经在最偏远的土地上投下邪恶的阴影”。这听起来也许不太可能，但事实上，国际工人联合会方才在1871年11月被王室封禁，而且巴枯宁主义者马德里分部在其官方刊物《团结》(*La Solidaridad*)的创刊号(1870年1月15日)中特别提到，它致力于唤醒全世界的工人，唤醒“纯洁的大洋洲和居住在富饶而广阔的亚洲地区的你们”。¹

在若干年后，黎萨尔写道：“如果没有1872年，黎萨尔现在会是耶稣会士，他不会写《不许犯我》，而是会写与之相反的东西。”^{2*} 由于帕西诺上了黑名单，黎萨尔的本姓梅尔卡多会妨碍小何塞接受良好的教育；所以他以次姓黎萨尔注册，进了雅典耀。1891年，他用《煽动者》纪念那三位殉道的神父。他的奥地利朋友、民族学家费迪南·布卢门特里特曾在1887年问他，*filibustero* 这个奇怪的词语究竟是

1 Scott, *The Unión Obrera Democrática*, pp. 6-7.

2 黎萨尔给朋友马里亚诺·庞塞及《团结》(19世纪90年代西班牙民族主义者的组织)成员的信，引自 Guerrero, *The First Filipino*, p. 608 at note 13. 翻译为我所加。

什么意思。他回答说：

很少有菲律宾人知道 *filibustero* 这个词是什么意思。一般民众还不知道这是什么玩意儿。我第一次听到这个词是在 1872 年 [当时黎萨尔 11 岁]，当时正在执行处决。它所引起的恐惧我记忆犹新。父亲禁止我们提起此事…… [它意味着] 一位危险的爱国者——或者一个冒失鬼——马上就要被绞死！^{1*}

59

其实，这是 1850 年左右生造出来的政治词汇，发源地是加勒比海一片惊人的海滩上，而后它漂洋过海，经古巴、西班牙，穿越印度洋，传到了马尼拉。²1882 年晚春，20 岁

60

1 *The Rizal-Blumentritt Correspondence, Vol. 1, 1886-1889* (Manila: National Historical Institute, 1992), 第 65 页之后的第 5、6 个无页码页面。1887 年 3 月 29 日的信，寄自柏林。

2 F [ernando] Tarrida del Mármol, "Aux inquisiteurs d'Espagne," *La Revue Blanche*, 12:88 (February 1, 1897), pp. 117-20. 在第 117 页塔里达写到西班牙的“现代宗教裁判官”，称“他们的方法一如既往：刑讯，处决，诽谤。如果他们想要摧毁的可怜人在古巴，那就称他为海盗；如果在半岛，那就是无政府主义者；如果在菲律宾，他就成了共济会会员。”* 我们后面还会讲到这位可敬的塔里达。这里我们仅需要讲的是，他完全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因为他 1861 年生于古巴（黎萨尔也生于那年）。在上面这篇文章中，他称自己“是古巴人”。参见 George Richard Esenwein, *Anarchist Ideology and the Working Class Movement in Spain, 1868-1898*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9), p. 135.

Filibuster 一词源于荷兰语的 *vrijbuitter*（后来英语中的 *freebooter* 一词），最初的意思是海盗。它如何变成了一个正面的、完全政治化的词语，是个（转下页）

的黎萨尔出国去西班牙深造。他这个计划一直瞒着父母，但他喜爱的哥哥帕西诺和一位热心的叔叔给他支持。这怎么可能呢？梅尔卡多家族是个有文化、说西班牙语和塔加洛语的家族，拥有马来人、西班牙人和华人血统。在他们的家乡卡兰巴（今天此地离马尼拉有一小时车程），这是最为繁盛的家族。不过他们的财富并不牢固，因为他们没有多少地产，但从当地道明会的大庄园那里承租了颇为可观的土地。1882

（接上页）很有趣的问题。也许，在雷纳尔和狄德罗的那部好笑的《欧洲人在两印建设与商业的哲学—政治史》[*Histoire philosophique et politique des établissements & du commerce des Européens dans les deux Indes* (Geneva: Libraires Associés, 1775)] 第52章可以找到一个显著的转折点（《海盗劫掠美洲诸海：这些海盗的起源、习惯、探险和衰落》）。两位作者虽然没有掩盖海盗的暴行，但也带有敬意地写到他们热爱自由，有自己的一套荣誉准则。完全在政治意义上使用 *filibuster* 一词的，最早应该是 1850 年前后新奥尔良的克里奥人。他们用这个词描述加入委内瑞拉人纳西索·洛佩兹麾下的各种雇佣军和理想主义者。他们连续四次试图入侵古巴（1848—1850 年），打破西班牙的镣铐，确保这个岛屿合并到美国。一些人，像威廉·沃克这样声名狼藉的美国探险家（19 世纪 50 年代中期，他曾自封尼加拉瓜总统），已经在自豪地称自己为“*filibusters*”。也许是曾在加勒比海服役、后来被分配到菲律宾的高层军官，将这个词带到了马尼拉。菲律宾群岛的最后五位总督里，有四位都以在加勒比的镇压活动而闻名：巴莱里亚诺·韦勒（Valeriano Weyler, 1888—1891 年，生于马略卡岛，他的父母是普鲁士人），尤罗西奥·德斯普赫尔（Eulogio Despujol, 1891—1893 年），拉蒙·布兰科（Ramón Blanco, 1893—1896 年）和卡米洛·波拉比耶哈（Camilo Polavieja, 1896—1897 年）。德斯普赫尔是在圣多明戈，其他几位都是在古巴。

历史在这里有很奇怪的讽刺：洛佩兹的名声并不怎么好，因为他对待黑人十分“严酷”，与南方的奴隶主和北方的扩张主义者站在一起。他曾邀请杰弗森·戴维斯和罗伯特·E. 李做他第二次远征的统帅。他招募的士兵主要是墨西哥战役中的老兵。但由于在哈瓦那被当众绞死，他死后竟有了爱国者的名誉。为了兼并目的而设计的红白蓝星条旗今天依然是古巴的国旗。参见 Hugh Thomas, *Cuba, The Pursuit of Freedom* (New Brunswick, NJ: Harper & Row, 1971), pp. 212—17。



少年时代的何塞·黎萨尔

年，世界糖价尚处高位，但会在 1883—1886 年的萧条中崩盘。家族总是会倾尽全力资助何塞，但他们寄去的钱从来都不够用，因此这位年轻人常常发现自己入不敷出。

不管怎么样，6月初，黎萨尔乘坐的荷兰邮轮迪真纳 (*D'jemnah*) 在马赛登陆。他随后前往巴塞罗那，然后到达马德里，在中央大学 (Central University) 注册入学。¹ 他碰

1 收录于 *Diarios y memorias* 的《旅行日记：从卡兰巴到巴塞罗那》第 57 页，20 岁的黎萨尔写道，(兰波的) 亚丁“让他想到但丁的地狱”。根据他 (转下页)

上了第一个令他消沉的打击。他这样告诉家人：

61 我沿着与马尼拉一样宽阔、整洁、两旁种有澳洲坚果树的街道行走，路上人很多，每个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到了我身上；他们叫我华人、日本人、美洲人〔即拉美人〕等，却没有人叫我菲律宾人！真是不幸的国家——连知道你的人都没有！^{1*}

在马德里，他的同学常问菲律宾属英国还是西班牙所有，也问另外一位菲律宾同学，菲律宾是不是离马尼拉很远。² 不过，西班牙人对于菲律宾这种全然无知、淡漠的状态，却带来了一些有益的结果。在殖民地——但西班牙政府
62 从未称菲律宾群岛或古巴为它的殖民地，也没有建立殖民部——种族等级森严，在法律、税收模式和禁止奢侈的规定

（接上页）6月23日从巴塞罗那寄回家的信，我们得知他途中曾作停留，欣赏庞贝和赫库兰尼姆的风光，并从甲板上瞻仰了伊芙岛，也就是埃德蒙·唐泰斯被长期囚禁过的地方。*Cartas entre Rizal y los miembros de la familia, 1886-1887*, in *Correspondencia epistolary* (Manila: Comisión del Centenario de José Rizal, 1961), Tomo II, Libro I, pp. 20-21.

1 *One Hundred Letters of José Rizal* (Manila: National Historical Society, 1959), p. 26. Letter of June 23, 1882 from Barcelona. 这些信在大部头的 *Correspondencia epistolary* 出版时还未公开。

2 “Que nos tomen por chinos, americanos ó mulatos y muchos aun de los jóvenes estudiantes no saben si Filipinas pertenece á los ingleses ó los españoles. Un día preguntaban á uno de nuestros paisanos si Filipinas estaba muy lejos de Manila.” *Ibid.*, p. 85. 这封寄回家中的信注明的日期是1883年1月29日。



亚丁港素描，何塞·黎萨尔作

中根深蒂固。半岛人、克里奥人、西班牙人华人混血、“华人”和土人这样的社会划分颇受强调。在菲律宾，*filipino* 一词仅指克里奥人。但在西班牙，黎萨尔和一起来的同学很快发现，这些等级区别在这里或是不为人知，或是不受关注。¹ 不论他们回国后是什么样的地位，在这里他们都是菲律宾人，就像 18 世纪末马德里的拉丁美洲人，都被看作美洲人

1 约维塔·文图拉·卡斯特罗为她的新版《不许犯我》法语译本写了一篇一流水准的序言。在序言中，她注意到，菲律宾学生能在马德里的大学注册是 1863 年以后的事。最初那批注册入学的学生是克里奥人，外表上与西班牙出生的西班牙人没有分别。不同肤色的混血人和土人似乎要到 19 世纪 70 年代末才出现。因此，他们的外表对于当地人来说是很新奇的。参见 *N'y touchez pas!* (Paris: Gallimard, 1980); 这个版本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资助。



何塞·黎萨尔在马德里中央大学读书时的照片

(*americanos*), 不论他们来自利马还是卡塔赫纳, 不论他们是克里奥人还是有混血血统。¹ (在同时代的美国出现“亚洲人”“亚裔美国人”这样的称呼也是出于相同的过程。) 1887年4月13日, 黎萨尔这样向布卢门特里特写道:

出于政治原因, 我们所有人都要做出牺牲, 即

1 参见我的 *Imagined Communities* (London: Verso, 1991), p. 57。

便我们都没有意愿这么做。在马德里出版我们报纸的朋友们也都明白这一点；这些朋友都是年轻的克里奥人、混血人和马来人，（但）我们都只是称自己为菲律宾人。^{1*}

他们在殖民地“是”什么人，与他们如何在大都会马德里（对公众）“称呼自己”有了鲜明的反差。但实际上，他们对自己的称呼涵盖范围甚至更广，因为这些混血人中许多是华裔混血，而非西班牙裔混血。（华裔混血人在菲律宾的数量大大多于西班牙裔混血。）² 他们的政治努力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他们给报纸起名“团结”。这是一个充满希望的名字，也令人想起国际工人联合会。因此可以说，菲律宾民族主义实际上起源于西班牙城市，而不是菲律宾本土。

64

黎萨尔在马德里的中央大学刻苦学习了四年。1885年夏，他取得了哲学和文学博士学位，如果不是钱花完了，本可以再拿一个医学博士。黎萨尔1896年末被处决后，米格尔·德·乌纳穆诺（Miguel de Unamuno）声称，在学生时

1 参见 *The Rizal-Blumentritt Correspondence, 1886-1889*, p. 72。西班牙语中的 *filipino* 一词充满歧义，而德语词 *Philippiner* 的意思却是准确的。知道这一点十分重要。这个词在德语中简单明了地指那个（准）民族。

2 十分惊人的是，*mestizo chino*（华裔混血）这个词组在《不许犯我》里根本没有出现过，在《煽动者》中也仅仅偶然出现了一次。小说中的许多角色很有可能就是华裔混血，但黎萨尔很小心，没有写出会暴露他们身份的名字。十分令人难过的是，这位年轻的反殖民主义精英受西班牙人对华人的歧视影响很深。

代他曾看到过黎萨尔。乌纳穆诺虽然比黎萨尔小三岁，但进入哲学和文学系却比后者早了两年。他说的话也许不假。¹但对于我们研究的问题而言，有一起最为重要的事件值得一提。在黎萨尔三年级刚开始（1884—1885 学年），他的历史教授、西班牙共济会领导人米格尔·莫莱塔（Miguel Morayta）做了一次就职致辞，猛烈攻击了教会的反启蒙主义，并带有攻击性地为学术自由辩护。²这位学者很快被扣上异端和污蔑西班牙传统文化的罪名，被阿维拉（Ávila）主教和其他主教开除教籍。学生们为莫莱塔发起了为期两个月的罢课，很快受到了格拉纳达、瓦伦西亚、奥维多、塞维利亚、巴利阿多利德、萨拉戈萨和巴塞罗那各所大型大学学生的支持。³随后，政府派出警察，许多学生遭到逮捕和 / 或殴打。黎萨尔后来回忆道，他当时躲在莫莱塔房子里，搞了三副不同的伪装，

1 墨西哥作家莱奥波尔多·赛亚（Leopoldo Zea）为委内瑞拉版《不许犯我》（Caracas: Biblioteca Ayacucho, 1976, p. xviii）写的那篇精彩导读中有所提及。赛亚引用了巴斯克哲学家、散文家、诗人、小说家米盖尔·德·乌纳穆诺·伊·胡戈的《颂词》（“Elogio”），参见 W. E. Retana, *Vida y escritos del Dr. José Rizal*（Madrid: Victoriano Suárez, 1907）。

2 莫莱塔强调《吠陀》成文比《旧约》早得多，称埃及人最早提出了死后审判的观念，还用怀疑的眼光讨论了大洪水和创世（罗马教廷仍然坚持认为上帝创世发生于公元前 4404 年），令主教团尤为恼怒。参见 Manuel Sarkisyanz, *Rizal and Republican Spain*（Manila: National Historical Institute, 1995），p. 205。

3 Rizal, *El Filibusterismo*, endnotes, pp. 38–9. 编者补充道，博洛尼亚、罗马、比萨、巴黎、里斯本、科英布拉和德国许多地方的学生也都发来贺信，并举行声援抗议活动。

才逃过此劫。¹后面我们将会看到，这次经历经他改造之后，成了《煽动者》主要情节中关键性的一幕。

学生时代所发生的事件当中，还有一样值得强调：1883年春黎萨尔第一次到巴黎度假。先前我们对他从法国首都写给家里的信已略有细致的分析。信中他难掩自己激动的心情。马德里和巴黎没有可比性。巴黎是第一个使他发现西班牙帝国竟是如此落后的地理—政治空间：经济上，科学上，工业上，教育上，文化上以及政治上。²这是他的小说为什么在反殖民主义小说中显得别具一格的一个原因。他站在嘲笑殖民者的立场上写作，而不单单是谴责他们。他在出版了《不许犯我》之后才读了爱德华·陶威斯·德克尔的《马格斯·哈弗拉尔》，但我们立刻就能看出，为什么他如此喜爱这位荷兰作家毫不留情的讽刺风格。

1 黎萨尔在1884年11月26日给家人写了一封信，对此有生动的叙述，收录于 *One Hundred Letters*, pp. 197–200。

2 据1860年普查，成年劳动人口的职业分布如下：234.5万名农业劳动者，146.6万名小经营者，80.8万名仆人，66.5万名工匠，33.3万名小商人，26.2万名贫困人口，15万名工厂工人，10万名自由职业及相关岗位人员，7万名“雇员”（政府职员？），6.3万名神职人员（包括两万名女性）以及2.3万名矿工。Jean Bécarrud and Gilles Lapouge, *Anarchistes d'Espagne* (Paris: André Balland, 1970), vol. I, pp. 14–15. 40年后的1901年，仅巴塞罗那那就有50万名工人，但他们当中一半人是文盲。参见J. Romero Maura, “Terrorism in Barcelona and Its Impact on Spanish Politics, 1904–1909,” *Past and Present*, 41 (December 1968), p. 164。

Schumacher甚至称，宗主国与殖民地文盲率处于相同水平为“殖民史上独有”。（1900年，10岁以上西班牙人的文盲率为58.7%。美国人在1903年组织的一次普查表明，菲律宾人的文盲率为55.5%——这一数字将各种地方语言、西班牙语和英语都考虑在内。）*The Propaganda Movement*, p. 304, note 9.

到毕业的时候，他已经厌烦了马德里；接下来的七年里，他多数时候居住在“先进”的欧洲北部。也许这和何塞·马蒂的选择类似。马蒂长黎萨尔 8 岁，19 世纪 70 年代中期在西班牙读书，然后就一去不返，去了纽约定居。

俾斯麦与新的帝国主义地理学

现在，我们必须暂时按下 24 岁的黎萨尔不表，粗略地看一看 19 世纪 80 年代与他处境相关的三个词语。19 世纪 80 年代的黎萨尔出版了《不许犯我》，而且在构思《煽动者》。

66 1866 年，在克尼格雷茨击溃奥匈帝国军队之后，铁血宰相又在 1870 年的色当取得大胜，路易 - 拿破仑和 10 万人的法国军队被迫投降。这场胜利使他得已于 1871 年 1 月，在凡尔赛宫（而不是柏林）宣布新的德意志帝国诞生，并兼并了阿尔萨斯 - 洛林地区。从这时起，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毁灭，德意志帝国一直都是主导欧洲大陆的霸权。19 世纪 80 年代，一反先前的政策，俾斯麦对在海外殖民探险中与英国和法国竞争产生了兴趣——竞争主要发生在非洲，但也涉及远东和大洋洲。与黎萨尔的轨迹有最直接联系的，正是德国在大洋洲的活动。

随便看一眼地图，原因便一目了然。在夏威夷与菲律宾之间，有一个由群岛组成的三角，马里亚纳群岛是北边的顶点，加罗林群岛和马歇尔群岛分别是西南和东南两个顶

点。马里亚纳群岛大致在马尼拉以东 1400 英里处。最西边的加罗林群岛距离菲律宾南部的岛屿棉兰老岛往东大约 600 英里，马歇尔群岛则还要再往东 1600 英里。在帝国主义时代之初，教宗宣布太平洋为西班牙帝国统治者的领海（*mare clausum*）。直到拿破仑战争的时代，这些群岛通常都被视为受西班牙帝国的保护。而事实上，西班牙对它们并无多少兴趣，只是把它们当作轮船加煤站和流放政治犯的地方。至于管理的任务，则完全交给了菲律宾总督。但在 1878 年，德国根据私人贸易路线，擅自在马歇尔群岛设立了自己的加煤站。1884 年，柏林兼并了新几内亚东北部（加罗林群岛中部以南约 800 英里，此前这块地区由一家私人公司管理）。接下来的那年，它在雅浦岛（Yap）竖起了帝国旗帜，以宣布对加罗林群岛的主权。德国的力量令西班牙人惧怕，他们匆忙镇压了当地对马德里这次延伸“主权”的反抗，并请求教宗从中斡旋。罗马承认了西班牙的主权，但德国人则赢得了贸易和加煤的特权，还通过与伦敦的交易控制了马歇尔群岛。次年，英国与德国分治所罗门群岛。1889 年，萨摩亚成了美国、英国和德国联合控制的三方保护领土。¹（帝国之间的各种吵闹在《煽动者》中有清楚展现。心地善良的土著学生伊萨加尼发现自己站在分裂的立场上，一方面，他同情被压迫

67

1 Karl-Heinz Wionsek 的书中有个年表很有用，参见 Karl-Heinz Wionsek, ed., *Germany, the Philippines, and the Spanish-American War*, Translated by Thomas Clark (Manila: National Historical Institute, 2000), pp. 63-4.

的土著岛民，而另一方面，面对德国人的威胁，他又站在西班牙一边。)黎萨尔对俾斯麦本人虽然没有什么好感，但德国却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它那种新教的节制，它的有序与纪律，它了不起的思想生活和工业发展。这些方面与祖国西班牙可以做有益的对比。他的第一部小说没有在马德里而是在俾斯麦的首都出版，无疑是让他感到高兴的事。

普鲁士在色当取胜后，又蛮不讲理地包围了巴黎。路易-拿破仑政府仓皇逃往波尔多；他们再次出现在凡尔赛宫，仅仅是来签署一份耻辱的停火协议，随后又签署了丧权辱国的条约。1871年3月，巴黎公社掌控了这座被遗弃的城市。巴黎公社维持了两个月，随后，屈从于柏林的法国当局发动攻势，在骇人的一周内处决了大约两万名公社成员或嫌疑者，这个数目比最近这场战争的阵亡人数还有罗伯斯庇尔1793—1794年的恐怖统治所处死的人数都要高。七千五百多人被监禁或流放到新喀里多尼亚和卡宴这样遥远的地方。还有好几千人流亡到比利时、英国、意大利、西班牙和美国。

68 1872年，政府通过了严格的法律禁止一切左派组织。直到1880年，政府才宣布对被流放和关押的公社成员实施大赦。与此同时，第三共和国认为自己有了足够实力去继续和加强路易-拿破仑的帝国主义扩张——印度支那、非洲和大洋洲。法国的一流知识分子和艺术家当中，有不少人或是亲身参加过巴黎公社（库尔贝是准文化部长，兰波和毕沙罗是积极的

公社宣传者)，或是对之抱有同情。¹1871年以来的残酷镇压是这些人与第三共和国离心离德的关键因素，也激起了他们对受害者的同情。思想界的这一发展我们在后面还会更细致地考察。

色当大败也致使法国撤回罗马驻军。这些军队本是用于维持教皇摇摇欲坠的领土主权，而现在被意大利王国越发具有压迫性、越发低效率的军队所取代。一贯持反动立场的庇护九世（本名乔瓦尼·马斯塔伊-费雷提，Giovanni Mastai-Ferretti）现在丧失了所有世俗权力。他宣布自己和属下遭到监禁，为了回击，他采用了政治和精神上的手段，威胁要开除为意大利王国政府效劳的所有天主教徒的教籍。这一立场一直延续到20世纪20年代末他与墨索里尼签订了皆大欢喜的协约为止。意大利帝国主义在东非的殖民活动效益不大，而与此同时，南方农村的贫困在1887年到1900年间非常严重，导致每年都有五十多万意大利人往国外移民。1887年，黎萨尔曾短暂地到访罗马，但他似乎只关心古迹。

1888年，他经太平洋返回欧洲，中途在明治中期的日本作过短暂停留。日本的整洁、能量和野心让他印象深刻，人力车也让他吃惊不已。当然，看到一个非欧洲的民族，努力维护自身独立，迈大步走向现代化，是令他欣喜的。虽然

1 参见 Krisin Ross 的生动描述和精彩分析，*The Emergence of Social Space: Rimbaud and the Paris Commune*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8)；以及 James Joll, *The Anarchist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pp. 148-9。

他在香港待过一段时间，但中国本身似乎在他的地图上消失了。他在选举期间抵达旧金山，反亚裔的煽动活动正值高潮。由于他的船上还有 650 名华人，种族主义反移民运动就抓住了这一点不放。船只由于“检疫”好几天都无法让乘客上岸。他为此十分愤慨，尽可能快地穿过了北美大陆。镀金时代的腐败、后重建时代对前黑奴的压迫、粗暴的反种族通婚法、私刑等也许给他留下了最深的印象。¹但他已经预见到，美国国会向太平洋扩张。在此之后，他愉快地在伦敦住下，在大英博物馆研究菲律宾早期史。同时，他似乎对爱尔兰日益严重的危机没有什么关注。（他住在樱草山，不知他是否知道，有位恩格斯就居住在附近。）

这个保守派当权、奉行资本积累和全球帝国主义的世界，表面上看来似乎很平静，但它同时也在创造着另一种世界。这个世界与黎萨尔的小说有更直接的关联。其实，早在 1883 年，他就预感到了未来的方向。

一场可怕的大火一直威胁着欧洲；世界的权杖从衰落的法国那颤抖的手中滑落；北方之国正尝试将权杖拾起；俄国皇帝的头上悬着虚无主义之剑，就像古代的达摩克里斯，这就是开化了的欧洲。^{2*}

1 详细的描述参见 Guerrero, *The First Filipino*, p. 198。

2 *One Hundred Letters*, p. 174. 1883 年 10 月 28 日从马德里寄回家的信。看起来，西班牙都不值得一提！

黑旗

黎萨尔出生那年，米哈伊尔·巴枯宁从西伯利亚逃往西欧（他在19世纪40年代因为密谋推翻沙皇统治而被判处终生放逐西伯利亚）。次年，也就是1862年，屠格涅夫发表了《父与子》，精妙地分析了某种类型的虚无主义的外表和心理。四年之后，一位名为卡拉科佐夫的莫斯科学生暗杀亚历山大二世未遂，与其他四人在斯摩棱斯克广场被当众绞死。¹同年，阿尔弗雷德·诺贝尔取得了火药的专利。虽然他这项发明的主要成分是极不稳定的硝化甘油，但是制造出来的炸弹却简单易用、表现稳定、便于携带。1869年3月，22岁的虚无主义领袖谢尔盖·内查耶夫（Sergei Nechayev）离开俄国；他与巴枯宁在日内瓦会面，共同撰写了轰动性的《革命者教义问答》，几个月后返回莫斯科。巴枯宁和这位虚无主义领袖一直保持着（紧张的）关系，即使后者谋杀了一位怀疑他的学生信徒一事已然是众所周知。陀思妥耶夫斯基后来将这起谋杀写入了小说《群魔》。²

1 生动的场面描写参见 Ramón Sempau, *Los victimarios* (Barcelona: Manent, 1901), p. 5. Florencio 罗列了 1877—1890 年间俄国（成功和失败）的暗杀事件，参见 Rafael Núñez Florencio, *El terrorismo anarquista, 1888-1909* (Madrid: Siglo Veintiuno de España, SA, 1983), pp. 19-20.

2 这个政治小团体通常被称为“人民的复仇”。内查耶夫又逃回了瑞士，但于 1873 年被引渡回国，继而被判处 20 年监禁。1882 年，监狱报告给出了一句巴德尔-迈因霍夫式的描述，称他被“发现死于囚室”。



人民意志党革命者于 1881 年 3 月 1 日在圣彼得堡暗杀了亚历山大二世



虚无主义领袖内查耶夫

到 19 世纪 70 年代末，接替虚无主义者的，是一小撮民粹派（narodniki），他们是秘密的激进反独裁组织。不论成功与否，政治暗杀在 1878 年的俄国已经司空见惯：1 月，薇拉·查苏利奇（Vera Zasulich）枪杀圣彼得堡军事长官费奥多尔·特雷波夫（Fyodor Trepov）将军未遂；8 月，谢尔盖·克拉夫钦斯基（Sergei Kravchinski）刺死了沙皇秘密警察头子梅津佐夫（Mezentsov）将军。1879 年：2 月，格里高利·戈登伯格（Grigori Goldenberg）射杀了哈尔科夫的长官德米特里·克鲁泡特金亲王；4 月，亚历山大·索罗维夫（Alexander Soloviev）用同样方式刺杀沙皇未成；11 月，列夫·哈特曼（Lev Hartmann）爆破皇帝御用火车的计划流产。1880 年：史蒂芬·哈尔图林（Stepan Khalturin）成功炸毁了皇宫一角——8 人死亡，45 人受伤。现在，诺贝尔的发明已经派上了政治用途。随后在 1881 年 3 月 1 日——黎萨尔登陆马赛的 15 个月前——一批称自己为人民意志党的人用炸弹暗杀了沙皇，全欧洲为之震动。¹（几个月后，美国总统加菲尔德

1 Núñez, *El terrorismo*, pp. 66–7; Norman Naimark, *Terrorists and Social Democrats: The Russian Revolutionary Movement under Alexander III*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chapter 1; Derek Offord, *The Russian Revolutionary Movement in the 1880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chapter 1; 尤其还有 David Footman, *Red Prelude*, second edition (London: Barrie & Rockleff, 1968), *passim*。第一颗炸弹未能伤及沙皇。一位被森保（Sempau）称作“Miguel Ivanovitch Elnikof”的人 [实际上他叫作伊纳台·格里涅夫斯基 (Ignatei Grinevitsky)] 认识到问题之后，到足够近的地方扔出了第二颗炸弹，以至于他和沙皇同时被炸死。这可以说是自杀式爆炸袭击的雏形。Footman 的书很有价值的一处在于，他在（转下页）

遭暗杀的事件几乎没有人注意。)

俄国的风暴对整个欧洲产生了深远影响。可以代表这场风暴的有两个人物，在第一个时期是1876年去世的巴枯宁（生于1814年），在第二个时期则是彼得·克鲁泡特金亲王（生于1842年），他于1876年从沙皇的监狱逃往西欧。

共产国际最开始的两次大会都在宁静的瑞士召开（1866年和1867年），进展也十分平静，马克思一直是大会的中心。但次年在布鲁塞尔召开的第三次大会上，巴枯宁的影响就可以被强烈地感受到。到了1869年举办的第四次大会，巴枯宁主义者已经成了多数。第五次大会原定在于在巴黎召开，但色当战役使会议泡汤。待到1872年，会议总算在海牙再开的时候，它无可救药地分裂了。巴枯宁去世时，会议已经解散，不过巴枯宁主义者的大会一直持续办到1877年。¹也正是在那一年出现了“无政府主义者”（anarchist）一词。它拥有了技术和政治上的意义，并且迅速、广泛地传播到全世界（即便有关无政府主义的目标与方法，显然有很多思想流派在相互竞争和交融）。²

（接上页）附录中为55位人民意志党活动者作了传记。其中13人被处决，14人死于狱中，15人活着出了监狱，8人逃往国外，4人在暗杀活动之中或之后自杀，另有两人为秘密警察效劳。

1 参见让·迈特龙（Jean Maitron）对此的简述，*Le mouvement anarchiste en France*（Paris: Maspéro, 1975），vol. I（*Dès origines à 1914*），pp. 42-51。

2 迈特龙就此给出了一些有趣的数据。无政府主义最重要的理论出版物是让·格拉夫（Jean Grave）的《反叛者》（*Le Révolté*）。1894年，萨迪·卡尔诺（Sadi Carnot）总统遭暗杀，它也因此被政府查封。当时它发行量达7000份，订阅者（转下页）

无政府主义强调个人自由与自治，怀疑等级制（“官僚制”）组织，而且喜好用讽刺作为自己的文字武器。这让它在右翼政权严酷镇压的政治条件下显得别具吸引力。保守政权发现，追踪、渗透、摧毁一批自我生成、自我治理的小团体，比粉碎工会和政党要困难得多。无政府主义理论不像当时的主流马克思主义那样有轻视农民和乡村劳动的倾向。我们可以说它骨子里也更反教权。这些条件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革命性的无政府主义在仍然以农民为主的社会中传播得最为成功，如在信仰天主教的、后巴黎公社的法国，复辟时期的西班牙，以及统一后的意大利、古巴，乃至镀金时代移民劳工的美国；而在大体信仰新教的、工业化、半民主的北欧却不及主流马克思主义那么流行。

不论如何，在凄凉的 19 世纪 70 年代行至末尾的时候，无政府主义思想圈子里出现了这样一个理论性的概念：“用行为做宣传”。也就是以谋杀反动政治家和资本家来吸引人们的注意，在震慑前者的同时，鼓励受压迫者为革命重做准备。1877 年 4 月，那不勒斯东北部贝内文托的起义以喜剧性

（接上页）来自法国、阿尔及利亚、美国、英国、瑞士、比利时、西班牙、意大利、荷兰、罗马尼亚、乌拉圭、印度、埃及、危地马拉、巴西、智利和阿根廷。没有俄罗斯人订阅。它有一个“流氓”竞争对手，埃米尔·普杰（Emile Pouget）的讽刺刊物《闲老头》（*Le Père Peinard*）（“好家伙，每周日都要读”）。它的受众略为狭窄，但考虑到它是用巴黎人的隐语写作，其订阅者之广，甚至更令人吃惊：阿尔及利亚，英国，突尼斯，阿根廷，比利时，西班牙，美国，意大利，瑞士和摩纳哥。*Le mouvement*, pp. 141-6.



埃里科·马拉泰斯塔

的失败告终。历史学家通常以此作为这一新阶段开始的标志。这场起义由两位那不勒斯青年发起：埃里科·马拉泰斯塔（Errico Malatesta）和他富庶的朋友卡尔洛·卡菲耶罗（Carlo Cafiero，他先前在安全的马焦雷湖北岸为巴枯宁提供资金支持），以及25岁的谢尔盖·米哈伊洛维奇·克拉夫钦斯基〔人称斯泰普尼亚克（Stepniak），1852—1895年。

73 此人参与了1875年波斯尼亚的反土耳其起义，后来又刺杀

了沙皇秘密警察的头目]。¹ 两人因此受到审判。但1878年翁贝托一世继位，一片普天同庆的氛围下，这两位意大利人也被宣判无罪。也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年轻的厨师、无政府主义者乔瓦尼·帕萨南特（Giovanni Passanante）轻易地摆脱了麻烦。而他此前差点就用一把刻有“国际共和国万岁”的刀刺杀了这位年轻的国王。² 贝内文托事件的两个月后，安德里亚·科斯塔（他与马拉泰斯塔有密切协作）在日内瓦发表讲话，为新的战术确立了理论。8月初，保罗·布鲁斯（Paul Brousse）在激进的《汝拉联邦公报》（*Bulletin de la Fédération Jurassienne*）上发表文章，称纸上谈兵已经不足以唤醒民众意识；俄罗斯人的事已经表明，无政府主义者需要像沙皇体制一样严酷无情。绅士的克鲁泡特金随即大张

74

1 详细的描述参见 Nunzio Pernicone, *Italian Anarchism, 1864-1892*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3), pp. 118-28。巴枯宁1864年曾住在佛罗伦萨，次年移居那不勒斯，在那里住到了1867年。（他向一位佛罗伦萨的追随者写道：“这里的政治和社会生活比佛罗伦萨更有活力、更真实。”）他设立了第一国际在意大利的第一个分部，马拉泰斯塔就是他最早招募的人之一。马拉泰斯塔后来回忆道，这位俄国人“为那不勒斯这潭死水带来了新鲜空气，打开了那些与他接触的青年们的眼睛，给了他们广阔的新视野”。事实上，意大利南部是发动革命活动的极佳地点，因为卡福尔及其继任者的自由贸易政策摧毁了当地以农业为主的经济。同时，当地的政治阶层感到，（1861年意大利统一以后的）皮埃蒙特家族与西班牙波旁家族的统治差别不大。佩尼科内也精彩地讲述了巴枯宁在意大利如何完全地压制了马克思和恩格斯。恩格斯和马齐尼全力攻击巴黎公社（因而意大利进步主义者对公社有极大的同情），巴枯宁正是借助了他们的这一愚蠢行为。他曾有力地论述道，马齐尼“总是想要人民为意大利服务，而不是意大利为人民服务”。*Ibid.*, pp. 17, 27, 44-53, 24.

2 Joll, *The Anarchists*, pp. 102-5.

表 1 暗杀

日期	受害者	暗杀地点 / 方式	杀手	政治取向	国籍
1894	萨迪·卡诺	里昂 / 刺死	山特·热雷尼莫·卡塞里奥 (Sante Jeronimo Caserio)	无政府主义	意大利
1897	卡诺瓦斯	圣阿格达 / 枪杀	米歇尔·安焦列洛	无政府主义	意大利
1898	伊丽莎白	日内瓦 / 刺死	路易·卢克尼 (Luigi Luccheni)	无政府主义	意大利
1900	翁贝托一世	蒙扎 / 枪杀	加埃塔诺·布雷希 (Gaetano Bresci)	无政府主义	意大利
1901	麦金利	布法罗 / 枪杀	列昂·佐尔茨 (Leon Czogolsz)	无政府主义	波兰
1903	亚历山大	贝尔格莱德 / 枪杀	士兵	民族主义	塞尔维亚
1904	冯·普列维 (Von Plehve)	圣彼得堡 / 炸死	E. Z. 萨佐诺夫 (E. Z. Sazonov)	社会革命派	俄罗斯
1905	谢尔盖	圣彼得堡 / 炸死	卡利亚耶夫 (Kaliayev)	社会革命派	俄罗斯

续表

日期	受害者	暗杀地点 / 方式	杀手	政治取向	国籍
1908	卡洛斯 / 路易斯	里斯本 / 枪杀	阿尔弗雷德·科斯塔和曼努埃尔·布伊萨 (Alfredo Costa, Manuel Buiça)	激进共和派	葡萄牙
1909	伊藤博文	哈尔滨 / 枪杀	安重根 (An Jung-geun)	民族主义	韩国
1911	斯托雷平	圣彼得堡 / 枪杀	德米特里·博格罗夫 (Dmitri Bogrov)	无政府主义	俄罗斯
1913	乔治	萨洛尼卡 / 枪杀	亚历山大·希纳斯 (Alexander Schinas)	未明；据称是“疯子”	希腊？
1914	弗朗茨·斐迪南	萨拉热窝 / 枪杀	加夫里洛·普林西普 (Gavrilo Princip)	民族主义	塞尔维亚

旗鼓地行动起来，在 1880 年 12 月 25 日那期《反叛者》上，为无政府主义下了理论上的定义，即“用言语、写作、匕首、燧发枪、火药进行永久反叛……所有不合法的东西，对我们来说都是好的”。¹就等 1883 年 9 月 2 日的《黑旗》秘密发表《法国虚无主义者宣言》了。在宣言中，作者声明：

联盟诞生后的三年里，数以百计的布尔乔亚家庭付出了致命的代价，被某种神秘的、医学无法定义和解决的病症所吞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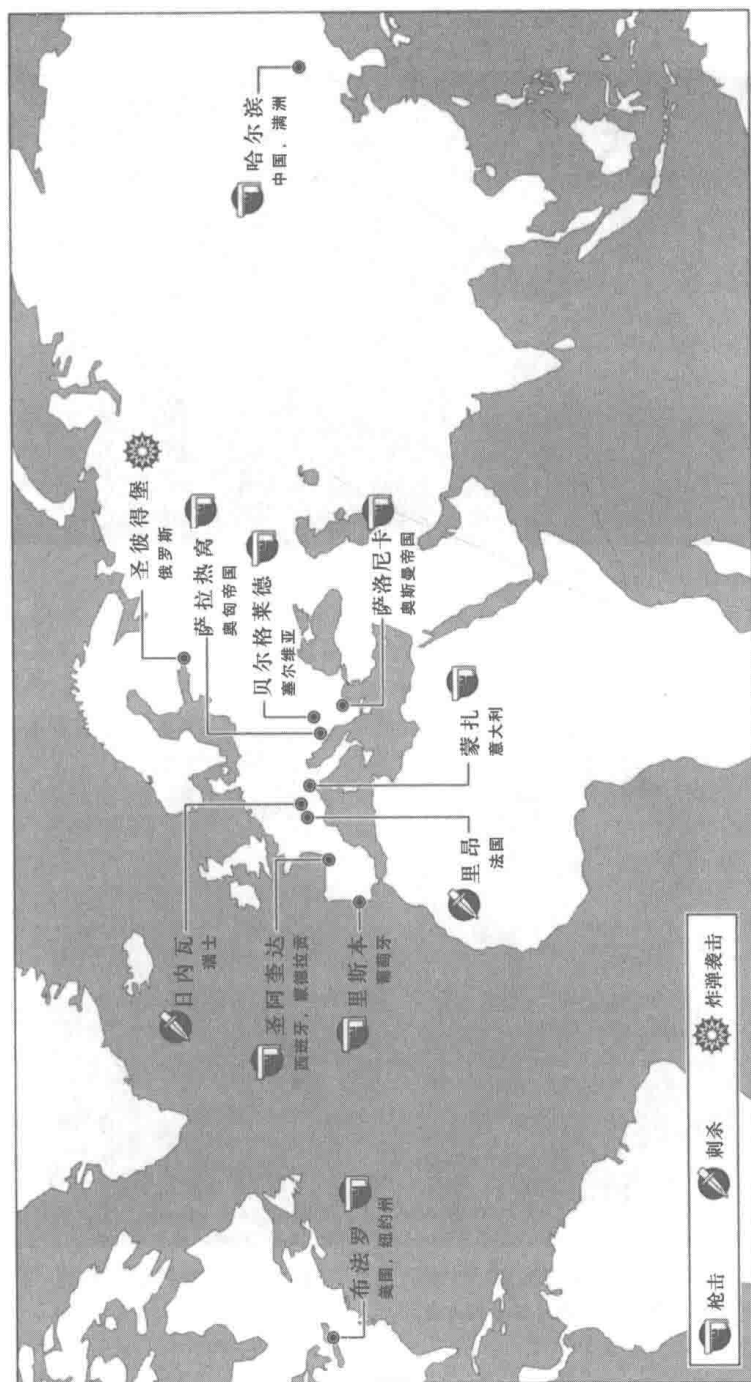
它怂恿革命者继续在暗中进行大规模投毒计划（黎萨尔几周前第一次快乐地游览了巴黎）。²这些迹象无不表明，某些无政府主义者正在思考一种新型的暴力，它将以俄国的方式实施，不仅针对国家领导人，而且还要袭击那些被视为阶级敌人的人。

青年无政府主义者的“早期恐怖主义”，我们在后面还会详细考察。但是，对于世界大战前 20 年所爆发出来的暗杀事件的洪流，如果我们略加观察，就可以发现一些有趣的特点。

首先要注意，在这张列表中我们可以看到几乎所有大国，除了欧洲的英国、德国以及欧洲外的中国和奥斯曼帝

1 Maitron, *Le mouvement*, pp. 77-8.

2 *Ibid.*, p. 206.





1892年3月弗朗索瓦·拉瓦肖被逮捕后警察局拍下的照片



维拉·扎苏里锡 (Vera Zasulich) (左); 山特·卡塞里奥, 杀害法国总统萨迪·卡诺的刺客, 在狱中, 1894年6月 (右)

国。¹其次，1894—1901年的无政府主义暗杀此后被激进民族主义者复制。其三，民族主义者通常是谋杀自己的统治者，无政府主义杀手们则是跨越国界为他们的事业献身。最后，无政府主义者中意大利人居多，这一点引人注目，似乎也能证明佩尼科内所说的“意大利人在宣传无政府主义理想中扮演了独一无二的角色。作为政治难民和移民者，他们在法国、瑞士、英国、西班牙、美国、阿根廷、巴西、埃及和突尼斯的意大利人社团建立起了自由意志主义的飞地”。²1885—1889年间，马拉泰斯塔就曾在布宜诺斯艾利斯

78

1 其实，1878年无政府主义者有两起刺杀德国国王威廉一世的尝试[一次是由马克思·赫德尔(Max Hödel)，5月11日；另一次由卡尔·诺比灵(Karl Nobiling)，6月2日。详见Pernicone, *Italian Anarchism*, p. 148]。另一起行动在法兰克福警署爆炸后被发现。据称策划暗杀的“无政府主义”头目是奥古斯特·莱茵斯多夫(August Reinsdorf)。此人被迅速处决，而警察长官朗夫(Rumpf)不久之后即遭暗杀：这是一起阴暗的事件，很有可能是朗夫一手操纵。在1883年到1885年的伦敦，有人阴谋炸毁伦敦塔、维多利亚火车站和下议院。参见Núñez, *El terrorismo*, p. 18。这些“事件”很快就反映到了小说当中。比如亨利·詹姆士的《卡萨马西马公主》(*Princess Casamassima*, 1886)，以及20年后康拉德的《秘密特工》(*The Secret Agent*, 1907)和《西方的眼睛下》(*Under Western Eyes*, 1911)。也许还需一提的是，1882年5月，芬尼亚将暗杀卡文迪许勋爵(爱尔兰新任政务司司长)以及他的助理秘书。虽然他们的身份远不及上面提到的那些人，虽然芬尼亚会与刺杀弗朗茨·斐迪南的民族主义者一样与无政府主义相去甚远，此事件还是应当引起读者们的注意。

2 Pernicone, *Italian Anarchism*, p. 3. 弗朗西斯科·尼蒂为此提供了补充性的解释。当时他是不勒斯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很久以后成了意大利首相。有趣的是，他曾这样悲叹：“我们必须补充一点，在意大利的学校里，他们总是为弑君辩护——对于这个错误，再怎么叹息也不为过。教师不学无术，不向学生解释殉道者和谋杀者的区别。所以，教出来的人开始报复社会，将其推上绝路。我曾偶然看到一本在许多意大利学校使用的历史手册。其为弑君行为所作(转下页)



1901年9月6日，波兰无政府主义者佐戈尔茨于纽约布法罗的泛美洲博览会上枪击威廉·麦金利总统

宣讲无政府主义理念。¹

黎萨尔呢？1885年他已离开西班牙，距离1888年第一

(接上页) 辩护之多，令人目瞪口呆，从布鲁图斯到阿杰兹劳·米拉诺 (Agesilao Milano)，所有这些都得到了赞美。小册子说曾经的意大利，尤其是中部意大利，有过一段许多小暴君统治的时期；弑君者因此是解放者。颇为不幸，这个传统延续了下来。即便是诗人，也未能免俗，从不拒绝赞美政治谋杀者。他们赞美的，不仅是那些没那么令人憎恶的弑君者，还有那些最糟糕的“意大利无政府主义者。” *North American Review*, 167:5 (November 1898), pp. 598-607, 引文在第 607 页。

1 *Ibid.*, p. 7.

波无政府主义“暴行”还有很长一段时间。他在巴黎的时间也与此类似。黎萨尔在1885年后的经历大多是在德国、英国和比利时这些无政府主义活动不怎么显著的国家。不过，他喜爱读报，一直热心关注世界政治走向。现在就出现了一个明显的问题：他是否真的与欧洲的哪位激进主义者有私交？证据并不充分，但不失趣味。

黎萨尔的好友特立尼达·帕多·德·塔维拉在晚年写过一篇文章，描述了他与巴黎的两代俄国虚无主义者之间密切的关系。他说道，自己曾经也是亚历山大二世的崇拜者。

但与此同时，我又敬仰虚无主义者勇敢而巨大的责任感。这些信息，我是从俄语老师米哈伊尔·阿钦那斯基（Michael Atchinatski）那里得知的。从他口中，这些事变得越发感人。老师是一位著名的虚无主义者，由于密谋暗杀那位沙皇，他已三次被判死刑。*

这位“恶贯满盈的虚无主义者”逃到巴黎躲避绞刑架，不过，唉——帕多感叹道——他那位伟大的敌人死后不到三个月，肺结核就夺走了他的性命。

这篇文章剩下的部分写的是两位俄国女孩，是他的医学老师、“著名的塔蒂厄（Tardieu）”介绍给他的。当时的帕多感到很吃惊，斗胆问道，她们与自己可能没有什么共同语言。



路易·卢克尼暗杀奥地利皇后伊丽莎白，1898年9月，时人所画（左）；卡诺瓦斯（右）



1905年2月4日，伊万·卡利亚耶夫于莫斯科炸毁了大公谢尔盖·亚历山大洛维奇的马车

但这位伟大的人物这样说道：

知道，知道……但你要把她们当作你的精神姐妹。你们都来自宗教和政治暴政所统治的国家，今天能一同站在这里，都是因为庇荫于我国的自由所带来的安全。*

帕多时常去拜访那对女孩，很快就喜欢上了她们。两人都来自喀山的富裕家庭，曾去圣彼得堡学习医学。在圣彼得堡，她们在空闲时候便积极参加虚无主义活动，谴责沙皇专制、警察恐怖和“西伯利亚”。当公共安全与秩序保卫部渐渐要向她们撒网的时候，她们的父母要她们立即回家，并以切断生活费为威胁。但这两位女孩（当时都 20 岁上下）81决定逃往巴黎，在那里继续学业。她们在巴黎穷困潦倒，靠打零工和时不时做点翻译维生。虽然处在法国警察和俄国大使馆的监视之下，她们却从无怨言，悉心照料就快死去的老虚无主义者。帕多评价称，她们的善良和无私不应受到质疑，而且为她们赢得了“拉丁区全体学生的赞美与尊重”。1894 年尼古拉二世即位，她们也从巴黎返回了家乡。但在随后那一年，由于参与暗杀新沙皇的行动，她们被审判，处以西伯利亚终身监禁。玛丽亚·米哈伊洛夫娜·卢季娜（Maria Michaelovna Lujine）在路途当中因感染于巴黎的肺结核死去。路易丝·伊万诺夫娜·克里洛夫（Luise

Ivanovna Krilof) 几个月后在托博尔斯克的监狱里因同样的疾病去世。¹

黎萨尔抵达欧洲之前，帕多的俄语老师就已过世了。但黎萨尔肯定会从他朋友那里听说这位著名的虚无主义者。要说他没有和朋友一起去拜访过那两位俄国女孩，也不太可能。他一定曾与她们有过交谈，而她们也一定端上了一直为客人暖着的热茶。比较难说清楚的，是她们究竟是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虚无主义者。我们怀疑，在当时的巴黎，人们对于俄国新的颠覆性地下组织复杂的发展还并不是十分了解，所以“虚无主义者”一词也许涵盖的范围很广。

权贵的西班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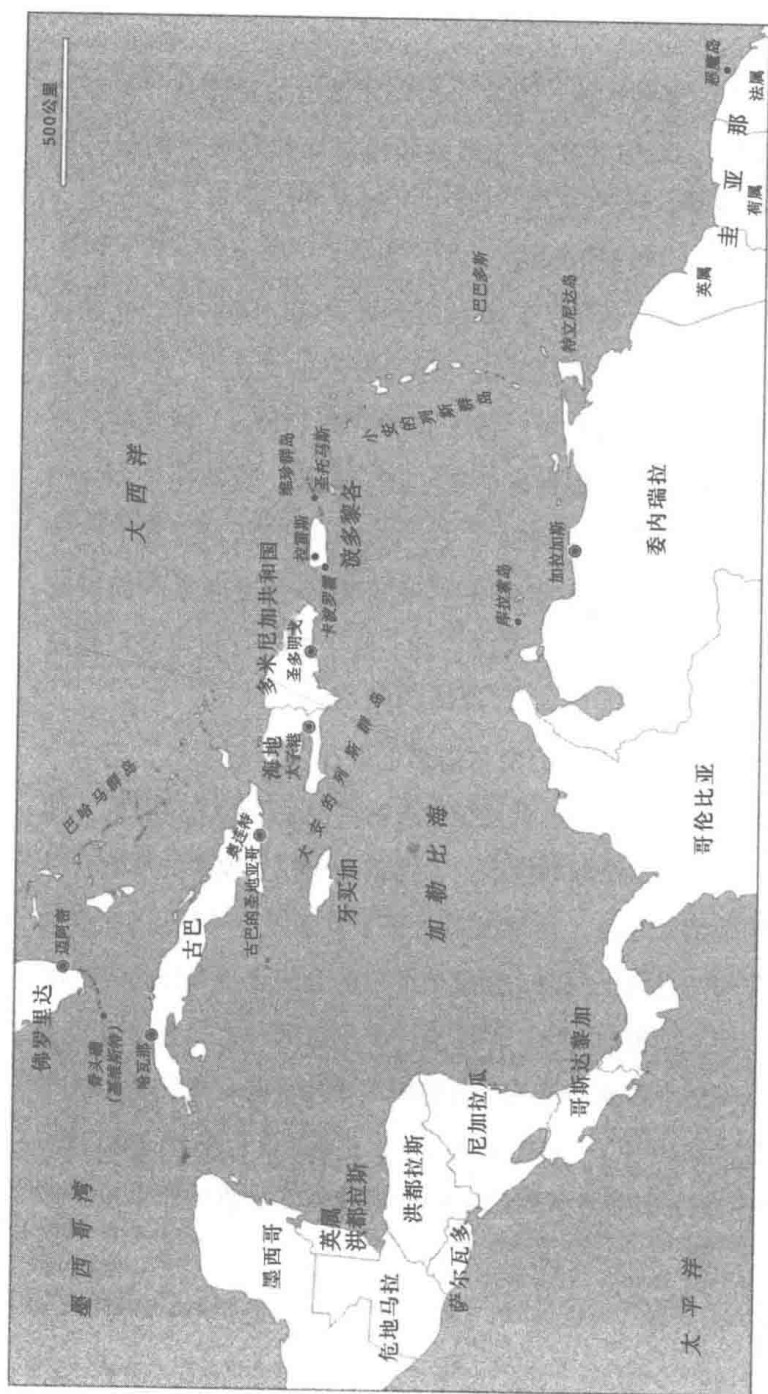
黎萨尔的第三个世界，是西班牙和它一度非常辽阔的帝国——不过到了19世纪80年代，只剩下古巴、波多黎各、菲律宾群岛、马利亚纳群岛、加罗林群岛、西属摩洛哥和没

1 参见 Pardo, "Las Nihilistas," *The Women's Outlook* (Manila), November 10, 1922. 帕多的叔叔华金(由于父亲早逝, 帕多从小就由叔叔抚养) 在四年的马利亚纳群岛流放生涯后, 于1875年搬到巴黎, 也叫他的侄子过来一起住。与黎萨尔在马德里一样, 他同时学习医学(索邦)和文学(国立流行东方语言学校), 于1885年毕业。虽说专攻的是马来世界的语言, 但他也懂俄语和梵语。帕多起伏不定的政治生涯和思想贡献, 已有比较犀利的述评, 参见雷希尔·莫哈雷斯(Resil Mojares) 不久前出版的 *Brains of the Nation, Pedro Paterno, T. H. Pardo de Tavera, Isabelo de los Reyes, and the Production of Modern Knowledge* (Quezon City: Ateneo de Manila University Press, 2006), pp. 121-252。

有黄金的里约·德·奥罗（西班牙语里的意思是“黄金的河流”）。在19世纪，大都会和殖民地此起彼伏的起义是这个世界的特点。[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才能在别处找到与之相似的情况。就法国而言：胡志明和武元甲在奠边府取得的政治、军事胜利是导火索，阿尔及利亚的民族解放阵线叛乱导致第四共和国垮台正式点燃了炸药，随后是戴高乐重新掌权、秘密军事组织（OAS）报复性的恐怖主义活动。就葡萄牙而言：在安哥拉、莫桑比克和几内亚比绍的军事失利导致了1974年4月里斯本爆发了反对萨拉查派独裁的血腥政变。]由于这条相互联系的曲折路线塑造了他的思想，所以它的一些主要特点值得我们做简要探讨。

82

1808年，未来的费尔南多七世在阿兰胡埃斯发起了一场军事叛变。这位恶名远扬的人物实现了他的主要目的，即迫使他父亲卡洛斯六世退位。但正处于权力顶峰的拿破仑以干预葡萄牙为由，借机出兵西班牙（占领了马德里）。费尔南多匆忙赶到巴约讷，想就他继位的合法化与拿破仑进行谈判，但立即被捕入狱。约瑟夫·波拿巴随后被推上西班牙王位。安达卢西亚与贵族统治的墨西哥几乎同时爆发了抵抗与叛乱。1810年，一个由自由主义者主导的议会在卡的斯召开，并于1812年缔造了西班牙首个宪政制度。殖民地（包括菲



三个世界2：加勒比海地区

律宾群岛)有了立法代表。¹拿破仑的倒台使费尔南多在“不神圣同盟”的全力支持下重新在马德里掌权。1814年,他拒绝承认宪法,推行新的反动独裁,甚至不顾经济萧条,试图阻挠美国革命。而美洲革命的两大主要原则,正是民族主义和在西班牙备受压制的自由主义。费尔南多在西班牙美洲以彻底失败告终,但维持住了西班牙加勒比海地区西班牙和克里奥人奴隶主的忠心——他们处于玻利瓦尔的魅力之外,而且被海地那场成功的奴隶革命所震惊。

菲律宾的情况又如何呢?1815年萨拉特叛乱被迅速、暴力地镇压下去(得名于吕宋西北角伊洛卡诺人城镇)。1820年,安达卢西亚发生了军事叛乱。叛军在卡斯市长的率领下,一度迫使费尔南多承认自由主义宪政。但卡斯尔雷的伦敦、梅特涅的维也纳、亚历山大一世的彼得堡,以及费尔南多在巴黎的亲族们,对此都不会接受。1823年,法国远征军恢复了独裁政权,卡斯市长被绞死,尸体被马拖着游街、肢解;数百自由主义者和共和主义者或被处死,或被关入监狱,或被迫逃亡。同年,为了响应大都会发生的这些事件,殖民地军队发生了一起由克里奥人领导的哗变;若不

84

1 后来所有的宪政时刻,菲律宾都保留了这一代表地位,直至1837年这一权利被废除为止——这已经是南美帝国崩溃以后很久的事了。黎萨尔告诉他的朋友布卢门特里特,自己的外公其实就曾作为菲律宾代表列席西班牙立法院。参见 *The Rizal-Blumentritt Correspondence*, vol. 1, 第268页之后第3页无页码页面(1888年11月8日,于伦敦)。

是有内部人背叛，它也许可以一举夺取马尼拉。¹它的领导人——混血儿安德烈斯·诺瓦雷斯（Andrés Novales）上尉此前曾为马德里参加镇压南美独立运动的战役。²

1868—1874年，我们也能轻易地发现类似的危机。1868年9月，一场军队—民众联合发起的政变推翻了伊莎贝拉政权。其中的核心人物，有普利姆·伊·普拉茨将军、善于权谋的自由主义政客普拉希德斯·萨加斯塔（Práxedes Sagasta）以及一心谋反的激进共和派曼努埃尔·路易斯·索里亚（Manuel Ruiz Zorrilla）。这场爆发为古巴和菲律宾带来的后果我们已经耳熟能详。但在西班牙本土，接下来的六年里发生了极大的政治骚乱。普利姆·伊·普拉茨于1870年末遭暗杀，这也葬送了萨伏伊的阿马德奥的君主政权。于是在1873年2月11日，西班牙共和国宣告成立。而实际上，新政权仅仅存活了11个月——期间发生了四次瑞士风格的总统轮换——尔后军队开进〔背后由狡猾的安达卢西亚保守派政客安东尼奥·卡诺瓦斯·德尔·卡斯蒂略（Antonio Cánovas del Castillo）率领〕，于1874年1月解散了议会。军政府在当年年底拥立了阿方索十二世，恢复了波旁君主制。

1 D. G. E. Hall, *A History of South-East Asia*, 3rd edition (London and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68), p. 721. 这些通常由克里奥人组织的骚乱，详情可见 Sarkisyanz, *Rizal*, pp. 76-9。

2 Luis Camara Dery, "When the World Loved the Filipinos," *Kasaysayan*, 1:4 (December 2001), p. 57. 他还愚蠢地自封为菲律宾皇帝。有趣的是，莫哈雷斯在《头脑》(*Brains*)一书第412页讲到，有几位叛军军官是墨西哥人。

人们推测，实施这样一种行动方针的关键理由，在于塞斯佩德斯（Cespedes）的古巴起义使得维护旧西班牙帝国的统一迫在眉睫。而与此同时，西班牙公众圈里炸开了锅。在人们的记忆当中，这是共和派第一次短暂成为合法政权。巴枯宁派和马克思派激进主义第一次有了政治立足点。1873年，又出现了一场广受欢迎的“自治州”运动，支持激进的政治去集中化。许多年轻无政府主义者和其他激进分子就在这场运动中有了自己第一次参与公开、群众性政治的经历。

有了上述背景，我们现在就可以探讨黎萨尔在19世纪80年代初所见到的那个复辟时代的西班牙。主导政坛的政客安东尼奥·卡诺瓦斯·德尔·卡斯蒂略1828年（与托尔斯泰同年）出生于马拉加一个小市民家庭。他既是一位多产、富有成就的历史学家，也是一位邪恶、残酷的政客。¹他32岁时就成了自由派内阁大臣，不过在伊莎贝拉倒台后很快就站到了右边，成了波旁复辟的关键设计师。除了积攒权力以外，他还有一个抱负，就是结束数十年的内部混乱，创造一个稳定的秩序。秩序，意味着终结这个国家的内战，消灭军事地主；他在世时，这一点做成了，但之后它们又报复性地卷土重来。秩序，也意味着压制激进左派以及帝国内任何严重的反殖民分裂主义迹象。说实在的，此人算得上是西班牙的

85

¹ 他是未来的总理安东尼奥·毛拉的得力爱将。毛拉曾这样评价他：“他讲的话令人震颤，他写的东西令人恐惧。” Frank Fernández, *La sangre de Santa Águeda. Angiolillo. Betances y Cánovas* (Miami: Ediciones Universal, 1994), p. 4.

俾斯麦。1897年卡诺瓦斯被暗杀后，铁血宰相便说道：“他是唯一一个与我有共同语言的欧洲人。”¹但卡诺瓦斯认识到，俾斯麦主义依赖的是国王的支持，所以归根结底无法长久。他从英国看到了更深刻、更持久的秩序，权力安全地在自由派和保守派精英之间传递；与此同时，工业化则不断推进，帝国主义也大步前行。这也是为什么他时常说自己非常景仰英国的代议制政府，为什么他在萨加斯塔的帮助下，着手建立了模仿格拉德斯通—迪斯雷利（Gladstone-Disraeli）的双头政治。不过这是一个独特而拙劣的模仿。舒马赫有力地描绘了这样一个腐败、权贵横行的政权；它基本上维持到了19世纪末：“两位领导人纵容整个体系通过选举操纵而不断腐败……既然更为严重的危机已经解决，两位领导人相互交接，继任政府然后会操控一场选举，选出一些有头有脸的少数派候选人，外加一些知名共和派和卡洛斯派，这样就算有了些国民议会的样子。”²萨尔瓦多·德·马达利亚加（Salvador de Madariaga）用接地气的話提出了同样的判断。他观察到，卡诺瓦斯主义的意图是建立一种“斗牛”政治——选举受操纵，腐败盛行，议会成了一家壮观的剧院，根据卡诺瓦斯的指示和剧本，上演古典、吉卜赛或音乐喜剧等形式的戏剧。³西班牙的迪斯雷利在1875—1881年、1883—1885年和1895—

1 *Ibid.*, p. 1.

2 Schumacher, *The Propaganda Movement*, pp. 21-2. 着重为我所加。

3 Fernández, *La sangre*, p. 5.

1897年执政，而这间隔当中几乎都是他的格拉德斯通掌权。卡诺瓦斯治下通常会发生最可怕的国内和殖民地镇压事件，而萨加斯塔执政时时而会有些谨慎的改革获得通过。

修会：被剥夺与剥夺

对于接下来发生的事，我们首先有必要了解一下，卡诺 86
瓦斯对于普遍十分反动的西班牙教会，采取了什么样的政策。1836年，摄政的首相胡安·门迪萨瓦尔（Juan Mendizábal）下达并实施了没收西班牙所有宗教修会财产的法令；在1868年光荣革命中，荣耀与正义部的首脑安东尼奥·奥梯斯（Antonio Ortiz）在西班牙废除了宗教修会。门迪萨瓦尔做得不像托马斯·克伦威尔那么绝，所以修会得到了国家开的薪水作为补偿。教会财产公开拍卖，被贵族、高层文官和军官、富裕的资产阶级（他们中不少已经是不在地主）抢购一空（尤其是教会在富庶的安达卢西亚的财产）。相对温和地征收了教会财产后，农业综合经营大行其道。数十万农民失去土地，贫困人口、吃不饱饭的工人以及“匪盗”（1840年以后这个地区因此出了名）急剧增多。虽然安达卢西亚人卡诺瓦斯寻求并取得了教会的支持，以对抗正在兴起的自由主义、共济会、共和主义、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浪潮，但他从未

试图推翻门迪萨瓦尔的法令。¹（1884年，应主教要求，派遣警察进入中央大学的也是此人。）他也没有恢复修会的独立地位，因为它们毕竟是直接对罗马而不是对他本人负责。但这些变化中有个例外十分醒目——菲律宾殖民地。

事情要从好几个世纪前，菲利普二世的时候说起。德·拉斯·卡萨斯（De las Casas）的启示和西班牙征服者在美洲进行的惨无人道的掠夺，使这位老国王决定将他最后一块帝国领地交给宗教修会管理，后者也确实相对和平地让当地民众皈依了天主教。遥远的菲律宾不像波托西²那样有“世俗”的吸引，所以修会大体上掌控了整个殖民地，尤其是在马尼拉以外的地区。随着时间的推移，道明会士和奥古斯丁会士取得了大量马尼拉的地产及农村的大庄园。³此外，从一开始，各修会就坚持用十多种土著语言传教（他们认为只有这样，皈依才是深刻、真诚的）。他们努力地想要学会这些语言。就这样，他们垄断了与土著的语言交往，而这一点赋予他们的权力之大，是没有世俗群体能够企及的；正因为充分

1 有关门蒂萨巴尔和奥梯斯，参见同上书，第134页，注16。有关没收修会财产（尤其在安达卢西亚）的后果更为概括性的论述，参见 Becarud and lapouge, *Anarchistes*, pp. 14-20。

2 波托西（Potosi），玻利维亚南部城市。——译者注

3 唯一的例外是1768年卡洛斯三世将耶稣会士驱逐出境。1773年法国、西班牙、葡萄牙和那不勒斯四个王国联手向克莱芒十四世施压，从而开展了全球范围的镇压耶稣会士的活动。庇护七世在1814年恢复了这个修会的合法地位，但它此时已经元气大伤。他们再度出现在菲律宾时，已经是1859年，而且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们与竞争的修会关系糟糕。

意识到了这一点，修会会士们才会顽固地反对在菲律宾传播西班牙语。即便到了黎萨尔那个时代，群岛上懂西班牙语的人口据估计也还只有3%，这在西班牙帝国是独一无二的（除了前耶稣会活跃的巴拉圭可以算部分例外）。19世纪，西班牙的统治阶层对这样的情况了然于心，而且他们估计，没有修会，西班牙在菲律宾的统治会崩溃（这个判断也许不错）。¹所以，奥梯斯的政策实施以后，唯一在西班牙得到容忍的，

1 不妨与荷属东印度群岛比较一下。荷兰是另一个迅速衰落的老迈帝国。在东印度群岛，严肃的荷兰语教育迟至20世纪初方才开始——这已经是荷兰在此群岛殖民三个世纪之后，西班牙在菲律宾的统治已经崩溃。在最初两个世纪，统治这个群岛的是大型的“跨国”东印度公司。它认为没有必要浪费钱去建立学校。19世纪的殖民国家把大部分精力放在剥削殖民地上（以缓解拿破仑战争和19世纪20年代巨大的迪波内戈罗叛乱造成的资金紧张），所以也无法比前任政府更有所作为。正规的土著语言训练在19世纪70年代方才开展，而且只集中教授爪哇语。此外，在荷兰本土，统治阶层与仆人和店主讲话主要仍用荷兰语。1880年后，荷兰的民主化尤其是选举权的扩大，使得殖民地政策受到了民族主义的压力。所以，当殖民地教育体系诞生后，教学的媒介最终是荷兰语。于是到20世纪20年代，当地有了一个小小的受过启蒙的民族主义精英层——这比菲律宾晚了40多年。这些精英确实也发动了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但为时已晚。1942年，日本发动了猛烈攻势，终结了荷兰统治。最后一部用荷兰语写作、有点分量的印度尼西亚小说是20世纪30年代的产物。1930年，殖民地有7000万人口，几乎全都是土著人口，懂殖民语言的最多不过0.5%。但与此同时，从东印度公司时代起的一个漫长的时期里，人们都在使用一种洋泾浜马来语。这种语言不仅是各个岛屿间贸易上的通行语言，也是统治者使用的语言。（东印度群岛处在海上跨洋贸易通路上，地理位置相对而言比菲律宾更为优越。19世纪90年代起，通俗语言办报开始兴起，“马来语”在市场上比荷兰语、爪哇语和阿拉伯语更为吃香，所以在1928年，那些年轻的民族主义者不是称它为洋泾浜马来语，而是“印度尼西亚语”。）荷兰语直到1960年仍然是知识精英的私人用语，但1942年之后，没有人会在公共场合说荷兰语。

是那些专门为菲律宾培养年轻修士的修会学校。与此同时，在西班牙被“扫地出门”的创伤让许多修士前往世界的另一面寻求安全与权力。因此，在卡诺瓦斯时代，修士权力之于菲律宾就如奴隶制之于古巴，成为了一道特殊的风景线。但1886年奴隶制最终被废除，而马尼拉的修士权力则一直要到1898年整个政治体系崩溃时，才受到了严重打击。从另一个角度我们可以看到，菲律宾的反殖民主义活动家不可避免地面临着一个艰难的选择，这是古巴人和波多黎各人所没有的：拒绝西班牙语还是传播它。我们后来将会看到这个问题如何塑造了《煽动者》的叙述。

黑色的翅膀

1872年秋，甲米地爆发了异乎寻常的罢工事件。警惕的总督伊斯基耶多怀疑这背后是国际工人联合会在密谋。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伊莎贝拉1868年9月从马德里出逃后，巴枯宁比马克思的反应要快得多。他立即派最好的意大利伙伴，前马志尼主义者、前加里波第主义者朱塞佩·法内利（Giuseppe Fanelli）前往巴塞罗那和马德里，向当地最先进的激进活动家告知此事，并将他们组织起来。¹虽然法

1 有关法内利和他的背景，参见Pernicone, *Italian Anarchism*, pp. 19–20。他也是那不勒斯人，而且是建筑师和工程师。1848—1849年，他在伦巴第和罗马的革命活动中十分活跃，而且曾与加里波第的千人远征军在西西里并肩作战，（转下页）

内利不懂西班牙语，但他在当地立即产生了强大的影响。（也许巴塞罗那意大利人社区帮助了他）次年年初，他组建了社会联合中心（Centro Federal de las Sociedades），还派了两名巴枯宁主义代表去9月的共产国际巴塞尔大会壮大俄国人的多数派。1870年初，西班牙地区联盟（FRE, Federación Regional Española的缩写，国际工人联合会的西班牙分部）开始出版《团结》，不久之后，它在工业化早期的巴塞罗那举办了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大会。¹

与此同时，马克思的古巴女婿保罗·拉法格（Paul Lafargue）终于穿越比利牛斯山，与家人逃到了西班牙。²他此前支持巴黎公社，但随后前往波尔多为巴黎起义寻求更多的支持。他刚出生的孩子在逃亡途中不幸夭折。在马德里安顿下来（1871年6月）以后，他化名帕布洛·法尔加斯（Pablo Fargas），依据马克思的指示打击巴枯宁主义者的气焰。但他来迟了。12月，议会禁止国际工人联合会在西

（接上页）协助后者摧毁了波旁王朝在意大利南部的统治。1865年，他当选新的国民议会议员，但他拒绝参与决策，而是用作为职务津贴发给他的铁路通行证周游全国，传播激进理念。

1 Esenwein, *Anarchist Ideology*, pp. 14–18; Becarud and Lapouge, *Anarchistes*, pp. 27–9.

2 为什么一个古巴人取了这么好听的法语名字？他祖父母和外祖父母都是“法国海地人”，逃到古巴躲避杜桑的革命。他的祖父（拉法格）是蓄奴小种植园主，外祖父（亚伯拉罕·阿尔马涅克，Abraham Armagnac）是犹太商人。他的祖母是海地黑白混血，外祖母是牙买加人。保罗和他父母都出生于古巴圣地亚哥。全家后又于1851年搬回了祖父母的故乡波尔多，这次是为了躲避古巴叛乱和西班牙的镇压。保罗持有西班牙护照，法语、西班牙语自如。

89 班牙活动。拉法格在西班牙待了一年左右。在巴塞罗那，他虽然不怎么走运，但还是在马德里帮助建立了一个马克思主义团体。1872年海牙共产国际大会上，拉法格是唯一一个支持马克思的“西班牙”代表。第一个半地下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政党在1879年方才组建，直到19世纪80年代初萨加斯塔执政时才正式出现在公众视野。它的喉舌《工人》（*El Obrero*）创刊于1882年。¹它成为西班牙左派政治的核心，还需要再过许多年。黎萨尔在马德里读书时，很有可能从未听说过这个组织。但事情接下去的发展，他一定知道得一清二楚，这一点我们能在《煽动者》中找到痕迹。卡诺瓦斯六年的高压统治于1881年由相对温和的萨加斯塔政府取代。不久就是亚历山大二世遭暗杀；在伦敦开会之后，各派无政府主义者都活动起来，承认“用暴力行为做宣传”的必要性。西班牙政府换届让西班牙地区联盟高层（大多是加泰罗尼亚人）以为，现在已经可以更广泛、合法地组织工人阶级。9月，西班牙地区联盟更名为西班牙地区劳动者联合会（FTRE，*Federación de Trabajadores de la Región Española* 的缩写）。由于这项方针有悖于伦敦通过的激进决议，所以他们尽可能地掩盖自己的决定。但消息终究还是泄露了出去。尽管成员数量有显著增加（一年内增加了5.8万人），但工业城市巴塞罗那的合法路线派与以安达卢西亚乡村为基地的激

1 Becarud and Lapouge, *Anarchistes*, pp. 29–34; David Ortiz, Jr, *Paper Liberals. Press and Politics in Restoration Spain* (Westport, CT: Westwood Press, 2000), p. 58.

进派之间的关系急剧紧张化。1882年塞维利亚大会上，大部分安达卢西亚人脱离出来，组建了他们称为“失地者”（Los Desheredados）的团体。1883年则是不幸之年。世界性的萧条降临，在安达卢西亚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后果，饥饿和贫困人口激增。此外，卡诺瓦斯重新掌权。就在首相老家的这块地区，爆发了新一波放火和抢劫的事件，在许多地方造成了巨大恐慌。¹警察逮捕、刑讯了数百位平民、无政府主义者、农民和匪盗，不久后他们声称发现了一场名为“黑手”（La Mano Negra）的大规模起义阴谋。²西班牙地区劳动者联合会担忧自己也会遭到镇压，因此非但没有给予支援，反而坚决与政府所炮制的犯罪活动划清界限。但这个立场无助于事。这个组织不断衰落，最终于1888年解散。³不过，我们将会看到，“黑手”的幽灵和安达卢西亚的恐慌，都反映在《煽动者》的后半部分当中。

90

1 根据 Becarud and Lapouge, *Anarchistes*, p. 36, 更早的一波发生在1878—1880年。

2 拉蒙·森保观察到，现在“被遗忘的做法（即宗教裁判所时代）又重现了”。*Los victimarios*, p. 275. 15年后，在自由化以后的政权下，有两部著名的西班牙小说出版。他们细致地回忆了那个时期巴塞罗那和安达卢西亚的地下活动：皮奥·巴罗哈的《红色黎明》（*Aurora roja*）和文森特·布拉斯科·伊巴内斯的《天花板》（*La bodega*）。两部小说最初都于1905年在马德里出版。

3 对这些发展的简述，参见 Núñez, *El terrorismo*, pp. 38–42。

亲密伙伴

1885年，萨加斯塔再度上台，一直主政到1890年。正是这一届政府最终废除了古巴奴隶制，推行了相对自由的结社法（再次允许激进分子合法组建团体），并显著扩大了出版自由。它甚至正儿八经地想在菲律宾群岛进行改革。1887年，西班牙刑法典的适用范围扩展到了菲律宾群岛，随后在1889年，西班牙商法、行政诉讼法和民法也同样扩展了范围（只有婚姻法因菲律宾教会苦苦坚持而没有推行）。但正是在1885年7月，黎萨尔离开了西班牙（差不多可以算是一去不复返），前往法国和德国，忙于医学深造和写他的第一部小说。1887年春小说出版后，他认为是时候回菲律宾了。不过在此之前，他先去奥地利见了费迪南·布卢门特里特。这是他们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相见。费迪南是他最喜欢的通信人，无疑也是他最亲密的伙伴和顾问。由于我们后面还会讲到好几位奥地利学者，所以我们有必要先介绍一下费迪南的生平以及两人之间的友谊。

布卢门特里特是奥匈帝国一位低级军官之子，1853年出生于布拉格（即比黎萨尔年长八岁）。他在布拉格一直住到1877年从查尔斯大学毕业（取得的是地理学和历史学学位）。然后，他搬到了另一个波西米亚城市莱特莫里茨，并一直在当地的中学教书。他的工作——加之他显然还患有忧郁症——使他在之后的人生当中都没有走出过波西米亚。但

在孩提时代，他有位嫁给秘鲁克里奥人的姨妈，她的保皇派丈夫在 1824 年激烈的阿亚库乔之战中被玻利瓦尔的部队杀害，她因此返回了家乡。她带回来的外国书籍以及与西班牙殖民地有关的东西让这位小男孩非常痴迷。他与黎萨尔有同样好的语言天赋，很早就具备了阅读西班牙语、葡萄牙语、荷兰语和英语的能力。西班牙帝国内，他又尤其醉心于菲律宾。1879 年他出版的第一部书写的就是这个国度。三年后，正当黎萨尔刚刚踏上欧洲的土地，布卢门特里特出版了《菲律宾人种志学初探》（*Versuch einer Ethnographie der Philippinen*）这部里程碑式的著作。这是第一部系统、专业地讨论菲律宾群岛上好几十种种族语言群体的论著。接下来的 30 年里，跟在它后面的有两百多种出版物，涵盖了这个国度的语言、历史、地理和政治。事实上，他迅速因为这部著作成为了欧洲菲律宾研究的学术权威。 91

但是，吸引了我们这位年轻而聪明的菲律宾人，让他想把布卢门特里特招募到自己事业中来的，绝不仅这一个原因。他完全忠于皇帝弗朗茨·约瑟夫，但正如穆西尔略带讽刺的评价所说，奥匈帝国是唯一一个“‘殖民’和‘海外’这两个词都有着完全没有尝试过、非常遥远的意味”的欧洲帝国。布卢门特里特常去教会，是虔诚的天主教徒。他没有什么时间去关心反动的西班牙教会。在政治上，他又是自由主义宪政主义者和民主派，所以立即对菲律宾的困境表示同情。他绝非那种只知卖弄学问的学究。他投身于市议会，组

织业余戏剧演出，酷爱绘画，有着尖锐而诙谐的文笔。他甚至还是很好的厨师，他做了菲律宾的代表菜肴宴请来到莱特莫里茨的黎萨尔，让黎萨尔十分吃惊。他的房子就像是图书馆和博物馆的结合，里面还塞满了各种菲律宾的艺术品。

这两位个子都不高的男子简直是绝配。1886年9月黎萨尔在海德堡给布卢门特里特寄去了第一封正式的自荐信。从那时起，他们就意识到了这一点。不到18个月，他们就开始用“你”而不用“您”称呼对方了。黎萨尔为比他年长的布卢门特里特提供了大量菲律宾的信息，尤其是有关自己的故乡塔加洛地区；布卢门特里特则将他介绍给柏林、莱顿和伦敦的相关学者，而且向他展示了有关菲律宾早期史的资料，这是我们这位菲律宾人先前并不知道的。1891年，黎萨尔邀请他的挚友撰写《煽动者》的前言，是再自然不过的了。¹

首次归国

萨加斯塔再度上台后，新任命了一位相对温和的菲律宾总督，埃米利奥·特雷罗·伊·佩里纳特（Emilio Tererro y Perinat）将军。这位将军又很依赖于两位共济会士。这两人

1 这些段落，一部分摘自 Harry Sichrovsky 的书的前三章。参见 Harry Sichrovsky, *Ferdinand Blumentritt: An Austrian Life for the Philippines* (Manila: National Historical Institute, 1987)。此书是最初1983年于维也纳出版的 *Der Revolutionär von Leitmeritz* 一书的译本。

都很干练，持反教权立场：马尼拉民政总督何塞·森特诺·加西亚（José Centeno García，他是同情共和派的矿业工程师，在菲律宾有20年不同寻常的经历），文官主管贝尼尼奥·胡伊洛哈·洛佩斯·巴列斯特罗斯（Benigno Quiroga López Ballesteros，这位年轻人曾是议会的自由派代表）。（在《煽动者》中，黎萨尔没有点明森特诺这个名字，但以他为原型塑造了一个光荣的角色。）两人强硬地推行法令，将市司法权从市长手中收走，并将权限赋予新设的和平法官。与此类似，他们将省级官员的司法权力分配给了初审法官。这两项举措的意图在于削减修会会士的权力，不让他们再像传统的那样，通过控制地方行政人员而恣意摆布地方政府。¹

黎萨尔知道现在的大好氛围。与布卢门特里特作别后，他快速游览了瑞士、罗马，然后坐船到马赛。回到马尼拉已是1887年8月5日。《不许犯我》的消息（还有几册书）比他早到，所以他一上陆，就发现自己已是个著名也臭名昭著的人了。各修会以及马尼拉大主教认为此书传播异端思想，具有颠覆性，完全是诽谤之作，所以应当查禁，对作者予以严惩。但出乎黎萨尔意料的是，特雷罗请黎萨尔与他面谈。特雷罗说自己想要读读这部小说，并请黎萨尔给他一份。这位总督怎么看这部小说，我们并不清楚。但在他当政的那个时期，小说

1 对比 Guerrero, *The First Filipino*, pp. 178–80 与 Schumacher, *The Propaganda Movement*, pp. 109–14。

没有遭到禁毁。¹黎萨尔在马尼拉住了几日，随后回到家乡卡兰巴与家人团聚，开始行医。接着，他树立的敌人开始活动了。1887年9月5日，他在给布卢门特里特的信中写道：

我每天都能收到威胁……父亲不让我自己出去，或是去别家吃饭。老人家吓得瑟瑟发抖。人们把我当作德国间谍或者特工；他们说我是俾斯麦的特工，是清教徒，是共济会士，是男巫，半个灵魂已经被魔鬼吸走云云。所以我只好待在家里。^{2*}

93 更坏的事还在后头。此前我们说到，黎萨尔家的财富主要来自他们从当地道明会庄园租借的土地。1883—1886年经济萧条，即便在当时是国际糖价暴跌的情况下，修道会士们仍然开始大幅提高租金。除此之外，他们还侵占了许多土地。这些举措在市民们看来都没有正当理由。黎萨尔回国的时候，许多租户（包括黎萨尔的亲戚）停止支付租金，请求马尼拉为他们做主。特雷罗怀疑道明会士逃税，派了一个委员会调

1 Guerrero, *The First Filipino*, p. 180.

2 *The Rizal-Blumentritt Correspondence*, vol. 1, 第133页后第5个无页码的页面。在宗教圈子里，俾斯麦是食人魔般的人物。因为他在19世纪70年代发动了文化战役（Kulturkampf），强迫德国天主教徒首先效忠于德意志帝国。（此举一部分是他对“教皇无谬误”的反应。）但更受广泛担忧的，是他对西班牙的大洋洲有所图谋。似乎在1885年，铁血宰相宣布帝国海军会在加罗林群岛保护德国企业家的安全。西班牙于是急匆匆派出部队，弹压当地抵抗，从而完全确保马德里对此地的主权。

查，但之后不了了之。同时，修道会士们继续发动攻势，从法庭那边得到了驱逐令。他们故意选择了黎萨尔家作为主要对象。双方在之后四年里不断上诉，甚至去了西班牙最高法院。但不出乎所料，道明会士赢了。于是，黎萨尔家族被赶出家园，其他顽固的民众不久也落得同样下场。此时，大家都劝黎萨尔离开菲律宾，因为道明会士怀疑是他组织了抵抗活动。似乎总督本人也发话称，自己再也无力保护这位青年小说家了。就这样，1888年2月，黎萨尔乘船前往日本，去亲眼看一看这个正在迅速自我现代化的、独立的亚洲国家；他又去了美国，最后到了英国。

就在差不多这个时候，特雷罗的任期结束。西班牙本土以及殖民地的保守派向萨加斯塔政府不断施压，迫使它做出了一个重大的决定——让巴莱里亚诺·韦勒（Valeriano Weyler）将军接任。此人之前在古巴素以严酷著称，19世纪90年代中期因美国媒体报道他为“古巴屠夫”而臭名远扬。¹特雷罗的自由主义顾问很快被解雇或调走。1891年，

94

1 韦勒（1838年出生）军旅生涯的前10年（1863—1873年）几乎全在加勒比地区度过。1844年，多米尼加第一共和国成功地脱离海地，但1861年，在其总统佩德罗·桑塔纳（Pedro Santana）的设计下，西班牙帝国将其收回。1863年，借助海地的支援，民众对总统的背叛行为发起反抗。韦勒是第一批从古巴派去镇压起义的青年士官。两年后，由于美国的施压，以及军事上的反复，马德里被迫撤军，承认了多米尼加第二共和国。

韦勒是位出色的军官，他在古巴镇压塞斯佩德斯叛乱战果累累。他有一支由无业游民或者罪犯组成的猎人部队（cazadores），手段极为残暴，他也因此得了“嗜血者”（el Sanguinario）这个绰号。即使是他最狂热的崇拜者，（转下页）

韦勒会成为最终“解决”卡兰巴租户抵抗的人：他派了一支炮兵分遣队，焚毁了数栋房屋，强行推平了被“非法”占有的土地。《煽动者》中，韦勒（没有点明）是西蒙那颗炸弹的核心目标。因此，黎萨尔推迟他回国的时间，一直等到这位凶残的将军任期结束才返回，也就不足为奇了。

流亡者民族主义内部的分裂

黎萨尔第一次漫长的欧洲行，时间主要用在学习和写小说上。现在，他脑子里想的只有接下去做什么。卡兰巴的灾难让他感到很难过、自责，也打消了他对于萨加斯塔的梦想。他看到，要解决问题，就只有更为直接地投身民族主义（文化）政治。他之所以决定住在伦敦，一部分原因在于布卢门特里特和学界友人告诉他大英博物馆有研究资料。从报纸和杂志上，他看出欧洲各个帝国内部民族主义正在兴起，更不

（接上页）也承认他杀的犯人远远比其他西班牙军官多。回马德里后，他受命摧毁瓦伦西亚的卡洛斯派势力，虽然没有用古巴风格的做法，却也大获成功。对此，佛朗哥派写的历史很有趣。参见 General Hilario Martín Jiménez, *Valeriano Weyler, de su vida y personalidad, 1838-1930* (Santa Cruz de Tenerife: Ediciones del Umbral, 1998), 第2—6章，尤其是有关死去的囚犯的部分，第247页。休·托马斯 (Hugh Thomas) 说韦勒在美国内战时期曾任驻华盛顿武官，后来成了残忍的谢尔曼的仰慕者。参见他的《古巴》(Cuba), 第328页。费利克斯·奥黑达·雷耶斯 (Felix Ojeda Reyes) 在他的 *El desterrado de Paris. Biografía del Doctor Ramón Emeterio Betances (1827-1898)* (San Juan: Ediciones Puerto Rico, 2001), p. 351 引用了韦勒1910年的《古巴任职记》(Mi mando en Cuba), 也证实这次任命确有其事。

用说古巴、奥斯曼帝国和东方了。所有这些民族主义的表述中，最核心的表述来自民俗学家、历史学家、词典编纂学家、诗人、小说家和音乐家；他们在屈辱的现实背后努力复原各民族辉煌过去。他们尝试用地方俗语替代帝国官方语言，巩固民族身份。他从未忘记，自己被误认为是中国人、日本人或者美洲人，从未忘记自己的国家在欧洲是多么不受了解。而且，他还知道，与马来亚、缅甸、印度、锡兰、柬埔寨以及越南不同的是，菲律宾在前殖民时代没有留下任何书面记录。菲律宾历史大多都是修会成员（后来还有西班牙宗族主义保守派）所作。比他年轻的伊萨贝洛·德·洛斯·雷耶斯的代表作《菲律宾民俗学》在1887年的马德里博览会上获奖，也许也对他在这方面的关切有所刺激。¹

在大英博物馆，黎萨尔找到了他一直在找的东西：安东尼奥·德·莫尔加（Antonio de Morga）博士1609年在墨西哥出版的《菲律宾群岛源流》（*Sucesos de las Islas Filipinas*）。 95

1 布卢门特里特和伊萨贝洛有书信往来的事也许让黎萨尔有些难过。1888年4月30日，他有点生气地在旧金山给布卢门特里特写信道：“据我观察，许多民俗学家或者未来的人类学家都来自伊罗戈。正在和你打交道的德罗塞尔（Delosserre）先生（伊萨贝洛的笔名）就是。我注意到一点：多数菲律宾民俗学家是伊洛卡诺人，也正因为他们喜欢用‘伊洛卡诺’冠名，他们会误导人类学家，把其实是菲律宾人的习惯和风俗归为伊洛卡诺人的。但错在我们。我手头有伊萨贝洛的作品，都做了评论，会从欧洲寄给你。也许因为他不完全理解塔加洛语，所以书里有若干错误。”* *The Rizal-Blumentritt Correspondence*, vol. 1, 第165页后的无页码页面。“正在和你打交道”说得多少有些唐突。黎萨尔称他第一部小说为“塔加洛小说”（*novela tagala*），而且他显然完全不懂伊洛卡诺语。这并无伤大雅，但可怜的伊萨贝洛却被他批评为用伊洛卡诺代表菲律宾人，而且塔加洛语水平还不够。

这本书非常罕见。1595年，30岁的莫尔加抵达菲律宾，在马尼拉担任听审法官及总督。他在当时算是个特例，是位极其诚实的殖民官员，而且没有让宗教偏见遮蔽他现实主义的视角。黎萨尔花了很大功夫抄写了这本书，随后决定给它加上大量注释和评论后设法再版。他写的评注主要是为了说明，相对于教会编年史，莫尔加对土著社会的描述更可取——它的文明水平、和平的经济生产以及与中国、日本和部分东南亚地区的商业往来等。最终，巴黎的加尔尼埃（Garnier）出版社再版了此书，虽然名义上是1890年出版，但实际上市时间是1889年底。¹

96 尽管在当时以及到后来，黎萨尔批注版的莫尔加一书流传并不广泛，但它清楚地代表了黎萨尔政治轨迹中的一个转折点。他正在成为煽动者，一个决定用任何方式为祖国谋求完全独立的爱国者。（我们将会看到，《煽动者》极为清晰地表现了这一新的立场。）由于《不许犯我》为他在菲律宾大众当中赢得了很高的声誉，加之他在西班牙各种共和派报纸

1 在 *First Filipino* 中，格雷罗对莫尔加原书和黎萨尔的评注有较长篇幅的讨论，颇为有趣（第205—223页）。1890年，伊萨贝洛在《团结》上为这本书写了赞许性的评论，但也指出，黎萨尔的爱国主义让他在有些地方写得过于夸张。黎萨尔看了大为光火，写了篇尖酸刻薄的回应，基本上就是说伊萨贝洛不过是个菜鸟。两人共同的好友胡安·卢纳写信给黎萨尔说，虽然黎萨尔很多观点没错，但这样的攻击只会让马尼拉的西班牙人笑话菲律宾人阵营的不团结；伊萨贝洛没有出拳还击，黎萨尔也就此作罢。（1890年11月8日的信。）*Cartas entre Rizal y sus colegas de la propaganda*（Manila: José Rizal Centennial Commission, 1961），Tomo II, Libro 3, Parte 2a, pp. 587—8.

上发表了大量文章，这次转折带来的一个后果是西班牙的菲律宾人社团日益分裂。即使在学生时代，黎萨尔就曾频繁批评他的同胞，称他们举止轻佻、喜好女色、懒散嚼舌以及酗酒等。虽然他和半岛上的不少人保持了密切的友谊，但他前往欧洲北部的数年加深了他的恼怒以及被孤立的感受。

但有趣的是，他们一度也有重新凝聚到一起的时刻。1888年，巴塞罗那一群较为正派的菲律宾人决定利用1887年萨加斯塔的自由化法案，结成一个充满活力的新的政治组织，出版他们自己的刊物，名为《团结》。在这些决策中，巴塞罗那的氛围起到了重大影响。1886年，颇有影响力的无政府主义刊物《无政府》(*La Acracia*)已经在巴塞罗那发行。同年在马德里，帕布洛·伊格莱西亚斯(Pablo Iglesias)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党推出了《社会主义者》(*El Socialista*)。但在1887年，巴塞罗那的无政府主义者终于有了自己成功的日报《生产者》(*El Productor*)。¹ 共和主义和

1 参见Ortiz, *Paper Liberals*, pp. 57-60。奥提斯评论道，这些产出(还有后来的《白色杂志》)表明，热闹的无政府主义报刊“在思想活力、流通和持续性上都超越了社会主义报刊”。他也指出有大量十分流行的阅读俱乐部，读者们在活动上大声朗读报刊(巴塞罗那工人阶级普遍不识字)。比较值得注意的是，在同一年出现了两个《生产者》，一个在巴塞罗那，一个在哈瓦那。哈瓦那那边的主编是富有活力的加泰罗尼亚无政府主义者恩里克·罗伊格·伊·桑·马丁(Enrique Roig y San Martín)。他有一个“劳动者社团”(Círculo de Trabajadores)，也隔月刊行巴枯宁主义杂志《世界之子》(*Hijos del Mundo*)。这个信息来自一篇未发表的论文“Leaves of Change: Cuban Tobacco Workers and the Struggle against Slavery and Spanish Imperial Rule, 1880s-1890s,” by Evan Daniel (2003), pp. 23-4。感谢罗宾·布莱克本(Robin Blackburn)和埃文·丹尼尔(Evan Daniel)允许(转下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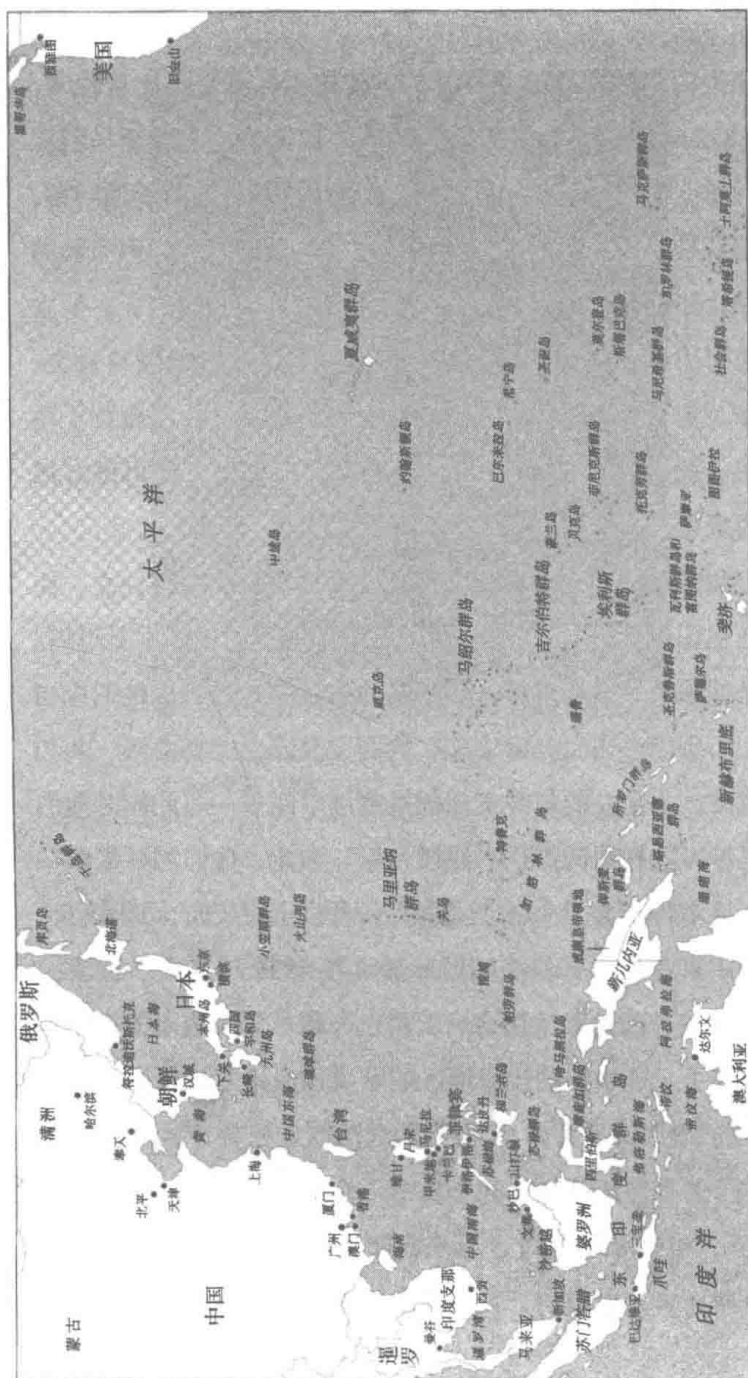
马塞洛·德尔·皮拉尔（中），两边是何塞·黎萨尔（左）
及马里亚诺·庞塞（右）

无政府主义组织同其他组织一样迅速发展起来。1889年1月马塞洛·德尔·皮拉尔（Marcelo del Pilar）的到访集中了菲律宾人的注意力。马塞洛·德尔·皮拉尔是他那一代人中最

（接上页）我阅读这篇文章。文中还说，哈瓦那的《生产者》定期转载巴塞罗那《无政府》的文章，翻译《反叛者》（事实上当时它已经更名《反叛》）及其他非西班牙语无政府主义期刊，但从未提到它在巴塞罗那的孪生兄弟，真是令人困惑。丹尼尔也强调了读书会之于文盲烟草工人的重要性。所有这一切都为当时的哈瓦那和马尼拉提供了鲜明的对比：在古巴，无政府主义刊物可以合法地大张旗鼓，而在菲律宾，这样的组织压根儿不可能被容忍。

有能力的菲律宾政治家。德尔·皮拉尔的哥哥（土著神父）在 1872 年伊斯基耶多的镇压活动中被逮捕、流放至马利亚纳群岛。在相对宽容的特雷罗、森特诺和胡伊洛哈统治时期，马塞洛是手段灵活的反修会民族主义运动组织者。但韦勒的到来让他感到自己正在风口浪尖，所以逃到了西班牙。他立即取得了在菲律宾活动家和他们新办刊物当中的领导地位。后来，为了更靠近国家权力中心，他将刊物的总部搬到了马德里。此后直到 1896 年 7 月在巴塞罗那去世，他再没有离开西班牙。 97

德尔·皮拉尔的目标当然是使菲律宾最终取得独立，而且他也积极推进与马尼拉的联系，鼓励那里的民族主义组织。但是他深信，必要的第一步得在西班牙本土进行。他们应当尽一切所能游说“自由主义”内阁以及议会的自由派、共和派成员，为独立的最终实现创造制度空间——与此同时他们还要尽可能好地掩盖这一终极目标。为此，他们需要采取一系列战术性步骤，大体上是推行一个类似古巴的同化政策。古巴一直在议会有代表，但菲律宾在 1837 年丧失了这项权利。1886 年废除奴隶制之后，古巴与西班牙的法律体系也基本相同了。这块加勒比海地区的殖民地通用西班牙语，有着世俗的、国立的教育体系，教会的政治权力相对有限。德尔·皮拉尔虽然是位成就颇丰的塔加洛语作家（事实上比黎萨尔更成功），也曾私下探讨过未来菲律宾独立后的语言政策，但就目前而言，他确信，只有依靠同化和西班牙化，才能在马 99



三个世界3：太平洋

德里创造有利的政治氛围，使菲律宾得以拥有古巴的政治地位。在菲律宾大力推行国家支持的西班牙语教育体系还能起到摧毁修会统治根基的效果。¹ 德尔·皮拉尔和他的圈子积极与温和自由派—共和派报刊培养联系，与保守派报纸和记者论战，而同时似乎绕开了无政府主义左派。他们的小心行事有战术上的理由，但实际的原因是，在这个时代贫困的殖民地人无法享受奖学金，只有富裕的、消息灵通的家庭，才负担得起在大都会留学的成本。

黎萨尔和德尔·皮拉尔两人有着完全不同的性格与才干。尽管如此，两人相互尊重，黎萨尔也一度兴致勃勃地为新报纸写稿。但他们的关系日渐紧张起来。德尔·皮拉尔比黎萨尔大 11 岁，他不顾危险在菲律宾组织活动多年；在西班牙，他又是一位精明而不知疲倦的说客，鼓动西班牙对对

1 舒马赫的《宣传运动》对德尔·皮拉尔的人生、理念、目标和政治活动有敏锐的描述，作者整体上对之持同情态度。上面这段话还完全不足以概括他的论点。这里也许应该简单说一说古巴人和菲律宾人在西班牙的往来。在大都会入会的菲律宾人大多加入了古巴人的会所（大概是因为古巴人比西班牙人更友好、热情）。克里奥古巴人拉斐尔·拉夫拉（Rafael Labra）是国民议会共和派团体的资深成员（复辟时期的安排就是这么奇怪，他代表的是波多黎各和阿斯图里亚斯）。他着力推动一个强硬的自治主义方案。他有众多有关殖民地问题的著述，有着较大的思想影响。而且，他还时常参加菲律宾活动家组织的政治宴会并在宴会上发言。此前，他在西班牙领导了第一波废奴运动（早在 1860 年！）（Thomas, *Cuba*, p. 240）。除此之外的联系，在 19 世纪 90 年代前似乎相当有限。古巴的政治情况比菲律宾领先太多，它在西班牙的代表更多的是半岛人和克里奥人（而不是混血人或“土著”），且两个殖民地的问题非常不同。就我所知，1890 年以前，似乎没有古巴人访问过西属菲律宾群岛；而亲身见过古巴的菲律宾人，在殖民地末期也是屈指可数。

100 菲政策进行细致的、实际的政治改革。事实上，就像布卢门特里特（两人也有很好的交情），他看不到其他什么可行的行动路线。但他的立场要生效需要三个条件。首要的也是最大的条件是，他必须证明自己的政策有显著的效果，否则人们必然会对之失望。我们可以在卡兰巴的变故中看到这种情况。德尔·皮拉尔毫不厌倦地为黎萨尔家族和当地民众奔走，却没有效果。其次，他游说的假想效果取决于如何说服西班牙政客和评论家，让他们相信西班牙的菲律宾社团坚定地支持他；这也使他不得不容忍黎萨尔所强烈反对的赌博、嫖娼、酗酒和小团体行为。第三，《团结》的编辑方针是避免不必要地冒犯西班牙读者，文章不能被马德里的右翼报刊利用。相反，黎萨尔居住在欧洲北部，根本没有实际的政治经验（无论是在菲律宾还是西班牙）。他没有必要为了现实的结果而容忍他所认为的菲律宾社团中许多人的不道德行为，也不必担忧他鄙视或讨厌的西班牙政客和记者的私人感情。他相信自己写作是为了菲律宾读者，而不是西班牙公众。

有一件特别抢眼的事。1890年4月，两人关系还不错的时候，黎萨尔退还了一篇编辑过的他的文章，称他已经根据建议做了修改，但后面又附上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前提是我的思想没有被更改，或我的表达方式没有因此被毁掉。”¹

1 *Carts entre Rizal y sus colegas*, p. 517. 整封信都是用塔加洛语写的。黎萨尔很少用塔加洛语写信，但这样做显然是为了传达亲密和友情。信写于（转下页）

但在5月26日，他致信德尔·皮拉尔说，他决定暂时不为《团结》写稿了。他为此做的解释不怎么令人信服：读者看他的文章看疲倦了，得“歇歇”，而其他菲律宾人需要更多证明自己的机会。这封信让德尔·皮拉尔忧心忡忡，11天后他回信（也是用塔加洛语）询问，他究竟哪里做错了，应该怎样补救。他还忧伤地补充道：“相信我，我一生中经历了各种灾难和不幸，唯独无法承受被这样抛弃的痛苦。”显然，黎萨尔为此深受感动，回信说德尔·皮拉尔反应过激了，他之前所说的不为《团结》供稿的理由，只应该按照字面意思来理解。

忧郁的想法激发了我的想象。小时候，不知为什么，我一直以为自己活不过30岁。近两个月来，每天晚上我都只梦见死去的朋友和亲戚。^{1*}

101

1890年就这样沉闷地过去。德尔·皮拉尔不堪编辑《团结》的重压，把这个活交给了爱好虚荣、野心又大的克里奥人爱德华多·德·莱特（Eduardo de Lete）。这是他犯下的一个战术性错误。爱德华多少年时候曾是黎萨尔的好友，但后

（接上页）布鲁塞尔（黎萨尔1月末搬到那里，因为听说物价和书籍印刷费比巴黎低很多）。在这里他开始认真撰写《煽动者》。

1 *Cartas entre Rizal y sus colegas*, pp. 539-41, 547-51. 最后两封信的日期是1890年6月8日和11日。

来与之交恶。也许是因为《不许犯我》让黎萨尔声名赫赫，引起了他的嫉妒吧。我们这位一直都很敏感的小说家日益感到，自己的文章在《团结》上受到审查，在其他地方发表又受到忽视或者轻视。所谓的皮拉尔派和黎萨尔派的派系纷争日益明显。其根源虽然来自私人恩怨，但内部的争论却是围绕“同化”和“分裂”展开的。

当年年末，事件达到了高潮。黎萨尔来到马德里，敦促社团确立自己的章程，选举一名有权制定政策的领袖。¹显然，他从马尼拉收到的信让他踌躇满志地以为，爱国主义运动的涌动当归因于他的著作。而三次连续的投票结果让他大吃一惊。他和德尔·皮拉尔基本上是平分了选票，而后者长期以来就是在西班牙的菲律宾人的实际领袖。最终，为了避免社团发生灾难性的分裂，德尔·皮拉尔指示自己的支持者把票投给黎萨尔。黎萨尔对此感到十分恼怒，随即威胁称，如果由他不信任的人担任副职，他便会辞职。虽然在表面上，黎萨尔是胜利者，但他意识到，他之前所希望的那种团结一致的支持，恰恰只能软化他的立场，而不能支持他实现目标。所以他辞去职位返回布鲁塞尔。1891年5月，他致信告诉德尔·皮拉尔，自己再也不会为《团结》撰稿，但也不会反对它。他正忙着完成一部新的小说。这起事件——他可谓纯属自取其咎——有两个不同的后果值得一提。首先，我们将

1 黎萨尔和德尔·皮拉尔错综复杂的恩怨，舒马赫的《宣传运动》第12章有完整、公允的描述。

会看到，这起事件无疑集中地塑造了《煽动者》的形式与风格。其次，他使得皮拉尔派和黎萨尔派的敌对关系大大尖锐化。这两派人都是出于各种或好或坏的动机，在他们象征性的领导人的旗下开展活动的。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黎萨尔在给布卢门特里特的信中对此只字不提。直到10月9日，他行将离开欧洲的时候，才写了一封信，为自己与《团结》决裂、让他的朋友难过而辩护。

你希望我给《团结》写篇文章，但我要向你坦白，我不会为那个刊物写任何文章了。我本该早点跟你说，但那些对我的攻击令人不快，我不希望你看到。我们共同经历了很多。你已经给他们写稿了，我完全赞同你写的东西。我们两个人能做到的事，你一个人也能做到。之前我提议了好几个项目，但他们背地里与我作对；我要让他们干活，他们就叫我“偶像”，说我是独裁者等。他们把这些事都写往马尼拉，歪曲事实，说我想要这样想要那样——完全不符合真相。从很多人那里听说，我的《煽动者》还没出版，他们就在说这本书一文不值，比《不许犯我》差多了。他们秘密地做了很多勾当，好像是要摧毁我小小的名声一样。所以还是先退出，免得组织分裂，让他们另择贤明。他们说与黎

萨尔太难交往；好的，黎萨尔走，障碍总该没了吧。他们很有可能告诉你的是另一个版本，但你的眼睛是雪亮的，你不会轻信他们的一面之词。^{1*}

103 布卢门特里特当即的回信已经遗失，但从1892年7月4日的一封信中我们可以大致了解它的内容。而这封信，黎萨尔也许并没有收到（原因我们后面会讲）。这位奥地利人的莽撞出乎寻常。他说，所有德尔·皮拉尔给他寄来的信中都表达了对黎萨尔的赞赏。他强烈建议皮拉尔派和黎萨尔派捐弃前嫌，避免冲突，因为他们的不和只会有利于他们共同的敌人，削弱他们的运动。他所建议的不是完全和平，而只是理智地停火。另外，他完全不赞同黎萨尔对《团结》的看法。《团结》依然是份非常有价值的刊物，这体现在，他们的论敌最近创办的一个双周刊正是为了打击它的影响力。但是——他补充道——不能指望一份刊物来创造奇迹，更别说是实现别人四十多年才有的成就了。菲律宾人不应该蔑视它，因为它在捍卫他们国家和人民的荣誉。“我这番话是忠言逆耳，我绝不会抛下可怜的非菲律宾人民；我不会做逃兵的。”²

黎萨尔日益确信，整个同化主义宣传是没有作用的。在

1 *The Rizal-Blumentritt Correspondence, 1890-1896*, 第416—417页之间的无页码页面。这封信寄于巴黎，1891年10月9日。

2 *Ibid.*, p. 47-48. 这册书并不包括布卢门特里特的德语原文。

腐败的卡诺瓦斯—萨加斯塔选举体系下，古巴人在议会拥有代表也毫无意义。西班牙操纵关税、通过垄断剥削古巴人，让他们屈服于巴斯克人和加泰罗尼亚人的商业利益。古巴人的代表也无力阻止他们持续、无情的掠夺。¹而且，黎萨尔相信，不管怎么样，在19世纪末，要把数百万菲律宾人同化成说西班牙语的人是不可能的事。1888年萨加斯塔派残酷的韦勒去马尼拉赴任，以及1890年卡诺瓦斯接替萨加斯塔这两件事进一步加深了黎萨尔的信念，即在西班牙是做不成什么的。解放的事业需要在家乡进行。

就是在这样的思维框架下，黎萨尔于1891年放弃了撰稿，全身心地投身到《煽动者》中去。8月，他狂热地看它出版，之后立即返回菲律宾。如果说《不许犯我》同时面向欧洲和菲律宾等多方面的读者，《煽动者》则只是为菲律宾人所作。除了他给西班牙和其他一些地方的私交寄去的几本外，剩下的书都运到了香港。他打算在香港定居到韦勒的任期结束。7月9日，在根特，他给信得过的老朋友巴萨写信。巴萨于20年前被伊斯基耶多流放，定居香港，成了成功的商人（和聪明的走私商）。这封信很重要，信中他将书托付给巴萨，要求他对此完全保密，不能被将触角伸到英国殖民

104

1 从马利亚诺·庞塞那里听说他善良但奇怪的同志格拉西亚诺·洛佩斯·哈耶那（Graciano López Jaena）在考虑去古巴以后，他回信道：“没有意义，古巴已经精疲力竭了，只是个空壳子而已。”1890年7月9日的信，收录于 *Cartas entre Rizal y sus colegas*, pp. 559–60。

地的教会密探发现。信中他抱怨自己极度贫困，抱怨西班牙菲律宾人团体中的富人成员不信守经济援助的承诺。¹

信任自己的同胞真不是件容易事；他们似乎联手不让我好过。啊！老实说，如果不是因为还有你在，如果不是因为我相信真正好心的菲律宾人还是有的，我早就会把所有这些人都送给魔鬼了！他们干吗要折腾我？我现在急需的就是精神上的安宁和自由的想象，但他们带来的却是阴谋诡计和勾心斗角！^{2*}

遗失的藏书？

在回头重新研讨阅读黎萨尔第二部小说时所面临的一些疑惑（尤其是它明显的预言性）之前，我们有必要简要讨论一下探究所面对的一项严重阻碍——黎萨尔政治思想之形成问题。他在卡兰巴的藏书中，没有伏尔泰、卢梭和赫尔德之后的政治思想家（除非我们把赫伯特·斯宾塞算进去）。用

1 事实上，《煽动者》的印刷费是黎萨尔的好友、富裕的瓦朗坦·文图拉支付的。黎萨尔生活非常节俭，朋友们常常以为他是吝啬鬼。不过，我们有时候可以注意到，旅行的时候他经常选头等舱，住的酒店也很好。当然，他这样做更多的是出于殖民地人的自豪，而不是因为被它们的奢华条件所吸引。

2 *Epistolario Rizalino*, vol. 3 (1890-1892), ed. Teodoro M. Kalaw (Manila: Bureau of Printing, 1935), pp. 200-01.



胡安·卢纳自画像，22岁

政治风险来解释书目当中的缺陷也许不无道理，因为尤其是对于他的家族而言，将当代政治理论的书带到殖民地警察国家，会引来很大的麻烦。但黎萨尔大量已经出版的欧洲书信体现出与此相似的缺陷。他从未提及贡斯当、黑格尔、费希特、马克思、托克维尔、孔德、圣西蒙、傅立叶、边沁、密尔、巴枯宁和克鲁泡特金——只有一句话偶然、间接提到了蒲鲁东和托尔斯泰。他在马德里、巴黎、伦敦和柏林居住的10年中，有没有可能避开或者忽视所有这些有影响力的政治思想家呢？到目前为止，只有一条直接（也许又有点模糊）的线索——1891年5月13日寄给在布鲁塞尔的黎萨尔的一

封信。信的作者是画家胡安·卢纳，是黎萨尔在巴黎的好友。这封信值得长篇援引：

106

明天战神广场沙龙要开张了。我第一次画了两幅隔墙和柱脚。挺满意的，因为你知道我是怎么像卖菜一样兜售我的画的。至于葬礼那幅画，我给它起名为“被忽视的人”（*Les Ignorés*）。看哪，我现在就忙着画那些身份低微、流离失所的人。能推荐几本会给我带来灵感的书吗？如此赤裸裸的物质主义，如此无耻地剥削穷人，还有富人对穷人的战争之类，有没有人批判过？我在找一个有价值的主题，把它展开到八米长的画布上。我正在读E. 德·拉夫莱（*E. de Lavelaye*）的《当代社会主义》，书里作者概括了卡尔·马克思、拉萨尔（*Lassalle*）等人以及天主教社会主义、保守派、福音派等等的理论。这本书饶有趣味，但我想要一本能聚焦当代社会的悲惨现状的书，有点像《神曲》，要有一位但丁，走进令人窒息的工厂，看那些在我们难以想象的悲惨条件下生活的男人、小孩、女人。我亲爱的朋友，我曾去参观一个铸铁厂。相信我，再怎么铁石心肠的人，像我那样待上五个小时也会被那里的景象深深触动。虽然菲律宾有修会士为非作歹，但比起这里的惨状和死亡，我们的同胞还算幸运的了。那边

有个工房是磨沙子和煤炭的，碾磨机开动以后，就变出了非常细的灰。它们被风卷起，成了大块大块乌云，整个房间似乎被烟包围了。那里的一切都沾满了灰，那十来个忙着往机器里铲煤和沙的工人看着就像是僵尸。这就是穷人的悲惨景象！我在那儿站了三四分钟，就好像吸入了此生以来吸过的全部沙子和尘埃；它们从我的鼻孔、嘴巴和眼睛里将我穿透……想来，那些不幸的人每天12个小时都要呼吸煤炭和灰尘：我相信他们肯定很快会死去，而这样将穷人抛弃简直就是犯罪。^{1*}

可惜我们没有黎萨尔的回信。但卢纳在讲到马克思和拉 107 萨尔的时候没有进一步解释，这就说明他知道黎萨尔并不需要。另外，虽然他比我们这位小说家年长，他却请他推荐一些揭露当代工业资本主义暴行的书，来启发自己的创作。

韦森特·巴兰特斯（Vicente Barrantes）1890年1月在马德里发表的一篇文章，虽然对我们的问题而言不是那么有说明力，但有可能也是一条线索。巴兰特斯此前在马尼拉担任要职，现在自诩是菲律宾专家。（巴兰特斯在《不许犯我》

1 *Cartas entre Rizal y sus colegas*, p. 660. 感谢安贝斯·奥坎波将这个文本寄给我。亦见他对卢纳这封信的评论，*Rizal without the Overcoat* (Pasig City, Manila: Anvil, 2000), pp. 62-3。拉弗莱（Laveleye, 1822—1892年）是一位著名的比利时博学家，支持复本位制的政治经济学家。

可以看出自己的身影：一位老资格的公务员，把富裕的混血人或土人关进监狱，以此敲诈勒索）在给布卢门特里特扣上俾斯麦特工的帽子之后，他谴责黎萨尔为“反天主教徒、新教徒、社会主义者、蒲鲁东派”。¹“蒲鲁东派”也许只是为了将黎萨尔贬为加泰罗尼亚民主联邦共和主义者弗朗西斯科·皮·伊·马高尔（Francisco Pi y Margall）的小帮手〔弗朗西斯科 1868 年翻译出版了蒲鲁东的《论联邦原理》（*Du principe fédératif*）〕。²巴兰特斯的长篇大论把黎萨尔逗乐了。3月6日，他写信给布卢门特里特，讽刺地说自己担心在《团结》发的那篇激烈的回信会把巴兰特斯气死：“那样的话我的动物展览就得失色不少了。他是蛇和河马最好的代表。”^{3*}

但最具说服力的证据也许是《煽动者》这本书本身（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我们找不到黎萨尔给卢纳的回信）。因为，尽管德尔·皮拉尔和《团结》仍在不断抨击修会，将他们视为菲律宾人梦想的主要敌人，并在萨加斯塔的自由主义者当中寻求支持，黎萨尔的第二部小说却很轻易地放过了修会会士们。出场的也是一两个比较讲道理的人物，《不许犯

1 这篇文章出现在1月2日的《现代西班牙》（*La España Moderna*）上——这个刊物的名称何其可笑。

2 虽然皮·伊·马高尔比黎萨尔差不多大了整整40岁，他们却是很好的忘年交。他是西班牙少数支持菲律宾人理想的知名政治人物。参见 Sarkisyanz, *Rizal*, p. 112 以及第八章（主要探讨两人的关系）。

3 *The Rizal-Blumentritt Correspondence*, vol. 2 (1890-1896), 第336页之后的第三页无页码页面。

我》里面无恶不作的阴谋家萨尔维修士在这里只是个小角色，甚至只是个可笑的人物。这次最惹人嘲笑的，是假装谦虚、没有能力、完全是机会主义者的自由主义者唐·库斯托迪奥（Don Custodio）。他背叛了向他寻求支持的学生们。

因此，我们很难避免得出这样的结论：尽管《煽动者》在某个层面来说具有高度的煽动性和颠覆性，在另一个层面上讲，它又是狭隘的，缺乏任何内在一致的政治立场。造成这个奇怪之处的最主要原因，很有可能当归结于黎萨尔是小说家、道德家，而不是政治思想家。他的藏书和书信中明显缺失的作家里边，他也许读过几位，但似乎没有给他留下多少印象。而且很有可能，他（尤其是在第二次欧洲之行期间）过于关注自己的国家，还有他的家庭和乡人遭遇的不幸，以至于对欧洲本身的社会惨状视而不见。黎萨尔大量的著作当中，见不到卢纳笔下对巴黎铸铁厂的惊悚描述。这位画家天真但生动地表达了自己的感受，即相比巴黎的工人，菲律宾人其实还算幸运。可这似乎完全超出了我们这位小说家的理解范围。

108

解释《煽动者》：洲际主义和预言

在《煽动者》开头几章，小说的背景似乎就是当时巴莱里亚诺·韦勒统治下的菲律宾（1888年3月到1891年4月）。愚蠢、残忍而犬儒的“殿下”（Su Excelencia）显然是以这位

未来的古巴屠夫为原型¹，因反对总督而被开除的那位没有名姓、自由主义、支持土人的高官，其实就是马尼拉文官首脑森特诺。有一个次要情节能鲜明地证实小说的时间设定。在第四章，作者介绍了老实巴交的农民塔莱斯的凄惨故事。他在伊瓦拉的家乡圣地亚哥（以黎萨尔的家乡卡兰巴为原型）耕种一小块土地。²看到他发了家，附近某个修会大庄园派人告诉他，他那块地在庄园的法定界限内，但只要他支付一小笔租金，就可以继续在这块土地上住着。在这以后，租金每年迅速上抬，终于到了塔莱斯无法也不愿付租金的地步。修会威胁将他逐出土地，他拒绝移动，而是将自己武装起来，保卫自己的土地。与此同时，他在法庭上打官司，钱白费得一干二净。最后，强盗将他绑架，要他支付赎金。等赎金总算交齐了，他回乡发现自己的地产已经被庄园霸占，租给了新的租户。那个晚上，新的租户和他的妻子，以及负责收租的修士都被残忍地杀害，他们的尸体上都用血写上了塔莱斯

1 在《煽动者》最后一章（第281页），西蒙讲述了他如何化名伊瓦拉，秘密携带祖上的财物逃离菲律宾，成了一位珠宝商人。随后，他“参加了古巴战争，一会儿支持这一边，一会儿又支持那一边，但一直都在赚钱。在古巴他认识了总督，当时还是市长。他最初用钱财俘获了这位市长的心智，后来又因为知道他犯下的秘密罪行而与他成了朋友”^{*}。1863年3月，韦勒在古巴当过市长。“秘密罪行”究竟指什么还不清楚——凶杀，腐败还是性？马丁的史书里有一个挺奇怪的部分，讨论这位将军荒诞、贪婪的性欲。在古巴当老大的时候，他曾与一位有夫之妇发生秘密的婚外情。对于这位妇女，韦勒本人这样写道：“这个女人让我神魂颠倒。如果叛军妨碍到我们幽会的话，纵使前面刺刀如林，也无法阻挡我对她的渴求。” *Valeriano Weyler*, pp. 256-7.

2 Chapters IV (Cabesang Tales) and X [“Riqueza y Miseria” (富与穷)].

的名字。

就在此时，发生了一件十分出乎寻常的事。叙述者（仿佛在比利时）突然喊道：

冷静，和平的卡兰巴居民们！你们中没有谁叫塔莱斯，也没有谁犯了这罪行！你们的名字是……西尔维斯特·乌巴尔多（Silvestre Ubaldo），曼努埃尔·伊达尔戈（Manuel Hidalgo），帕西阿诺·梅尔卡多（Paciano Mercado），你们的名字是全体卡兰巴人民！^{1*}

乌巴尔多和伊达尔戈是黎萨尔的姐夫，而帕西阿诺是他挚爱的长兄。1888—1890年，因为抵抗道明会士，他们都受到了严酷惩罚。作者平静地揭开了“圣地亚哥”的面罩：卡兰巴。²在小说后面，我们看到塔莱斯成了强盗。他的女儿胡丽为了免遭卡莫拉神父的侵犯而自杀。在此之后，塔莱斯与西蒙联手，最终成为了“鹰眼”（Matanglawin），成了震慑马尼拉周边农村的法外贼首。从历史角度看，当时的菲律宾

1 这段呼唤即是第十章的结尾。它让人想到德克尔的《马格斯·哈弗拉尔》著名的结尾。德克尔直率地抛开了小说的角色和主线，以自己的名义描述了印度群岛的荷兰殖民地政权及其在荷兰的支持者，令人毛骨悚然。

2 黎萨尔当时有个政治上的爱好，也就是坚持用自己的正字法拼写塔加洛语词语（源于西班牙语的词也许尤其如此）。有一个显眼的地方就是用卡斯特尔语没有的字母k替换原来的c。因此，卡兰巴拼写成了Kalamba。

似乎没有鹰眼这样的人物，不过殖民地首府南部的丘陵地带有许多许多小的盗贼团伙。但黎萨尔学生时代那个暴力、饥饿的安达卢西亚，也许有着一两个这样的人物？

调换

110 如我们前面所述，要求国家建立（世俗）西班牙语学校（此举是西班牙化的第一步）的学生运动终告失败是《煽动者》的次要情节。在历史上，马尼拉从未有过这样的学生运动，更何况韦勒也不会对它有一丝容忍。不过显而易见，这个次要情节是德尔·皮拉尔 1889 年以后在西班牙鼓动同化运动的微型版。对此，黎萨尔是没有任何指望的。黎萨尔对学生有细致的描绘，这些描绘看上去完全不像是我们从其他史料中看到的景象。黎萨尔所经历过的 19 世纪 70 年代末的马尼拉高中和大学完全与政治无关。而在他的小说里，学生们大多被讽刺地描绘成年纪轻轻的机会主义者、吹牛专家、犬儒主义者、家境富裕的旁观者还有寄生虫。唯一一个被描述成完全善良、爱国的学生，是土人伊萨加尼。他一直坚定而天真地相信这场运动，而本人没有什么严肃的政治理念。因此，我们很难避免得出这样的结论，即整个次要情节不过是 1880 年马德里的翻版，漂洋过海移植到了 1890 年的马尼拉。

但问题还没有完全说清楚。早前有一章很关键（《西

蒙》)。读者在这一章里可以得知西蒙实际上就是伊瓦拉（因为巴西利奥偶然认出了他），《不许犯我》里面那位天真的英雄。他们之间的对话带出了学生运动的问题。也许会让读者吃惊的是，犬儒的虚无主义谋反者西蒙言辞激烈，仿佛是位巴斯克人。¹

啊，青春！总是天真，总在梦想，总在追逐蝴蝶和鲜花。你们团结在一起，努力用玫瑰花环把你们的祖国和西班牙捆在一起。而事实上，你们要打造的链条，比打造钻石还要难！你们要求权利平等，将习俗西班牙化，却不知你们正在要求的其实是死亡，是摧毁你们的民族性，是忘却你们的祖国，是向暴政奉献！你们未来会变成什么样？一个没有特点的民族，一个没有自由的国家；你们的一切都是舶来品，甚至你们的缺陷。你们要求西班牙化，受到拒绝却也不感到羞愧！即使他们同意了，你们又想用它干什么呢？对你们有什么好处？幸运的话，就是一个贴满布告的国家，一个内战频发的国家，

111

1 不妨做个对比。赛亚援引了乌纳穆诺的《颂词》（见前文第98页注释1）：“西班牙语在菲律宾和在我的故乡巴斯克一样，是种外来语言，最近移植的玩意儿……我牙牙学语时就说西班牙语，家里也说西班牙语，但这是毕尔巴鄂西班牙语，一种贫瘠、羞怯的西班牙语。（因此）我们不得不重新塑造它，打造自己的语言。于是乎，在某些方面本是我们作者的弱点的地方，却也成了我们的强项。”*（第xxix页）

一个像南美那样掠夺者和坏人当道的共和国！……西班牙语绝不会成为这个国家的共同语言，人民绝不会说西班牙语，因为，那种语言不能表达他们头脑中的想法，不能表达他们心中的情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感受、自己的感受方式。你们少数说西班牙语的人，想想它给了你们什么好处？扼杀你们的原创性，让你们的思想屈从于他人，妨碍你们自由，把你们变成真真正正的奴隶！自以为受过教育的人里，十个有九个都是菲奸。那些说西班牙语的人竟忘了自己的母语，不再用母语写作，也听不懂了。假装一个词都听不懂的人，我也见得多了！所幸，你们的政府里都是些蠢货。在俄国，为了奴役波兰，他们强迫波兰人说俄语；在德国新征服的领地，他们禁止说法语。你们的政府期望你们说自己的语言，而你们呢，反过来却一心要消除自己的民族性，真是滑天下之大稽。你们完全忘了，只要一个民族保留了自己的语言，它也就保留了其自由的保障，就像一个人只有保留了自己的思维方式，才能保留自己的独立性。语言就是一个民族的思想。^{1*}

这篇长篇大论力量强大，足以让读者忘记，伊瓦拉－西

1 *El Filibusterismo*, chapter VII (“Simoun”), pp. 47–8.

蒙有一位嚣张、残忍的巴斯克人祖父，为了伪装，他操着一口糟糕的、口音严重的塔加洛语；读者也容易忽略，这段谴责西班牙化的话是用极好的西班牙语表述的。读者还有可能忽视西蒙在几行字之前自相矛盾的论点：“岛上人已经在讲四十多种语言了，你还想再加一种语言，好让大家相互更不能理解吗？”^{1*}但重要的是，虽然身在欧洲，黎萨尔从没有公开写过如此刻薄的土著式表述——这样写会让《团结》周围的同志们震惊。在西班牙的他是对现在讲话，而到了马尼拉，他以波兰和阿尔萨斯为警示，对未来讲话。

随着小说走向高潮，还可以看到多次类似的时空转换。建立西班牙语学院的运动失败后，神秘的颠覆海报一夜之间贴满了整个大学，导致当局采取无差别逮捕的措施——明显是重现了黎萨尔大学第三年时卡诺瓦斯在马德里中央大学的搜捕行动。神秘海报迅速引发了一场大恐慌，传闻有凶残的强盗会发动叛乱，让人回想起1883年安达卢西亚的黑手恐慌，也预示了1892年初农民对赫雷斯（Jerez）的所谓“革命式”的袭击。有趣的是，黎萨尔把这些线索全放在了菲律宾，与之相关的那章也用的是塔加洛语的标题（没有翻译）：Tatakut（意思是“恐慌”）。

1 *Ibid.*, p. 47. 因此，这说明在菲律宾有四十多个民族，而不是一个民族。这也忽视了西班牙语作为通用语所发挥的决定性作用，它是与其他四十多个民族交流的纽带。黎萨尔太相信赫德的话了。即使在今天，塔加洛语更多的是作为市场通用语，而不是民族语言而迅速流通。

让我们跳拉瓦肖

最后，我们讨论一下西蒙策划爆炸的情节。塔莱斯的手下以及其他一些法外之徒同意协助这位神秘的珠宝商，也同时发起了袭击。

113 这起失败的阴谋有若干个地方颇为奇特。首先，作者想象这起事件发生在 1890—1891 年，也就是早于 1892—1894 年西班牙和法国爆发的那波爆炸事件。不过 1888 年起，炸弹和炸药箱爆炸袭击逐渐增多，通常是在工业城市巴塞罗那，但在马德里、瓦伦西亚和卡的斯也时有发生。大多数炸药安放在工厂，很少造成伤亡，也几乎没有一起受到追究。我们大有理由相信，它们是愤怒的工人受无政府主义观念影响后设置的，不过有些也许是卧底做煽动者的警探组织的。1892 年 1 月 8 日，“赫雷斯起义”之后，爆炸的数量和严重性显著扩大。当晚，五六十名农民进城袭击监狱，解救此前被关押和刑讯的同志。他们似乎天真地指望地方守备军会站在他们一边。警察将这些农民驱散，最终一名农民、两名市民身亡。此时卡诺瓦斯的第三次任期临近结束，他发动了一场针对工人和农民的无差别的镇压活动。2 月 10 日，四个被认为是“起义”领袖的人被当众绞死。¹

1 Núñez, *El terrorismo*, p. 49; Esenwein, *Anarchist Ideology*, pp. 175–80. 19 世纪西班牙实行三种肉刑：枪毙、吊死和勒死。通常认为前两者可以当即让受刑者死去；而绞刑架则是中世纪的刑罚工具，费时更长，所以用于处决“最坏的”（转下页）

一个月后，巴黎发生了一系列严重的爆炸事件。这是半荷兰半阿尔萨斯人弗朗索瓦-克劳德·柯尼希斯泰因（François-Claude Koenigstein）的杰作。他以拉瓦肖（Ravachol）的名字而广为人知，是一个谋杀、盗窃前科累累的罪犯。他很快被逮捕、审判。在法庭上，他声称自己是为了报复先前警察暴力镇压克里希工人游行及随后数位工人受审判一事（检察官要求判处死刑，但没有成功）。拉瓦肖对法庭说，他此番行为，依据的是革命的无政府主义原则。7月11日，他走上断头台，喊道“无政府万岁！”并扬言有人会为他的死复仇。¹自屠杀巴黎公社成员之后，他是法国

114

（接上页）犯人（即政治犯）。凑巧的是，埃森魏因出色的研究也带出了一些奇怪的东西。从某个角度看，这一连串事件始于1886年5月初芝加哥的干草市场“暴动”。在反“共产主义”和反移民的歇斯底里下，四位无政府主义者接受了滑稽的“公平审判”，于当年11月被处以绞刑。处决激起了整个欧洲的怒火（当然在美国也是一样），在法国工人组织的发起下，5月1日成了每年纪念这些受害者的日子（除美国外）。西班牙左派全体都大力支持这个新的传统，尤其是在萨加斯塔仍然当权期间。就在1891年“五一”纪念日后不久，两颗炸弹在卡的斯爆炸，造成一名工人丧生，数人受伤。当地警察逮捕了157人，但没有确凿的证据能够找出主谋。所以不排除有警探从中煽动的可能。赫雷斯的人想要释放的，就是这些囚犯当中的一些。奇怪的是，就在这个节骨眼上，马拉泰斯塔还有无政府主义思想新星塔里达·德尔·马尔默尔正好在西班牙演讲、组织，而且本来计划在赫雷斯演说。得知暴力事件的消息后，马拉泰斯塔仍然义无反顾地赶往卡的斯，不过是乔装成富裕的意大利商人。他在当地似乎没有实现什么。埃森魏因认为这个细节很重要，因为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后来，无政府主义者都没有称1月8日是“用行动宣传”。相反，他们一直坚称自己与之没有关系。

1 参见 Maitron, *Le mouvement*, pp. 213-24。在囚室里，柯尼希斯泰因告诉审讯者，自己在读了尤金·苏的《游荡的犹太人》以后就丧失了宗教信仰！迈特龙指出，这一时期的法国无政府主义大体上还是一个个微小的、秘密或半秘密的（转下页）

第一个被处决的政治犯。

虽然他的过去并不怎么光彩，但拉瓦肖之死使他立刻成为了比利牛斯山南北无政府主义左派的英雄人物。努涅斯援引当时一首广为人知的歌谣《拉瓦肖舞曲》，歌词是这样写的：

让我们跳起拉瓦肖！
声音万岁，声音万岁！
让我们跳起拉瓦肖！
爆炸的声音
万岁！

西班牙的无政府主义报刊引用了著名无政府主义理论家埃利泽·勒克吕（Elisée Reclus）的话：“众多人从拉瓦肖身上看到一位拥有少见的伟大精神的英雄，我也是这些人中的一位。”而作家保罗·亚当（他是马拉美圈子的一员）写了一首《拉瓦肖颂》，断言“拉瓦肖看到了民间疾苦，在一场大屠杀中牺牲了自己的生命。他的仁爱、无私，行动的力量，面对不可避免的死亡时的勇气，让他成为了传说。在这个犬

（接上页）单位，它们之间没有实际的组织联系。这个特点使得警察难以有效地监控它们，也让犯罪分子相对而言容易渗透。直到1890年末，法国无政府主义放弃了用行动宣传，辛迪加主义出现在工人阶级的政治生活当中，他们才成了一股真实的政治力量。西班牙无政府主义的社会基础就要坚实而且广泛得多。拉瓦肖是半个阿尔萨斯人，是我根据拉蒙·森保在《受害者》第15页上的证词所做的推论。

儒、讽刺的年代，一位圣徒在我们当中诞生”。¹ 西班牙无政府主义报刊将拉瓦肖描述成“暴力的基督”，一位“勇敢而无私的革命者”，有些无政府主义者为了纪念他还发行了两期以他为名的杂志：1892年末的《拉瓦肖》和1893年初的《拉瓦肖的回声》（*El Eco de Ravachol*）。

1893年秋，拉瓦肖事件有几次重大反响。9月24日，保利诺·帕亚斯（Paulino Pallás）向加泰罗尼亚总督阿塞尼奥·马丁内斯·坎波斯（Arsenio Martínez Campos，《桑洪条约》的签署者。该条约和平解决了塞斯佩德斯在古巴长达10年的起义）扔了两颗炸弹。² 这起暗杀造成一人死亡，数

115

1 Núñez, *El terrorismo*, pp. 121–3. 由于没有法语原文，这里似乎也没必要引用西班牙语译文。

2 根据当时报纸的报道，帕亚斯用的不是标准的“奥西尼炸弹”，而是一种叫作“菲尼亚”的炸弹。*Ibid.*, p. 53. 费利切·奥西尼（Felice Orsini, 1819年生）是1848年革命老兵，在短暂的罗马共和国时期做过议员，是坚定的意大利民族主义者。1855年，奥地利政府将他囚禁于曼图亚要塞。但他演出了一场精彩的越狱，前往帕莫斯通的伦敦。在那里，马齐尼正在富尔汉姆路破旧的住所中策划起义。奥西尼1856年的回忆录 *The Austrian Dungeons in Italy: a narrative of fifteen months of imprisonment and final escape from the fortress of S. Giorgio* (London: G. Routledge, 1856) 轰动一时，迅速售出了3.5万本。他那拜伦式的长相，以及热烈的修辞，使他在文学圈子里十分吃香。与此同时，他正在发明一种新型炸弹，主要是用雷汞。这种炸弹不需要引线，只需要击打便可爆炸。他在普特尼以及德文郡和谢菲尔德废弃的采石场做了试验。之后，由于相信暗杀路易-拿破仑会在法国激起革命，进而让意大利跟随巴黎的脚步，他穿过海峡，在1858年1月14日试用了他的发明。他的目标不过受了点皮外伤，但另外有156人受伤，最终有八人不治身亡。5月13日，奥西尼被处以绞刑。帕莫斯通尝试通过一项《密谋暗杀法案》，将谋杀外国统治者作叛国罪论处，但处理不当，自己也下了台。参见Jad Adam, “Striking a Blow for Freedom,” *History Today*, 53: 9 (September 2003), pp. 18–19.

人重伤，但马丁内斯·坎波斯本人只受了些皮外伤。帕亚斯没有躲起来，也没有逃跑，而是将帽子丢向空中，喊道：“无政府万岁！”一个月后，他被一支射击小队枪决，处刑的地点在很快就将臭名昭著的蒙胡伊克要塞。¹11月7日，32岁的圣地亚哥·萨尔瓦多（Santiago Salvador）向巴塞罗那歌剧院丢了一颗巨型炸弹。此时剧院正上演着罗西尼的歌剧《威廉·泰尔》（*Guillermo Tell*）。炸弹使众多人丧生，也把一批巴塞罗那的富人精英炸成重伤。当局逮捕、刑讯了许多无辜的嫌疑人，直到抓住了躲起来的萨尔瓦多。²他宣称自己所

1 对于西班牙而言，这是第一个明显的“行动宣传”的例子。1878年10月，一位年轻的加泰罗尼亚桶匠胡安·奥利瓦（Juan Oliva）开枪射击阿方索七世未中。一年后，19岁的弗朗西斯科·奥特罗（Francisco Otero）做了同样的尝试，但枪法也很不准。两人与无政府主义圈子都没有明显的关系，但两人都被迅速处决。（Núñez, *El terrorismo*, p. 38.）

帕亚斯是来自塔拉贡的一位贫穷的青年印刷工人，他移民到了阿根廷，在那里结了婚，后来为了养家又去了巴西，在圣菲做排字工的时候成了激进分子、无政府主义者。1892年5月1日，他将一颗爆竹丢入了里约的阿尔坎塔拉剧院，并喊道：“无政府万岁！”没有人受伤，观众们还为他喝彩。他们之所以这样热情，是因为在巴西无政府主义运动早期，同志们买不起房子开会，或是上演自己的戏剧，所以他们租了当地的剧院。帕亚斯在里约的听众应该是西班牙和葡萄牙无政府主义者，而在圣保罗，主要是意大利移民。[参见 Edgar Rodrigues, *Os Anarquistas, Trabalhadores italianos no Brasil* (Sao Paulo: Global editor e distribuidora, 1984), pp. 66 and 73] 西班牙警察搜查了他的住所，发现了无政府主义报纸，一份克鲁泡特金的《面包与自由》，还有一幅干草市场殉难者的石版画。许多历史学家认为，赫雷斯的处理令他愤怒，是让他这样做的一个原因，但努涅斯认为帕亚斯手中没有任何资料可以支持这个论点。参照 Esenwein, *Anarchist Ideology*, pp. 184-5; Núñez, *El terrorismo*, pp. 49 and 53; 以及 Maura, “Terrorism,” p. 130（他说有两人身亡，12人受伤）。

2 他也许不是随意选了这出戏。1879年人民意志党第一次大会尤其（转下页）

作所为是为他的朋友、他敬爱的帕亚斯复仇。随后，他于24日在蒙胡伊克被绞死。¹1892年再度掌权的萨加斯塔宣布巴塞罗那戒严，戒严令实施了整整一年。它的执行者正是刚刚从菲律宾回来的韦勒。无政府主义报刊被强行关停。

随后的12月9日，奥古斯特·瓦扬（Auguste Vaillant）往法国议会丢了一大颗炸弹，虽然没有造成死亡，但炸伤了数位议员。1894年2月5日，他被推上断头台。这是法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没有被害者死亡却动用死刑的案例。²（当时的萨迪·卡诺总统是大革命时期著名的将领拉扎尔·卡尔诺的孙子，但才干平庸。他拒绝减轻判决，也因此于1894年6月24日在里昂遇刺身亡。暗杀他的是年轻的意大利无政府主义者山特·热罗尼莫·卡塞里奥，后者在两个月后上了断头台。）这波无政府主义爆炸事件随即进入高潮，瓦扬被处

（接上页）强调说：“我们将用威廉·泰尔的手段战斗。”威廉·泰尔是传奇的瑞士弓箭手，19世纪晚期欧洲激进分子普遍将他看作古时的英雄人物。参见Walter Laqueur, *A History of Terrorism* (New Brunswick, NJ: Transaction, 2002, revised edition), p. 22。

1 起初萨尔瓦多是卡洛斯派、热忱的天主教徒，但贫困、一点小罪（走私）以及难以偿还的债务激发了他对无政府主义的兴趣。与他一同被处决的还有五人，不过与帕亚斯的情况一样，没有令人信服的证据证明他这次举动不是自发的。可参见Esenwein, *Anarchist Ideology*, pp. 186-7, 以及Maura, “Terrorism,” p. 130。根据贝卡吕和拉普热的《无政府主义者》第44页，在被问及以后他女儿怎么办时，圣地亚哥·萨瓦多尔说道：“如果她们长得漂亮，资产阶级会照顾她们的。”这是无政府主义者的玩笑话？抑或只是传说？

2 迈特龙称瓦扬正是应了第三共和国某些领导人的需要。他们正纠缠于巴拿马运河泡沫的丑闻，而瓦扬正是一个转移公众注意的好办法——同时也可以借机从严推行禁止任何形式的“革命宣传”的法律。*Le mouvement*, p. 237。

决后，巴黎立即发生了一系列凶险的爆炸。爆炸显然也有为他报仇的目的。警察发现始作俑者是埃米尔·亨利（Emile Henry），一位出生于西班牙的年轻知识分子，他的父母都是在外流亡的巴黎公社成员。¹ 警察也很快将他逮捕，于5月21日被送上断头台。²（对于本研究而言，最重要的一起爆炸是1896年6月7日基督圣体日的“暴行”。不过这起发生在巴塞罗那的事件我们会在第四章讨论。）

1892—1894年这五位炸弹袭击者，无一符合西蒙的轮廓。他们都十分年轻、贫困、教育程度不高（除了亨利），自称是无政府主义者。他们的炸弹没有任何胡伊斯曼风格。不过，不妨读一读乔尔记录下来的埃米尔·亨利在受审时所说的话。³ 被问及为什么他杀了这么多无辜民众，亨利讽刺地答道：“没有人是无辜的。”接着说道：

我坚信，现存的社会组织是坏的；我要与之斗

1 他家逃离巴黎时，亨利还是个三岁的孩子。在西班牙，他父亲不得不在矿场做工，因为水银中毒而痛苦地死去。1880年大赦后，这个男孩回到法国，学习出色，进了综合工科学校。但为了无政府主义，他在1891年（23岁）辍学。参见 Joan Ungersma Halperin, *Félix Fénéon: Aesthete and Anarchist in Fin-de-Siècle Pari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8), p. 268.

2 克利孟梭深受亨利的受刑所感动，写道：“亨利犯下的是野蛮人的罪行。但社会的回应似乎只是拙劣的报复……如果死刑犯有胆量闯罗盖特（1851年以后，这个监狱执行了巴黎所有死刑）的鲜血，就放他们走吧。然后我们再谈谈。”引自 Maitron, *Le mouvement*, p. 246.

3 *Ibid.*, p. 115–19. 请注意，亨利讲到了赫雷斯和芝加哥，也讲到了帕亚斯和瓦扬。

争，加速它的灭亡。我带着深刻的仇恨去斗争，这仇恨每天都在加强，因为这社会每天都在上演令人讨厌的景象。这个社会的一切都是卑劣的，一切都是懦弱的，一切都在阻碍人激情的发展，阻碍心灵慷慨的倾向，阻碍思想的自由飞翔……我要让资产阶级看到，他们的乐趣将被打断，他们金色的小牛犊会在神坛上剧烈颤抖，直到最终那一次震动将它丢入泥潭与血泊之中。

他继续做着宣告，称无政府主义者：

不会放过资产阶级妇女和儿童，因为他们挚爱的妇女和儿童也没有被放过。他们的孩子住在贫民窟里，没有面包吃，因为贫血而慢慢死去。他们难道不也是无辜的受害者吗？还有那些在你们工厂干得面色惨白的女人，耗尽精气就是为了每天赚 40 苏，不过幸运的是贫困没有让她们去做妓女；你们把那些老人也变成了生产机器，等他们再也没有力量了，就丢进垃圾堆和济贫院。资产阶级的绅士们，请至少有勇气直面你们的罪行吧。请认同我们的报复是完全合法的吧。

你们在芝加哥绞死过人，在德国砍了他们的头，在赫雷斯把他们勒死，在巴塞罗那枪毙他们，

在蒙布里松和巴黎把他们推上断头台，但你们永远无法摧毁无政府主义。它的根太深了；它诞生在一个腐化的、正在走向崩溃的社会的心灵当中；它是对现行秩序的暴力反击。它代表着平等主义和自由至上主义的渴望，要打碎现行的权威；到处都有无政府主义，因此要抓住它是痴心妄想。到头来，你们自己会被杀掉。

不同寻常的地方在于，亨利的演说简直是西蒙的翻版：他认为自己是在加速一个腐败体系的崩溃进程；他的所作所为，是针对统治阶级对穷人犯下的罪行进行的暴力复仇（包括“无辜”的人）；而他的理想是在未来建立一个平等而自由的社会。虽然塔加洛农民有自己的乌托邦和救世主传统（植根于民间天主教思想内）¹，西蒙的演说没有将之体现出来，反而用的是欧洲人表达社会愤怒的语言（至少可以追溯到法国大革命）。但小说想象当中的西蒙更复杂也更自相矛盾。他的身影里，有一个负面的图像，即贵族“社会主义者”鲁道夫。鲁道夫私行正义，处罚坏人和剥削者。西蒙身上也有德赛森特的影子，为邪恶的社会再增加一个敌人——甚至是内查耶夫的影子。²但与此同时，西蒙又是一位反殖民族

1 经常被引用的有 Reynaldo Clemeña Ilete, *Pasyón and Revolution: Popular Movements in the Philippines, 1840-1910* (Quezon City: Ateneo de Manila Press, 1989)。

2 我们不应该把内查耶夫排除在外。1869年他与巴枯宁一起撰写的（转下页）

主义者，满脑子都是革命。而如果问他这样一个不怎么该问的问题：“假设爆炸袭击成功了，接下去呢？”他也会给出一个同样的回答：“什么都没有。”西蒙并没有复仇成功后如何做的方案。《煽动者》中的其他人也都没有：他们只有“自由”的梦想，这个梦想没有形状，是个乌托邦。（这必定是为什么阴谋总是失败的答案。）正是在这里，黎萨尔发现了反殖民民族主义和“行动宣传”的交会点：都是没有计划的乌托邦主义，都有着自我牺牲的癖好。我的行动和死亡会生出一个比没法活下去的当下更好的世界。

119

同样的旋律还出现在另外一个场景当中：巴西利奥得知了石榴灯里的“地狱装置”以后，喊道：“但这样一起大屠杀，人们会怎么说？”西蒙又嘲讽地回答道：

（接上页）《革命者教理书》在欧洲广为阅读。1893年1月15日和31日两期《团结》上，有一篇奇怪的两期连载文章。作者是布卢门特里特，题为“一次访问”，讲述的是一位叫作西蒙的不速之客。西蒙解释称，黎萨尔让他在小说里装死，不让殖民地当局知道他还活着，也不让他们知道他们的政治理念在菲律宾人当中大规模繁殖。对于菲律宾的未来，以及在政治斗争中实现这个未来的方法，两人之间爆发了一场持久而激烈的辩论。愤怒的民族学者一度说道：“西蒙先生，您不仅是一个颠覆者，您也是一位虚无主义者。”对此，即将神秘离开的西蒙嘲讽道：“我要去俄国了，到虚无主义者的学校去报到！”在黎萨尔抵达欧洲之前，内查耶夫就已不在人世。但布卢门特里特是黎萨尔最亲密的朋友。所以我认为，如果不是与黎萨尔认真商量过，是不会将西蒙与虚无主义联系在一起的。此外，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群魔》在1886年的巴黎出了法语译本，此时正值黎萨尔离开法国首都、前往德国不久。得益于德·奥坎波，我们也得知，黎萨尔阅读了（但究竟在什么时候？）屠格涅夫《父与子》的德文译本。（感谢梅根·托马斯让我注意到布卢门特里特的文章。）

人们会鼓掌，就像他们一如既往的那样，更强、更暴力的在他们看来就是合法的。当西方国家牺牲了数百万美洲土人的性命时，欧洲鼓掌了。他们鼓掌当然不是为了去发现比他们更道德、更爱好和平的民族。在那儿是北方，有着自我中心的自由，有私刑的法律，还有政治操纵；在那儿又是南方，是个吵闹的共和国，有着野蛮的革命，还有内战和宣言，就像它的西班牙母亲！强大的葡萄牙掠夺摩鹿加群岛时，欧洲鼓掌了。现在，英国为了殖民摧毁了太平洋地区的地方土著族群，欧洲也鼓掌了。欧洲会为我们鼓掌，就如在一出戏的尾声一样，一场悲剧就要收场。普通民众只能看到事情的表面，只能看到它的结果！^{1*}

西蒙给的例子有英国、葡萄牙、美国，但他的逻辑肯定适用于阿根廷、哥伦比亚、委内瑞拉和秘鲁，代表着西蒙此前曾如此蔑视地提到的、那些失去了元首的后革命拉丁美洲共和国。不过，与此同时，他说到的和没有说到的例子全都是暴力的“胜利”。从修辞的这个角度来看，这种类型的“成功”在菲律宾群岛也日渐有了可能性。《煽动者》出版的五年后，安德雷斯·博尼法乔（Andrés Bonifacio）会在马尼拉外围发

1 *El filibusterismo*, Chapter XXXIII [“La última razón”（最后的说理）], p. 250.

起武装起义——距马蒂在古巴起义之后不足 18 个月。

谜一样的微笑

这就把我们带到了《煽动者》最后一个政治的方面。小说最后几页是奄奄一息的西蒙和绅士的土人神父弗洛伦蒂诺 (Florentino) 的对话。西蒙在这位神父那里找到了暂时的避难所。这段对话很长。西蒙向神父问了一个伊万·卡拉马佐夫式的问题：如果你们的神要求如此不人道的献祭，要求善良而无辜的人遭受这样的羞辱、折磨、征收、贫困和剥削，而只告诉他们接受痛苦、卖力工作的话，这又是什么样的神呢？¹ 弗洛伦蒂诺用一长篇布道文作为回答，说明了神对人这样做是正当的。他告诉西蒙，上帝知道他所承受的所有这些苦难，而且会原谅他，但他选择了邪恶的手段去实现美好的目的，这一点是不为神所认可的。许多评论家认为老神父的话是黎萨尔为小说里的政治—道德戏剧的定调之笔。但轻易下结论就容易忽视两点。首先，西蒙听布道时和听了布道之后没有说一句话，他甚至根本没有在听。他没有做忏悔，也没有要求宽恕。而不久他就死了。其次，尾声前有很短的一章。这个章节很奇怪，叫作“谜” (El misterio)，手稿原本有七页纸，但作者删掉了其中三页。

1 *Ibid.*, chapter XXXIX (无标题), p. 283.

这一章设定在富裕的奥伦达（Orenda）家族。爆炸和武装袭击失败后，场面一片混乱。有三位访客到访。其中一位是纨绔公子莫莫伊（奥伦达家长女森西亚的求婚者），他参加了保利塔·戈麦斯的婚礼，对刚才发生的事困惑不已。另一位是学生伊萨加尼，他为了救保利塔，抓起了致命的台灯，与之一起跳入了帕西格河。莫莫伊告诉这家人，有位不知身份的强盗抢走了台灯，然后跳进河里。值得注意的是，此时森西亚插话道：“强盗？是黑手的人？”“不清楚，”莫莫伊继续说道，“不清楚他是西班牙人、中国人还是土人。”第三位访客，是帮忙装饰婚礼的银匠。他补充了坊间的传言，说当时台灯正要爆炸，新娘的房子里也藏有火药。莫莫伊为此大为震惊，言语中不无恐惧。随后，他发现森西亚正在看他，自己的恐惧实在有损男性气概，于是：“‘真是丢脸！’他鼓起气力喊道。‘还好强盗把它偷了去！否则大家都要完蛋了……’”森西亚完全惊呆了。接着：

121

“去抢不属于自己的东西总是错误的，”伊萨加尼带着谜一般的微笑说道。“如果强盗知道内情，如果他能动脑筋想一想，他肯定不会这样做。”停了些许，他又补充道：“就算拿再好的东西给我，我也不会去做他这事儿。”*

一小时后，伊萨加尼告辞，称他将到叔叔弗洛伦蒂诺神

父家中“永久隐居”，然后便从小说中消失了。¹这位善良、爱国的学生，此前从未有这样谜一般的微笑。（这是阴沉的西蒙的专利。）他为破坏了珠宝商人的计划感到遗憾。西班牙语说得很清楚，他所说的“永久”（por siempre）隐居不过是他在临走之际的想法。他会追随谁的脚步呢？作者似乎邀请读者等待《煽动者》的续集。

现在，我们也许有更充分的知识储备来理解这本书的预言性，以及黎萨尔称之为菲律宾小说的意义。预见性主要来源于作者将大量真实的事件、经历和情感从西班牙移植到了菲律宾，手法巧妙；随后，这些事件就仿佛成了未来的影子。将事件设定在韦勒总督的时期（书出版的时候他还在掌权）进一步加深了这种呼之欲出的感觉。但西蒙完全是另一回事了。他在之前的小说（包括《不许犯我》）中就已出现，而且不是从西班牙，而是从想象的古巴、从他在世界的周游中进入了这部小说。他可谓萦绕菲律宾的世界幽灵（espectro mundial），反映出伊斯基耶多曾经梦想的那个不可见的马基雅维利式共产国际组织。这个组织在现实中还不存在，但正在成形，因为就像他的民族一样，已经有人在想象它了。

西班牙帝国的大头一直是在美洲。1810年到1830年间，西班牙帝国的蒸发也预示着剩余的殖民地将会有最后的清算。同时，它也警示了早熟的后果。黎萨尔认为，欧洲本

1 *Ibid.*, pp. 271-2.

士受到的威胁不仅有内部的战火，还有底层的暴力运动。《煽动者》是在一个全球舞台的侧面上写作的。这舞台上，有俾斯麦和薇拉·查苏利奇，有美国佬的操纵和古巴的起义，有明治日本和大英博物馆，有胡伊斯曼和巴黎公社，有加泰罗尼亚和加罗林群岛，有虚无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还有马车夫和“同种疗法”医师。

- 122 1945年底，日本侵略政府刚垮台不到两个月同时荷兰殖民主义还没伸出利爪的时候，印尼第一任总理、年轻的苏丹·夏赫里尔（Sutan Sjahrir），用“gelisah”一词描述了闹革命的国人的情况。这个词翻译成英语并不容易：它的语义涵盖了“渴望”“忧虑”“不安”和“期待”。这就是《煽动者》的感觉。有什么东西就要来临了。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问题

123 把几乎整版《煽动者》打包托付给了他信任的老朋友、在香港的何塞·巴萨，又解决了剩下的一些事务之后，黎萨尔于 1891 年 10 月 19 日离开欧洲。除了阴郁的一天外，他再也不会踏上这片土地。启程的时间选得正合适。巴莱里亚诺·韦勒的四年菲律宾总督任期一个月后就结束了。他的继任者是欧洛希奥·德斯普赫尔（Eulogio Despujol）将军。此人担任士官表现出色从而飞黄腾达，人们认为他比韦勒要温和得多。（确实，他公开解雇了许多腐败官员，把他们遣送回西班牙，而且与强大的宗教修会也保持了距离，这些举动很快就让他在被殖民民众当中受到欢迎。）¹

黎萨尔的家人反复劝他不要回家，去安全的香港住。香港离马尼拉不过 800 英里，他们可以到香港与他团聚。他刚

1 德斯普赫尔的政策和个性，参见 Schumacher, *The Propaganda Movement*, pp. 274-5。

抵达这块受英国殖民统治的土地没几天，他年迈的父亲、哥哥帕西阿诺还有他的姐夫都到了——后面两位刚从民都洛岛的流放生涯中“逃离”出来。¹ 这年年底之前，几乎完全失明的母亲还有两位姐姐也跟着到了香港。我们这位青年小说家开设了一家眼科诊所，生意不错。这个家庭享受着团聚的时光，也似乎认为在香港定居是个不错的想法。但他此时名声赫赫，是菲律宾首屈一指的思想领袖；加之他离开欧洲的情景，使他难以长期迁就家人的愿望。那些比较激进的同志们（还在欧洲）的信件将他团团包围。他们问他“接下去”怎么做，而且承诺不论这“接下去”是什么样，他们都会全力以赴支持他。黎萨尔之前已经和德尔·皮拉尔还有他的手下说过，他们在欧洲只是在浪费时间，因此黎萨尔明白，被人看到自己在香港浪费时间，会对他有多么不利的影响。

124

该做什么？从照片的底片当中，我们可以看到 1892 年 1 月 30 日，费迪南·布卢门特里特写了一封警觉而犀利的信，提出了另一个重要方案。

最要紧的是，不要参与任何革命煽动，我求你了！因为一个人要策划革命至少要能看到成功的可能性，否则的话不必要的鲜血将是这个人良心的负担。任何时候，当一个民族反对统治他们的另一个

1 这些人不太可能像普通乘客那样，在殖民地当局不知情的情况下前往香港。也许相比正式撤销韦勒的流放法令，当局更愿意采用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

民族，或是一个殖民地反对它的宗主国的时候，革命的成功从来不仅仅依靠它自己的力量。美国能取得独立自由是因为有法国、西班牙和荷兰为盟友。美洲的西班牙语共和国之所以取得自由，是因为西班牙陷入内战，还有英国、北美为他们提供金钱和枪支。罗马尼亚人、塞尔维亚人和保加利亚人是被俄国人解放的。意大利人得到解放要感谢法国和普鲁士。比利时人则靠的是英国和法国。在各地，仅仅依赖自己的力量民族，无不被正统的军队所击垮：1830年、1848年和1849年的意大利人；1831年、1845年和1863年的波兰人，1848年和1849年的匈牙利人（Ungara），以及1868年的克里特岛人（Kider）。^{1*}

125 布卢门特里特继续说道。这样的革命不可能成功，除非：
（1）敌人部分陆军和海军发生兵变；（2）宗主国与其他国

1 *Cartas entre Rizal y El Profesor Fernando Blumentritt, 1890-1896*, pp. 783-4. 誊抄下来的文本已经难以辨认。Ungara 应该是 Ungarn。Kider 最开始一定是 Kreter。信仰基督教的克里特岛人 1868 年起义，反抗土耳其人统治，但遭到了血腥镇压。奇怪的是，好几部黎萨尔的传记在引用这封著名的信件时，写的总是读者看不懂的“the Kider”或者“los Kider”，好像没有注意到任何奇怪的地方。更奇怪的是，国家历史研究所的 *The Rizal-Blumentritt Correspondence, 1890-1896* (Manila: 1992), p. 430 对这个词的翻译是“爱尔兰人”。一定是抄写者看不懂，就把连写的 et 当成了 d，写了 Krder 这样一个无法理解的词。于是乎，克里特（Kreter）的第一个 r 也要变成元音，而只有 i 的纵向形状符合。

开战；(3) 资金和武器预先有充分准备；(4) 外国势力公开或秘密支持起义。他又说道：“今日的非律宾不符合任何一个条件。”¹ 布卢门特里特在莱特莫里茨教书，这里是哈布斯堡帝国的中心地带。哈布斯堡帝国似乎从来没有支持哪个民族争取自由，但它的周围环绕着波兰、匈牙利、意大利、塞尔维亚、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希腊乃至克里特。布卢门特里特用最近的历史以及战略规则作为自己的坚实理据。1891年，革命成功所需要的四个条件非律宾无一具备的论断也完全正确。但这样的情况会持续很久吗？

另一方面，黎萨尔有位充满活力、比他年轻的朋友艾迪贝尔托·埃万杰利斯塔（Ediberto Evangelista，此人后来是1896—1898年反西班牙武装起义中的烈士）于1892年4月29日的根特（当时还是说法语的地区）这样向黎萨尔写道²：

1 请注意，我们所引用的这段话里，“lass Dich nicht in keine revolutionären Agitationen ein”的意思不是领导，而是纠缠。我们之前还引用过他1892年7月4日写给黎萨尔的信。这位奥地利人是这样写的：“给我写信说黎萨尔应该创办一份革命报纸或开始一场革命运动的，不是皮拉尔派而是黎萨尔派。我告诫他们不要向你提出这样的建议，所以我立即给你写信。”他提到的这些信似乎没有保存下来。

2 黎萨尔说服了埃万杰利斯塔，还有何塞·阿波罗和何塞·亚历杭德里诺离开“落后的”西班牙，到根特学习工学（这是布卢门特里特的建议）。亚历杭德里诺后来在革命中成了一名将领。他曾与黎萨尔一起在布鲁塞尔居住，此时黎萨尔正在撰写《煽动者》，他帮忙在根特找到了一家出版商，也帮忙做了校对。伊万杰利斯塔、亚历杭德里诺和安东尼奥·卢纳都是黎萨尔的强烈支持者，他们都反对德尔·皮拉尔的政策（亚历杭德里诺将其称为“可悲的政策”）。参见 Schumacher, *The Propaganda Movement*, pp. 236, 271-2。

您为何不至少看看相信您的理念而且热切努力的人有多少；我的意思是，不顾政府反对，把他们组织成一个革命俱乐部，而您在香港或者其他什么地方领导，对于实现您的理念至关重要。古巴独立运动者不就是这样做的吗？西班牙的进步主义者不也是吗？^{1*}

康拉德国度

为了解决或避免这些自相矛盾的压力，黎萨尔的第一个方案是举家与和他见解相同的朋友们一同迁往今天马来西亚沙巴联邦国东部的山打根。地理上看，它距离菲律宾非常之近——距离霍洛 250 英里（霍洛是曾经十分强大的穆斯林苏丹国苏禄的首府，目前在宽松的西班牙统治下还蠢蠢欲动），距离马尼拉的里程也不过 600 英里稍远。哈瓦那到迈阿密和坦帕的距离也是 600 多英里。在坦帕，马蒂正在从古巴烟草工人群体中招募革命者。在政治上看，这样的地理位置也很合适。在 19 世纪 90 年代，婆罗洲北岸是一块非常独

1 *Cartas entre Rizal y sus colegas de la Propaganda*, p. 800. 就在前一年，马蒂在美国组建了古巴革命党。他说到的西班牙人，肯定是马努埃尔·路易斯·索里拉的激进共和派追随者。索里拉在巴黎流放期间，大部分政治生活都用在了策划革命上。黎萨尔有好几位朋友为索里拉派报纸，如为《未来》（*El Porvenir*）和《进步》（*El Progreso*）撰稿。这两份报纸对菲律宾人的事业基本持友好态度。参见 Schumacher, *The Propaganda Movement*, pp. 46, 55, and 202.

特的康拉德地带。西边部分是所谓的白酋长王国，系英国探险家詹姆士·布鲁克于1840年建立，1880年以后受伦敦保护，但内政不受干预。一度十分强盛的文莱苏丹国还有一部分残余，占据了中部一小块地方，而东部包括山打根在内在1882年以后都是由一家私人企业（英国北婆罗洲特许公司）管理。更好的事情是，1885年，西班牙被迫放弃对霍洛岛主权更迭所产生土地的半合法所有权。因此，相比在香港还有西班牙领事以及天主教修会当地分会的监视，在山打根却是不需要顾虑这两者的。因此，我们无须惊讶，黎萨尔在欧洲的那批比他更狂热的同志（如埃万杰利斯塔和安东尼奥·卢纳）对于定居计划非常热心，他们想象着的是马蒂的佛罗里达。1892年1月的某天，卢纳给在香港的黎萨尔写信称：“婆罗洲就是我们的骨头礁 [Cayo Hueso，美国人根据发音造出了Key West的称呼]，我很有可能成为它的居民，如果形势需要。”^{1*}另外，山打根也会为黎萨尔的家人带来不受困扰

127

1 *Carts entre Rizal y sus colegas*, pp. 771-2. 这封信很重要，因为卢纳的判断非常敏锐。他跟黎萨尔说自己正要返回马尼拉为菲律宾谋求独立。“但还有很多东西要学，还需要有很多手法、谋划，不能夸大我们的力量……我们要像耶稣会士那样沉稳、冷静，静待时机成熟。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我愿意为您效劳，但只有一个条件，即如果我看到运动只不过是一场兵变的话，我可以退出……我相信您能理解我说的话。如果他们胜利了，许多人就会白白牺牲。但不论如何，我都会回马尼拉，我做任何一件事都不会忘记自己是独立主义者。请不要怀疑：如果形势让我站到马尼拉的西班牙人一边，那他们会更加倒霉。我会让他们掏钱养活我，布置地雷，直到果实成熟。到那时（如果您也有这些想法），您立刻就会有一颗卫星，它会忠实地为您服务。”*

128 的生活,也有利于小说家本人、他的藏书和写作。¹他还希望,家乡卡兰巴的那些流离失所的人会与他一起到婆罗洲的这个避难所定居。²

3月底,黎萨尔在与英国北婆罗洲特许公司驻香港代表初步协商后,第一次参观了北婆罗洲。之后他还会多次造访此地。最开始的时候,前景似乎十分光明。公司给黎萨尔提供5000英亩荒地,三年内免租,最后还可能以低价购买。英国北婆罗洲特许公司迫切希望更多的人定居到这个人烟稀少的地方,所以还答应菲律宾人社区会由菲律宾人自己的成

1 1892年1月31日,黎萨尔动情地向布卢门特里特写道:“行医闲时,我就用塔加洛语写我那本书的第三部分。它将只讨论塔加洛人的习俗,即他们的习惯、品德和缺点。这是一个美好的主题,我感觉不能用西班牙语写。我想要写一部现代意义的小说,一部艺术性的、文学性的小说。这一次,我将为了艺术牺牲政治等一切;如果我用西班牙语写,那么可怜的塔加洛人就读不懂了——而我要将这部书献给他们,他们是最需要读一读这本书的人……写作期间麻烦重重,因为我的很多想法不造新词就不能自由表达。此外,我用塔加洛语写作也还不够熟练。”* *The Rizal-Blumentritt Correspondence, 1890-1896*, 从第431页开始的无页码页面。第三部小说没有写完。安贝斯·奥坎波仔细地复原了它仅有的一小部分。参见他的 *The Search for Rizal's Third Novel, Makamisa* (Manila: Anvil, 1993)。二十多页手稿以后,黎萨尔放弃了用塔加洛语写作,回到了西班牙语。Makamisa的意思是“弥撒以后”。这个文本的焦点是皮里的市民,还有他们的西班牙人教区神父。它回到了《不许犯我》的那种讽刺性的西班牙生活剧色彩(costumbrista)。也许这是他中断写作的原因,又或许是他认定自己无法超越前作《煽动者》。不论怎么说,1892年下半年之后,他似乎放弃了再写一部小说的想法。

2 请别忘了,此前强力怂恿卡兰巴的租户和住民将道明会士告上法庭,一路告到马德里的最高法院的正是黎萨尔。我们已经看到,在酷爱报复的修会打赢官司之后,韦勒落井下石,烧毁房屋,把反对者赶出卡兰巴。这样的结局让黎萨尔崩溃,他为乡亲们因他而受到的苦难感到极度愧疚。

员依据自己的风俗习惯管理，不受差役和不合理税收的干扰。但没过几个月，整个项目就开始崩溃。黎萨尔意识到，他根本没法募集足够的钱去运作这块小小的殖民地。此外，要增加它的人气，就会出现大规模移民，这就需要西班牙的准许。黎萨尔写信给新任总督德斯普赫尔，解释了家人和乡亲到这个地方和平定居的愿望，但德斯普赫尔不为所动。如此规模的移民会让他的政府蒙羞；更何况，保守的西班牙报刊很有可能将其视为马尼拉政治、军事力量所不及的又一个坦帕。¹

黎萨尔另一个方案（也是令他家人更担心的）是在菲律宾本土建立第一个菲律宾人的合法政治组织。这个方案的意义还很难下定论。黎萨尔本人在这方面没有留下任何文档。所有的书面证词（通常自相矛盾）来自四年后警方审问员和刑讯者得到或提炼的证据。这已是革命爆发之后的事了。²（黎萨尔本人在1892年未受到审问，但我们很快就会

129

1 在某种意义上讲，将山打根和坦帕作对比是没有道理的。英国对菲律宾没有任何企图，而美国的一些强势集团贪婪地盯着古巴已经多时了。但在1890年，反差可能没有今天来看那么明显。难以想象安东尼奥·卢纳和艾迪贝尔托·埃万杰利斯塔只是为了种种菜、读读书就答应从欧洲赶来，到山打根加入黎萨尔。

2 参见 Guerrero, *The First Filipino*, pp. 315-6. 格雷罗主要援引的史料出自 W. E. 雷塔纳 (W. E. Retana) 1907 年的 *Vida y escritos del Dr José Rizal*, 而雷塔纳则几乎完全依赖警察的报告。伊萨贝洛·德·洛斯·雷耶斯的《回忆录》是非常重要的例外。《回忆录》为伊萨贝洛因被怀疑参与策划了1896年的博尼法乔起义（怀疑不实）而被关在马尼拉毕里比得监狱时所作。他采访了多位起义牢友。添加了其他材料以后，他很快出版了 *La sensacional memoria de Isabelo de los Reyes sobre la Revolución Filipina de 1896-97* (Madrid: Tip. Lit. de J. Corrales, 1899)。

看到，他回到马尼拉 10 天后就被逮捕，此时他刚举办了一场私人宴会，在会上宣布了他所说的菲律宾协会成立。）

菲律宾协会

菲律宾协会有五条明确的目标，它们与 1890 年以后黎萨尔在书信中体现出来的思考颇为契合：（1）整个群岛统一成一个紧密、团结、同质的国家；（2）在危急和需要的情况下相互保护；（3）反抗一切暴力与不公；（4）发展教育、农业和贸易；（5）研究并推行改革。¹ 第一点显然意味着要大幅修改殖民地法律，消除西班牙人、克里奥人和混血人的层层特权。后面几点说明，殖民地国家常常不讲法制，在建设现代社会上少有建树。不过，这个方案以及它所采用的文雅用语，就整体而言处于菲律宾殖民地现行法律的边界之内。除此之外，还有他们言而未及的 19 世纪 80 年代古巴的例子。古巴废除了奴隶制，政党（更不用说公民组织乃至左翼组织）都有了合法地位（受一定的法律限制）；而且，在相仿的限制下，一个多样而繁荣的出版业也发展起来。这一切，如果古巴行，为什么菲律宾不行呢？尝试一下似乎是合情合理的。

1 Guerrero, *The First Filipino*, p. 295 引用了雷塔纳的书（pp. 236ff），雷塔纳在书中用的史料据说是埃皮法尼奥·德·洛斯·桑托斯（Epifanio de los Santos）发给作者的一份没有具体信息的文本。

但从1896年的供词来看，协会的内部组织显然是为了半秘密活动所设计。形式上，它以地方协会为组织基础，地方协会的负责人组成更高层的省级协会；省级协会的首脑组建一个最高议事会，有权管理整个协会。但每个成员必须要：

牺牲所有个人利益，盲目、逐字逐句服从他所在议事会或更高级议事会首领的指令以及所有口头和书面指示。如果看到、观察到或者听到协会可能受到威胁，每个成员必须立刻通知他所在议事会……他所在的议事会以及协会的行动和决定，他必须绝对对外人保密，即使是对他的父母、兄弟、儿女等；甚至，他要为保守秘密付出自己的生命。

130

他还应该“不向任何羞辱屈服”，“本会成员有难必须拯救，并负责招募新成员”。（也许很典型，妻子和姐妹在这个规章里显然根本不值一提。）¹

很难相信，这样一个威权主义的组织结构（显然取法

1 格雷罗倾向于信任这些审问记录，却是有限度的信任。早一辈的历史学家，如拉斐尔·帕尔马（Rafael Palma）曾在《黎萨尔传》（*Biografía de Rizal*, Manila: Bureau of Printing, 1949）中不加批判地引用这些文本。这种转变值得玩味。20世纪40年代，黎萨尔还是一位没有争议的革命英雄。到了20世纪60年代，他那种资产阶级的犹豫不决（这已经是比较不错的表述了）受到了批判，格雷罗的作品在一定程度上也微调了历史叙述，作为对此批判的回应。

于古老的共济会传统)会是黎萨尔的设计。¹ 这位小说家在1888年返回欧洲后不久似乎成了共济会士。没有材料可以说明他搬回欧洲北部以后在共济会活跃。我们仅知道,有殖民地土人成为共济会士是在1891年,不过其人数在此后迅速增加。² 更有可能是安德雷斯·博尼法乔设计了这个结构。在黎萨尔被放逐到棉兰老岛、协会突然解体不久,他就又成立了地下革命组织卡提普南。³ 对于1896年被刑讯的卡提普

1 1896年12月,黎萨尔告诉审讯员,到香港时,积极的共济会士何塞·巴萨曾要他为菲律宾协会草拟一份章程。章程依照共济会的习惯制定。但他不知道巴萨拿这章程去做了什么。这个说法似乎有点太随意了,但我们找不到有任何章程出自黎萨尔之手。参见 Horacio de la Costa, SJ, ed. And trans., *The Trial of Rizal: W. E. Retana's Transcription of the Official Spanish Documents* (Quezon City: Ateneo de Manila University Press, 1961), p. 6: "excitado por D. José Basa...redactó los estatutos y reglamentos de una Sociedad denominada 'Liga Filipina,' bajo las bases de las prácticas masónicas...que en este momento no recuerda el declarante haber indicado ningún fin político en los estatutos, que se los entregó á José Basa, no recordando á la persona que se los remitió." 需要一提的是,在西班牙,德尔·皮拉尔也在考虑组织一个菲律宾协会——也就是说,它已在酝酿当中。

2 Schumacher, *The Propaganda Movement*, pp. 174-5.

3 这里,伊萨贝洛的回忆很有意思,不过许多历史学家发现他并不是位靠谱的见证者。“黎萨尔被放逐到达皮丹之前,他留下了指示,让人邀请我加入协会。这没有什么奇怪的。很有灵感的作曲家胡里奥·纳克皮尔先生(Julio Nakpil)负责给我带了一份协会的章程。他说黎萨尔曾亲自拜访,但我正好不在家。当我在章程中读到‘盲目服从,泄露协会秘密者死’这句时,我机敏地找了若干理由拒绝了。我的个性和观点是非常独立的,也许我加入进去只会破坏任何组织都非常需要的纪律。”* *La sensacional memoria*, p. 105. 这里没有明显的理由怀疑伊萨贝洛在说假话,但我们难以想象黎萨尔写过要求“盲目服从”、泄密者死之类的章程。尽管黎萨尔确实曾去拜访伊萨贝洛,而伊萨贝洛正好外出不在,但他也不大会派纳克皮尔去传达他的邀请。伊萨贝洛是马尼拉最重要的菲律宾记者,是《团结》的定期撰稿人(以笔名)。纳克皮尔那时是马尼拉手工业界的一页[和黎萨尔的(转下页)]

南党人来说，他们很容易把组织形式推到菲律宾协会头上，原因不外乎两个：审讯员希望听到这样的回答，而且博尼法乔一直声称这两个协会一脉相承。

然后呢？与马蒂做个比较很能说明问题。¹马蒂是第一代克里奥人，他的母语是西班牙语。他妻子出身古巴大地主家庭，但他们的婚姻并不快乐（也许他是同性恋）。他的青年时代大多在墨西哥和美国度过。1892年，美国还在进行着疯狂的内陆扩张，还没有成为殖民列强；在广泛、古旧的意义上，可以说他是美洲人。他的关系遍布拉丁美洲，他甚至还是乌拉圭驻美国的荣誉理事。经过好几年的努力，他成了有名的演说家、诗人，也是杰出的政论家。此外，他有着丰富的政治组织经验，能够继承这几十年来古巴的内部起义，以及美国有关游说团体以不同程度参与发动的武装入侵。对于合法地回到古巴能改变什么，他不抱有幻想，而且摆在他面前的还有若干选项。而且：塞斯佩德斯发动的十年叛乱（1868—1878年）及随后的小战争叛乱（Guerra Chiquita, 1879—1880年）使得古巴境内有了成千上万经验丰富的老

132

（接上页）出身天差地别]，他父亲是银匠，本人则是自学成才的钢琴老师、演奏者和修理师。（他在黎萨尔死后才开始了爱国作曲家的生涯。）他曾在博尼法乔的卡提普南党中活跃，在元首受处决后娶了他的遗孀。参见 *Filipinos in History* 中有关他的条目，vol. II, pp. 49-52。因此，我们有充分理由怀疑，派他去见伊萨贝洛的不是黎萨尔而是博尼法乔。

1 有关马蒂的出身与生平，我主要参考的是 Thomas, *Cuba*, Chapter xxv。马蒂的父亲来自瓦伦西亚，母亲来自特内里费。

兵，擅长游击战，随时准备接受征召参与新的军事斗争。

黎萨尔是混血人，拥有部分土人血统、部分华人血统和部分西班牙人血统。他的母语不是西班牙语，而且他很可能从未合法地结过婚。¹ 青年时期他在西欧各地接受训练，而不是在美洲。（刚到马赛就被当作美洲人让他十分愤怒。）他是位技巧精湛的政论家，虽然不是演说家，但写的小说却精彩得出奇。他早早搬去了欧洲北部，尽管这在很多方面对他

1 在他国内流放的最后一段时间（对此见下文），他与一位名叫约瑟芬·布拉肯（Josephine Bracken）的女士愉快地同居了一阵。她的背景有点模糊。她在1897年2月黎萨尔死后简要地讲述了自己的人生经历，写到自己父母是贝尔法斯特的天主教徒，1876年8月9日生于香港的维多利亚兵房，她父亲是那里的一名下士。她母亲名叫伊丽莎白·麦克布赖德（Elizabeth MacBride），在生她的时候去世。她父亲感到无计可施，只好让他认识的、没有子女的陶菲尔（Taufel）夫妇收养了自己的女儿。陶菲尔先生和三任妻子的关系都很不好，与约瑟芬来找黎萨尔看病的时候几乎双目失明，黎萨尔此时正在棉兰老岛上度过自己的流放生涯，他们会面大约是在1895年1月或2月。治疗一周后，他的视力似乎有所改善，两人便启程返回马尼拉。但约瑟芬把老人留在马尼拉，自己又回到了棉兰老岛，与这位眼科医生住到了一起。他们不可能结婚，因为教会要求黎萨尔撤回先前自己所持的信念，而殖民地又不能搞世俗婚礼。这样一位标准伊比利亚风格的情妇在自己的辖区，显然让负责看管黎萨尔的军队头头大为光火。约瑟芬1.52米高，比黎萨尔矮了10厘米。Guerrero, *The First Filipino*, pp. 360-7. 唉，可惜安贝斯·奥坎波已经从内部证据决定性地证明，这份文档系他人伪造，虽然伪造者的动机尚不明了。尽管陶菲尔一家还有他们去达皮丹看病确有其事，但他也援引了黎萨尔的传记作家奥斯丁·科茨（Austin Coates）在香港多处档案中的研究。科茨的研究表明，约瑟芬的出生证明上含有“父亲未明”字样，而科茨推测她的母亲有可能是一位华人洗衣工。耶稣会神父韦森特·巴拉格尔（Vicente Balaguer）声称他在黎萨尔被处决前一小时为他和约瑟芬主持了婚礼，但我们找不到婚姻证明，也无法确证约瑟芬曾去死囚室探望黎萨尔。参见 Ocampo, *Rizal without the Overcoat*, pp. 160-6. 更早的标准版本，参见 Guerrero, *The First Filipino*, pp. 472-86.（与黎萨尔一起从达皮丹到了此地之后，约瑟芬与他的一位姐妹住在一起。）

颇有帮助，却使他丧失了马蒂所充分具备的东西——实际政治经验。他的国家所处的地区，几乎完全是大大小小的殖民地：英国的印度—缅甸、马来亚、新加坡、一部分北婆罗洲，法国的越南、柬埔寨和老挝，荷兰拥有广阔的印度群岛，只有暹罗在形式上保持独立国家的地位。虽说黎萨尔大量阅读了关于这些地方的东西，尤其是那些与自己一样说奥斯特罗尼西亚语的国家，但除了新加坡和北婆罗洲他去过几天以外，其他地方从未亲身去过。清朝即将寿终正寝。对于他而言，周边没有一个支撑点，不像马蒂有着广阔的共和主义新世界为后盾。菲律宾群岛有自己的地方农民起义和克里奥人叛变的传统，但这些都是陈年往事，他能利用的就只有 1872 年的甲米地叛乱，以及之后血腥镇压的后果。19 世纪 90 年代初，信仰天主教的菲律宾人当中，没人拥有游击战的经验。

133

1892 年春末，黎萨尔的选择十分有限。他已经永远离开了欧洲。山打根越发让他感到只是个幻象。香港也只有在英国人继续容忍他的时候才是避难所——而且英国人绝对不想惹恼马尼拉殖民者。为了忠实于他的承诺以及所有视他为民族领袖的人们，他似乎就只有一条路可走——公开回国。

第二次回国

1892 年 6 月 19 日，黎萨尔迎来了 31 岁生日。20 日，

他写了两封信，托付给了他的葡萄牙友人 P. L. 马尔奎斯 (P.L. Márquez) 博士 (香港监狱总管)。这两封信密封上面写明在他死时方可开启并发表。¹21 日，他给德斯普赫尔总督写了一封私人信函，这封信与他坐同一艘船到了马尼拉。

两封信当中，一封写给他的家人，另一封写给“菲律宾人”。两封信都意在解释为什么他毅然决定踏上返回菲律宾的危险旅程。他写到，他自己的行为已经为许多无辜的人、自己的族人，尤其还有父老乡亲们带来了极大的苦难，当中很多人因为他而受到严酷迫害。他不会改变自己已经选择了的道路，只是希望为之担起责任，与殖民地当局面对面，希望他们从此往后豁免其他所有受害者。第二封信则让我们能够更全面地认识他的目的：

134 对于那些否认我们的爱国主义 (能力) 的人，我还想告诉他们，我们知道如何为使命、为信念献身。为了自己所爱的而死，为了祖国、为了自己尊敬的人而死，死又有何惧？如果我认为自己是菲律宾政治的唯一支柱，如果我相信自己的同胞还能用得上我，也许我对是不是要走出这一步还会有些犹豫。但可以接替我的大有人在，他们可以更好地利用我的地位；而且，也许也有些人认为我是夸夸其

1 有关这位可敬的马尔奎斯，参见 Palma, *Biografía*, p. 220。之所以没把信托付给父母或者姐妹，是因为就像大多数家庭那样，他们难免会偷看。

谈的无用之辈，因为他们排挤我，让我闲着。我一直都爱我可怜的祖国，也相信我会爱她到最后的时刻——无论人们对我会有多么不公；因为我爱她，所以我牺牲了我的未来、我的生命、我的喜悦。不论我的最终命运如何，我死时一定要祝福她，祈求她得到救赎。^{1*}

他奇怪地将爱国情怀和个人恩怨混到一块儿，这需要咱们做点解释。两个月前，《团结》发表了一篇文章。他认为这篇文章是针对他和他的方针的恶毒攻击。攻击的形式是一篇露骨的讽刺文章，题为“两毛钱的救赎者”（Redentores de Perro Chico）。黎萨尔断定，这篇文章用“伊鲁索一世”（Iluso The First）嘲弄他。文中，这个角色是一位夸夸其谈的煽动家，举止模仿拿破仑，自认为是上帝派来解放幻象之城（菲律宾）的天使。他召集了一群愚蠢、天真而狂热的追随者在身边，呼吁他们拿起武器反对他们的压迫者。当他的听众中有一个声音响起，问他没有武器、船只和钱又怎能反抗的时候，这位江湖骗子答道：

你这卑鄙的家伙，你说什么？你反对什么？
钱？你们不需要。一把剑、一颗顽强的心就是我们

1 *Cartas entre Rizal y sus colegas*, pp. 831-2.

的秘密。上帝将你们造成了出色的爱国者。出版界？我们写的已经够多了。我们不应该指望州长、市长乃至教区神父。你以前有没有听我演讲？你难道认为我吼得还不够吗？我难道没有给你们指一条明路？没有激励你们去战斗？我自己是不应该去战斗的。我的生命是神圣的。我的使命更为高级……你们需要补给吗？它们会从天而降，上天会帮助善举的。如果没有降下来，那就斋戒！武器？买啊！军事组织？自己干！船？游泳就可以了。交通？自己的包自己背！衣服？别穿了。住宿？睡地上。医生？死吧，这是所有爱国者的职责。*

衣衫褴褛、没有武器的人群前去讨伐压迫者，但当即被抓了起来，成了天下笑柄。他们或是被绞死，或是被流放。他们中没有伊鲁索一世的身影：“他离开了，去为祖国的不幸哀悼。他已经用自己的高谈阔论证明了他的爱国心。”*——他会“坐在奥林匹斯山之巅”这样对自己说：“我要做的是更崇高的事。我是唯一的先知；只有我的爱配得上我的祖国。”* 他最后进了疯人院。¹

1 *La Solidaridad*, April 15, 1892, pp. 685-7. 这篇文章的英译很生动，不过没有译全，也不总是准确，可见于 Guerrero, *The First Filipino*, pp. 289-92. 尽管文章以笔名发表，但作者显而易见是莱特，黎萨尔一直都认为这是位没有原则的小人。收到了4月15日刊后，黎萨尔致信德尔·皮拉尔，要求他给出解释：文章里不仅有人身攻击，还公开暗示了有人计划对西班牙人发动一场（愚蠢的）（转下页）

马德里究竟发生了什么我们还不清楚。德尔·皮拉尔肯定为他的支持者和黎萨尔派之间的裂痕懊恼不已，卢纳、亚历杭德里诺和埃万杰利斯塔这些人的话激怒了他，而有关山打根定居点背后的意图，也有些添油加醋的流言传到了他耳朵里。他完全清楚，如果爆发武装革命，他自己的同化主义政治运动就会毁于一旦。如果类似事件爆发，他们就很难不在事后予以谴责，而这样做在菲律宾群岛会导致不可预见的后果。因此这样的推测就说得通了：他希望扼杀这种可能性，而且认为一篇讽刺“愣头青”的作品，比直接提出方针、措辞小心翼翼的文章要有效得多。这篇讽刺文章有多个靶子（“两毛钱的救赎者”）能很好地佐证德尔·皮拉尔的意图。与此同时，他是个沉稳的人，善于协调人际关系，也擅长制定策略。排挤黎萨尔对他来说没有好处。他给我们这位小说家写的信，诚恳而且讲理，但他收到的回信却不一定都是这样的。而且，这篇讽刺文本身显然针对的是一位救赎者——黎萨尔（“他们叫我‘偶像’，说我是暴君”），而不是一般的愣头青。最有可能的解释是，德尔·皮拉尔和莱特都觉得可以写一篇讽刺文章，但具体怎么写交给了莱特，当时他是《团结》的主编。莱特于是利用这个露骨的机会公报

136

（接上页）武装袭击。7月20日，德尔·皮拉尔心平气和地回信称，这篇讽刺文章完全不是针对黎萨尔个人，而是在警告那些不经过严肃思考就想要立即叛变的愣头青。我们几乎可以确信，黎萨尔没有收到这封信，因为（我们后面将会看到）他在7月7日被流放到棉兰老岛。两封信的内容，可见于 *Cartas entre Rizal y sus colegas*, pp. 809-11, 841-3。

私仇。我们不知道文章发表以后，德尔·皮拉尔和莱特之间做了什么样的交流，但德尔·皮拉尔肯定不会对这篇文章感到高兴。所以，读他写给黎萨尔的那封长信，就感觉他处在很尴尬的位置，既要接受讽刺一下“愣头青”的决定，又要澄清莱特实际写的也不过此意。他如果不这样写，就只能书面致歉。那样的话，致歉书会传播开来，迫使他与莱特决裂。

对于一直以来都非常敏感的黎萨尔来说，这篇文章就好比是最后一根稻草。被嘲讽为夸大狂、自命不凡的救赎者是一回事，而被嘲笑是懦夫，只会让自己同胞送死，自己却待在安全地带则是另外一回事。尽管回菲律宾的首要原因是他族人和乡亲们的处境，但这篇讽刺文章很有可能让他下定了决心。他要用实际行动驳斥这篇文章，所以公开去了殖民地首府，手无寸铁，除了近亲之外了无随从。¹

137 黎萨尔的第三封信写于6月21日。此时他正要登上去

1 帕尔马在《黎萨尔传》第199页引用了1933年何塞·亚历杭德里诺回忆录《牺牲之路》(La senda del sacrificio)第2页的一段话，引文如下：“他时常和我探讨一些问题，其中有一个是用什么手段在菲律宾推广革命；在这个问题上，他这样或是用类似语言表达了他的看法。‘我决不会去领导一场没有胜算的革命，因为我不希望让我的良心背负鲁莽、没有结果的流血。但如果另外有人在菲律宾领导革命，那他会得到我的支持。’”*他的回忆可能没错，但这已经是他们讨论的40年后了。说这番话的人是极为著名的革命将领，先后与西班牙人和美国人交过手。而在说这番话的时候，民族主义精英一致希望黎萨尔作为革命者和殉道者为后人所纪念。亚历杭德里诺出身于马尼拉北面不远处的邦板牙一个富裕的地主家庭，1892年的他无疑就是被德尔·皮拉尔警告和激怒的黎萨尔派“愣头青”之一。

马尼拉的轮船。这封信他写给总督，称他回国来解决一些私人事务，请求德斯普赫尔停止韦勒对他家族的迫害。面对他本人可能受到的质问，他做了充分准备。26日是星期天，他在马尼拉上岸，在中国城岷伦洛的一家精致而崭新的旅馆里落脚，而且当晚就得到了总督的接见。¹ 这位总督的年纪差不多是黎萨尔的两倍，当场“赦免了”黎萨尔的父亲，并让这位大作家三天后再来府上。

至少从比较的视角看，这件事有点不同寻常。这里的这位年轻的殖民地百姓，在九个月前发表了小说；在小说中，没有名姓没有指明的总督，还有殖民地顶层精英，都被炸得粉身碎骨。更何况，早在六个月前，殖民地政权就拿到了这部书。（何塞·巴萨曾试图从小港口将书走私进菲律宾，而当局在中菲律宾港口伊洛伊洛发现了一大批偷运的书籍。）² 这样的会面，不论是在英国、法国、荷兰还是葡萄牙这些帝国（乃至在西属古巴），都是无法想象的。权且做些猜测：首先，德斯普赫尔太忙，没时间读这部小说，或者他从来不读小说；再者，如果他更热心点的话：他估计也只是看

1 就当黎萨尔的船驶离香港，当地西班牙领事便电报通知了德斯普赫尔，并补充道：“老鼠已经进了圈套。”Austin Coates, *Rizal-Philippine Nationalist and Patriot* (Manila: Solidaridad 1992), p. 230. 这番话可以看作精心密谋的证据，但更可能是情报人员的习惯说法。如果真有陷阱，德斯普赫尔就不太可能浪费精力在接下去一周中与黎萨尔进行六次会谈了。（而且，圈套是要用诱饵的，这里也没有。）我们不久将看到，将黎萨尔流放到达皮丹的决定无不体现出临时安排的特点。

2 *Ibid.*, p. 217. 大多数书被当即焚毁。

到过这部小说。

事态高速进展。第二天是周一，黎萨尔坐新开通的马尼拉北部的铁路线，经停多个城镇。他发觉，虽然没有人认识他，但他的名字被挂在每个人的嘴上，他抵达马尼拉的消息也是人尽皆知。德斯普赫尔周三和周四再次接见了，他，允许黎萨尔的姐妹们从香港返乡。他们主要讨论了山打根的那个项目。黎萨尔坚持要把它做下去，而总督对此强烈反对。他们约定7月3日（周日）再谈。与此同时，警察局特工一直在跟踪黎萨尔，检查所有他到访过的房屋。那一天，黎萨尔在一位富有的政治支持者家中正式推出了菲律宾协会。众多与会者中，有安德雷斯·博尼法乔。这位年轻的手工艺人、商业代理人在四年后会发动革命。黎萨尔本人似乎只是列出了协会的目标，解释了为什么政治斗争的中心必须从西班牙转移到菲律宾，然后呼吁大家进行各种类型的援助。周二早晨，早有预谋的警察搜查开始了，但除了几本小说、共济会的传单、反修会的小册子等几样东西外，没有搜出其他东西——这些微不足道的东西在西班牙是不会被判刑的。于是也就没有大规模的逮捕行动。

热带的西伯利亚

周三，黎萨尔一周内第五次见了德斯普赫尔，向他保证自己即将返回香港。但这次总督让他解释为什么他的行李

箱里藏着反修会传单——包括一篇讽刺教皇列奥十三世的文章。黎萨尔回答说不可能有这等事，他姐妹们帮他打包的，绝对不会做如此愚蠢的事，更不会背着 he 这样做。德斯普赫尔于是逮捕了他，将他关到了圣地亚哥要塞。但押送他的是总督自己的马车，护送的是德斯普赫尔的亲从。次日他收到内部流放到达皮丹的指令。达皮丹是偏僻的南方岛屿棉兰老岛西北岸的一个小小的定居点。¹在那儿他将度过生命最后四年的大部分时光。情况并不算坏。人们待他都极为恭敬有礼，他的表现也绝不像伊鲁索一世。但究竟发生了什么？

我们可以从那张偷运的传单开始分析。德斯普赫尔告诉黎萨尔，这张传单是在他抵达马尼拉后才被发现的。此时距他被流放还有 10 天。如果确有此事，总督应该会马上收到报告。如果他发觉这些传单具有颠覆性，他就不会与黎萨尔进行这么多次热情会晤，也不会在他遭到逮捕时表现出相当的礼貌。早在 1907 年，温塞斯劳·雷塔纳（Wenceslao Retana）就为黎萨尔写过传记。在这部传记里，作者观察到，据说发现了诽谤印刷物的海关官员是大反动派道明会士马尼拉大主教贝尔纳迪诺·诺撒雷达（Bernardino Nozaleda）的侄子。他还指出，一位名叫米格尔·罗德里格斯·贝里

139

1 值得玩味的是，黎萨尔被流放的原因没有提到菲律宾协会，也没有提到宣布协会成立的那场宴会。这可以说明，德斯普赫尔或是没有把协会太当回事，或是他不太愿意让黎萨尔面对煽动叛乱的指控。不论怎么说，德斯普赫尔保持沉默可以进一步支持我们的结论，即 1896 年有关创立协会的供词，是当年西班牙爆发恐惧的产物，而不是 1892 年韦勒那位宽松的继任者的意图。

斯（Miguel Rodríguez Berriz）的西班牙法官在黎萨尔抵达前不久发现，奥古斯丁会一家孤儿院里正在秘密印刷反修会的传单。¹此外，黎萨尔根本没有提到列奥十三世。因此我们几乎可以断定，传单是伪造的，以迫使殖民地当局决定性地着手处理《煽动者》。这位作家在卡兰巴纠纷问题上，曾将飞扬跋扈的道明会士拉到了西班牙的最高法院。德斯普赫尔也完全有可能知道或怀疑事情背后的蹊跷。但不管怎么说，传单还是派上了用场。

真正让德斯普赫尔担心的是其他的事。首先，是东骨头礁。黎萨尔反复强调，建设山打根定居点的事不是闹着玩，如果他得到允许返回香港，他会继续去做它。日后这位作家会不会揽到什么靠山是谁也说不准的。不论如何，在婆罗洲，他既逍遥于西班牙帝国之外，又离帝国很近。其次，如果允许这位青年作家自由出入马尼拉，他的名声激起的民众热情会在被殖民者当中制造不满，或许黎萨尔还会被他人在殖民地和（或者）教界的敌人暗杀。不论哪一件事发生，从德斯普赫尔的角度看都会是政治灾难。形势的逻辑不言自明：让这

1 引自 Guerrero, *The First Filipino*, p. 337。雷塔纳是个怪人。19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他热情地赞美修会，赞美殖民统治的好处，赞美西班牙性（hispanidad）——同时他也刻薄地攻击黎萨尔和他的同志们。但1896年处决黎萨尔的野蛮行径，以及1898年西班牙帝国的倒塌，使他的思想发生了奇怪的大转弯。他成了黎萨尔的忠实支持者，称他是西班牙文化中最精华的东西的典范。雷塔纳长期住在菲律宾，是教会的支持者，所以对于了解修会士们的阴谋，他有得天独厚的条件。但早在八年以前，完全相同的故事就在伊萨贝洛的 *Sansacional memoria* 中发生过（pp. 64-5）。

家伙待在菲律宾，但不要让他产生害处；也要优待他，不让他成为殉难者（尤其是在大都会的报界）。此外，总督虽然身为传统的天主教徒，但也是位老派绅士，而在19世纪西班牙的特殊语境下，绅士这个词也有些自由主义者的意味。¹实际上，他私底下很有可能颇为喜欢魅力翩翩的黎萨尔。

黎萨尔流放的目的地以及这目的地是如何选定的，颇能证实这一假设。达皮丹是耶稣会传教的前哨，流放黎萨尔到此地的决定也是一个仅有德斯普赫尔和加泰罗尼亚人耶稣会士、出身外省的帕布洛·帕斯特尔斯（Pablo Pastells）两人知道的秘密。开明专制君主卡洛斯三世将耶稣会士驱逐出境的时候，当地的教区、财产和圣俸迅速被他们的对头（尤其是道明会士和奥古斯丁会士）攫取。1859年，也就是黎萨尔出生前不久，当局允许耶稣会士返回此地，但他们必须接受其他神职同志的盘剥，而且他们的活动仅限于在遥远的南部（苏禄和棉兰老岛）殖民地和穆斯林地区之间不确定的边缘地带传教。他们试图在马尼拉建立自己的精英中学（我们常常提到的雅典耀）时，之所以能够战胜来自道明会的恶意反对，还得靠马尼拉的世俗市长。如果说，耶稣会士在19世纪的欧洲常被视为教会狡猾、精明的思想先锋，那么，在没有什么重大财产利益需要保护的菲律宾殖民地，他们更显

140

1 安贝斯·奥坎波推测，黎萨尔之所以受到不同寻常的礼貌对待，也许是因为共济会的兄弟情谊。德斯普赫尔所属的后伊莎贝尔一代当中，有许多西班牙高级将领是共济会士。

得像是自由主义者。1892年，仍然还有老师在雅典耀执教，其中就有帕斯特尔斯。他们喜欢以前那位成为作家的学生，认为《不许犯我》主要嘲讽了道明会和方济各会，十分高兴看他们的敌人出丑。至于这位外省人本人，他与德斯普赫尔携手似乎还有另外一个动机：他有自信让被与世隔绝的黎萨尔在耶稣会的劝说下改邪归正。这是多么值得向其他修会炫耀的事！¹ 对于绅士而富有权谋的德斯普赫尔而言，让耶稣会和道明会相互制衡，又是一件多么愉快的事！²

马蒂的起义

也正是在这个节骨眼上，马蒂在世界的另一边组建了
他的革命流亡政党，开始全面准备发动一场终极革命。临近
1894年末，他认为时机已到，决定于1895年2月引燃战火。
141 在之前的20年里，古巴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切

1 在上述分析中，我的解释有一部分来自格雷罗和科茨的讨论。参见 Guerrero, *The First Filipino*, pp. 333-5; Coates, *Rizal*, pp. 236-7 (可惜没有注明史料来源)。在达皮丹度过的几年里，黎萨尔与帕斯特尔斯进行了漫长的神学—政治通信，已经出版。这对于后世是件幸事。见 Raul K. Bonoan, SJ, ed., *The Rizal-Pastells Correspondence* (Quezon City: Ateneo de Manila Press, 1994)。不用说，黎萨尔的文字虽然极其礼貌，但对土得可笑的帕斯特尔斯，黎萨尔轻而易举就占了上风。帕斯特尔斯在黎萨尔被“依法谋杀”后，在他家乡巴塞罗纳出版了愤怒的 *La masonización de Filipinas: Rizal y su obra*。

2 19世纪的菲律宾统治者当中，这是唯一一个真正算得上聪明、好意、有谋略的决定。



何塞·马蒂

似乎都有利于他的目的。（从1872年甲米地起义到1896年博尼法乔起义这段时间的菲律宾与此完全没有可比性。）十年战争是这一转变的首要原因。正如我们注意到的，这场战争的最终结果并非马德里取得毁灭性的胜利，而是双方都做出了政治上的妥协。多年来，塞斯佩德斯（他在宣告共和国成立的那天解放了自己的奴隶）基本掌控着支离破碎的古巴东部农村，那里的奴隶相对较少，经济比其他地方都更加依赖牲畜饲养。但他未能向古巴西部发动决定性的猛攻，而殖



传奇的安东尼奥·马塞奥，古巴独立军次长，19世纪杰出的游击战指挥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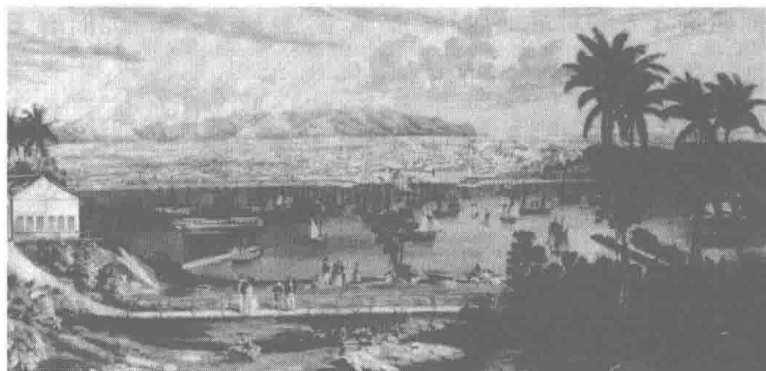
民地的首府正是在西部，富裕的甘蔗种植园居于支配地位，巨大的奴隶人口被种植园主控制着——历史学家们不带丝毫讽刺地称这些种植园主为“殖民地贵族”。战争期间，在马德里的暗中支持下，殖民地政权不断剥削浑身是血、奄奄一息的海地，动员争取岛上半岛人和克里奥人精英的支持：实际上，如果叛乱成功，“白人”会被赶尽杀绝，而建立在“圣多明戈的废墟”之上的这座岛上的繁荣，也会消失得无影无踪。塞斯佩德斯最成功的几位游击指挥官当中就有好几位黑人，比如传奇人物安东尼奥·马塞奥（Antonio Maceo）。

而西班牙人则对此加以利用，不仅要巩固西部对他们的支持，还要以此离间叛变的东部。

虽说如此，到了19世纪80年代，马德里还是认识到，奴隶制的时代已经过去。格兰特和谢尔曼击败了南方的联盟国，废奴主义还在英国、法国和荷兰相继取得成功。这意味着1878年的时候，巴西和古巴是仅存的、正儿八经的奴隶制国家。¹ 因此，《桑洪协议》之后，叛军放下武器换取赦免与改革的同时，马德里也迅速、圆滑地让古巴奴隶制和平地寿终正寝。不过，和平的结局利弊参半，因为它证明了海地的幽灵不过是个怪物。此外，马德里的迪斯雷利和格拉德斯通都认识到政治改革已不可避免，必须采取切实的措施恢复经济。漫长的战争让东部变成了一片废墟，而19世纪80年代的西部，则在世界大萧条和欧美的竞争之下蹒跚而行。政治改革第一次允许古巴人组建政党，也给了出版以相对的自由；行政上的改革和理性化也有建树。但是，令大厦将倾的帝国失望的是，这些都没能巩固民众对它的支持。另外，大都会农业集团的开办很大程度上终结了低效率的种植园统治，而鼓励西班牙人大规模移民古巴带来了完全没有预见到的后果。1882—1894年间（只有1888年数据暂

143

1 也许我们会以为波多黎各也和巴西还有古巴一样。但在伊莎贝拉下台、塞斯佩德斯的起义爆发之时，这个岛上只有41738名奴隶，不过是总人口的7%。（古巴的奴隶则是这里的10倍之多。）因此早在1873年波多黎各就废除了奴隶制。当然，奴隶主们得到了补偿，而奴隶没有。参见Ojeda, *El desterrado*, pp. 123 and 227.



古巴的圣地亚哥，1856年

缺)，至少 22.4 万名半岛人移民古巴，而当时古巴的人口不足两百万。这二十几万人中，只有 14 万回到了西班牙。¹ 阿达·费雷尔（Ada Ferrer）注意到，根据 1887 年的人口普查，标签为“白人”的群体中，只有 35% 的人能够读写，而“有色人”中这一比例是 12%。（只有在哈瓦那，两个群体的识字率显著较高）。² 古巴当时有三分之二的“白人”是文盲，足以证明新移民大多是大都会农民和无产者出身，尤以加泰罗尼亚人居多。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就这样到了古巴。令人印象深刻的古巴无政府主义的创立者是加泰罗尼亚移民恩里克·罗伊格。我们在第三章曾提过此人。他是这波贫困（有时还很激进）的移民当中的关键人物，在 1889 年英年早

1 Thomas, *Cuba*, p. 276.

2 参见她犀利的著作 *Insurgent Cuba: Race, Nation and Revolution, 1868–1898*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99), p. 116.

逝之前，他一直都是马蒂的强烈支持者。¹

这种人口上的转变，加之奴隶制没有预兆地逐渐终结，使得马蒂得以用一种民族主义的风格实施革命，这种风格超越了（或表面上超越了）种族的话语。也就是说，白人和黑人古巴男性会平等地相互拥抱，并肩作战反对帝国统治（这既是隐喻，也是战场上的情况）。²“海地”的阴影逐渐消失，糖业“贵族”也崩溃了。马德里的狂热支持者因此越来越少。于是，1888年之后，在几乎所有部门，黎萨尔式的普遍民族主义得到了迅速传播。³这些变化反过来又使得1895年的革命者们成功摒弃了东西之分。黑白混血的英雄人物、十年战争中的指挥官马塞奥最终能够从东往西穿越整个古巴岛，每到一处都能赢得崇敬与支持。

144

4月，战斗打得热火朝天。马蒂、马塞奥还有1868—1878年的五星级英雄人物马克西莫·戈麦斯都溜入了岛上。3月时候的马德里，自由派首相萨加斯塔刚刚郑重其事地向参议院宣布，西班牙准备好即使“用尽最后一块钱，流尽她的儿子们最后一滴血”，也要镇压叛乱。但还没等得及他去

1 托马斯在他近1700页的巨著中用了一段的篇幅（第291页）讲罗伊格这个人。费雷尔则压根儿没有提到他。

2 费雷尔的书很吸引人，基本上算是19世纪古巴种族/民族问题方面令人信服的研究。他没有回避当时涉及的种族主义和机会主义（通常是无意识的）。但整个主题没能入托马斯的法眼。

3 民众对殖民地政权的敌视日益公开，也促使剩余的种植园主认为，长远来看马德里是靠不住的。他们开始思考之后不论发生什么，他们如何能够保持影响力——也许还要借助美国的支援。

145 指挥战争，他的政府就在不到八周之后垮台了。¹ 卡诺瓦斯第六次也是最后一次重掌政权，迅速说服了干练的政治大将阿塞尼奥·马丁内斯·坎波斯（也就是十年战争协商解决的设计师）返回古巴担任总督和总指挥官。我们也许还记得，1893年9月24日，时任巴塞罗那总督的他成了保利诺·帕亚斯的无政府主义炸弹袭击的目标。毫发未损的他随后被派往西属摩洛哥镇压叛乱。他是唯一一个拥有足够经验与声望的人物，可以停息帝国内部的军事—政治争端。八个月后，他前往古巴。

早在1895年6月，纵然马蒂在5月份的一次军事行动中丧生，新任总督仍然不带幻想地描述了新的现实。他这样给卡诺瓦斯写信道：

岛上只有少数西班牙人还自称是西班牙人……其他人……都憎恨西班牙……作为一个文明国家的代表，我不能做不妥协的带头人。我必须等他们出手。我们可以将农村的家庭集中到城市，但驱赶他们要花费很大的功夫，因为在内陆地区愿意为西班牙服役的人已经非常之少了……贫困和饥饿

1 Fernández, *La sangre de Santa Águeda*, p. 125, 引用 Carlos Serrano, *Final del imperio. España 1895-1898* (Madrid: Siglo Veintiuno de España, Edit. SA, 1984), p. 19. 费尔南德斯借此机会指出，这句著名的话常被错误地当作卡诺瓦斯所言。自由主义者认知障碍的一例。

会肆虐。然后我就要搞配给，上次战争的时候，这个数目达到了四万一天。这样做虽然可以将农村和城市隔绝，但不能防住间谍，因为刺探情报的往往是妇女、儿童。也许我们会采取这个措施，但这只是最后的办法，而且我认为自己没有实施这种政策所必需的性格。目前各位将军当中，只有韦勒有必要的胆识下此狠手，因为只有他兼具战争所必备的智谋、勇气与知识。请三思，我亲爱的朋友。如果这番讨论之后，你赞同我方才所描述的政策，请速速召我回国。我们在拿西班牙的命运做赌注；但我保有自己的某些信念，这些信念高于一切。它们禁止我草率地杀戮，或者做类似的行为……即使我们战胜并镇压了叛军，也无济于事。我忠实而恳切地认为，由于这个国度既不希望赦免敌人，也不希望将他们杀绝，所以不论有无改革，不出十二年战事还会再起。¹

老练的总督放长了眼光，认识到帝国已经大势已去（而且他迫切地想要抽身）。面对强大的民族主义浪潮，改革注定无济于事；军事胜利会造成民不聊生的惨景，也无法保证12年内不会再次发生战争。卡诺瓦斯很有可能明白他的意思，

146

1 引自 Thomas, *Cuba*, pp. 320-21。着重为我所加。

但他也深信，古巴独立不仅会让他失势，也定然会摧毁他和萨加斯塔在此前30年辛苦建立起来的权贵民主制（cacique democracy）。古巴独立还会让西班牙沦为欧洲小国，对西班牙的民族尊严和自信造成毁灭性打击。因此，他授予韦勒全权，派他去哈瓦那赴任。¹韦勒将军于1896年2月10日抵达古巴，将在此度过接下来的18个月。卡诺瓦斯信守承诺。为了支持韦勒，他保证不久就派遣一支大约20万人的西班牙军队前往古巴，这也是当时穿越大西洋的最大一支军事力量。²

韦勒完全没有辜负卡诺瓦斯的期望。用他那普鲁士般的铁腕，在1896年扭转了战争势头。12月，马塞奥还有马克西莫·戈麦斯的儿子“潘乔”战死，这位父亲则基本处于逃窜状态。但胜利的成本是巨大的。休·托马斯整体上对卡诺瓦斯和韦勒抱有同情（主要是出于对假想的美国人在战争前、战争期间和战争后的目的的蔑视），他评价道：“整个岛变成了一个巨大的集中营。”1895—1899年间，古巴的人口从180万降至150万。死去的大多是营养不良和因此患上寄生虫病的儿童。托马斯称，1899年，在全世界有人口普查的地方，古巴的五岁以下儿童所占人口比重是最小的；在19世纪，

1 韦勒是1893年11月29日起担任加泰罗尼亚总督的，比处决保利诺·帕亚斯一事恰好晚了两个月。但他在任内监决了圣地亚哥·萨尔瓦多。

2 Thomas, *Cuba*, p. 349. 1898年6月西班牙方面（向美国人）投降的时候，战争耗费了西班牙15亿比塞塔，造成了4万多人伤亡（大多死于黄热病和其他疾病，第414页）。



古巴军事总督，“屠夫”巴莱里亚诺·韦勒

丧失了六分之一人口的除了古巴，再无别的国家。¹ 经济凋敝的众多原因当中，戈麦斯对付大种植园主的焦土政策起了重要作用。² 但更深层面的问题在于，不论是卡诺瓦斯还是

147

1 *Ibid.*, pp. 308 and 423. 托马斯在比较后提出的结论并不确切。至少有一个例子可以说明。1865年，巴拉圭在与巴西、阿根廷和乌拉圭宣战前夕，人口有1337439人，以瓜拉尼人为主。五年后战争结束，人口锐减至28746名成年男性、106254名15岁以上女性，以及86079名儿童。加起来一共是221079人，相当于损失了115320人，也就是83%的人口。巴拉圭的三个敌国也损失了百万人口。参见 Byron Farwell, ed., *Encyclopedia of Nineteenth Century Land Warfare* (New York: Norton, 2001)。

2 Ojeda, *El desterrado*, p. 340 引用了古巴军队统帅（是位道明会士）为此所做的辩解：“当我把手放到劳动人民痛苦的心头，感受到悲痛带给它的伤痕；当我在满是财富的周围触碰到如此的悲惨、如此的贫困；当我看到租户房子里的这番景象，看到他所忍受的殴打，看他与衣衫褴褛的妻子儿女寄人篱下，（转下页）

韦勒，在军事手段之外，都没有可行的政治解决办法。我们会看到，有一位周游各地、不过十来岁的意大利小伙子将解开这个僵局。

黎萨尔去古巴？

黎萨尔意识到，他在这狭小的达皮丹岛上的流放生涯，很有可能会持续很久，所以一到岛上就马上安顿了下来。148 他给自己盖了一栋简陋的茅草房，房子位于今天仍然十分美丽、静谧的海湾沙滩上；随后，他开了家诊所，为当地孩子办了所小学校。他热衷于农学和植物学，亲朋好友能够寄到岛上的书，他全都读了。当然，他的通信受审查，现存的信件文笔平静，但小心翼翼。他可以在定居点自由活动，守卫官也待他彬彬有礼。1893年夏，新任总督拉蒙·布兰科抵达马尼拉，接替了日益不受马尼拉的半岛人社团以及修会欢迎的德斯普赫尔。虽说布兰科是参与过卡洛斯战争和十年战争的老兵，他却是以灵活善变闻名。在此期间，黎萨尔的好几位友人策划了营救他的活动，但都以失败告终：他们计划租一艘船，解救他，带他到香港，另外一些友人则试图让萨加

（接上页）住在如此凄惨的茅舍里；当我问他们学校，却被告知根本没有学校以后……我怒不可遏，对这个国家的上层阶级的仇恨油然而生。看到这种全然的惨状和痛苦的不公，我顿时狂怒地喊道：‘上帝保佑火炬。’” 引用出自 Juan Bosch, *El Napoleón de las guerrillas* (Santo Domingo: Editorial Alfa y Omega, 1982), p. 13.

斯塔总理宽恕他，让他在西班牙议会竞选议席。1894年11月，布兰科指挥了与棉兰老岛中北部穆斯林地区马拉瑙的一场小型战斗。取胜返回马尼拉途中他顺路造访了达皮丹。据说他首先建议黎萨尔返回西班牙（黎萨尔拒绝了这个想法），随后提出可以让他搬回吕宋，到最北部的一个伊洛卡诺省份。但会面最终没有任何结果。¹

不过，到了1895年，古巴的起义正改变着菲律宾的整个政治语境。布卢门特里特所说的“前提条件”开始酝酿成熟。黎萨尔有一位比他年长的朋友，名叫雷希多尔（Regidor）。此人在伦敦为在西班牙经商、投资的英国商人做法律咨询师，积累了大笔财富。他与马德里的不少要员是朋友，从他们那里他得知，古巴黄热病肆虐，急缺军医。他因此游说布卢门特里特和巴萨，让他们说服黎萨尔去做志愿医生。最终，在几经犹豫之后，黎萨尔同意了。11月，他写信给布兰科，请求他允许自己去古巴为伤病员提供医疗服务。此时哈瓦那还是马丁内斯·坎波斯掌权。巴萨认为，此举会被看作黎萨尔忠诚于帝国的证据。但不管怎么说，主要的问题是如何逃出菲律宾。前往哈瓦那需要途径西班牙；从旁观者角度看，只要到了西班牙，黎萨尔就可以在有影响力的朋友以及政治盟友的保护下安全定居下来。小说家本人的动机就不那么清楚了。他对维护荣誉十分敏感，向布兰科撒

1 Guerrero, *The First Filipino*, p. 342.

谎的行为肯定为他所不齿——因为在此之前布兰科毕竟还给了他体面地去西班牙的机会。他很久以前就确信，在大都会干不成什么大事。1895年11月他正对古巴的事十分关注，因此这次行程对他来说正是机会。

149 但出于什么理由呢？这里我们只能靠推测了。他知道马丁内斯·坎波斯即是靠无血手段终结了十年战争的《桑洪和约》的设计师。而且他本人又是医生，认为救死扶伤就是天职，而不论伤者属于哪一边。他也曾在西班牙结识了几位值得尊敬的古巴人，尤其是废奴主义者、克里奥人拉斐尔·拉夫拉。对于到19世纪80年代末为止的古巴“最新”政治史，他也大致熟悉。也许他急切地想知道，可以从菲律宾姐妹殖民地的经验当中学到点什么。无论如何，他在棉兰老岛与世隔绝的生活，很有可能使得他无法得知这个加勒比海岛在韦勒“大人”的统治下，正发生着什么样的事情。

结果，布兰科迅速将黎萨尔的信盖上私人的许可章，寄到马德里。但帝国首都那边几个月没有回音。而与此同时，在古巴，韦勒和韦勒主义接替了马丁内斯·坎波斯。

新的形势

1892年7月黎萨尔被放逐之后，新生的菲律宾协会也即刻瓦解。但不久之后，协会圈里一小撮活动家决定在马尼拉开一次秘密会议，以一个秘密的革命组织取代了菲律宾协

会，他们管它叫 Kataastaasan, Kagalangalang Katipunan ng mga Anak ng Bayan（也许可以翻译成至高至尊人民子女协会）。协会的头领是安德雷斯·博尼法乔，当时 29 岁，小黎萨尔两岁。1895 年末之前，卡提普南一直都没什么起色，成员也不到 300 人。¹但当年的国际新形势促使它开始了富有活力的扩张，到了 1896 年 8 月，据有些活跃分子称，协会成员数已经达到了一万人。²

最可以体现卡提普南这个地下组织所面对的形势的，是这样 150 一个历史环境：1895 年 4 月 11 日马蒂登陆古巴，而就在六天前，甲午战争以日本大胜告终，东京与北京签署了《马关条约》。就古巴而言，事情不仅是马蒂的惊人之举以及马塞奥和戈麦斯在早期打了精彩的胜仗那么简单。博尼法乔和他的同志们很敏锐地觉察到，如果在世界两端都爆发反殖民主义起义，西班牙将面临巨大的困境。他们也明白，在这

1 事实上，1893 年 4 月菲律宾协会在原址恢复。用伊萨贝洛的话讲，负责特罗索地区分会的博尼法乔“看到协会中的上层同志们无休止的讨论使协会正在丧失自己的活力；他认为这些人的作风算不上真正的爱国主义，而更该算作孩子气的自我主义。所以他抛弃了他们，将他所主持的公议会提升为卡提普南的最高议会。”* De los Reyes, *Sensacional memoria*, p. 87. 那些上层同志们慌张不已，宣布博尼法乔为叛徒，并试图解散特罗索分会。但博尼法乔拒绝服从。这导致菲律宾协会于 10 月自行解散，而在此前，协会的一些内部文件流到了总督手中。从这件事我们可以明白地看到，博尼法乔尽可能地利用他所鄙夷的菲律宾协会作为掩护，来巩固卡提普南的地下工作。

2 简要的叙述，参见 Teodoro A. Agoncillo, *A Short History of the Philippines* (New York: Mentor, 1969), pp. 77-81。“一万”这个数目很有可能是夸张了，但也许不算太过，因为一场主要以大砍刀为装备的起义运动在最初取得了惊人的成功。

等形势下，马德里会集中军力投入能赚钱的古巴，而不会管通常让它亏本的菲律宾。另外，南端距离吕宋北部海岸不足250英里的台湾，现在成了日本的领地，既然古巴可以找到附近美国的支持，菲律宾人难道就不可能从这日出帝国取得支援吗？

事实上，这两个“邻居”的地缘政治处境非常不同。当时的美国是西半球独一无二的霸权，而东亚是各个野心勃勃、相互竞争的“白人”帝国的竞技场——英国、法国、德国、俄国和美国。《马关条约》签订没多久，就马上遭到了德国、法国和俄国的干预，迫使日本政府将刚刚取得的辽东半岛归还清政府。此外，日本还背负着之前30年列强加给它的的不平等条约，使得它的竞争对手在日本本土仍拥有较多的治外法权。英国与日本在甲午战争爆发前夕曾签署过一项协议，确实有望废除不平等条约，但条约生效期是1899年。不过，既然伦敦开了头，其他帝国首府也必然会跟进。因此，19世纪90年代末（还）不是日本鲁莽地进行海外冒险的时机。

尽管东京和马尼拉官方的关系大体正常，但西班牙当局日益对未来感到担忧。¹ 日本船只蜂拥进入菲律宾海域，贸

1 在接下去有关日本的小节里，我大量参考了约瑟法·M.撒尼尔（Joséfa M. Saniel）的开创性著作 *Japan and the Philippines, 1868-1898* (third edition) (Manila: De La Salle University Press, 1998)，这本书详尽研究了日语、西班牙语和英语史料。

易差额完全倒向日本一边。¹日本人开始向菲律宾移民，东京方面向殖民地施加高压，要求放松移民法律。日本精英对菲律宾的了解越发深入，而西班牙的外交部门却因为没有能够阅读或讲日语，不得不在日本的政策和意图问题上依靠英国人和美国人。19世纪90年代初，反对派议员、报纸、军国主义者、商业利益团体和理论家们要求日本在太平洋和东南亚扩张的游说活动声势渐涨（部分程度上是为了阻挠德国和美国的扩张）。西班牙殖民主义在菲律宾的软弱和衰老正越发广泛地为众人所知。²相互之间有似断非断的联系。冒险家、平民和军人正在进出这块殖民地。

在西班牙本土，东京对中国所取得的军事胜利使日本威胁论（*espantajo Japonés*）成了公众关注的焦点。³1895年2月，萨加斯塔的前海外领土大臣莫莱特写道，日本崛起为一等强国“意味着欧洲与东方的关系会发生一场剧烈的转变，那些地方的西班牙领地会受到尤其大的影响。拒绝接受这个事实，坐以待毙，无异于睡在铁轨上却自信满满地以

1 1890—1898年间，马尼拉对日本的贸易逆差增加了60倍。*Ibid.*，附录IX，p. 101.

2 明治时期的大作家、政治评论家福本诚于1889年和1891年两度深入游历菲律宾。第二次旅行后他写了一系列文章，描述了西班牙殖民地军队的脆弱：几个西班牙人士官吃力地统率着土人组成的部队。具体而言，他指出，1890年韦勒第二次出兵征讨加罗林群岛叛军的时候，马尼拉驻军是倾巢而出。*Ibid.*，p. 68.

3 这个“日本的幽灵”收录于L. González Liqueste所编*Repertorio histórico, biográfico y bibliográfico*（Manila: Impr. Del Día Filipino, 1930）中题为“日本威胁与1896年革命”（*El espantajo Japonés y la revolución de 1896*）的部分。撒尼尔于《日本与菲律宾》（*Japan and Philipppnies*）一书第186页也有引用。

为，即将开来的火车引起的轨道震动会向他发出警报。”¹不久，激进共和派报纸《正义》(*La Justicia*) 讽刺地评论道：“未来真是美好；同时在古巴和菲律宾作战……复辟政府 [即卡诺瓦斯政府] 很有可能会在西班牙民族的废墟上写下墓志铭——西班牙的终结 (*Finis Hispanae*)。”²

在这样的情况下，菲律宾民族主义者开始与日本人建立有益的联系也就不奇怪了。第一个这样做的人是何塞·拉莫斯。他出身富裕家庭，富裕到有财力供他在伦敦念书。1895年夏，他预先得知殖民地当局会因传播民族主义而逮捕他，于是逃离菲律宾，装成英国人搭乘了一辆前往横滨的英国轮船。在那儿他娶了日本妻子，用了她的姓氏（石川），并最终入籍成了明治天皇的子民。他把大部分时间都用在了购买朝鲜战争多出来的枪支上，然后将其送往菲律宾。不过他的这番尝试只是白费功夫。³ 其他富裕的菲律宾人也以旅游或留学深造为借口前往日本。

随后，在1896年5月4日，日本海军训练船今后号载着33名士官生和20名在日本一家海军学校学习的学生，驶入了马尼拉港。马尼拉当局迅速地以可能违反检疫法规为理

1 SanieI, *Japan and Philippines*, 引用 Moret 的 “El Japón y Las Islas Filipinas”, 最初发表于 *La España Moderna*, LXXIV (1895年2月)。

2 *Ibid.* 请注意, “菲律宾战争”指的是日本与西班牙之间的战争, 而不是镇压菲律宾人起义。

3 *Ibid.*, pp. 180–182.

由将其隔离。¹虽然现有的日本、西班牙和菲律宾方面的记录在细节上各不相同，但三方都同意，卡提普南的领导人博尼法乔、皮奥·巴伦苏埃拉（Pio Valenzuela）博士、年轻的煽动者埃米利奥·贾辛托和丹尼尔·提罗那（Daniel Tirona）与今后号的船长有私人接触，并给了他一封请愿书，请求日本方面的援助，带领他们“发起反政府起义”。陪同他们的是在殖民地居住多年、娶了菲律宾妻子的何塞·田川森太郎。是田川告诉他们今后号将抵达马尼拉，并为他们充当了翻译。这起事件没有带来什么重大的影响，只是殖民地警察变得更加警觉了。²世良田船长在向上级汇报时没有提到这次会面。

离开达皮丹

这就是5月晚些时候卡提普南首脑会面的直接背景。会上首脑们决定，武装起义是可行的，他们将派代表团前往日本寻求实质性支援，还有一位密使会前往达皮丹去取得黎萨尔的支持。（这位小说家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成了卡提普南的

153

1 本文之后对今后事件的叙述出自西尼尔仔细而审慎的重构。*Ibid.*, pp. 192-194.

2 田川原是长崎出身的木匠，是最早在菲律宾定居的日本人之一，于19世纪70年代初期移民。最终他成了还算成功的商人。1895年7月，博尼法乔似乎曾请他组建一家贸易公司，出口大麻、糖、烟草和其他产品，而收益会用于在日本购买村田来复枪。卡提普南提出只要田川愿意去日本组织采购，他们会支付一切费用。但这个计划似乎无疾而终。*Ibid.*, pp. 249-250.

荣誉主席；卡提普南的演讲通常会以呼喊“菲律宾万岁！自由万岁！黎萨尔博士万岁！”而结束。）5月末，他们当中唯一的文化人皮奥·巴伦苏埃拉博士以带一位失明仆人去治疗为理由乘船抵达棉兰老岛。有必要注意的是，黎萨尔并不认识巴伦苏埃拉，也没听过他的名字，所以他的心头肯定曾有这位博士可能是政府密探的念头掠过。两人之间简短的对话讨论了什么我们难以确定。当审问官后来向他询问细节时，黎萨尔被记录在案的回答是这样的：

唐·皮奥博士说会有一场起义，他们担心[他]在达皮丹会遭到不测。[他]断言，冒险的时机还未成熟，因为菲律宾[社会]各个成分还没有统一起来，他们也没有武器、船只、教育以及其他任何组织抵抗运动的条件。他们应当以古巴为鉴，古巴人虽然有充足的资源、有大势力在背后支持，而且作战经验丰富，却也未能够实现他们的渴望。因此，不论斗争结果如何，西班牙在与菲律宾人妥协的时候会占有优势。出于这个原因，[他]认为他们应当等待。^{1*}

这是军事法庭速记员矫揉造作之笔，但黎萨尔还向审判

1 De la Costa, ed., *The Trial*, p. 9.

法庭提供了一份简短的“辩护补充”，用一如既往的优雅文字，他写道：

从皮奥·巴伦苏埃拉先生处得知有人在策划起义后，我建议他们打消这个念头，尝试用理性的论点说服他。皮奥·巴伦苏埃拉先生离开时似乎已经被我说服，因为后来他没有参加起义，而是向当局自首，请求宽恕。^{*}

154

之后那句话意义含糊，增加了理解的难度：

皮奥·巴伦苏埃拉先生过来提醒我要小心，因为——据他所说——他们可能会把我也牵连进去 [“他们”应该是指西班牙人而不是卡提普南]。^{1*}

这里的证言可信度颇高。看到黎萨尔对博士的消极建议，读者不难回想起布卢门特里特反对革命冒险的有理有据的警告。关于古巴正在发生的事情，他究竟知道多少我们并不清楚，但目前岛上斗争所处的困境，正好被他用于修辞来增强那条建议。不过显而易见的是，巴伦苏埃拉在造访黎萨尔时小心翼翼，表现得就像是在就起义时机是否合宜向黎萨

1 *Ibid.*, pp. 67 and 68.

尔寻求建议，而不是直接寻求他的支持。不论他是否真的被我们这位小说家的道理说通，他似乎接受了黎萨尔所说的道理。当然他这样做也有可能只是因为他担心黎萨尔会向其他拜访者、黎萨尔的家人甚至达皮丹政府透露消息。¹巴伦苏埃拉回到马尼拉后是怎么和同志们说的，我们也无从得知：他有没有明确向他们汇报，黎萨尔的意见是时机未到，仍需等待？或者说，他仅仅告诉他们，黎萨尔直截地拒绝支持博尼法乔的计划？后者也许更有可能，因为据说博尼法乔起初听到这个消息还是半信半疑，但旋即面色铁青，称黎萨尔是懦夫。但黎萨尔的声望实在太高，所以两人决定不把他“拒绝”的消息告诉卡提普南的同志们。²

随后，发生了一件出乎意料的事。7月1日，布兰科收到了一封军事大臣阿斯卡拉哈（Azcárraga）的来信，信中说，既然韦勒没有反对让黎萨尔来古巴行医，他就应当得到许可启程前来。总督的官方信件送到达皮丹的黎萨尔手中是30日。次日，黎萨尔乘坐为他带来布兰科信件的那艘
155 船前往马尼拉。决定如此之快，也许看上去有些唐突，但理由很简单：他期望尽早逃离耶稣会士定居点的无聊与隔绝——或者还有布兰科在信中的催促。在审判中，黎萨尔解

1 巴伦苏埃拉是卡提普南成员当中，供词被用于为黎萨尔定罪的一人。革命爆发时，他躲了起来；在布兰科承诺赦免投降叛军的时候，他又是第一个自首。他把所有自己知道的都告诉了审问官，牵连到了许多同志。多年后他所出版的回忆录，因其不可靠以及自私自利而为人所不齿。

2 Guerrero, *The First Filipino*, pp. 381-3.

释道，他之所以如此坚决地前往古巴，是纯粹出于私人理由，即与一位传教士神父不和。¹这说的无疑就是那位神父拒绝主持黎萨尔和约瑟芬·布拉肯的婚礼，除非黎萨尔宣布撤回自己所有的异端主张。但真正的理由，应该还是他担心被卷入卡提普南起义当中，他确信这场起义会是血淋淋的教训。不过，在这个节骨眼上，他的运气用完了。²

6月7日，也就是仅仅七周以前，巴塞罗那一年一度的基督圣体日庆典上，有人投掷了一颗巨型炸弹。六人当场死亡，另有42人伤势过重，在医院不治身亡。次日，巴塞罗那宣布戒严（当时的主管正是德斯普赫尔将军）。戒严令将会持续一年之久。这颗炸弹格外恐怖的地方在于它似乎并不针对显赫的政治或宗教人物，受害者都是普通民众。³在教会、各种右翼团体以及他们的报纸歇斯底里、明里暗里的鼓动下，警察展开了疯狂的行动，逮捕了大约300人——各种派别的无政府主义者、反教权论者、激进共和主义者、进步主义知识分子和记者等。他们大多被关押在阴森的蒙胡伊

1 De la Costa, ed., *The Trial*, p. 68.

2 可惜，马塞洛·德尔·皮拉尔也是。6月4日，他因为贫困和疾病在巴塞罗那逝世，年纪才刚过46岁。尽管他与黎萨尔有分歧，但菲律宾人通常也将他视为革命年代的主要英雄。

3 警方的情报声称袭击者的目标是主持庆典的教界和军事要员；不成，所以改向后排群众投掷炸弹。拉蒙·森保在 *Los victimarios* 第282页上，给出了这个理论为何非常值得怀疑的若干理由。后面我们会看到，森保本人后来也曾试图暗杀，目标是蒙胡伊克刑讯官老大，但没能得手。

156 克要塞，它很快就将因为地牢里的刑讯而在欧洲臭名昭著。¹首要（也是最终的）嫌疑人是一位 26 岁的法国人。此人名叫托马斯·阿谢里，生于马赛，以前是神学院学生，做过水手，从法国军队脱逃，后来又做了法国警方的线人。他又称自己的真实身份是无政府主义间谍，他的任务是向警方提供虚假消息，就警方的突袭向同志们发出预警。²在受到一番痛苦的刑讯之后，他在军事法庭接受审判。他及其他四位几乎可以确定是无辜的西班牙人于次年 5 月 5 日被处决。

古巴早已在实施戒严，现在轮到巴塞罗那——菲律宾群岛不久也会跟进。现在，国内的镇压（在欧洲是最为严酷的）以及国内民众对韦勒哈瓦那政策残酷性的日益了解使西班牙政治出现两极化。卡诺瓦斯既受到拥戴，也遭到憎恨，而他许多政敌对蒙胡伊克的怒火，很快就转变为对古巴更为坚定的同情。

1 这个奇特的名字从何而来尚存争议。更为可能的解释是，它是从拉丁语朱庇特山（Mons Jovis）转变而来。要塞处在一个陡峭高耸的悬崖上，俯瞰山下的城市，是罗马人向众神之首献祭的适宜之地。最终有 87 名囚犯受审——第一场审判在 12 月 15 日（我们不久会讲到，12 月 26 日是黎萨尔本人在军事法庭受审的日子）。其余大部分人都被草草送往西属非洲。向来谨慎、仔细的埃森魏因以及其他一些学者都认为真正的策划者是一个叫作让·吉罗的法国人，而他已经逃往阿根廷。参见 Esenwein, *Anarchist Ideology*, p. 192；以及 Núñez, *El terrorismo*, pp. 96-7, 161-4。

2 阿谢里的国籍成了当局的撒手锏。它让西班牙公众想起了拉瓦肖、瓦扬和埃米尔·亨利，并把愤怒一直推送过了比利牛斯山脉。此外，对于一位贫穷的外国人来说，他在西班牙能指望得到的政治援助少之又少。

最后的旅程

1896年7月31日，黎萨尔乘船前往马尼拉，指望赶上通常每月一趟的邮轮前往西班牙。但他的船碰上了麻烦，待他8月6日抵达菲律宾首都的时候，邮轮已经开走了。行程不得不推迟到下一趟邮轮，预定是9月3日发。他没有登上陆地，而是舒服地居住在甲米地船坞的泊船上，并要求不要让近亲以外的其他人打扰。他的想法是，如果在他还在马尼拉时卡提普南就起事的话，自己一定不能被牵扯进去。我们没有办法确证他对于马尼拉的事态有多少了解，更不用说古巴、马德里和巴塞罗那了。但很有可能的是，他并不明白一个对博尼法乔而言十分明了的事实——20万西班牙军队陷在古巴，所以马德里没有能力再向菲律宾派遣一支具有压倒性力量的军队。布卢门特里特构想的那个解放斗争的成功时刻，现在似乎浮现在了叛变者的视野当中。

1895年末起，布兰科总督的密探们就一直向他报告，有一股地下的、革命的卡提普南，他们的活动正日益猖獗。由于手头兵力不多，加之担心会使马尼拉的西班牙人社群发生恐慌，他下令密切监视可疑人员，悄悄对可疑地点展开搜查。1896年春，卡提普南的成员开始逐个消失，被客气地驱逐到了遥远的各个海岛上。卡提普南领导层日益认识到了这个严峻的问题，这也是巴伦苏埃拉前往达皮丹的原因之一。7月中旬，布兰科的密探取得了某个支部绝密的成员名单，随即

157 将他们一网打尽。被捕的一些成员开始坦白。总督的计划是悄然将卡提普南捣毁，但他忘了把女人考虑在内。被捕的一些成员的妻子和母亲去找了各自的教区神父，希望他们能帮忙把他们的男人放出来。8月19日，《西班牙人》发表了一篇绘声绘色的故事，作者就是一位教区神父。他说道，在聆听忏悔时，他发现一场革命起义即将爆发。（在天主教殖民地，忏悔就是这样被出卖的！）西班牙人社群陷入了愤怒的恐慌当中。现在，布兰科不得不下令进行大规模公开搜捕行动，而让他气愤不已的是，修会开始大放厥词，称是他们的爱国警觉阻止了一场大屠杀，而无能的总督却什么也没做。¹ 潜逃中的博尼法乔必须将计划提前了。他指示24日在巴林塔瓦克（Balintawak，一个马尼拉北部不远处的村庄）开卡提普南全员大会，讨论接下去的行动。但搜捕压力之大，使会议不得不提前到23号，地点也改到了普加德拉文（Pugadlawin）村。会议决定于29日起事，到会成员撕毁了他们的纳税收据（当局要求所有土人携带，作为身份证明），高喊：“菲律宾万岁！卡提普南万岁！”邻近的几个省份也收到了呼吁，相约同时到殖民地首都汇合。²

1 清晰的叙述参见 Onofre Corpuz, *The Roots of the Filipino Nation* (Quezon City: Aklahi Foundation, 1989), vol. 2, pp. 217-19.

2 参见特奥多罗·阿贡西约 (Teodoro Agoncillo) 生动而且细致的叙述。他的书虽然带有立场，但不失为开拓性的贡献：*The Revolt of the Masses* (Quezon City: University of the Philippines Press, 1956)，第9章。这个口号被写入了民族的历史，虽然事情发生在普加德拉文村，但还是被称为“巴林塔瓦克的呼号”。（转下页）

29日，博尼法乔带队袭击了位于马尼拉郊区马里基纳的兵工厂。两天后，装备拙劣的叛军拿下了甲米地省，马尼拉周边的一些省份不久也落入叛军手中。

布兰科发觉情况不妙。居住在殖民地的西班牙人陷入恐慌当中（菲律宾人口大约有700万，其中西班牙人大约只有1.5万人，包括女性和儿童）。强大的修会甚至更为恐慌。他们都要求总督立即开展暴力镇压。¹整体上讲，他向他们的压力屈服了（也许他本人的判断更好，因为殖民地军队非常之小，他还得向马德里电报求援）。²当局逮捕了数百名菲律

158

（接上页）这个称呼显然出自“亚拉的呼号”，即1868年10月10日塞斯佩德斯宣布起义的古巴民众口号。但巴林塔瓦克的呼号很有可能是在1896年8月之后好一阵子才发明出来的。不管怎么说，此刻的菲律宾还“落后着古巴28年”。但我们之后就会观察到，两年后，它们就会成为几乎同时代的两个国家。

1 西属菲律宾的人口数据一直因为不确切或者自相矛盾而饱受诟病。原因在于当局从没有进行过像样的现代人口普查，它的猜测几乎没有能和教会汇编的数据对得上号的。对于各种统计数据最完整、详细的研究，可见于Onofre Corpuz, *The Roots of the Filipino Nation* 的第一册第515—570页这56页的附录当中。他得出的革命前夜的菲律宾拥有700万人口的估算，包含了南方的穆斯林人口，以及吕宋高山丘陵的不信教人口，而这两者都是西班牙没有有效控制的地区。至于西班牙人，他估计（第257页）在1876年大约有15327人（包括半岛人、克里奥人和西班牙混血），其中有1962名神职人员（约占15%）。他们大多居住在马尼拉或者马尼拉附近。Sichrovsky (*Ferdinand Blumentritt*, 第25页) 还给出了19世纪末各个修会的人数，虽然没有指明史料来源，但也不是完全不可信：奥古斯丁派346人，回忆派327人，道明会233人，方济各会107人，耶稣会42人，嘉布遣会16人，本笃会6人，共计1077人。

2 革命爆发时，布兰科手头只有3000名士兵，以西班牙人为士官，统辖土人雇佣步兵。一批西班牙义务兵搭乘四艘舰船，将会于10月抵达，给他5000人不到的增援。参见Corpuz, *The Roots*, vol. 2, p. 233。比较古巴和菲律宾，我们可以发现，古巴人口虽然只有菲律宾的四分之一，却要面对人数几乎是菲律宾（转下页）

宾人，处刑了若干，并没收了“叛军”财产。所有被军事法庭判定曾帮助过博尼法乔叛军的人都以枪决论处。但让殖民地精英暴跳如雷的是，布兰科效仿了马丁内斯·坎波斯早在古巴的政策，立即宣布赦免所有迅速投降的叛军，并在次月发布了第二条法令予以重申。10月末，诺撒莱达大主教电报了马德里的道明会总部（使菲律宾叛乱的消息在西班牙政治阶级当中更广地传播开来）：“情况恶化。叛乱扩大。布兰科软弱，不知何故。速速任命新长官，以备不虞。”六周不到，布兰科就被召回了。¹

黎萨尔呢？8月30日，也就是在博尼法乔以攻击马里基纳兵工厂拉开了起义序幕的后一天，黎萨尔收到了来自总督的两封亲笔介绍信。一封给战争大臣，另一份给海外领土大臣。语言很不同寻常。首先，布兰科写道：

黎萨尔在达皮丹居住的四年当中表现出色，而且似乎与这些日子我们都在哀叹的那些荒诞行径没有丝毫瓜葛，没有加入任何密谋或是任何在谋逆的秘密组织。在我看来，这使他更值得我们原谅和善待。²

（接上页）25倍之众的帝国军队。

1 Guerrero, *The First Filipino*, p. 409.

2 *Ibid.*, p. 391. 我对格雷罗的翻译略做了语法修正。

从遣词造句中可以看出，布兰科想要向马德里的卡诺瓦斯内阁和军事高级指挥部门证明，黎萨尔与起义没有半点关系。而为了证明这一点，他称赞了黎萨尔在达皮丹的优良表现，同时提到了各个密谋团体（他汇报这些组织的活动已经有好几个月了）。

邮轮按计划出港。当邮轮抵达新加坡，逃亡在外的支持者在船上拜访了黎萨尔，怂恿他跳船走人。他们已经准备好代表他向英国殖民地提出要求，为他发布一封人身保护令。但他不愿食言，拒绝了他们的帮助。9月25日，穿过亚丁的时候，他看到一艘西班牙运兵船，载满了义务兵——这对于菲律宾来说还是新鲜事，但在古巴早已司空见惯。三天后，邮轮抵达马耳他。此时，他被命令待在船舱，不得外出。不过他还是给布卢门特里特写了一封沮丧的信，偷偷送了出去。10月3日，他抵达了戒严中的巴塞罗那。他先是在船舱里被关了三天，然后在几个士兵的护卫下被送到蒙胡伊克要塞关了起来。翌日，他被带去见德斯普赫尔总督。总督礼貌而忧伤地和他做了番交谈。总督告诉黎萨尔，他得搭乘另一艘满是增援部队的运兵船回马尼拉。一到马尼拉，他就被关进了圣地亚哥要塞。

这里边究竟发生了什么？只要菲律宾不出乱子，卡诺瓦斯就不需要担心韦勒在哈瓦那的严酷和布兰科在马尼拉的宽容之间的反差。但随着卡提普南武装起义的爆发，这一反差再也得不到容忍了。更何况，布兰科还给他发了电报，要求

实质性的军事支援。这无疑会威胁到韦勒迫切需要的人力和财政资源。此外，布兰科总督请求的是半岛的部队，而不是当地土人雇佣兵。半岛的部队只能靠征兵扩充，但征兵早已不得民心，需要他不断向公众做解释。最后，只要对菲律宾表现出半点软弱，嗜血者韦勒在古巴的严酷手段就会显得没有道理。事实上，在西班牙最后两个大殖民地推行两种不同的政策，在政治上已经变得不可能了。

问题还不仅如此一个。从法律上讲（即使在戒严中的巴塞罗那），审判黎萨尔是不可能的——不仅他的“犯罪”不是在西班牙实施，而且所谓的“犯罪”在西班牙也没有证人。政治上讲，在西班牙的首都审判黎萨尔会是一场灾难。黎萨尔在马德里是个名人。杀掉几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无名小卒容易，但对于黎萨尔这样一位与莫雷特、莫莱塔还有皮·伊·马高尔交往甚密的人，要动手可是难上加难。在巴塞罗那以外的其他地方，西班牙并没有实施戒严，而这样的一个案子会引来当局所不希望的巨大的公共关注。国际媒体也必然会扩大大事态，而现在，他们已经开始抨击塔里达·德尔·马尔默尔不久后所说的西班牙的“新宗教纠问”。即便戒严中的巴塞罗那也不那么靠谱。内阁清楚德斯普赫尔早前和黎萨尔有所往来，所以并不信任他能否主持袋鼠法庭¹审判这位菲律宾青年。不过，当局已经决议要痛击菲律宾独立运动的精神

1 袋鼠法庭（kangaroo court），即不公正的法庭。——译者注

领袖。为了实现这一点，就得把他送回原籍。而工具所幸就在手边。

博尼法乔的起义爆发不久，布兰科便设立了一个调查委员会，调查起义的起源、计划和资源。他任命了一位名叫弗朗西斯科·奥利维（Francisco Olivé）的上校主持调查工作，却不知此人在10年以前曾被韦勒送到卡兰巴，依照韦勒的命令，采用一切必要力量将顽抗道明会士的佃农（包括黎萨尔一家和族人）治罪。这位上校在马德里的支持下，坚持立即审讯、审判黎萨尔。马德里的新政策、马尼拉西班牙人的愤怒还有他自己最近的经历，让布兰科手足无措。12月2日，虔诚的天主教徒卡米洛·波拉比耶哈将军带着一群亲信抵达殖民地首都。10天后，他接过了布兰科的权力。

马尼拉的韦勒主义

新任总督此前从未在菲律宾任职。但这是一位在镇压塞斯佩德斯的古巴十年战争中表现出色的老兵。在小战争叛乱中，他曾任古巴总督，但在任期结束前就因为殖民地公务员大规模的、根深蒂固的腐败而提前辞职。¹他也不缺政治眼光。在古巴的时候，他曾公开表明：“我们不是要以一切代价、永久性地防止古巴独立。这样的尝试是不可能成功的。

1 Thomas, *Cuba*, p. 299.

相反，我们应当为古巴的独立做准备。在合理的时间内尽可能久地留在岛上，在友好地离开之前，尽一切可能避免被武力赶出古巴，捍卫我们的利益和荣耀。”¹ 他来马尼拉时的身份是王后摄政的军事家族的领袖。而之所以选他，原因不外乎其廉洁、忠诚以及军事上的韧性。他们认为他已经准备好毫不迟疑地实施卡诺瓦斯的指令。

161 我们难以确定，黎萨尔在囚室中是否知晓这些事件的意义。但引人注目的是，在12月10日，也就是布兰科下台的前两天，黎萨尔给总督写了一封请愿书，经由正在准备审判文件的审问官送出。根据审问官的记录，请愿书的核心意思大概是这样的：

他恳求阁下允许他发布声明——如果处在他这样境地的人可以做声明的话——谴责这种犯罪行为，并〔声明〕他从未许可他们使用他的名义。此举仅为不让那些不幸的人们受到蒙骗，也许也是在救他们的命。签名人不希望此事影响到他的案子。^{2*}

次日，布兰科批准了黎萨尔的动议，这也是他在任的最后一项决定。同一天，检察官正式决定，“被告和证人的对

1 Guerrero, *The First Filipino*, p. 411.

2 De la Costa, ed., *The Trial*, p. 32.

质无益于犯罪的证明，因为他认为声明已经足够证明，故而省略”。¹

黎萨尔是什么时候得知布兰科下台的消息的，我们无法断定。12月15日他撰写“宣言”的时候，他很有可能还蒙在鼓里。也许有人告诉他，波拉比耶哈支持布兰科的许可信。《致菲律宾同胞书》(*Manifiesto á Algunos Filipinos*)是黎萨尔写的最后一篇政治文本，出于这个理由以及文章本身的内容，它值得我们全文引用：

同胞们：从西班牙回来时，我得知有人打着我的名义起事。这个消息对于我来说，不仅是惊奇，更是痛苦。但是，由于我相信一切都已经结束，所以在面对在我看来无法挽回的这一事实之际，我保持了沉默。现在，我打听到骚乱还在继续；由于某些人仍在继续打着我的名义——不论居心是好是坏——为了纠正这一暴行，让不慎的人醒悟，我急急忙忙写了这些话，好让你们知道真相。从最开始听到这个计划，我就予以反对，与之对抗，而且也证明了它是绝对不可能成功的。这就是真相，而且有活着的证人可以证明。我坚信，起义的想法极其荒谬，更严重的是可能会导致灾难。我做的还不仅

162

1 *Ibid.*, p. 30.

是这些。后来，他们没有听取我的建议，运动爆发了。我随即提供了我的服务，而且还有我的性命乃至我的名节，帮助当局消灭叛乱。这是因为我对叛乱将会带来的恶果深信不疑，我认为如果自己做出一些牺牲，可以阻止这种无益的不幸，那是再好不过的了。我现在依然是这个看法。

同胞们：我和任何人一样，已经多次证明了为我国争取自由的渴望，我现在依然渴望之。但我认为，人们接受良好教育，是其必要前提，通过教育与工作，他们会保留自己的个性，同时又使自己配得上那些自由。在自己的作品中，我向来强调，学习以及公民美德的必要性；没有这些，我们的事业就会裹足不前。此外，我也曾写到（也重申过），想要改革结出果实，就必须自上而下，因为从下而上的改革往往会是不规律、不确定的冲击。依托这些观念，我不得不谴责，也的确要谴责这一荒谬、野蛮的起义。它背着我却打着我的名义，它让菲律宾人蒙羞，让那些可能会支持我们的人心生怀疑。它的犯罪行为令我憎恶。我拒绝任何类型的参与，因为我的心中充满悲痛，为那些不慎被蒙骗的人感到惋惜。所以，返回你们的家园，也祈祷上帝宽恕

那些奸邪之人。^{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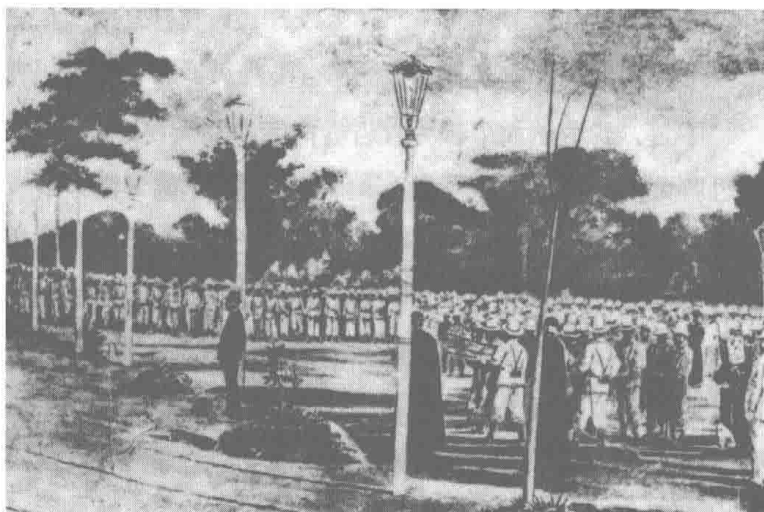
不过，黎萨尔如果以为宣言会向菲律宾人民广而告之，那也就太天真了。军事法官兼律师尼古拉斯·德·拉·佩纳（Nicolás de la Peña）将军在给波拉比耶哈的信中写了如下枯燥的文字：“宣言概括如下：同胞们，面对失败，放下武器；日后，我会带你们去应许之地。他的宣言不仅不利于和平，而且还会在未来激起叛变精神。”他因此建议按而不发，总督予以同意。²

12月19日，波拉比耶哈下令立即以教唆和叛国罪在军事法庭审判黎萨尔。审判实际上于26日开庭，经过一天的草草过场之后，军事法官建议判处被告死刑。波拉比耶哈于28日批准了建议。拿到死刑通知书并被要求签名的时候，黎萨尔注意到他被说成是华裔。他把单词划掉，修正为土人（indio）而不是菲律宾人（filipino）。³生命最后的几个小时里，姐姐特立尼达前来探望。他借机给了她一盏小台灯，轻轻告诉她里面藏着一小张纸片，是用小字写的一封与祖国告别的诗歌，有70行。这首诗的题目是“我的诀别”（Mi último adiós），是一首美丽而忧郁的诗歌。不久，它就被翻译成塔加洛语。十分讽刺的是，译者竟是博尼法乔。（在接下去的

1 *Ibid.*, pp. 172-3.

2 *Ibid.*, p. 173. 奇特的是，字里行间让人回想起1892年莱特的讽刺文章。

3 安贝斯·奥坎波看过原始文献，这里的信息由他提供。



12月30日拂晓，黎萨尔被带到巴共巴延（现在的鲁内塔公园）枪决

164

一百年间，这首诗有了差不多64种外文译本，以及49种菲律宾语言译本。）¹12月30日黎明，黎萨尔被带出囚室，带到一处叫作巴共巴延（Bagumbayan）的开阔地（现在是鲁内塔公园）。一个世纪前，曾有一位世俗神父在这里被绞死。一队由西班牙士官指挥的土人小队，在数千围观群众眼前将黎萨尔射死。他虽然年仅36岁，却能高贵、平静地面对死亡。由于担心他的墓太过显眼，会成为民族主义朝圣者的圣地，当局没有将他的遗体还给家人，而是秘密地埋了起来。

不过，卑劣的算计其实无助于事。公开处决黎萨尔恰恰

¹ 参见 National Historical Institute, *Dr José Rizal's Mi Último Adiós in Foreign and Local Translations* (Manila: National Historical Institute, 1989-90), 2 vols.

产生了与卡诺瓦斯的预期相反的效果。它非但没有熄灭起义（先不论菲律宾人对独立的渴望），反而让黎萨尔即刻成了民族殉道者。它让革命运动上升到了更深、更广的境界，间接地导致了卡诺瓦斯本人在次年遭到暗杀的事件，也为西班牙帝国的终结铺好了路。

三种思考

为了给本章内容下个结论，在思考之后我们可以观察到以下三点。

首先，1892年黎萨尔带着几乎整版《煽动者》的图书回到家乡时，他在等待什么？最能引起我们注意的是，在他四年的达皮丹流放生活中，这位极具天赋的作家除了几封带着审查员影子的书信，几乎什么都没有写。不过毫无疑问的是，他本可以写一些手稿在当地藏起来，或是让来看他的姐妹们偷偷带出去。他计划的第三部“美丽”而“有艺术性”的小说无疾而终，而《弥撒以后》的残篇只不过是翻转了《不许犯我》的情节，算不上是更进一步。也许，再创作一部伟大的小说超出了他的能力。在此期间，山打根和菲律宾协会两个项目因为殖民地政府的弹压而迅速流产。雷希多尔和布兰科都曾给了他求生的机会，但他都拒绝了。他确信，离开菲律宾就不可能做出什么有益于国内的事。在巴伦苏埃拉拜访他以前，他也没有去古巴的热情。而当他匆忙决定接

受布兰科的建议时，这次出行与其说是去做什么，还不如说是逃亡了。

也许可以说，1896年夏，他正在经历许多原创作家所经历的处境：一旦作品离开印刷厂，进入公众领域，他们就不再拥有、也不再能掌控它们。黎萨尔错误地将自己视为菲律宾人的政治导师，但他的权力其实并不是来自他的传道或者批判性文章（因为这些作品和其他文化人写出来的没什么两样）。赋予他权力的，是他的小说——无人能效仿。他的《不许犯我》在想象中创造了一个完整的（也是同时期的）菲律宾人“社会”，里面有相互勾结的殖民地高层官员，有村庄里的赌徒，有异见知识分子，有掘墓人，有修道会士，有警察线人、向上爬的人、儿童侍僧、女演员、小城的首领、强盗、改革者、木匠、十来岁的女孩，以及革命者。小说真正的英雄——革命者埃利亚斯——最终为改革家伊瓦拉牺牲了自己的生命。黎萨尔在《煽动者》里，则想象了这个社会的政权垮台、其统治者近乎全灭的过程。也许在那以前，根本没有菲律宾人这样想象过，遑论将梦想提到公共领域。黎萨尔的天才仿佛再也收束不住，埃利亚斯和西蒙这两个对比鲜明的人物，开始有了他们自己的生命力。黎萨尔没有见过博尼法乔，博尼法乔也许只在某个晚上曾听过黎萨尔的讲话。但当卡提普南推选黎萨尔做他们的名誉主席，以“黎萨尔博士万岁”的口号结束讨论的时候，起作用的无疑是埃利亚斯和西蒙，以及现在已经属于他们的其他许多鲜活的小说

人物。¹ 小说家和小说已经分道扬镳，何塞·黎萨尔和黎萨尔博士不再是同一人。也许正是发现了这一距离，使得博尼法乔在收到巴伦苏埃拉的报告时恼怒不已。这也无疑是黎萨尔在人生最后几个月里，对自己的名字感到愤怒的焦虑的深层原因。换言之，“我不是西蒙”。

再往前追溯一下，可以注意到一件特别讽刺的事。黎萨尔反复和皮拉尔派说，在西班牙活动不会成功，同化是幻想。但在殖民地，他发现自己同样难以做成什么。他跟巴伦苏埃拉讲，古巴战争将迫使马德里对菲律宾人做出让步，但他没有讲到西班牙语的危险，也与卡提普南起义划清界限：这实际上就是皮拉尔派的立场。而在此时，古巴战争摧毁了德尔·皮拉尔运动的前景，而此前《团结》的财务危机已经使之摇摇欲坠。在生命的最后几个月里，德尔·皮拉尔计划搬回香港，在这里同化是无关紧要的问题。但如果他活得更久，这位经验丰富的政治家也许最终会支持卡提普南。还剩下什么其他选择呢？

第二种思考与古巴有关。马蒂 1895 年的起义不仅是令菲律宾民族主义者欣喜的榜样，而且也是对复辟政权乃至整个帝国的致命一击。卡诺瓦斯不得不向古巴派遣大规模军队，

1 下一章当中我们会看到，博尼法乔只比黎萨尔多活了五个月。能够毫无争议地断定的是他所写的文本极其稀少，他的地下生活为无数种推测提供了空间。但是，可以确定的是，早在黎萨尔抵达马尼拉以前，就至少有几本《煽动者》迅速流传开去。1892 年到 1896 年之间的某个时候，这位卡提普南的领袖也曾读过这部小说是毋庸置疑的。

而战争也带来了巨大的人员、资金损失，打击了西班牙的国际声望。这一切使得马德里难以有效应对菲律宾的事件（下一章就会看到这一点）。卡提普南自 1895 年末以来一直迅速成长，表明了人们正通过纸质媒体了解到马德里的弱势。这些媒体对于博尼法乔和他的朋友们来说无疑是触手可及的（但身在达皮丹的黎萨尔消息则要闭塞得多）。黎萨尔竟然用“荒谬”和“绝对不可能”来描述卡提普南起义，可以明显体现出他对于 1895—1896 年的真实形势知之甚少。如果韦勒和戈麦斯之间的血腥斗争没有在最高潮，卡提普南选择在 1896 年 8 月起事也就变得极不可能。不过，如果他们真的要起义，他们肯定会被韦勒手头强大的军事力量所击垮。不过，一旦卡提普南发动起义，那韦勒主义（虽然韦勒不会亲自降临）进抵马尼拉几乎是必然。从法律的角度看，殖民地当局正是出于这种政治需要才处死了黎萨尔——处死黎萨尔更多的是为了杀鸡儆猴，而并非因为他是革命者。布兰科为黎萨尔写的信极力向最高权威说明，这位小说家与起义没有任何关系。但字里行间透露出一种恐惧，即马德里到头来也许仍不得不插手菲律宾事务。我们也许可以认为，波拉比耶哈的行动十分愚蠢，或是遵守了愚蠢的指令。更有谋略的做法难道不是让黎萨尔活着，到塔加洛各地宣讲自己的狱中宣言吗？这难道不会毁掉黎萨尔的声望？答案也许是肯定的，但这时候这样做已经来不及了。民众起义业已持续了三个月，有着自己的动力。更何况许多人会相信宣言是他被

迫所做。此外，这个问题没有将古巴考虑进去。马德里决定杀掉黎萨尔也是有意让古巴的岛民以及西班牙以外的世界知道。之所以派波拉比耶哈接替布兰科，并非因为他更为善战，而是因为西班牙从此人身上看到了第二个铁血韦勒的影子——垂死挣扎的西班牙帝国太需要这样的人了。

最后一点：尽管古巴独立战争对黎萨尔的命运有重要影响，但我们不得不承认，它只是正在抬头的世界性动乱的一个部分，而这一动乱将会在1914年达到高潮。一度由英国统治了半个世纪的东亚，正因为来自日本、美国和德国的竞争而变得极为不稳定。在南非，布尔战争即将拉开序幕。中欧和东欧的民族主义斗争，正在侵蚀伊斯坦布尔、维也纳、圣彼得堡乃至柏林所控制的多民族陆上帝国。最广泛意义上的社会主义，也正在民族和国际当中活动（我们后面即将看到）。戒严中的巴塞罗那——那个黎萨尔在欧洲度过最后一晚的城市——是这一正在扩散的运动开始酝酿的关键地点。



塔里达的圣战

169 10月初的那个晚上，黎萨尔被关入蒙胡伊克。而1896年6月7日基督圣体日爆炸后遭逮捕的三百多人也大多还在那里。一个关键的例外是古巴克里奥人费尔南多·塔里达·德尔·马尔默尔。他是黎萨尔的同龄人，此前最后出现在公众视野是于1892年赫雷斯暴动时随马拉泰斯塔在西班牙各地做政治宣讲（不过他们的活动以失败告终）。过了一阵子，他在巴塞罗那工艺学院的台阶上被捕（7月21日）。他是学院的工程师兼主管，也是位出色的数学教授。8月27日，塔里达获释。他之所以那么幸运，是因为有个年轻狱警中尉认出他是自己以前的老师，于是大胆地托病溜进巴塞罗那城内，将塔里达被拘的消息透露给了报社以及他可以想到的所有有影响力的人物。同样十分幸运的是，保守派议员蒙特-罗伊格侯爵是这位古巴人的表亲。侯爵用他的影响和关系向监狱方施压。（对于这种来自右翼的帮助，塔里达没有感到丝毫



处决无政府主义者，巴塞罗那

尴尬，但毫无疑问，他也因此不得不尽最大可能帮助后台没有那么硬的狱友们。) 释放之际，他悄然越过比利牛斯山脉，携带着他偷偷带出来的狱友们的信件和其他文件前往巴黎。

随后，塔里达在《白色杂志》上发表了《西班牙狱中一月》(“Un mois dans les prisons d’Espagne”)。《白色杂志》是法国首要的双周思想性刊物。他发表这篇文章的时候，正值黎萨尔被押送回马尼拉。它是塔里达之后 15 个月里为这个杂志写的 14 篇文章的第一篇。¹ 这些文章不仅细致地描述了

170

¹ 参见 *La Revue Blanch*, 11: 81 (October 15, 1896), pp. 337–41。这份评论出自两对兄弟的想法。一对比利时兄弟和一对法国兄弟(小的只有 16 岁)(转下页)

171 蒙胡伊克监狱内上演的暴行，而且讲到了古巴独立战争、菲律宾和波多黎各的民族主义运动、休达监狱里虐待犯人的情况、美国吵嚷的帝国主义野心，以及（也许是让人吃惊的一点）一篇充斥了各种等式的专业文章，讨论的是“空中航行”（此时莱特兄弟还没有制造出飞机）。系列文章中的第二篇发表于12月15日，即黎萨尔遭到处决的两个个月前。这篇文章讨论的正是“菲律宾问题”（文中简单提到了这位小说家，称他是因政治而受到放逐之人）。这一时期，塔里达大可以说是杂志最积极的供稿人了。他能得到这么大的空间，最初无疑是因为他对蒙胡伊克有亲身经历。这是后来横跨大西洋的反卡诺瓦斯政权运动的肇始。作者以其常用的媒体笔法，将这个政权的所作所为称为“西班牙的宗教纠问”。《白色杂志》无疑找对了人：塔里达是十分少有的人物，不仅是位思想开明、能说法语的加来罗尼亚无政府主义知识分子，而且作

（接上页）于1889年夏天在斯帕（还会在哪里呢？）见面。四人得到了纳坦松（Natanson）兄弟的资金支持。纳坦松兄弟是富裕而有文化的波兰裔犹太人、艺术品商人，他们于1880年搬到巴黎定居。两对兄弟在1889年12月在列日出了第一期。不过，1891年，杂志搬到了巴黎，由纳坦松三兄弟中的老二塔戴直接管理。到了10月份时，双周刊的装帧高雅了许多。1895年1月，方才在臭名昭著的三十人审判中摆脱了恐怖主义和教唆起义罪名的费利克斯·费内翁接手了主要的编辑工作。我们将会看到，他是一位坚定的世界主义无政府主义者、反帝国主义者。他使得杂志较以往有了更鲜明的左翼色彩。《白色杂志》的最后一期（第312号）出版于1903年4月15日。杂志一直以来都是亏本经营，而当时塔戴在东欧投资失利，美丽的波兰妻子米希亚·哥德夫斯卡（Misia Godebska）也离开了他，转投一位报业大亨的怀抱。他的长兄亚历山大虽说是一流的金融家、股票经纪人，也感到自己一个人难以承受整个财务负担。参见 Halperin, *Félix Fénéon*, pp. 300-14.

为古巴爱国者，他有充分的资格将蒙胡伊克与古巴、波多黎各和菲律宾的独立斗争系统性地联系起来。

这一切又是什么样的机缘巧合促成的呢？塔里达本人的职业生涯对此有决定性的影响。¹ 我们之前曾提到，他 1861 年出生于哈瓦那，在 1868 年伊莎贝拉女王下台这一引人注目的事件之后，随家人回到了西班牙。我们并不清楚他父亲（后来成了一位富裕的加泰罗尼亚鞋业商人）此前为什么要去古巴定居。但回国的日子暗示他们也许是政权最后那几年被压迫的众多对象之一。² 不久，他们将小费尔南多送入了波城（Pau）的一所中学——几十年后，布尔迪厄也会接受这所中学的磨炼。在这所学校里，一位同学 [未来的法国总理让-路易·巴尔杜（Jean-Louis Barthou）] 让塔里达皈依了共和主义。回到西班牙之后，费尔南多越发倾向于左派，时常光顾工人阶级的会议和俱乐部。1886 年（《不许犯我》问世前一年），他成了一位坚定的无政府主义者，一位富有魅力的演说家，同时也是重要的无政府主义刊物《无政府》和《生产者》的定期撰稿人。1889 年 7 月，巴塞罗那工

1 这里以及后面那段，我参考的是埃森魏因的《无政府主义意识形态》中内容翔实的第八章（《不带形容词的无政府主义》）。

2 费尔南德斯暗示还有另一种可能性。塔里达的母亲（很有可能是克里奥人）有个堂兄弟叫多纳托·马尔默尔（Donato Marmol）。此人来自东部省，是率先投靠塞斯佩德斯的众人之一。十年战争期间，他晋升为将军。塔里达在起义爆发后迅速举家前往欧洲，也许意味着他的父亲担心这一危险的亲缘关系会带来不利的后果。La sangre de Santa Águeda, p. 25.

人推选他作为代表去巴黎参加新近成立的国际社会主义大会 (International Socialist Congress)。¹ 在那年 11 月一次公共演说中, 他发明了极其独特的口号“不带形容词的无政府主义” (anarquismo sin adjetivos), 以此为工具来解决左派内部派系林立的问题。172 “所有宣称能保证解放全社会的革命理论当中, 最贴近自然、科学和正义的, 拒绝一切政治、社会、经济、宗教教条的, 就是不带形容词的无政府主义。” 他希望以此终结马克思主义和巴枯宁主义两派之间痛苦的争执: 他说, 真正的无政府主义决不会将预先设想的经济方案强加给任何人, 因为这违背了最基本的选择原则。但他的运动也同样是针对于整个个人“用行动做宣传”的观念。

很快, 塔里达就引来了让·格拉夫 (经常被戏称为无政府主义教皇) 在《反叛者》中发文非难。后者谴责他代表了错误的西班牙无政府主义的“集体主义”传统, 即固定于一个有组织的工人阶级基础上。他随即又发表了塔里达的答复, 表现出了这位教皇并没有认为自己绝对正确的态度。28 岁的塔里达此时已是一位数学教授, 他很有说服力地写道, 用行动做宣传的小群体如果没有任何集体组织, 就根本不足以对抗资产阶级的集中化权力。西班牙无政府主义者们根据长期的经验, 认为协作是至关重要的, 因为工人阶级有组织的抗

1 大会在当年的博览会期间召开。那一年, 埃菲尔铁塔——约里斯-卡尔·胡伊斯曼斯蔑称它是“伸开双腿的妓女”, 但乔治·瑟拉 (Georges Seurat) 却十分喜欢——揭开了面纱。Halperin, *Félix Fénéon*, p. 204.

争是对抗国家压迫唯一有用的手段。因此，武断地将工人中心（centros obreros）斥为天然的威权主义“等级制”是完全错误的；相反，他们是西班牙革命运动不可或缺的成长动力。格拉夫要求废除工人组织是愚蠢的。不过与此同时，塔里达也愿意承认，对于奄奄一息的西班牙地区劳动者联盟——第一国际的残羹——官僚主义确实已经根深蒂固，这个组织也已不再有任何价值了。

塔里达的论述，就其本身而言便十分重要（它不久就说服了马拉泰斯塔、勒克吕和其他人），但在我们目前的语境下，值得关注的关键在于它们发表在《反叛者》上。而我们知道，巴黎的许多主要的小说家、诗人和画家都是《反叛者》的忠实订阅者。因此当塔里达从蒙胡伊克获释来到巴黎时，他在报纸上已经是大家所熟悉的人物了。而同时，韦勒在古巴进行的暴力镇压受到大量报道，塔里达的古巴人身份进一步确保了他能够跻身这个圈子。

还需要注意的是，塔里达并不是作为一位孤独的被害者而出现在巴黎的。就算实施戒严的巴塞罗那政府再怎么暴力，卡诺瓦斯还是很机智地没有将它扩展到全国范围。但在9月，他迫使议会通过了当时西欧针对恐怖主义和颠覆行动最为严酷的立法。此外，根据里卡多·梅拉（塔里达的一位细心的同志）1897年为巴黎《新人类》（*L'Humanité Nouvelle*）整理的的数据，正经的无政府主义活动家和支持者

在西班牙的分布大致如下：安达卢西亚 12400 人（+23100 名

支持者)；加泰罗尼亚 6100 人 (+15000 名支持者)；瓦伦西亚 1500 人 (+10000 名支持者)；新老卡斯提尔 1500 人 (+2000 名支持者)。总计 25800 人和 54300 人。¹ 卡洛斯战争揭示出来的社会等压线体现得再明显不过：北方和西北的天气是寒冷的、反动的、教会的；南面和东面是狂热的大雨和风暴，作为他们眼目的是总理出身地安达卢西亚，而不是巴塞罗那。此外，卡诺瓦斯的政敌——党内政敌以及自由主义、联邦主义、共和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者们——发觉时机成熟，各自出于政治原则或者机会主义考虑，纷纷拿起了蒙胡伊克丑闻，用尖刻的语言将之传遍“文明的首都”。更有助于此的是，巴塞罗那关押的人里面，至少有一位前大臣，以及三位议会代表。

而更进一步的是，巴黎正日益成为西班牙帝国的臣民开展政治行动的重要场所。激进共和派领袖索里亚在巴黎定居已有时日，在此密谋推翻复辟政权。他的私人秘书弗朗西斯科·费雷尔·瓜尔迪亚 (Francisco Ferrer Guardia) 是位老练的左派活动家，我们后面还会看到他的身影。此人在著名的巴黎孔多赛高中教西班牙语。这所中学也雇用了马拉美，直到他 1898 年英年早逝。1895 年春马蒂在古巴发动独立战争之后，西班牙对于加勒比海来的民族主义者和激进分子而言太过危险。他们在传奇般的人物、波多黎各革命者拉蒙·贝斯坦斯博士富有活力的领导下聚集到法国首都，做反对卡诺

1 埃森魏因在书中有引用和讨论。参见 Esenwein, *Anarchist Ideology*, p. 202。

瓦斯和韦勒的宣传和密谋。最后，在基督圣体日突袭之后，马德里的许多激进分子越过了比利牛斯山北上。只有菲律宾人在巴黎没有多少声音。黎萨尔和德尔·皮拉尔都死了，马里亚诺·庞塞去了香港。画家胡安·卢纳是唯一一位广为人知的资深民族主义人物。

巴黎走向激进

要领会为什么 1897 年的巴黎为塔里达极为成功的运动敞开大门，就有必要将时间往前推移，看一看两位不同时代的人——他们在创造新的思想和政治气候当中扮演了核心的角色——的早年生涯。

乔治·克列孟梭生于 1841 年，在路易 - 拿破仑的专制帝国政权下长大。¹1861 年，当黎萨尔将要出生的时候，他正在激进共和主义左派的各个圈子之间游走，并因此结识了亨利·罗什福尔（Henri Rochefort）——旧罗什福尔 - 拉塞（Rochefort-Laçay）侯爵。罗什福尔后来会成为他的妹夫，同时也是一位以古怪著称的激进派记者、编辑。1862 年，克列孟梭因为写了一些批判文章而被皇帝监禁起来，获释之后在圣贝拉吉政治犯监狱隔壁的一家医院工作。在那儿他认识

174

1 接下来对克列孟梭政治生涯（至 1900 年）的叙述主要参考了 Gregor Dallas, *At the Heart of a Tiger: Clémenceau and his World, 1841-1929* (New York: Carroll & Graf, 1993), esp. at pp. 30-38, 97-120, 185-7, 212-340。



拉蒙·贝斯坦斯（左）；他在巴黎沙托丹街的住所（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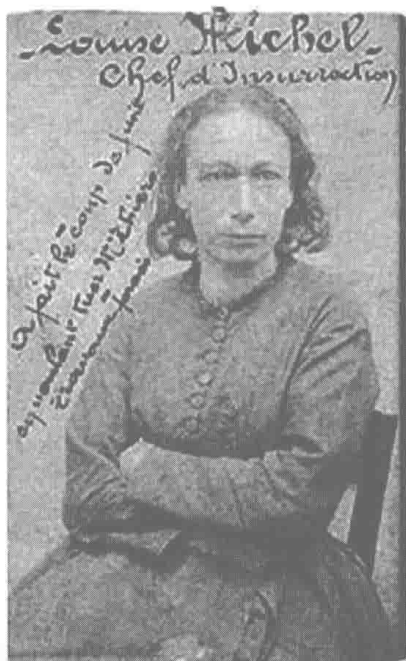
了布朗基并为之着迷。他甚至为这位永远的谋反者从比利时偷运了一台印刷机。色当战败后，他成了蒙马特市长，来年春天的巴黎公社就会在这个区爆发。克列孟梭强烈反对后路易－拿破仑政府对俾斯麦的卑躬屈膝，德军围困巴黎时他也极力反抗。他在市长办公室建立了一个武器作坊，制造了不下 2.3 万颗奥西尼炸弹，用于对抗侵略者。在这段时期他和路易斯·米歇尔走得很近。路易斯是位不同寻常的女性，长他 11 岁，是一位外省贵族和侍女的私生女，14 岁的时候就曾将自己的诗歌寄给维克多·雨果。19 世纪 60 年代，她住在巴黎，政治立场不断左倾。1870—1871 年，她因为在蒙

马特专注于救死扶伤而颇有名气。克列孟梭在这个岗位上坚持到了最后一刻，在离开首都时曾这样对自己说：“他们将要射杀我全部的选民。但虽然如此，我不能让我的名声受到指责。”

克列孟梭是最早呼吁大赦巴黎公社成员的第三共和国的议员之一。他还尝试让布朗基出狱，在1880年路易斯·米歇尔从新喀里多尼亚监狱获释归来时予以帮助。当这位红色圣母于1883年再度被判入狱（这次的罪因是无政府主义）时，克列孟梭领导了媒体运动，迫使第三共和国将其释放。作为工人组织权和结社权的坚定支持者，他也致力于反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包括法国在印度支那、非洲和大洋洲的野蛮扩张。再没有法国政要像他那样同情古巴的独立大业。他主办的报纸《正义》一直维持到了1897年10月，是后公社时期最强有力也最受尊重的反对派喉舌。而克列孟梭转战欧内斯特·佛汉新办的《震旦》的时候，正值德雷福斯事件爆发。

比克列孟梭小20岁的费利克斯·费内翁1861年生于都灵，比黎萨尔在卡兰巴出生只晚了10天。这是位天资聪颖的外省男孩，20岁时才搬去巴黎，在战争部谋了个一官半职，然后开始了令人惊讶的艺术评论、文学编辑以及（19世纪80年代中期起）无政府主义活动家生涯。¹ 23岁时，他创办

1 费内翁的父亲是位法国旅游推销员，母亲是位年轻的瑞士女性。Halperin, *Félix Fénéon*, p. 21.



广受爱戴的法国无政府主义者、教士、自愿援助工路易·米歇尔。图为警察所摄

了前卫的《独立杂志》(以最初的形式维持了一年),主打的是于斯曼的小说,而且也发表了蒲鲁东、布朗基、巴枯宁和克鲁泡特金的文章。它极其敌视法国在印度支那的帝国主义,以及复仇性的法国民族主义。费内翁曾挖苦战争部长“为了屠杀和掠夺华人而向远东增派部队——对他们我们深表同情”。¹

1 *Ibid.*, p. 56.



保罗·西涅克 (Paul Signac) 为费利克斯·费内翁所作的前卫画像

19世纪80年代后半期，也就是黎萨尔出版《不许犯我》、伊萨贝洛·德·洛斯·雷耶斯出版《菲律宾民俗学》的时候，费内翁成了巴黎前卫界的焦点人物——虽然他更喜欢在幕后工作，但从某些角度来说他仍然成了焦点人物。他同时在编辑刚办起来的《潮流》(*La Vogue*, 1885—1889年) (在拉佛格等人的帮助下) 以及重生了的《独立杂志》(1885—1889年)。前者出版了济慈、陀思妥耶夫斯基、惠特曼以及拉佛格最为如梦如幻的诗歌，来对抗法国民族主义者的偏狭性。1886年兰波放出了重磅炸弹《彩图》后，精心收

拾摊子、将杂乱的诗歌组织起来的，正是费内翁。¹同一年，独立派人士沙龙举办了第二届展览会。在第一届上，瑟拉（长费内翁两岁）和西涅克（小费内翁两岁）的作品尤为引人注目。费内翁不仅发明了“后印象主义者”一词来形容这些年轻的反叛者，而且还成了他们坚定而卓越的拥护者。²他为展览会写了一篇“高瞻远瞩”、富有创见的评论。与其政治风格很吻合的是，他将这篇评论寄给了比利时的前卫、社会主义期刊《现代艺术》，并在激进派小报《闲老头》上用巴黎人的行话发表了另一篇。仿佛这样还不够，他从好友于斯曼处又接手了《现代艺术》戏剧批评家的工作，在易卜生强大的影响下，推崇新式剧本写作。19世纪90年代初——也就是《煽动者》出版之际——费内翁回归到激进派政治活动领域，但也没有放弃其他副业。1891年8月，他遇到了自称佐·达克萨（Zo D’Axa）的奇人〔即阿方斯·加洛·德·拉·佩鲁兹（Alphonse Gallaud de La Pérouse）〕。此人于三个月前创办了暴力的无政府主义/前卫期刊《外面》（*L’Endehors*）。³杂志出了不到两年。创刊六个月后，佐受到“破坏道德”的指控，因为他的杂志曾发文苛责法国军队、司法和议会。他潜逃至英国，但又因为担心妻子不忠而回到了巴黎。他遭到

1 *Ibid.*, pp. 62–67.

2 T. J. Clark 在 *Farewell to an Idea*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9) 第 62 页上对他评价甚高，称他为“波德莱尔之后最好的艺术评论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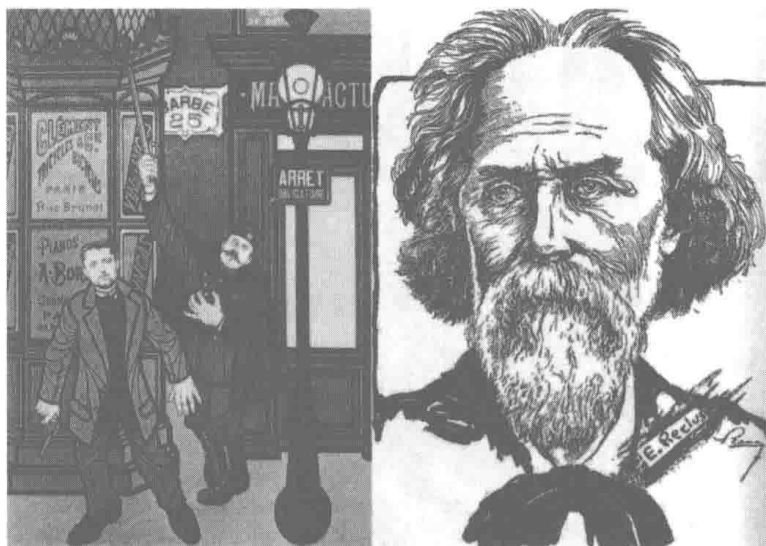
3 Halperin, *Félix Fénéon*, pp. 245–6.



马克西米利安·卢切 (Maximilien Luce) 的《在囚室》描绘了 1894 年费内翁在狱中的情形

逮捕，被单独囚禁了两周，获准保外候审后就一去不复返了。¹ 不过，他的许多位同志却被关了好几年。费内翁没有被逮捕，但警察局从那年（1893 年）开始收集他的信息。他带着《外面》走过了最后的时间，邀请了比利时大诗人、激进分子埃米尔·维尔哈伦 (Emile Verhaeren)，还有马拉美

1 *Ibid.*, p. 252.



时人所绘埃米尔·亨利被捕图（左）；勒克吕，著名无政府主义理论家（右）

圈子里支持无政府主义的法国作家奥克塔夫·米尔博（Octave Mirbeau）和保罗·亚当（Paul Adam）。¹

178 正是在佐圈子的会面上，他遇见了埃米尔·亨利并为之倾倒。他曾给西涅克写过封信，形容亨利为“众人当中最为纯正的无政府主义者”，因为他的行为针对的是对第三帝国负最终责任的议员们。（费内翁也向西涅克写道：“无政府主义者的行动到目前为止收到的效果已经超出了20年来传播勒克吕或克鲁泡特金的小册子的影响。”）² 1894年4月4日，

1 Maitron, *Le mouvement*, p. 137.

2 Eugenia Herbert, *The Artist and Social Reform: France and Belgium, 1885-1898*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1), p. 113. 她的第二条引用出自（转下页）

亨利被捕之后（他无疑将要被迅速处决），费内翁在参议院对面新潮的富瓦约餐馆安放了一颗炸弹。炸弹位于窗台上，爆炸后没有致人死亡，但有些人受了重伤。¹ 就如我们之前已经了解到的，他很快被警方逮捕。与他一如既往冷血的性格相符的是，就在死刑候审期间，他在监狱图书馆惊讶地发现了《诺桑觉寺》（*Northanger Abbey*），翻译了起来。² 作为三十位煽动者之一出庭受审的他，将法官玩弄得团团转，加之有许多克列孟梭这样的思想界名人为他做证，他被无罪释放。³ 马拉美向法官描述费内翁时用了“这个温和的人”（*cet homme doux*）一词。而当记者问及他对于这位艺术评论家和他一起被告的其他人（知识分子、罪犯和无政府主义者的怪异组合）的态度时，马拉美淡定地回答道，“他不希望对这些圣徒做任何评价”。⁴ 但是，1895年瓦莱利有过更清楚的

179

（接上页）John Rewald, “Extrait du journal inédit de Paul Signac,” in *Gazette des Beaux-Arts*, 6: 36 (1949) p. 113.

1 参见 Halperin 生动的再现，Halperin, *Félix Fénéon*, pp. 3-4。一直到多年以后，他才为他对无政府主义者亚历山大·科恩造成的伤害表示忏悔。科恩是一位受过良好教育的荷兰犹太人，是他最早将陶威斯·德克尔的《马格斯·哈弗拉尔》译为法语。

2 David Sweetman, *Explosive Acts: Toulouse-Lautrec, Oscar Wilde, Félix Fénéon and the Art and Anarchy of the Fin-de-Siècle* (London: Simon and Schuster, 1999), p. 375.《白色杂志》后来发表了译文。

3 Halperin 在《费》一书第 14 章细致地讲述了这场审判，文笔出色，非常有趣。尽管警察在费内翁的战争部办公室内发现了爆炸物，但他们无法拿出任何直接的证据来证明被告和富瓦约爆炸案的联系。

4 Joll, *The Anarchists*, pp. 149-51.

180 评价。他形容费内翁为“我所见过最聪明的人。正直、无情、绅士”。¹ 得到释放后，费内翁发现公开活动并非自己所好，于是去了《白色杂志》做幕后兼职编辑。不久就成了杂志的驱动力量。²

克列孟梭和费内翁，两人虽然分属不同的时代，有强烈但截然不同的个性，而且政治活动也只有部分重叠，却将在19世纪90年代末成为往来密切的盟友。究其原因，除了他们都敌视第三帝国在亚洲和非洲的帝国主义暴行之外，另一个明了的理由就是他们愤怒于拉瓦肖、瓦扬和亨利的袭击事件之后所谓的《犯罪法律》。这些法律禁止了一切革命宣传，参与乃至同情“革命者”的人都可能受到严厉处罚。[在警察那里已经积累了厚厚一堆文件的卡米列·比萨洛(Camille Pissarro)，早早地便逃往安全的比利时。]³ 但同时还有一场更广泛的政治转型正在步步前行，其标志性事件莫

1 Halperin, *Félix Fénéon*, p. 6.

2 《白色杂志》停刊后，费内翁逐渐从政治生活引退，不过1906年他开始为《早晨》(*Le Matin*) 撰写一些讽刺性、通常文字极其简练的短文，题目叫作“三行新闻”。*Ibid.*, p. 17. 他成了欧洲最为成功的一家艺术品交易所中的关键人物，干到了1924年退休。他人生的最后20年生活孤独，因为许多人都以为他早就死了。虽然数十年来对马克思主义没有多少兴趣，他还是在“一战”临近尾声时加入了法国共产党，此时他已年届六十。他于1944年去世，如果不是德国占领了巴黎，他本打算将自己丰富的艺术收藏品赠送给苏联。Sweetman, *Explosive Acts*, pp. 493-5.

3 比萨洛(以及其子吕西安)是正儿八经的激进分子。卡米列是犹太人，出生于丹属安的列斯群岛。因此，他曾见过加勒比海的奴隶叛乱被野蛮镇压，也体会过法国学校的反犹主义。德加斯和勒努瓦尔(Renoir)通常称他为“犹太人比萨洛”。*Ibid.*, p. 220.

过于 1885 年比利时工人党的成立，以及次年左拉小说《萌芽》的出版。

比利时工人党与《萌芽》

在 19 世纪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比利时是仅次于英国的工业化国家。不过，政治上它还颇为落后，选举权十分有限，权力大多掌控在支持自由贸易的自由主义大亨手中。19 世纪晚期，国家元首莱奥波尔多二世为了补救这一形势，断然发动了外交和军事干涉，让自己在 1885 年成了刚果的绝对统治者。不过，就在同一年，著名的埃米尔·范德费尔德（Émile Vandervelde）组建了比利时工人党，极大地动员了工人阶级，使得选举权在 10 年不到的时间里迅速扩大，而且工人党在议会的席位超越了曾不可一世的自由派。范德费尔德认为自己是一位开明的马克思主义者，尊重比利时工人中间的蒲鲁东主义传统，与许多和平的无政府主义者也有友好的关系。此外，他还热爱艺术，密友中不少是比利时的激进前卫艺术家——这一点也许更引人注目。借助这些关系，他在布鲁塞尔开办了人民之家，非常成功。他雇用埃米尔·维尔哈伦运作人民之家的艺术部门。维尔哈伦于是将比利时前卫画家（被称为“二十人团”）带进了工人党的圈子。画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倾向于无政府主义的幻想艺术家詹姆士·恩索尔。在文学界，维尔哈伦也同样颇有人缘，赢得了众多人的支持，

其中就有梅特林克（范德费尔德后来满怀深情地回忆起他，称他是“有闯劲的革命者”）。¹ 艺术期刊《现代艺术》以及文艺期刊《红色杂志》不仅培育了当地青年才俊，而且在同时维持了坚定的世界主义立场。组织以维尔哈伦和范德费尔德为主轴，于斯曼和费内翁也受邀做评论家——这些我们在前面已经看到了——而与此同时，法国的印象派和后印象派迫切地想要在布鲁塞尔的展览会上展示他们最新的作品。（这就是1890年1月黎萨尔前来撰写《煽动者》的那个布鲁塞尔——此时正值《白色杂志》在列日创刊的一个月之后。）法国和比利时作家相互在对方的杂志上发表作品，威廉·莫里斯的理念与作品也得到了非常热烈的欢迎。比利时工人党的领导者和政策给法国施加了实质性的影响。虽说此前严肃而缺乏教养的朱尔·盖德（Jules Guesde）一度避免与巴黎知识界有任何接触，但19世纪90年代中期让·乔尔（Jean Jaures）逐渐接替了他，极力效法比利时的模式。²

虽然左拉曾遭到巴黎文艺激进分子的不屑，他的《萌芽》却无疑引发了一场政治轰动，每被译成另一种欧洲语言，就会将影响带到那个国家。《萌芽》以对东北昂赞煤田的一场艰苦、悲剧的罢工的大量研究为基础而写就。（一部“社会”

1 我们知道梅特林克也许主要是他曾写过以中世纪为背景的剧本《佩雷亚斯与梅丽桑德》（*Pelléas et Mélisande*），但其实他也是1889年布鲁塞尔社会主义中老学者联谊会最早的成员之一。直到1913年大罢工期间，他仍然在为工人党的《五一画册》（*Album du premier mai*）撰稿。参见Herbert, *The Artist*, p. 99。

2 上述段落大部分参考了同上书，*Ibid.*, p. 9, 27-34, 67-71。

小说能够产生比纪实报道更深、更长远的政治影响，这在19世纪并不少见。) 尽管左拉带有敌意地描述了煤炭工人当中的“革命派”，但《萌芽》仍然为读者描绘了一幅恐怖的图景：矿工的贫困、因工致病、缺乏安全措施，以及矿场主的剥削。¹ 克列孟梭曾亲身造访过罢工的矿工，并为自己所观察到的情形感到震惊。值得注意的是，煤田也与亨利1894年的一次致命袭击有所联系（也许是通过左拉）。亨利男扮女装，在卡尔莫煤田协会（*Société des Mines Carmaux*）的办公室内放了一颗炸弹，以惩罚诡计不成叫来武装警察镇压工人罢工的那些卡尔莫煤田老板。尽管社会主义议员承诺从中斡旋，但几个月后事情都没有结果，而工人们却因没有收入而挨饿。亨利的炸弹被人发现并送去了警察局。炸弹在警察局爆炸，炸死了五名警察和一名男孩。²

德雷福斯事件

“恶棍法”（*lois scélérates*）颁布之后，接下去三年政治氛围风云突变。最能体现这一点的，莫过于《白色杂志》1897年初春出版的宏刊《巴黎公社研究》（“*Enquête sur la Commune*”），著名的无政府主义者勒克吕、路易斯·米歇尔、

1 *Ibid.*, p. 162. 赫伯特甚至认为，《萌芽》是第一部瞄准工人阶级的小说。左拉在转变。

2 Halperin, *Félix Fénéon*, pp. 272-3.

让·格拉夫等纷纷撰文，克列孟梭的妹夫、激进贵族亨利·罗什福尔的一篇文章也在杂志上发表。塔里达的文章同样备受关注，同时，我们还能看到马拉美、拉佛格、贾里（Jarri）、丹尼尔·哈勒维（Daniel Halevy）、尼采、已故的爱德华·陶威斯·德克尔、保罗·亚当以及于斯曼的同性朋友让·洛兰。多年以后，出生于1872年的莱昂·布鲁姆将会这样写道：“我那一代文学人当中……充满了无政府主义思想。”¹

阿尔弗雷德·德雷福斯将军起先因充当德国间谍的指控被草草定罪，随后于1894年秋被流放到恶魔岛（卡尔诺的年轻杀手受绞刑和三十人审判的仅仅三个月后）。人们最初并没有把这起事件放在心上，只有费内翁在《白色杂志》上刊文批判了法庭判决。但到了1896年，犹太人德雷福斯是被反犹的、贵族出身的高级军官构陷的证据逐渐水落石出，在当时引发了一场强烈的媒体运动，迫使政府于1897年10月逮捕了真犯马里-夏尔·埃斯特拉齐少校，并于次年1月审判了他。审判仅持续了一天。结果，法庭竟厚颜无耻地将其无罪开释。不料此举引来了左拉发表于克列孟梭办的《震旦》上的那封著名的公开信——《我控诉》。四面楚歌的法国当局没有办法，只能在1898年2月将左拉送上了法庭。法庭判处他罚金和监禁。一时间，左派知识分子所说的这位“资产阶级小说家”，突然就成了左派的英雄。² 这起事件又

183

1 引自 Herbert, *The Artist*, p. 12.

2 许多作家鄙视左拉，认为他是个“资产阶级”小说家，是个急急忙忙（转下页）

引发了右派和左派之间大规模的政治冲突，也正是在此期间，许多前卫知识分子破天荒地开始活跃在政治舞台，而他们当中最热心的（如奥克塔夫·米尔博）差点被反犹太主义暴民谋杀。¹

与此同时，居住在巴黎的古巴流亡者在马蒂起义爆发后日渐活跃起来，游说（而且是逐渐成功）克列孟梭这样的一流记者撰文支持他们祖国的事业，表示对反帝国主义的支持。²

之前我们曾提及，塔里达并没有在巴黎待多久。西班牙的外交压力迫使他流亡到比利时。³ 然后他从比利时穿过多佛海峡。这也就是为什么他后来许多写给《白色杂志》的文章发自伦敦。此时的伦敦从政治上讲仍然是世界最重要的城市，也是众多无政府主义者逃离本国政府迫害的避难所。在英国，蒙胡伊克和德雷福斯这两件交织在一起的丑闻引发了广泛的愤慨，在基尔·哈迪（Keir Hardie）、拉姆塞·麦克唐

（接上页）想为自己做证的俗人。最高法院于4月推翻了此次判决。随后举行了第二场审判。但左拉因为自己的政治目的业已实现，已经逃往英国，一直等到法国大赦才回到国内。

1 Herbert, *The Artist*, p. 203. 米拉波当时正在《震旦》工作。

2 根据右翼作家爱德华·科明·科洛梅尔（Eduardo Comin Colomer）的说法，塔里达结识了当时在孔多赛高中教西班牙语的无政府主义者弗朗西斯科·费雷尔·瓜尔迪亚（他的故事后文还会讲到），以及一群强力支持古巴独立的人士，包括克列孟梭、阿里斯蒂德·布里昂（Aristide Briand）、夏尔·马拉托（Charles Malato）、亨利·罗什福尔以及贝坦西斯领导的加勒比激进分子。参见他的 *Historia del anarquismo español*（Barcelona: Editorial AHR, 1956），Tomo I, pp. 180–81。

3 Fernández, *La sangre de Santa Águeda*, p. 27.

纳 (Ramsay MacDonald) 还有其他一些人的安排下, 这位年轻的古巴无政府主义者进行了漫长的公开巡回演讲, 受到了热烈的欢迎。¹ 在这个与西班牙积怨甚深的国家, 说起“新宗教纠问”很能吸引眼球。塔里达巧妙地利用了他与各大洲、各国之间的联系, 促成了自由主义者、共济会士、社会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反帝国主义者以及反教权主义者的联合, 共同反对西班牙首相。且看加入这场运动的报纸、期刊的名录 (只是小小一部分)² :

184

法国: 克列孟梭的《正义》, 罗什福尔的《不妥协者》(*L'intransigent*)、《日报》(*Les Jour*)、《巴黎回声》(*L'Écho de Paris*), 让·格拉夫的《新时代》(*Les Temps Nouveaux*)、《绝对自由主义》(*Le Libertaire*)、《小共和国》(*La Petite République*), 以及《闲老头》。

英国: 《泰晤士报》, 《每日记事》(*The Daily Chronicle*), 《自由》(*Freedom*)。

西班牙: 《国家》(*El País*), 《正义》, 《自

1 塔里达发觉他喜欢上了英国, 最终在那里定居下来, 唉, 也许因此成了费边社会主义者。他在“一战”期间英年早逝。

2 科明的 *Historia del anarquismo español*, vol. 1, pp. 173-5; 以及 Esenwein, *Anarchist Ideology*, p. 194。Fernández, *Santa Águeda*, p. 31 引用了 Paul Avrich, *An American Anarchist: The Life of Voltairine de Cleyr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8), pp. 112-13, 称仅在费城, 《纠问官》的英译本就刊发了五万份。

治》(*La Autonomia*),《公正》(*El Imparcial*)以及皮·伊·马高尔的《新政权》(*El Nuevo Régimen*)。

德国:《法兰克福杂志》(*Frankfurter Zeitung*),《前进》(*Vorwärts*)以及《社会主义者》(*Der Sozialist*)。

意大利:罗马的《讲坛》(*La Tribuna*)以及梅西纳的《未来》(*L'Avvenire*)。

葡萄牙:《自由》(*A libertade*),《道路》(*O Caminho*)以及《劳动者》(*O Trabalhador*)。

罗马尼亚:《社会动向》(*Miscarea Sociala*)。

阿根廷:《受压迫者》(*El Oprimido*),《革命》(*La Revolución*)以及意大利语的《未来》。

美国:波士顿的《自由》(*Liberty*),纽约古巴人的《觉醒者》(*El Despertar*)以及坦帕古巴人的《奴隶》(*El Esclavo*)。

卡诺瓦斯发觉在外界他找不到有力的援手,甚至欧洲天主教国家也爱莫能助。奥匈帝国正被它国内的武装民族主义和巴尔干人搞得焦头烂额,法国因为德雷福斯事件闹得不可开交,意大利则还在1896年3月阿达瓦战败的灾难性后果中挣扎。但卡诺瓦斯没有因此被吓破了胆。我们之前也看到了,他批准几位相对出名的蒙胡伊克囚犯到国外流亡,但大多数没有在军事监狱审判的人被引渡到了环境艰苦的西属非

洲营地。与这些人一同被引渡的，还有哈瓦那押送来的古巴“闹事者”。1897年5月5日，因基督圣体日“暴行”被判死刑的阿谢里和四名西班牙人遭到处决，但没过多久，获释者中有人偷偷带出了一些信件，信中描述了他们在狱中受到的虐待，并宣称他们是无辜的。三个月后，卡诺瓦斯在劫难逃，在圣阿格达的巴斯克兰温泉遭到了血腥的政治谋杀。

安的列斯爱国者：贝坦西斯博士

1827年4月8日，拉蒙·贝坦西斯出生于波多黎各的卡沃罗霍——早托尔斯泰一年半。我们并不清楚带着非洲血统的他是怎样成长起来的（况且他似乎还是私生子）。但不管怎么说，他有位足够富裕、观念足够现代的父亲。父亲送这位早慧的少年到图卢兹中学学医，在那里他习得了一口流利的法语。之后，他在索邦继续接受医学教育，于1853年毕业。1855年，在返回波多黎各前，他在当年的霍乱疫情中崭露头角。由于从小受狄德罗和拜伦熏陶，他在1848年革命（它同时也废除了法属加勒比地区的奴隶制）时一度投笔从戎，巴黎巷战中甚至可能曾有他的身影。¹ 在接下去

1 “他积极地参与了法国1848年革命……这场革命对于他来说就像是神秘的启示一般。” Felix Ojeda Reyes, “Ramón Emeterio Betances, Patriarca de la Antillanía,” in Félix Ojeda Reyes and Paul Estrade, eds., *Pasión por la libertad* (San Juan, P. R.: Editorial de la Universidad de Puerto Rico, 2000), p. 32.

的 50 年余生中,他致力于行医(他与黎萨尔一样是眼科医生)以及参加激进的共和主义、反殖民主义政治运动。从接触政治伊始他便是废奴主义者,后来又倾心于玻利瓦尔式的跨洲解放运动,目的是推翻衰老而野蛮的西班牙殖民主义,以及他所说的“美国牛头怪”这种饥渴的帝国主义。¹虽说他的祖国是波多黎各,但他还坚信,地理上较为分散、受多重殖民又不具备军事意义的加勒比群岛只有团结成“玻利瓦尔”式的安的列斯联邦(它会将海地、丹麦殖民地圣托马斯以及其他非盎格鲁-撒克逊殖民地集合起来),才有存活和进步的可能。²他相信,实现这个梦想有一个条件,也就是他所说的古巴、波多黎各、圣多明戈的完全去西班牙化;因此,他完全反对殖民者的“同化”意识形态,也完全不信任西班牙人或美国人的好意。³

19 世纪 60 年代回到加勒比地区后,他积极支持恢复多米尼加独立的武装斗争(1863—1865 年,见第三章),还在

1 1870 年 4 月 8 日,他在王子港为他的古巴同胞 Rican Francisco Basora 写了一封信。Paul Estrade 对此有引用。“El herald de la ‘independencia absoluta’,” in Ojeda and Estrade, eds., *Pasión por la libertad*, p. 5.

2 1870 年 2 月到 1871 年初秋,贝坦西斯在海地居住。他帮助当地人对付霍乱疫情,还写了一篇讲述亚历山大·佩蒂翁(Alexandre Pétion)的文章,颇为引人注目。佩蒂翁是海地的爱国者,贝坦西斯从委内瑞拉逃离时,此人正在玻利瓦尔躲避,他为贝坦西斯后来回国提供了重要的军事支援。贝坦西斯的书于 1871 年在纽约出版。当代版本收录在 Carlos A. Rama 编辑的选集当中,书名是 *Les Antillas para los Antillanos* (San Juan: Instituto de Cultura Puertorriqueña, 1975)。他因为赞美佩蒂翁而招来了杜桑过于严厉的批评。

3 “Es igual yugo por yugo”(除狼得虎)。Estrade, “El heraldo,” p. 5.

波多黎各本土进行激进宣传，直到不得不潜逃为止。在1872年返回巴黎以前，他居无定所——圣托马斯、海地、多米尼加共和国、委内瑞拉乃至纽约——遭到西班牙间谍的追踪，受到独立后腐败的专制政权的威胁，而且还被屈服于马德里压力的非西班牙殖民地政府定罪。¹他把时间都用于为穷人治病，撰写强有力的政论文章，采购他所能采购到的武器，将它们藏匿至起义时机成熟时。他也在很大程度上激发了波多黎各本土的第一场武装起义，此事发生在1868年9月9日的山城拉雷斯——塞斯佩德斯宣布古巴独立的仅仅四周前——持续时间不到一天。²起义没带来什么实质性影响，原因不外乎他对武装起义的执着，而且他的秘密组织方法总有挥之不去的共济会极左冒险主义和1848年的气息。³但经过这次波澜，他成了传奇人物。

贝坦西斯于1871年底回到了巴黎。此时巴黎公社落幕已有八个月。之后，他便将在巴黎度过余生。⁴他的医术最终为他赢得了荣誉骑士团勋章，但他从未停止论辩文章的制作——马尼拉的公主已经是个很好的例子——并且在巴黎和

1 在纽约贝坦西斯协助创办了波多黎各革命委员会（1867年7月16日）。委员会的宣言谴责了奴隶制、半岛的商业垄断集团、饥饿、学校缺乏以及殖民地毫无进步的状况。一个月后，他面不改色地在法庭前发誓自己本是想成为美国公民——算计着这样也许能逃出西班牙的爪子——第二天就起程去了丹属圣托马斯！Ojeda, *El desterrado*, pp. 98-9.

2 贝坦西斯本人因为在荷兰殖民地库拉索打猎所以错过了这个历史性的事件。

3 两人之间有趣的相似性，参见Ojeda, *El desterrado*, pp. 349-51.

4 *Ibid.*, p. 221.

西欧其他地区培养了很多政治盟友。1879—1887年间，他甚至是在巴黎多米尼加公使馆谋得了一个显赫的职位，同时还兼管伦敦和伯尔尼方面的事务。¹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也顺理成章地成了巴黎“拉丁区”共同体的老前辈（他在其他国家也有影响，不过不像在巴黎那么大）。贝坦西斯这样立场和脾气的人，要玩转这个角色可不容易。19世纪90年代中期，在这座启蒙之城里，有三百多名古巴人和波多黎各人，另外还有四百多名来自拉美其他国家的人士。他们几乎个个都是富豪，有大农场主、银行家、医生、实业家，还有花花公子。他们的政策倾向要么是彻头彻尾的保守主义，要么（充其量）是同化论自由主义者。奥赫达即不无讽刺地写道：“（拉丁区共同体）里边一个黑人也没有。手工艺人也寥寥无几。”^{2*}这与坦帕、骨头礁以及纽约的古巴人社群简直是天壤之别。马蒂是在这些整体上较为贫困的工人阶级中找到他的支持者的。但贝坦西斯更多的是用个性、医术以及每周的社交活动维持他的圈子的。每周的定期会面（*tertulias*）在他坐落于沙托丹街6号乙的宽敞办公室中举行。令人惊奇的是，这里离黎萨尔富有的朋友瓦朗坦·文图拉（《煽动者》出版的资助者）的住所（在4号乙）只隔了一两幢楼房。³

187

1 Estrade, "El heraldo," p. 10.

2 Ojeda, *El desterrado*, p. 338.

3 参见文图拉1890年2月5日和5月19日给黎萨尔的信。第一封说他签下了一份两年的租约，第二封说他将要搬进去住了。黎萨尔1891年10月的时候便住在那里，而后动身前往马赛和香港。 *Cartas entre Rizal y sus colegas*, pp. 493-4, 531.

我们这位年长的贝坦西斯有一个特点，就是务实，他欢迎任何可能成为盟友的人。他本人虽然远算不上无政府主义者，但也许出乎他意料的是，他的盟友当中最富有活力的却当属无政府主义者（或倾向于无政府主义的人士）。马蒂一直以来都在尖锐地批判无政府主义，指责它蔑视一般意义上的政治，而且否定祖国的概念。另外，有不少无政府主义者在民族主义运动领袖们的身上，看到了权力欲和选举癖，而这样的迹象说明，民族独立对改善工人阶级的真实生活没有多大帮助。¹ 在巴黎，贝坦西斯的朋友主要是前巴黎公社成员和还有无政府主义知识分子。勒克吕（1830年生）和米歇尔（1830年生）与他是同代人，还有亨利·鲍尔——杜马的私生子、巴黎公社成员，曾进过新喀里多尼亚的刑事监狱。罗什福尔也在，还有法国无政府主义者夏尔·马拉托。贝坦西斯说服马拉托去巴塞罗那，在那边煽动工人起义，从而减弱韦勒对古巴的攻势。²（当然，马拉托没有成功。）这些人没有去过古巴或菲律宾，对于他们的民族主义也没有投入任何感情。但对于法国政府，他们有着许多不美好的经历，不论是它的内政还是对外殖民（新喀里多尼亚，恶魔岛）。卡

1 Francesco Tamburini 很好地指出了这一点。参见他的“Michele Angiolillo e l'assassinio di Cánovas del Castillo,” *Spagna contemporanea* [Alessandria, Piedmont] IV:9 (1996), pp. 101–30, at p. 117。理论上讲也许确实如此。但古巴民族主义将许多地方无政府主义者带到了马蒂一边，西班牙民族主义又暗地里强化了西班牙无政府主义对于古巴（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分裂主义乌托邦理论的不信任。

2 Ojeda, *El desterrado*, pp. 339, 348; Estrade, “El heraldo,” p. 9.

诺瓦斯和韦勒可以被看成是伊比利亚半岛的梯也尔和加列尼（分别是粉碎了巴黎公社的法国总统和征服并建立了法属非洲殖民地的将军）。促使他们进入贝坦西斯的圈子的，与其说是渴望古巴和菲律宾取得自由，不如说是因为他们都反感于西班牙政府在蒙胡伊克、古巴和菲律宾的暴行。

188

出了法国，与贝坦西斯关系最密切的是受加里波第传统影响的意大利无政府主义者。他们愤慨于首相弗朗西斯科·克里斯皮的高压政策，也不满意意大利在埃塞俄比亚令人厌恶的惨败。1848年的精神——“民族之春”——在这中间也起到了作用。作为1848年的过来人，贝坦西斯支持当年革命同志当中的许多人前往古巴，从事加里波第式的革命斗争。但马蒂的革命组织位于纽约的总部总是从中作梗。总部的主管是托马斯·埃斯特拉达·帕尔马（Tomás Estrada Palma），他之所以要这样做，为的是防止“外国人”搅和岛上的斗争。¹ 颇为奇怪的是，贝坦西斯的小圈子下面，最活跃的分部之一在比利时，负责的是年轻的古巴工程师佩德罗·赫雷拉·索托伦哥（Pedro Herrera Sotolongo），他是黎萨尔的保护者亚历杭德里诺和埃万杰利斯塔的同学、好友。² 不消说，

1 参见 Francesco Tamburini, “Betances, los mambises italianos, y Michele Angiolillo,” in Ojeda and Estrade, eds, *Pasión por la libertad*, pp. 75–82; 以及 Ojeda, *El desterrado*, pp. 362–71。

2 这个委员会由两名古巴人、两名比利时人和一名叫费迪南·布鲁克的年轻英国人组成。这位英国人的哥哥曾去古巴打过西班牙人。Paul Estrade, *Solidaridad con Cuba Libre, 1895–1898. La impresionante labor del Dr Betances en París*（转下页）

与非古巴人无政府主义者友人一道，让这样一个古巴富人群体（不仅没有黑人或手工艺者，也没有任何无政府主义者）乖乖听话，差不多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我们这位波多黎各人依然实现了某种程度的成功。

最终，在1895年马蒂发动独立战争之际，贝坦西斯的时刻降临了。这两人似乎从未见过面，现存的通信也极少。但虽说贝坦西斯的年纪差不多是马蒂的两倍，生活经历也与这位年轻人全然不同，他们却十分尊敬对方。¹ 在马蒂位于纽约的革命总部，总有几位波多黎各人在高层任职，波多黎各人在十年战争中也扮演了自己的角色。顺理成章地，1896年4月2日，贝坦西斯被正式任命为古巴革命驻巴黎最高外交特使。此举不仅是对他的资历和声望的肯定，也是出于他对西欧的了解，以及他在西欧所拥有的、无他人可以匹敌的政治人脉。

189 还需要附加说明的一点是，贝坦西斯一直都对菲律宾革命抱有热切的兴趣。其中一部分原因在于菲律宾革命可以分散西班牙在古巴的军力，但与此同时，他当然也支持这场革

（接上页）（San Juan: Editorial de la Universidad de Puerto Rico, 2001），p. 143。赫雷拉在亚历杭德里诺移居香港后也与他保持密切联系。他向贝坦西斯传达了他所得知的有关菲律宾革命进展的消息。1897年，贝坦西斯办的刊物《古巴共和国》（*La República Cubana*）刊登了亚历杭德里诺的两封信（盖有香港的邮戳），一封写于7月，另一封9月。黎萨尔的保护者也曾利用他与赫雷拉的联系，敦促纽约的古巴人资助武器。我们不清楚亚历杭德里诺是自行做的决定，抑或是受他名义上的上司马利亚诺·庞塞的指示。

1 有关他们之间的关系，参见 Ojeda and Estrade, eds., *El desterrado*, pp. 329–33。

命甜蜜的民族主义理想。早在 1896 年 9 月 29 日，也就是博尼法乔发动起义的一个月后，这位医生致信纽约的埃斯特拉达，称起义事态的严重性远超西班牙公众的想象，西班牙已经派遣了 1.5 万人的部队前往镇压。¹ 同月，贝坦西斯的刊物《古巴共和国》发表了两篇有关菲律宾的文章——题目是“自由菲律宾万岁！”以及“菲律宾人追求的是什么？”——表达了对这场起义的强烈支持。² 从赫雷拉处得知菲律宾人急需武器以后，他把消息转达给了纽约的埃斯特拉达，催促他做力所能及的帮助。³ 他也将黎萨尔最后的诗作寄去了佛罗里达，后来刊登在 1897 年 10 月 7 日的《骨头礁杂志》（*Revista de Cayo Hueso*）上，标题是“我最后的思考”（*Mi último pensamiento*）。⁴

安焦列洛：从福贾到圣阿格达

1871 年 6 月 5 日（也就是巴黎公社遭血腥镇压后不久），米歇尔（“米盖尔”）·安焦列洛出生于意大利南方城市福贾，距离马拉泰斯塔的那不勒斯 112 公里。⁵ 也就是说，他比贝

1 *Ibid.*, p. 372. 根据 Estrade, *Solidaridad*, p. 147, 贝坦西斯告诉埃斯特拉达他在西班牙使馆有眼线，给了他许多机密信息。

2 Estrade, *Solidaridad*, p. 147.

3 Ojeda, *El desterrado*, p. 373.

4 *Ibid.*, p. 374.

5 后面讲述的安焦列洛生平，主要参考了 Francesco Tamburini, “Michel (转下页)”

坦西斯小 44 岁。在一所技术学院念书时，他意识到自己是激进共和派，深切地反对君主制。1892 年他被征召入伍，因为被发现参加过 1799 年帕耳忒诺珀共和国的纪念活动，受到了部队长官的严厉处分。¹ 退伍后他成了一名坚定的无政府主义者。1895 年选举期间，他发表宣言，反对克里斯皮首相颁布的类似“恶棍法”的法令，也因此被指控煽动阶级仇恨而遭逮捕。利用休庭期间的短暂自由，他向司法部长写了一封义正词严的信，抗议检察官的不公。为此，他被判入狱 18 个月、国内流放三年。就在此时，他去见了一位朋友，也是他以前的同学，罗伯特·德安吉奥（Robert d'Angiò）。后者已经是让·格拉夫的《新时代》（《反叛者》在三十人审判之后的新名字）的通讯员了。德安吉奥带他见了奥莱斯特·费拉拉。费拉拉当时还只是位名不见经传的法学生，但不久就会扬名于世。他是古巴革命的成员、马克西莫·戈麦斯将军的亲信，最后在赫拉尔多·马查多将军残酷统治的任期内（1925—1933 年）担任了古巴外交部长。² 费拉拉建议他逃离意大利。于是，在 1896 年初，他用化名经马赛抵达巴塞罗那。这座城市居住着不在少数的意大利工人和手工艺者，而且巴塞罗那的无政府主义活动也是远近闻名的。基督圣体日爆炸

（接上页）Angiolillo”。本文的作者全面研究了意大利到目前为止基本无人问津的、有关这位福贵人及其暗杀西班牙总理的国家档案。

1 帕耳忒诺珀共和国是 1796—1799 年，在拿破仑军队的保护下建立的四个意大利共和国当中的最后一个。它的首都是那不勒斯。

2 有关费拉拉的生涯，参见 Tamburini, “Betances,” pp. 76-7.



米歇尔·安焦列洛（左）；大名鼎鼎的费尔南多·塔里达·德尔·马尔默尔（右）

事件发生时，安焦列洛才刚刚安顿下来，做起了自由出版人（而且刚学会西班牙语）。城市随后实行戒严。他有不少朋友被关入蒙胡伊克，其中有卡耶塔诺·奥耶尔，安焦列洛曾与他在塔里达和森保的杂志《社会科学》（*La Ciencia Social*）共事。这些囚犯饱受虐待的谣言促使这位青年出版人逃离西班牙，前往法国。他在马赛因为伪造文书被捕，在监狱里待了一个月，随后被驱逐到比利时。在比利时，他在一家印刷厂找到了一份临时工作，这家印刷厂属于范德费尔德的比利时工人党的一名高层成员所有。之后他于1897年3月移居伦敦：此时是黎萨尔被处决的三个月之后，塔里达反对卡诺

瓦斯政权的斗争正值高潮。

此前说过，伦敦是当时受到迫害的大陆无政府主义者最安全的庇护所。现在，伦敦的西班牙无政府主义者分遣队里，又增加了像“费德里科·乌拉雷斯”（Federico Urales）和奥耶尔这样的人（奥耶尔在受到可怕的刑讯之后，因为证据缺乏得释，随后被驱逐出境）。在一个不怎么有名的机构“印刷”（Typographia）的帮助下（“印刷”是英国印刷工人工会为外国人保留的一个特别部门，他是这里边的成员），他重新操起了旧业。英国无政府主义者约瑟夫·佩里领导的西班牙暴行委员会于5月30日在特拉法尔加广场组织了一场巨大的示威游行，他也无疑是一万游行者当中的一员。在人群前面讲话的是一系列政界要人，包括闻名欧洲的塔里达，不过他不是以无政府主义的名义，而是以《白色杂志》的代表以及贝坦西斯的巴黎古巴革命代表团的代表身份出场。¹ 马拉托发表了激动人心的演讲，他问道，谁愿为何塞·黎萨尔和其他许许多多被卡诺瓦斯政权谋杀的人报仇。但最为催情的时刻，当属蒙胡伊克的受害者讲述他们的故事、露出他们残破躯体的时候。没过多久，安焦列洛就在一位流放中的西班牙无政府主义朋友的家中结识了奥耶尔和弗朗西斯科·加纳（另

1 Estrade, *Solidaridad*, p. 146; Tamburini 指出，在《纠问官》当中，塔里达颇为不真实地将自己描述为“一位古巴人，但不是煽动者；一位联邦主义者，但不是无政府主义者；一位自由思想人，但不是共济会士”。“Michele Angiolillo”第114页引用了塔里达这部名作的第36页。

一位饱受摧残的受害者)。当时在场的德国无政府主义者鲁道夫·罗克尔 (Rudolf Rocker) 这样描述了见面的场景：

那天晚上，加纳展示了他残废的双腿，以及刑讯后在周身留下的伤疤。此时我们才明白，相比阅读这些问题，真切地从受害者那里听到真相所带来的震撼要大得多……我们像是都变成了石头，呆坐在那里，好几分钟后嘴里才能说出几句愤怒的话。只有安焦列洛一言不发。不多久，他突然站了起来，简单地说了声再见，便离开了……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他。¹

此事没过多久，安焦列洛竟到了巴黎，他想的是复仇，袋子里藏着一把在伦敦购得的手枪。此时，他已经读了塔里达匆忙拼凑起来的《纠问官》(*Les Inquisiteurs d'Espagne*)。这个文本比其他所有文本都更翔实地强调了马尼拉、蒙胡伊克和哈瓦那之间的联系。² 据说他参加了罗什福尔和贝坦

192

1 Fernández, *La sangre de Santa Águeda*, p. 40, 引用鲁道夫·罗克尔的回忆录的西班牙语译本。En *la borrasca (Años de destierro)* (Puebla, Mexico: Edit. Cajica, 1967), pp. 118-20. 他也引用了克莱尔在与加纳见面以后给母亲写的一封信，信中写到他的手被烧红的热铁炮烙，手指甲被掰掉，脑袋被放到一个金属容器里压，睾丸也被扯掉。这一讲述出自我们之前引用过的 Avrich, *An American Anarchist*, p. 114。

2 根据 Max Nettlau, 此事发生在6月中旬。Nettlau 引用了让·格拉夫的《新时代》，1897年6月19日。

西斯有关西班牙政府跨洲暴行的演讲。也正是在这个时候，他在沙托丹街的例会上拜访了这位波多黎各人。贝坦西斯起初怀疑他是警察卧底，但塔里达和马拉托打消了他的疑虑，因为两人都曾在伦敦与安焦列洛有过交谈。贝坦西斯和安焦列洛最终面对面有过什么样的碰撞仍旧无从得知。贝坦西斯后来曾说到，安焦列洛告诉他自己计划去西班牙暗杀王后摄政以及婴儿国王阿方索十三世。我们这位善良的医生答复说这样做将是错误的：杀害一位妇女和儿童“公众影响恶劣”；况且，两人都应该为西班牙政府的残暴负责。真正的恶人是卡诺瓦斯。¹单纯从表面上看，这个叙述似乎有点失真，因为安焦列洛并非一个莽汉。他曾在戒严的巴塞罗那生活，与遭到刑讯的同志们谈过话，也参加过特拉法尔加广场的示威游行。他完全明白，卡诺瓦斯才是西班牙帝国的主人。也许这位波多黎各老人在写下这段话的时候，希望给后世留下他拯救了一位妇女和她的孩子的印象，同时揽到让安焦列洛将矛头指向西班牙首相的功劳。²差不多在30年以前，他曾写信给他的朋友、著名的多米尼加爱国者格雷戈里奥·鲁佩隆（Gregorio Luperón），谈及有必要逮捕并以叛国罪审判腐败的专制统治者布埃纳文图

1 参见 Fernández, *La sangre de Santa Águeda*, p. 45。他以很长的篇幅摘录了贝坦西斯的讲述。

2 需要补充的是，Tamburini 的研究有一个关键的元素，即有力地推翻了人们常常重复的故事：贝坦西斯（或罗什福尔）给了安焦列洛很大一笔钱（1000 法郎或 500 法郎）。

拉·巴埃斯 (Buenaventura Báez) :

我认为拿下巴埃斯并非没有可能，而且，多米尼加共和国亟需一场激进的改革。所以我赞同狄德罗——他似乎预见到了路易十六之死：“惩罚国王会永久性地改变一国的精神。”^{1*}

193

不管真相如何，总之，安焦列洛经波尔多到了马德里，被安托万·昂提涅克招待了几天。昂提涅克是蒲鲁东派传统的无政府主义青年。²在西班牙首都，他得知卡诺瓦斯正与他年轻许多的秘鲁妻子在圣阿格达的温泉度假。他入住了同一家酒店，观察了一两天后，于8月8日用在伦敦买的手枪将目标射死。安焦列洛没有企图逃跑。之后的那周，西班牙政府对他进行了为期三天的军事法庭密审。在辩护词里，他讲的主要是蒙胡伊克，也隐约谈到了古巴和菲律宾的战争。³他还说道，卡诺瓦斯“集宗教暴虐、军事残酷、司法

1 Ojeda, *El desterrado*, p. 121. 这里引用的是 Manuel Rodríguez Objio 的 *Gregorio Luperón e Historia de la Restauración* (Santiago, Dominican Republic: Editorial El Diario, 1939), Vol. 2, p. 167-168.

2 Tamburini 从昂提涅克的回忆录引用了如下悲伤的句子：“他反复读的只是塔里达·德尔·马尔默尔的《蒙胡伊克》，他的行李箱里除了这本书别无他物……临行的几小时前，我们跟他说：‘下次见，同志。’‘不，我们不会再见了。永别了。’说这话的时刻，他眼镜后面的眼睛闪着光。我们都惊呆了。”“Michele Angiolillo”, p. 118.

3 有趣的是，8月10日伦敦的《泰晤士报》和《每日电讯报》都刊登了路透社的报道，称有位名叫米歇尔·安焦·戈利 (Michele Angino Golli) 的人 (转下页)

无情、权力暴政、富裕阶层之贪婪于一身，而且是以其最令人厌恶的形式。我为西班牙、欧洲和全世界除害。因此我不是杀手，而是刽子手”。¹ 法庭随后判处他死刑。他于8月20日被绞死。在生命的最后一刻，据说他大喊：“热米纳尔！”² 因此，在巴罗哈笔下他是这样的形象：

他身材修长，很高，很呆板，举止很有礼节，操着外国口音的西班牙语。得知了他的所作所为，我惊讶不已。谁会相信一位如此绅士、如此羞怯的人能做出这样的事情？^{3*}

卡诺瓦斯之死不仅为在西班牙复辟“元首民主制”敲响了丧钟，还顺带着让古巴的韦勒倒台（这位将军立即就会明

（接上页）“承认他射杀卡诺瓦斯阁下为的是给巴塞罗那无政府主义者和在菲律宾被处决的起义领袖黎萨尔博士报仇。”第二天，《每日电讯报》为读者刊登了另一篇路透社报道，又写道：“据悉，戈利对他没有杀掉波拉比耶哈将军表示遗憾。波拉比耶哈将军是杀害运动领袖黎萨尔的主谋。”报道压根儿没有提到韦勒和古巴。感谢 Benjamin Hawkes-Louis 为我提供了这条信息。

1 Tamburini, “Michele Angiolillo,” pp. 123 and 129. 我从意大利语原文翻译出了引文。原文系 Tamburini 从 1897 年 9 月 2 日发表在安科纳的 *L'Agitazione* 上题为 *La difesa de Angiolillo* 的文章中摘录。

2 “热米纳尔”（*germinal*，萌芽）是无政府主义运动中很流行的战斗口号。它的流行也许是因为左拉的小说大获成功的缘故。Tamburini, “Michele Angiolillo,” p. 124. 但这一象征要追溯到法国大革命将春天的第一个月命名为“芽月”，也就是说，“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

3 Pío Baroja, *Aurora roja* (p. 160), 被 Núñez, *El terrorismo* (p. 131) 引用。

白这一点)。¹以战争大臣阿斯卡拉哈为首的临时政府只维持到了10月4日，随后执政已久的萨加斯塔上台。萨加斯塔再度让西斯蒙多·莫雷特做自己的海外领大臣。两人一直以来都公开反对卡诺瓦斯在古巴和巴塞罗那的政策（马蒂起义爆发时，萨加斯塔正在掌权，不过他也至少在言辞上曾表现强硬）。10月31日，韦勒交出了古巴帅印，接收者不外乎拉蒙·布兰科——那位曾试图挽救黎萨尔，但因为教士在卡诺瓦斯内阁和王后摄政那里的游说而被迫离开马尼拉的将军。²布兰科带着一道宽赦、妥协和改革的指令来到古巴。但一切为时已晚。强硬的殖民地民众用有组织的暴动作为迎接 [60 195 年后，吉·莫列特（Guy Mollet）在阿尔及利亚也会遇上这样的情境]。革命者们对第二个《桑洪条约》已毫无好感。美帝国主义也蠢蠢欲动。八个月后，美国成了古巴的主人。确实，也许只有韦勒有能力和决心重重打击一下麦金利、罗

1 这位将军——贝坦西斯喜欢叫他迷你阿提拉——也许还会感到松了口气。费尔南德斯讲到他在前一年4月没有被炸死已经是万幸。当时，在两位阿斯图里无政府主义者的帮助下，一位名叫阿曼多·安德烈（Armando André）的古巴民族主义青年在总督府邸一楼厕所的屋顶上藏了炸弹。按照预先设计，韦勒只要坐上马桶，炸弹就会爆炸，整个二楼天花板就会掉落下来，砸烂他的脑袋。不过，这几位密谋者并不知道，韦勒的痔疮很严重，几乎从来不用这个厕所，而更喜欢用一个陶土做的野外马桶。炸弹爆炸了，但没有人受伤。韦勒决定向马德里报告，称爆炸是堵塞导致厕所气体无法正常排放所致。

2 11月19日韦勒返回西班牙赢得了民众的热烈欢迎。新成立的自由主义政府对此恐慌不已，担心他会领导政变。但这位将军可不是傻子，他遵守宪法，丝毫没有怂恿他的支持者，使得他们随后转向强硬的天主教政治家波拉比耶哈，寻求行动的可能性。参见 Martín, *Valeriano Weyler*, 第8章。

斯福以及赫斯特的财力。

进入大漩涡

在黎萨尔被处决、处决的政治施行者卡诺瓦斯遭暗杀的这七个月里，菲律宾发生了什么呢？

波拉比耶哈在菲律宾只待了四个月，但他短暂的统治却将产生长远的影响。黎萨尔死后 12 天，12 位知名菲律宾人在百万富翁弗朗西斯科·罗克萨斯的“带领下”，走上了处死这位小说家的刑场。韦勒主义降临马尼拉。¹

不过，波拉比耶哈的主要任务是在军事上击垮叛军。就这个目的而言，除了山地省份甲米地还没有夺回控制以外，他取得了成功。在甲米地，他的军队受复杂的战壕和要塞体系的阻碍，迟迟未有战果。这套防御体系是在黎萨尔前保护者埃万杰利斯塔的指令下设计和建造的，此人从根特怀揣着

1 没有理由相信他们所受的指控是真实的。这些人当中，有的曾参与了 1892 年黎萨尔的菲律宾协会，有的曾与德尔·皮拉尔以及《团结》的圈子有书信往来，有的是富裕因而谨慎的民族主义者。奥坎波提到博尼法乔曾向罗克萨斯请求资金，帮助卡提普南，但这位百万富翁拒绝了。这位愤怒的革命者于是叫他的亲信助手埃米利奥·哈辛托（Emilio Jacinto）在卡提普南党的成员名单上伪造了他们这些人的签名，放到西班牙警察能发现的地方。他似乎以为他们会因此被逮捕或刑讯，进而坚定他们的革命信念。Ocampo, *Rizal without the Overcoat*, p. 246；也可参见特奥多罗·阿贡西约的 *A Short History*, p. 86。这部简史是以他开创性的两卷本菲律宾革命史研究为基础的。



卡提普南革命协会的创办者安德雷斯·博尼法乔

一张民用工程师文凭回国，投身建设。¹波拉比耶哈的攻势带来了政治上的后果，迫使博尼法乔撤出其拥有绝对权威的马尼拉地区，进入甲米地。博尼法乔对甲米地这个省份并不熟悉，而那里的民众素以派系纷争闻名。²果不其然，他与雄心勃勃的甲米地人派系领袖埃米利奥·阿吉纳尔多（Emilio

1 埃万杰利斯塔在1897年2月17日的一次行动中死亡。

2 该省讲的是一种特殊的塔加洛方言。一直以来，地方上的豪强以复杂的通婚习俗而闻名。

196 Aguinardo) 爆发了冲突。阿吉纳尔多是小城卡维特的市长，时年 27 岁。他既不属于黎萨尔所代表的那批受过高等教育的文化精英，也不属于那些通常是自学成才的马尼拉匠人（比如博尼法乔）。他的西班牙语讲得一般，不过却是商业化农业的一员，是拥有中等规模土地的乡绅，其家族在甲米地地区颇有根系。他于 1895 年 3 月加入卡提普南，当时虽然能力平平，但一打起仗来，他马上展露出自己的军事天赋。

3 月，在特赫罗斯城举行了一场选举。选举将确定革命的领导者以及革命政府的成员。博尼法乔大可以名正言顺地宣称是他组建了卡提普南——阿吉纳尔多后来加入了——并发起了起义。但阿吉纳尔多的支持者觉得博尼法乔在马尼拉的起义是彻底的失败，已成过去了。前头要完成的任务是有效地进行斗争，退守甲米地使得这个任务尤为艰巨。最后，阿吉纳尔多赢得了选举，组建了一个几乎完全由甲米地人组成的内阁。此外，前领袖因为没接受过常规教育、出身卑微而受到鄙夷。博尼法乔没有因此一蹶不振，而是开始集结他能够集结的所有支持者。阿吉纳尔多集团随后将其逮捕，在 4 月开庭审判，最终以背叛革命罪判处他死刑——要知道这场革命可是博尼法乔发动的！他和他的一个亲兄弟于 5 月 10 日被处决。

197 我们不清楚波拉比耶哈是否了解这些动向（如果了解的话，他是否关心此事？）。4 月，他因为厌恶马德里不愿或

不能派遣他认为平定叛乱所需的军事支援，而辞去总督一职（一如他之前在古巴所做的）。1896年末，他的军力提升到了1.6万人，1897年1月，他又得到了1.33万人，共计2.93万人。之后却什么也没有发生。¹如果起义扩散到群岛更远的地方，他根本没有人力实现自己的使命。卡诺瓦斯似乎也意识到，菲律宾韦勒主义的时代已成过去。而其他资深将领，在得知迫使能征善战的波拉比耶哈挂印的条件后，也不会愿意在政策不改变的情况下接手烂摊子。4月，费尔南多·普里莫·德·里维拉（Fernando Primo de Rivera）抵达菲律宾接替波拉比耶哈。19世纪80年代初，他曾是位小有名气的总督，当时是黎萨尔行将前往欧洲的时候。依靠自己对殖民地的了解、军事经历和政治手腕，他可能会采取两面政策，一方面推行能够吸引地方精英的政策，另一方面继续讨伐叛军（即使现在这需要慎之又慎）。也许可以说，这是某种布兰科主义的复活。事实上，新任总督确实成功夺回了甲米地，但没有逮住阿吉纳尔多及他的将领们。在绕过马尼拉后，阿吉纳尔多一行在首都北面一个布满岩石的堡垒中躲了起来，之后攻击他们的军事行动就再没有成功的了。²

5月17日，博尼法乔受处决的一周后，普里莫摆出了

1 Corpus, *The Roots*, vol. 2, p. 239.

2 如今，分岩（Biak-na-Bató）是游客不怎么到访的官方历史遗址。涉蜿蜒的小河而上，可以找到蝙蝠乱飞的石灰石洞穴。阿吉纳尔多和他的手下被认为曾在这里躲藏过。

自认为是一重大妥协的姿态，赦免了被布兰科或波拉比耶哈囚禁的 636 人。他还邀请了这群人中的代表团到他的官邸，向他表示感谢和重新效忠的决心。但会面给他带来了不愉快的惊讶。代表团中为首的正是伊萨贝洛·德·洛斯·雷耶斯，他是在博尼法乔起义后旋即遭到逮捕的。这位繁忙的民俗学家兼记者完全被起义震惊了。监狱对他来说是极为可怕的打击。几个月后，马里亚诺·庞塞给布卢门特里特写信道：

198

可怜的伊萨贝洛，这样一个和蔼、沉静的人物，却因为一系列变故（最严重的是他妻子过世），还有他不久前经历过的身体上的折磨，变得紧张而易激，以致差点当众大骂他所认为的不公和野蛮行径，以及这种极度不公的根源——宗教修会。^{1*}

确实，他体弱多病的妻子在他入狱期间去世，而且波拉比耶哈不允许他参加妻子的葬礼，也隔绝了他与自己那群孩子的联系。

不管怎样，开会时伊萨贝洛带着一本言辞激烈的备忘录；这个册子他已经印送给了西班牙的友人，大致讲述了他所认为的作为文明人（*ilustrados*）和平解决此事的条件。最首要

1 庞塞在香港给布卢门特里特写的信，落款日期为 1897 年 9 月 22 日。参见 Ponce, *Cartas sobre la Revolución, 1897-1900* (Manila: Bureau of Printing, 1932), pp. 42-5。庞塞写到他从某位成员那里听说了有关这位代表与普里莫会面的事。

的一条是立即将修会驱逐出菲律宾，而且他极为详细地罗列了他们滥用权力的暴行。随后，他坚持要普里莫讲解政府打算如何应对殖民地的诉求，或至少是如何给他本人所属的同化“党人”（19世纪的意义）一个交代。总督的反应“仿佛像是被蛇咬了一般”。¹伊萨贝洛的无礼令总督大为光火（“脾气太大，净想出风头”）。三天后，他下令再度将其逮捕，关入马尼拉的毕里比得监狱。²没过多久，伊萨贝洛被秘密押送到了戒严中的巴塞罗那。当局告诉船长不要让这个年轻的家伙和任何菲律宾人接触，以免他“造成很大的影响”。³一个月后，船抵达了巴塞罗那。此时卡诺瓦斯还未被暗杀，正活得好好的。伊萨贝洛被关入巴塞罗那市的监狱。另一位囚犯，加泰罗尼亚老兵、无政府主义—共和主义记者伊格纳西奥·波·伊·辛格拉（Ignacio Bó y Singla）通过贿赂得以与他接触。这位记者是个值得尊敬的人物，正在为期六年的服刑期间，罪行是他曾支持古巴独立，反对将西班牙军队送到韦勒的哈瓦那。他告诉这位不知所措的菲律宾人，“先进的共和派”支持菲律宾独立。⁴但这还只是个开头。

1 Ponce, *Cartas*, p. 24. 给布卢门特里特的信，1897年8月18日写于香港。原文为：*el General saltó como picado por una culebra*。

2 Scott, *The Unión Obrera Democrática*, p. 14, 引用普里莫与马德里高层的书信。

3 *Ibid.* 有意思的是，在上面引用过的庞塞8月18日写给布卢门特里特的信中，他说他在乘客名单中没有看到伊萨贝洛，意思就是他在马尼拉有眼线监视船只的乘客。用现在的话来说，他担心这位民俗学家“被消失”了。

4 *Ibid.*, p. 14. 1900年，伊萨贝洛回忆道：“我在巴塞罗那国立监狱被严加看管，不能与外界人接触，进我的囚室要过三道有锁的门；但杰出的联邦主义（转下页）”

199

一周后，伊萨贝洛被移送到蒙胡伊克。那里的长官和气地向他保证，只有那些死刑犯会被关进囚室（但他说的并不是真话）。继黎萨尔之后，他并不是目前为止第一个被关进去的菲律宾人。无政府主义者“费德里科·乌拉雷斯”——他在基督圣体日爆炸案后，因为勇敢地收养了帕亚斯的女儿、为儿童开办了一所人气极高的学校以及出版了抨击巴塞罗那军事法庭审判的文章而被捕入狱——在回忆录中写下了如下动人的描述。他说道：

殖民地政府的游说成功地让政府以政策太过宽松为由撤掉了布兰科将军，让信基督教的将军、黎萨尔的谋杀者波拉比耶哈取而代之。抵达菲律宾后，波拉比耶哈立即开始了处决行动，并把政治犯押送到西班牙。装满了起义者的船抵达巴塞罗那后，这些人像我们一样被关在了蒙胡伊克监狱。这时是冬天，可怜菲律宾人还穿着他们当地的服装。他们的裤子和内裤差不了多少，衬衫薄得像蜘蛛网。看到这些可怜菲律宾人在巴塞罗那监狱的院子

（接上页）记者伊格纳西奥·波·伊·辛格拉博士却不知怎么弄到了钥匙。他是被当作革命者抓进来的，也是成功到囚室看望我的人。” *Filipinas ante Europa*, March 25, 1900. Federico Urales, *Mi vida* (Barcelona: La Revista Blanca, 1930), Tomo I, p. 218 写到，虽然波的体格并不出众，但勇气过人。他的政治生涯以作为联邦主义者跟随皮·伊·马高尔开始，但后来转向无政府主义和坚定的无神论。他后来也出版了一部读着令人揪心的蒙胡伊克实录。

里，围成一个圈踱步，踢着地面想暖和脚，身体冻得瑟瑟发抖，真是令人感到既羞愧又哀伤。狱友们向院子里扔鞋子、裤子、背心、夹克、帽子还有袜子，好让这些从不知道寒冷为何物的菲律宾人暖和一点。这是一个高贵、美丽的场景。^{1*}

9月，伊萨贝洛有了新室友，名叫拉蒙·森保。9月4日，此人曾试图暗杀纳西索·波尔塔斯中尉——蒙胡伊克的主刑讯官，人称“西班牙的特雷波夫”。波尔塔斯的名字因为塔里达的文章传遍了欧洲，已经是新宗教纠问的同义词了。（韦勒任加泰罗尼亚总督、还未被再次派往哈瓦那期间，他提拔这位中尉做特别政治情报单位的头目。）简单来说，森保是一位倾向于无政府主义的波西米亚式文学人物、记者和诗人。² 如果乌拉雷斯的回忆录可信，那么，刺杀波尔塔斯的

1 Urales, *Mi Vida*, Tomo II, pp. 196-7, and 200. 乌拉雷斯真正的加泰罗尼亚名字是霍安·孟西尼 (Joan Montseny)，但他拿乌拉尔山脉（西伯利亚！）作为自己的战斗名和笔名。他本要被押送到里奥德奥罗；但在最后时刻，却被流放到了伦敦。在伦敦他立即协助组建了西班牙暴行委员会。1898年他回到西班牙，创办了用西班牙语命名的《白色杂志》，以纪念法语的《白色杂志》（但他的杂志倾向于面向觉醒的工人，而不是知识名流）。他的回忆颇为动人：当他刚创办西语《白色杂志》的时候，他用笔名布丹博士写过许多高人气文章，讨论的是疾病以及导致疾病的社会条件。他之所以要这样做，是因为“工人阶级知识分子并不相信乌拉雷斯的才干，因为他们知道他就是霍安·孟西尼 [Juan (原文如此) Montseny]”，但他们对“布丹博士”深信不疑。Ibid., p. 206.

2 参见 Núñez, *El terrorismo*, pp. 55 (Narciso Portas), and 60-61 and 158 (Sempau)。Nettlau 对他的描述颇为尖刻，“在无政府主义与加泰罗尼亚主义间摇摆的（转下页）

计划最初是在巴黎酝酿的。在森保被捕后，法国无政府主义者夏尔·马拉托来到巴塞罗那，试图帮他越狱，未果。¹ 不管怎样，伊萨贝洛被这位暗杀未遂的人物深深吸引。老年时他曾写道，这位加泰罗尼亚人

受过极好的教育；菲律宾各种植物的学名他都牢记于心。后来他将黎萨尔的《不许犯我》翻译成了法语。在与数百警察特工的斗争中，他展现出了大无畏的精神。他的名字就足以让欧洲震颤。但在现实当中他就像一个诚实、听话的孩子——是的，甚至可以说天性就像基督一般善良……我庄严重申，人们所说的无政府主义者、虚无主义者（或者按他们今天的说法，“布尔什维克主义者”）是正义和四海皆兄弟原则的真正的拯救者以及无私的捍卫者。当帝国主义垂死挣扎的日子过去，他们将有充分的资格走上我们的神坛。²

201 也许是在森保的帮助之下，伊萨贝洛又认识了一位友好的狱卒，后者给他送来书籍和报纸。根据他后来的回忆，这

（接上页）独行侠”（Nettlau 手稿，第 116 页）。森保后来在世纪之交参与到了加泰罗尼亚复兴当中，与他人共同运作了加泰罗尼亚语评论刊物《奥西坦》（*Occitània*）。

1 *Ibid.*, p 158, 引自乌拉雷斯《回忆录》的第三卷，第 80—81 页。

2 伊萨贝洛，引自 Scott, *Unión Obrera Democrática*, p. 15.

些东西“真的让我大开眼界”。他读到，无政府主义“支持废除国界；即没有国界的爱，不分地理或阶级差别……我们所有人都团结在一起，而不需要不公正的税收或法令，因为它们只对付不幸的人，却从不打击真正的罪犯”。¹

卡诺瓦斯死后，萨加斯塔的反对派联盟上台。与此同时，塔里达的运动也正热火朝天。²接着，蒙胡伊克囚犯的情况也开始转变。新政府驳回了军队和警察方面将森保送上军事法庭审判的要求（他们肯定会判他死刑）。而人们都对波尔塔斯恨之入骨，以致没有民事法官愿意或有胆量宣判这位未遂的刺客有罪。1898年1月8日，伊萨贝洛获释。得益于皮·伊·马高尔、亚历杭德罗·勒卢（Alejandro Lerroux，巴塞罗那激进共和党的头目）还有费德里科·乌拉雷斯等人的介绍信，他很快在莫雷特的海外领土部的宣传机关得了个闲职。伊萨贝洛写的菲律宾方面的文章，尤其是反对修会的宏论，在勒卢的党媒上发表，帮他润色文字的是共济会士米盖尔·莫莱塔教授。最棒的是，伊萨贝洛还拿上了手枪，快乐地投身到当时的激进示威当中。他没有向任何人开枪，却不幸挂了彩。³

1 *Ibid.*, p. 14.

2 无政府主义的自由剧院（Théâtre Libéraire）于1898年开业首演，演出的戏剧题目是“蒙胡伊克”。这出戏的人气持续了好几年。Herbert, *The Artist*, p. 39。赫伯特评价称，19世纪90年代的巴黎缺少有才华的法语剧作家，易卜生（他的作品通常被往无政府主义的方向解释）鹤立鸡群。

3 司各特描述了伊萨贝洛所参与的1898年2月反对“蒙胡伊克”的（转下页）

往东去，年轻人

202 马利亚诺·庞塞比黎萨尔小两岁，比伊萨贝洛大一岁，来自毗邻马尼拉的东北部省份布拉干（阿吉纳尔多的游击队躲藏的地方就在这个省）。还在圣托马斯读书时，他便是德尔·皮拉尔麾下一名民族主义活动家；到马德里学医时，他仍旧继续活动（他就读于黎萨尔和乌纳穆诺都读过的中央大学）。庞塞和他的导师是1889年2月在巴塞罗那创办的《团结》的主心骨，也是九个月后将它转移到西班牙首都的主要人物。虽然他曾用各种笔名发表文章，他却发现自己真正的才华在于编辑、财务和档案。于是，德尔·皮拉尔越来越多地将杂志的管理事务交给他打理。即使在黎萨尔和德尔·皮拉尔闹得最不可开交的时候，庞塞仍旧是两人的亲密好友，受两人的信任。这非常能体现他沉稳、诚实和谦虚的个性。

黎萨尔被逮捕并押送到达皮丹后，《团结》慢慢走上了下坡路，它最后一刊发行于1895年10月。停刊的原因有很

（接上页）游行。游行由一个与勒卢有密切联系的团体组织（包括在他的报纸《进步》工作的一位女记者，她后来会成为伊萨贝洛第二任妻子），其构成为：自由思想协会、巴塞罗那心理学研究中心、《大洪水》（*El Diluvio*）；卡德派（也许应该是笛卡尔派？）精神主义联盟、法学院自由学生、马克思主义中心、进步主义女权主义协会、青年共和派、《共济会杂志》、装卸工人协会、木材装运劳工协会、工会联合会，以及《人民的声言》（*La Voz del Pueblo*）。参见 *Unión obrera Democrática*, p. 16。



马里亚诺·庞塞（右）与孙逸仙博士（右）在庞塞家中会面，横滨

多。它面临的一个困难就是在财务上依赖马尼拉的富人支持者，但它日渐难以从这些人手里拿到钱了。不过，主要的问题在于，经过六年的投入，德尔·皮拉尔的战略同化政策在西班牙政府内部仍旧影响甚微，而且菲律宾殖民地的人们日益觉得这是一条死胡同。于是，1896年春，庞塞和德尔·皮拉尔决定移居香港，在那里他们不必担心被迫害，而且又离菲律宾不远。但德尔·皮拉尔的身体那时候已经大不如前，而如我们前面提及的，他在7月4日于戒严中的巴塞罗那悲

惨去世。庞塞一直尽心服侍到他临终，并着手遗留下来的工作。当8月末博尼法乔起义爆发时，警察突击搜查了他的住所，以及西班牙—菲律宾协会的房屋，搜走了许多文件。庞塞本人也被收监，但只关了一个晚上，因为警察找不到什么确凿的线索。这起事件平息下来以后，他越过边境到了马赛，于10月11日坐上了发往远东的轮船。

1897年春，34岁的庞塞着手了一项将花去他接下去四年时间的工作：为当时的阿吉纳尔多革命政府筹钱，购买枪支弹药偷运进菲律宾，还有不停地为祖国独立做宣传。（1898年6月，庞塞受阿吉纳尔多派遣，作为菲律宾的代表前往日本。）前两项任务庞塞做得不怎么成功。他的《革命书信》收录了不少他写给旅居在外的许多菲律宾富豪的书信，信中他请求他们展现出爱国主义，给予实质性的资金援助。而在另外一些写给好友的信件中，他抱怨这些人大多都自私、没有爱国心，十分可憎。寻找武器甚至更是艰难。但书信展现了庞塞是如何进行舆论宣传，如何使之适应1897—1900年那些炙手可热的事件的。其细致程度令人惊喜。在着手分析这些文本前，我们有必要重述一下这一串事件。

谁是敌人？

当伊萨贝洛还在蒙胡伊克苦苦挣扎时，菲律宾的军事僵持仍在继续。普里莫·里维拉未能毁灭阿吉纳尔多，而这位

甲米地人也无法从比亚克纳巴托的堡垒展开大规模反攻。发起政治举措的时候到了。阿吉纳尔多的文官们向他建议，如果颁布民主宪法，建立一个合法的、与殖民地政府竞争的革命政府，他的地位会大大增强。任务分配给了费利克斯·费雷尔和伊萨贝洛·阿塔乔。特奥多罗·阿贡西约平淡地描述了制宪进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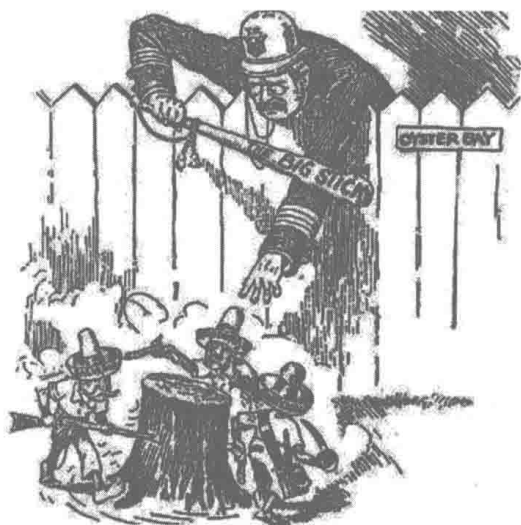
费雷尔和阿塔乔提取了1895年起草的古巴希马瓜尤（Jimaguayú）宪法当中的内容，把它当作了自己的思考成果……当时一位名叫克莱门特·何塞·苏卢埃塔（Clemente José Zulueta）的学者，在朋友向他表示担心比亚克纳巴托宪法的唯一一个副本也许已经佚失的时候，曾淡定地说道：“别担心，弄份希马瓜尤宪法即可。”¹

204

宪法唯一新增的、具有本土色彩的内容是将塔加洛语定为民族语言的条款，它在后来起了决定性的影响。革命元首的西班牙语不佳，对菲律宾以外的世界也知之甚少。于是，在11月1日，他骄傲地宣布实施这份“菲律宾人”宪法。次日他宣誓就任总统。

但早在这华丽的阵势之前，革命政府就已经开始同普里

1 Agoncillo, *A Short History*, p. 102.



威廉·麦金莱总统遭暗杀一事促成了西奥多·罗斯福的掌权。他对美国外交政策有一句名言，“温言在口，大棒在手”，在当时的漫画里备受讽刺

莫·德·里维拉谈判。他们似乎希望在卡诺瓦斯死亡、韦勒下台、萨加斯塔重新掌权之后，尽可能地与殖民地当局缔结远东版本的《桑洪条约》。当年年末，双方同意叛军放下武器，并获得完全赦免。阿吉纳尔多带着一班官员前往香港，兜里装着 40 万比塞塔；按照约定，等军队投降告成后还能再拿到 40 万。另外还有一笔 90 万比塞塔的款项将被用于抚恤过去 15 个月间无辜受难的菲律宾人。普里莫·德·里维拉知道菲律宾人一定非常怀疑西班牙是否会耍阴谋诡计，所以派了两位将军到阿吉纳尔多那边做人质，而且他 27 岁的侄子、米盖尔·普里莫·德·里维拉上校（20 世纪 20 年代的西班牙

牙独裁者，此人远没有他叔叔聪明）会陪同阿吉纳尔多前往香港。不足为奇，双方都没有完全遵守协议——许多叛军将武器埋了起来，没有上缴。而约定支付给阿吉纳尔多的第二笔钱从未兑现。¹

与此同时，华盛顿方面开始活动。这主要是西奥多·罗斯福的推动。早在1897年11月，他就曾写到，如果与西班牙就古巴问题开战，可以考虑将驻扎在日本的亚洲分遣队派往马尼拉湾；同时，他安排与他意见相似的海军准将乔治·杜威接管分遣队。1898年2月末，罗斯福命令杜威将行动基地转移到香港。4月25日，美国最终对西班牙宣战（此前，被派往古巴震慑西班牙的美国战舰缅因号在哈瓦那港离奇爆炸）。杜威在接到官方电报一个小时之后，便率领舰队开往菲律宾。5月1日，他摧毁了陈旧的西班牙舰队，马尼拉海岸近在咫尺。（此时古巴本土却还没发生战斗！）在杜威的邀请下，阿吉纳尔多和他的手下于19日从香港动身回国。但华盛顿的真实目的不久就显露了出来。阿吉纳尔多被禁止进入马尼拉，而杜威的人马开始与被打败的西班牙人交好，与菲律宾人的关系不断恶化。没有办法，6月12日，阿吉纳尔多只能在卡维特的自家阳台上（而不是在首都）发表菲律宾独立宣言。旋即，他任命阿波利纳里奥·马毕尼（Apolinario Mabini）为首席政治顾问。

205

1 *Ibid.*, p. 103.

马毕尼是个非同寻常的人物。¹ 他比黎萨尔小三岁，出身八打雁省贫农家庭。在短暂的一生中，他没有一分钱的个人积蓄。在圣托马斯他是位优秀的法学生，也是黎萨尔那夭折了的菲律宾协会的成员。马毕尼能说一口流利的西班牙语，但没有钱也许也没有意愿到海外深造。他唯一一次出国，是后来被美国人押送到了关岛的政治监狱。1896年，也许因为风湿热或者脊髓灰质炎，他不幸下肢瘫痪。但焉知祸福，因为瘫痪，波拉比耶哈的愤怒没有烧到他的头上。1898年上半年，阿吉纳尔多在香港居住期间，马毕尼写了一篇捍卫革命的宣言，文辞激情洋溢，一时间名声大噪。元首召他去甲米地的时候，数百人轮流将他从洛斯巴诺斯温泉抬到了革命领袖的总部。几乎所有阿吉纳尔多政府的公文皆出自马毕尼之手。他在担任阿吉纳尔多的总理期间，也实际管理着这些法令的实施。马毕尼有着钢铁般的意志，是一位坚定的爱国者，也是少数后黎萨尔时代能够认识到民众运动对于革命存亡之重要性的高层领导人之一。而且他很早就预言，大部分文化人和富人会背叛革命。

但马毕尼掌权之际，正值大批美国军队登陆古巴。六周后，西班牙和美国重归于好，华盛顿成了这个海岛实际的主人。接下去轮到菲律宾了。当年年末，美西签订《巴黎条约》，马德里以两千万美元将菲律宾殖民地“出售”给美

1 这则美妙且不可或缺的史料仍旧引自 Cesar Adib Majul, *Mabini and the Philippine Revolution* (Quezon City: University of the Philippines Press, 1996), 初版于1960年。

国。(德国以低得多的价格买下了加罗林和马里亚纳群岛。)与此同时,在阿吉纳尔多的临时首都马洛洛斯(在布拉干省),菲律宾国民大会召开了,大会制定了新宪法,宣布成立菲律宾共和国,马毕尼任总理。新政府尽一切努力动员吕宋岛外的政治资源,取得了不错的成效,只有遥远南方的穆斯林群体没怎么搭理他们。

1899年2月,菲律宾—美国战争爆发。菲律宾士兵们作战勇猛,但由于装备简陋,在常规战争中无法与他们的新对手对抗。接下去发生了更糟糕的事。5月,马毕尼被一个狡猾的文化人党团排挤下台,而这群人一心要与美国合作。总参谋长安东尼奥·卢纳于6月被阿吉纳尔多和他的亲信暗杀(他们担心这位伊洛卡诺人日后会夺权)。卢纳是菲律宾将领当中唯一一位有清楚战略眼光的人,他知道如何组织游击战抗击新的殖民者。1901年3月是这场战争的官方终战时间,阿吉纳尔多在上吕宋山地被捕——他很快向华盛顿宣誓效忠。但其他将军还坚持战斗了一年。而一直要到1910年左右,民众武装抵抗才完全被镇压下去。关于这段历史的细节已经有大量研究,这里不做赘述。就本书而言,只有两件事需要强调。

首先,在黎萨尔被处决两周年纪念日的前夕,阿吉纳尔多发表声明,要求全体菲律宾人从今往后在黎萨尔的忌日哀悼祖国的这位民族英雄。最早建成的纪念物是两根小石柱,上面刻有黎萨尔小说作品的目录。这两根石柱至今仍矗立在

台风频发的吕宋东南部比科尔半岛上的达特（Dáet）小城。其次，此前强烈谴责韦勒在古巴“强制集中民众”的美国，到头来在菲律宾也采用了相同的政策。大量菲律宾人因为营养不良和疾病死在了这些集中聚居区，还有许多人在残酷的镇压起义中丧生；虐待俘虏也是司空见惯的事。¹

一位全球化的绅士

了解了这一历史背景，我们就可以回过头来看庞塞的书信。假如我们把他看作菲律宾政权在海外最重要的宣道师，解读这些书信时便会产生更多的想法。不过在进行分析之前，我还需要强调，庞塞的《书信集》是在他去世很久以后才出版的，只收录了他本人写的书信。原始书信和别人写给他的书信都早已遗失了，我们也就无法确定这些信有没有受到篡改，以及多少书信没有被收录。[《书信集》的编辑者为西奥多罗·卡劳（Teodoro Kalaw），是后革命时代主流民族主义者、政治家。他也许不希望把革命运动的脏衣服拿出

1 参见 Leon Wolff, *Little Brown Brother* (New York: Doubleday, 1961), 以及更晚近的 Celerina G. Balucan, “War Atrocities,” *Kasaysayan*, 1:4 (December, 2001), pp. 34–54。但在 *Battle for Batangas: A Philippine Province at War*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1) 中，格伦·梅（Glenn May）翔实地研究了受打击最大的八打雁省的教区记录，决定性地证明沃尔夫所说的死亡“50万人”是夸张的数据。而且，很大一部分死亡发生在美国镇压起义之前，原因不外乎农业收成欠佳、牲畜染病以及气候异常等。

来让读者消费。这部书信集很显著的一个特点是没有收录庞塞和亲戚之间的私人信件、任何批评阿吉纳尔多的信件以及批判那些没有原则的“领袖”（主要是在香港，还有其他地方）搞阴谋诡计和财务操纵的信件——这些事情我们可以从其他史料得知。]

《书信集》共收录 243 封信，从 1897 年 5 月起，到 1900 年 3 月止。庞塞书信的特点，大致可以从两张表格（见后页）中看到个大概。需要指出，有些书信使用了一个或多个假名（庞塞本人也没用真名）影射在监控他的西班牙、英国和美国间谍。这些假名背后的真实人物，尚未完全确定。

几乎一半的书信都是写给以下五人的：加利卡诺·阿帕西夫莱（Galicano Apacible，庞塞去日本后在香港的接班人），43 封；布卢门特里特，39 封；贝赫尔·德·迪奥斯（Vergel de Dios，庞塞与巴黎古巴人之间的主要联系人），15 封；“Ifortel”[也许是拉斐尔·德·帕恩（Rafael de Pan），地址不明]，12 封；以及弗朗西斯科·阿贡西约（阿吉纳尔多在美国的代表），11 封。

书信中用到的语言也很能说明问题。通常，庞塞给西班牙人、古巴人、波多黎各人和菲律宾人写信用西班牙语，此外还有三处额外用到西班牙语的地方，颇为有趣。所有与布卢门特里特的长篇通信都使用西班牙语，与日本翻译者“藤田”（Foujita）和在马尼拉（后来在墨西哥）执行侦察任务的日本外交官三浦荒次郎（Miura Arajiro）通信用的也是西

表 1 (已知的) 通信者国籍

菲律宾	28	荷兰	1
日本	17	葡萄牙	1
西班牙	5	英国	1
古巴	4	美国	1
未明	3	加拿大	1
奥匈帝国	2	中国	1

表 2 通信地址 (国家或州)¹

日本	18 (至少一半位于东京)
西班牙	9 (巴塞罗那和马德里平分秋色)
菲律宾	6 (各地)
未明	6
香港	5
法国	5 (全在巴黎)
美国	5 (新奥尔良、纽约和“宾夕法尼亚”)
奥匈帝国	2 (德累斯顿和莱特莫里茨)
澳门	12
新加坡	1
荷兰	1
墨西哥	1
加拿大	1 (蒙特利尔)
德国	1 (柏林)
中国	1 (上海)

1 由于当时香港、澳门分别受英国、葡萄牙的殖民统治，故作者按西方思维在此表中将它们单列并与中国和其他国家并列。此点敬请读者不要误解。——编者注

班牙语。另一方面，庞塞艰难地用在香港学到的英语与他的两位日本联系人以及一位英国人、一位荷兰人、一位美国人、一位加拿大人、一位德国人、一位奥匈帝国人进行书信往来。最引人注目的是，只有他给阿吉纳尔多的两封信是完全用塔加洛语写作的（虽然在其他西班牙语书信中时常也能看见一两句塔加洛语）。显然，他十分清楚这位元首对西班牙帝国的语言掌握不精。

比较一下两张表格，其他一些事情也一目了然。首先是菲律宾人和古巴人散布在世界各地的程度——与庞塞通信的有在新奥尔良、巴黎、香港、巴塞罗那、上海、马德里、横滨及澳门的菲律宾人，有在纽约、巴黎的古巴人（但这些人都不在哈瓦那，也算不上真正在西班牙）。另外还有一点特别值得注意。庞塞在用西班牙语写作的时候，通常用的是19世纪西班牙使用的极其礼貌的称谓。但与他两位（也仅此两位）最亲近的古巴人——巴黎的贝坦西斯和何塞·伊斯基耶多——通信时，他用的称呼是“我最杰出的同道”（*mi distinguidísimo correligionario*）和“我亲爱的同道”（*mi querido correligionario*）——这位风趣教友的话下之意显然是“（非菲律宾）民族主义同胞”。

如果我们从《书信集》往回退一步，考虑这批书信所在的大环境，那么，这些缺失的联系人体现出其“全球化”的局限性。庞塞与新世界的首都（包括哈瓦那和华盛顿）没有联系。在欧洲，最大的缺口是伦敦，然后是维也纳、罗马、

布鲁塞尔、里斯本和贝尔格莱德。在亚洲，他重要的中国联系人住在日本而不是中国本土，而印度和周边东南亚国家几乎是隐形的存在（尽管庞塞曾提到某个叫作马提亚斯·冈萨雷斯的人正在为爪哇的独立事业奋斗）。从政治上看，他显然与左派交流甚少。克列孟梭、德雷福斯、塔里达、范德费尔德、基尔·哈迪，还有马拉泰斯塔，以及加泰罗尼亚和安达卢西亚的无政府主义者们，他都从未提及，他们似乎处在他的视野之外。他写信的对象以西方的自由主义学者和报人以及流散在各地的古巴和中国民族主义同胞为多，只有与日本人的往来情况略为复杂。

布卢门特里特

1896年12月16日，布卢门特里特一反常态，给巴黎的帕多·德·塔维拉写了一封十分突兀和情绪化的信：

很高兴你喜欢我在《西班牙政治学》（*Política de España*）上谴责菲律宾叛军的文章。这场灾难性的叛乱在我心中激起的怒火，很难用西班牙语词汇来充分表达。其始作俑者不仅应当受到法律严惩，还应当受到菲律宾人的仇恨与鄙夷，因为这些人的诡计让祖国蒙受血光之灾、不幸还有毁灭。全欧洲都同情西班牙的事业，敬佩西班牙在西方和东

方捍卫本国光荣旗帜的英雄行为。我相信，当你收到这封信时，这场疯狂的叛乱已经被消灭了。^{1*}

毋庸置疑，一想到他被关在圣地亚哥要塞的挚友黎萨 210
尔的命运，布卢门特里特就焦虑不已。他可能还写了其他类似的信，寄给在西班牙的朋友和同行，期望他们能帮忙救黎萨尔的命。但1897年1月的某日，他收到了黎萨尔写的最后一封信，信中说当这封信送达的时候，自己应该已经死了。黎萨尔被处决一事深深地触动了这位奥地利人，从今往后，他变成了革命的支持者，不知疲倦地为之奉献自己的才智。

尽管庞塞和布卢门特里特从未谋面，两人的通信却已持续多年，因为后者时常为《团结》供稿，并且一直向编辑们寄去他的菲律宾研究的新作。现在，两人的关系变得极其密切。对于布卢门特里特而言，身处香港的庞塞可以为他提供丰富而且可靠的消息，让他得以细致地了解这场革命的起起伏伏。这样做之所以必要，是因为当时菲律宾本土正在实施戒严，而欧洲媒体大多对革命知之甚少、态度淡漠。反过来，布卢门特里特则似乎就世界政治局势给了庞塞颇为精辟的建议，特别提醒他不要对美国人的意图和野心抱有天真的幻想。² 布卢门特里特不仅在定期写给报

1 从原始信件的重排版摘录，可见于马尼拉雅典耀出版的帕多·德·塔维拉文集。

2 1898年9月28日的一封信中，庞塞向布卢门特里特写到，他赞同（转下页）

纸杂志的文章中采用了庞塞的报告，而且，考虑到庞塞与国际学术界不熟，他还利用自己（在宾西法尼亚、柏林、德累斯顿、荷兰）的学界人脉，让庞塞可以直接与热心而活跃的教授们接触。¹

安的列斯人

庞塞的书信集中有 11 封是写给散布在全球各地的安的列斯人的，时间在 1897 年 5 月到 1898 年 11 月之间，而其中大部分信件是在 1898 年 8 月美国征服菲律宾之前送出的。因此可以说，它们是在菲律宾民族主义者将古巴看作闪亮的榜样、将西班牙看作敌人、将美国看作善意的潜在盟友的时期写成的。大多数信寄给了古巴人何塞·伊斯基耶多。此人显然与庞塞私交甚好——庞塞提到过他们同是马德里雅典耀俱乐部的成员，曾一起共事。伊斯基耶多是位青年律师、同化论自由主义者，处在巴黎贝坦西斯的民族主义圈子外围。²

（接上页）这位学者（指布卢门特里特）的观点，也已经反复警告了他的同胞，“尽管在美国人统治下，这个国家的农业、工业和商业都会发达，但是，财富不会是我们的，而会落入美国人的手中”。* *Cartas*, pp. 195–205.

1 具体而言，有柏林的 Eduardo Soler 博士、宾州的 Daniel Brenton 博士、德累斯顿的 A. H. Meyer 博士，以及荷兰的一位头脑聪明的出版人 A. Tjeenk Wilink。在 1897 年 9 月 9 日那封充满感情的信中，庞塞感谢威林克在其《观察》（*Op de Uitskijk*）中发表了一篇赞美和纪念黎萨尔的文章，作者是著名的爪哇学家 R. A. Kern。 *Cartas*, p. 34. 后来，布卢门特里特曾鼓动庞塞亲自为这个杂志供稿。

2 *El destierro* 数百页的篇幅中，提到伊斯基耶多的次数寥寥。

第一封信寄于1897年5月11日，它体现了之后会不断重复的模式：庞塞向这位朋友更新菲律宾革命进展的消息，同时向他要古巴人的出版物，尤其是马蒂的宣言以及马克西莫·戈麦斯论游击战原理的作品。他随后又请求伊斯基耶多将他引介给纽约的古巴代表团，从而就是否能在古巴组织一次菲律宾武装远征一事，向他们征求意见。庞塞对美国的看法十分有意思，当时他写道：“我们尚没有着手向美国寻求保护。”他继续阐述了自己的看法：

我们没有忘记，你们是我们的兄长，我们还刚起来，对革命大业还经验不足。正因如此，我们需要帮助、建议以及教导，而这些东西，我们只能寄希望于你们。古巴和菲律宾共同经历过可耻而悲惨的被奴役历程，我们也应该一起将身上的枷锁打碎。^{1*}

伊斯基耶多对美国的前景肯定不抱乐观态度，因为在第二封9月8日的信中，庞塞询问如果要组织远征，墨西哥会否愿意允许“远征军”从它的某个太平洋沿岸港口出发。²1898年6月，在美国入侵古巴前不久，位于纽约南街81号45号房间的古巴情报办公室致信马毕尼（刚掌权，所

1 Ponce, *Cartas*, pp. 5-9.

2 *Ibid.*, pp. 28-32.

以说写信者的消息很灵通)，向菲律宾人出售“最新”的武器，并配有介绍使用方法的手册。虽说庞塞与伊斯基耶多之间的通信是否是其原因还没有确凿证据，但这确实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细节也值得我们注意，不过多少会令我们感到些忧伤：一台带推车的轻迫击炮 125 美元；十颗一箱的炸弹附火药 40 美元，带 10%—20% 的折扣。“此外，箱子里还

212 还包括炸弹用的 12 个外壳、12 根导火线。包装有一个钩子和一些铰链，并配有柄和一条皮带，可以扛在肩上，运输方便。”¹ 庞塞后来写的信主要是向纽约的古巴人代表团 [贡萨洛·德·克萨达 (Gonzalo de Quezada)] 寻求帮助，住在巴黎的伊斯基耶多则在找阿贡西约，后者是阿吉纳尔多派到美国游说媒体和立法者的，后来被派往巴黎，试图在签订《巴黎条约》的会谈中发声。两个任务都没有什么实质性成果。十分奇怪的是，最有触动力的通信反倒没有任何政治意义的一封。1898 年 9 月 13 日，庞塞从横滨写信给香港的阿帕西夫莱，收信人是“卡诺伊” (Kanoy)。(今天，卡诺伊是塔加洛语对“美国人”的蔑称。这个词语源于 amerikano 一词，但这里只是加利卡诺用的一种带有情绪的菲律宾话。) 他告诉阿帕西夫莱，说自己收到了贝坦西斯寄来的一封信 (贝坦西斯在几日之前刚去世)，向他询问了两个问题。第一个是

1 信中没有点到马毕尼的名字，故意用了“尊敬的先生”来称呼收信人。但后来截获这封信的美国人的推测也几乎完全没错。这封信的微缩胶卷可以在马尼拉的国家图书馆查阅。

打听一位名叫曼努埃尔·罗维拉·伊·穆尼奥斯（Manuel Rovira y Muñoz）的波多黎各青年律师的消息。他正在拉古纳省做土地登记员，因为长期没有给波多黎各的家里人写信，所以令他们十分担心。¹ 贝坦西斯打听的第二件事更为复杂，却也完美地展现了19世纪末“全球化”是如何运作的。他告诉庞塞，自己听了一位古巴囚犯讲述的关押在巴里亚多利德（Valladolid）的五名古巴人（包括此人本人）和七名菲律宾人的悲惨遭遇后，感到非常担忧。贝坦西斯表示，他本人可以为古巴人提供帮助，但无论是在伦敦还是在巴黎，他都找不到菲律宾人的代表；所以他请求庞塞做些力所能及的事。贝坦西斯的信中还附带了那位“古巴”囚犯来信的誊抄稿（这封信本身就具有极高的价值）。信是以西班牙语写的，但用的是颇为奇特的正字法。Valladolid 写成了 Balladolid，Capablanca 写成了 Kapablanca，aquí 成了 akí，cómo 成了 komo。塔加洛语没有“v”这个音，标准西班牙语中也找不到“k”这个字母。说西班牙语的古巴人即使文化水平再低，也不可能用这样的拼写，但这种写法和黎萨尔在《煽动者》的时候强烈推动过的写法有所接近（前文已有叙述）。² 实际

1 Ponce, *Cartas*, pp. 174–6. 就在同一天，庞塞写了一封言辞强硬的信，请求马毕尼出手相助，并补充道，贝坦西斯是位老同志，“对我们的神圣事业贡献良多”。*Ibid.*, pp. 177–9. 后来消息传了出来，这位年轻人被菲律宾政府拘禁，但身体和精神状况良好。

2 是贫穷的塔加洛人采用了黎萨尔的“发明”，还是黎萨尔借用了他们的习惯，这个问题我们也许永远也无法知道答案。

将那位囚犯的话整理成文、寄给贝坦西斯的，一定是菲律宾人，情况大概就是 he 跟着—位文盲古巴人的口述做了记录。这则轶事很好地证明了舒马赫的论断，即 1900 年，菲律宾的识字率和西班牙差不多，因此必然比古巴高很多。

日本人

起初，日本对于庞塞而言是一个全面的冲击，不过这冲击随着时间流逝，最终他快乐地娶了一位日本妻子。1898 年 7 月 8 日，他致信布卢门特里特：

您说得对。[在这里生活]摧毁了我们从欧洲习得的每一种观念，因为每样东西都打开了一个未知世界，相比我们事先的想象，这是一个完全陌生、异域的世界。^{1*}

庞塞不懂日语，所以给所有日本通信者写信时都用英语。他也不懂明治晚期日本精英内部的矛盾与阴谋，所以起先被投机者看成是个很容易俘获的猎物。他费了很长一段时间才明白，反对派（任何时候组成的反对派）热衷于谴责所有当权的政治联盟对“白人”权力“示弱”，不愿去帮助被

1 Ponce, *Cartas*, pp. 124–6.

剥削的“亚洲兄弟们”——直到政治巨轮转动，在野党当权。庞塞结交了高层政府官员（通常对他的事业持谨慎的同情态度）、反对党政客（他们就无须那么小心了）、媒体、大学教授、众多军队和平民冒险家，虽说成果不算显著，但还是说服了若干杂志发表了阿吉纳尔多政权的主要文献。（关于日本人的谨慎，第四章已经做了解释。）

随后在1899年4月5日，菲律宾—美国战争正值高潮之际，庞塞给在香港的阿帕西夫莱写信，称他已经找到所需的那条持久的宣传渠道。他说有一份叫作“开化新闻”（*Kaika Shimbun*）的期刊正以“菲律宾问题”为大标题长期连载他的文章。奇迹般的事情不仅是这合同，而且还在于这份杂志有位职员〔庞塞称他“藤田则义”（*Foujita Sonetaka*）〕的西班牙语还算流利。¹ 25日，庞塞再次给阿帕西夫莱写信，

214

1 *Ibid.*, pp. 316–17. 藤田在当时的日本肯定是位罕见的国际化人物。早稻田大学教授梅森直之告诉我，藤田名列1899—1900年外务省西班牙语译员名单（当时这种政府文书叫作“职人录”）。根据东京大学出版的校史，1901年他在东京大学外国语学校执教西班牙语。还有文献提到他在教马来和印度斯坦各语言的集训课程（在同一家机构），参见 Matsuno Akihisa, “Nihon no okeru Malay go no kaishi to tenkai”, in Kondo Tatsuo, ed., *Wagakunini okeru gaikokugo kenkyu/kyoiku no shiteki kosatsu* (Osaka: Gaikokugo Gakko, 1990)。1880年，他还向东亚学会的教育协会做了“伊斯兰教盛典”的讲座。该机构的创办者是著名学者井上哲次郎。（藤田是这个组织的成员，该组织的卷宗告诉我们，藤田出身东京，有武士背景，但没有大学文凭。）这个讲座随后分两部分在协会的刊物上发表，参见“Huihuikyo no keiten ni tsuite,” *Toa no Hikari*, 3:4 (pp. 50–56) and 3:6 (pp. 78–85)。

梅森写到，在这个值得我们关注的文本中，藤田提到他曾在莫斯科住过一阵，在那里他曾以自己与沙皇统治下的穆斯林的交往经历做过演讲。随后他前往中国学习伊斯兰教，而最后他的兴趣拓宽到了从菲律宾到北非的整个伊斯兰（转下页）

讲述了他对受邀在东方青年协会致辞感到高兴。这个协会的成员主要是“印度人、韩国人、中国人和日本人”，他则是其名誉成员。¹在这之后不久，庞塞想将他的系列文章编辑成书，并进行修订，剔除重复的内容等。“藤田”将翻译和出版这个文本，而作为回报，他会取得该书的日语版权。庞塞的文章或者这本书即将问世的消息似乎让“藤田”陷入了困境，因为庞塞11月3日给他写信，称自己对“藤田”因为“我们的事业”而受到日本警察骚扰感到非常难过。²一周之前，他曾给费利佩·布恩卡米诺（Felipe Buencamino，曾策划拉马毕尼下台的党阀头目，现在是阿吉纳尔多的左右手）写过一封言辞冷峻的信，简略地向他说明，由于时间限制，他将无法把自己的手稿提交给“我们政府的审查局”（la censura de nuestro Gobierno）。³书迟至1901年方才出版，比《书

（接上页）世界。他还指出了阿拉伯语对土耳其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甚至日语的影响，并给出了具体的例子。他认为欧洲的宗教偏见使得在那里学习伊斯兰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但日本人可以站在“没有偏见或偏好”的立场上研究，而且也应该着手研究。

1908年后，藤田从我们已知的史料中神秘地消失了，就如他神秘地进入这些史料一样。梅森注意到，档案员显然不清楚如何读他名字里的汉字，所以出现了各种读法，如“Hideo”“Kiso”“Suetaka”等。

1 *Ibid.*, p. 333-6. 在此期间，庞塞结识了20岁的“Iwo”。此人是朝鲜元首的次子，朝鲜进步派将他视为最合适的王位继承人。这位青年的活力和自由主义理想吸引了庞塞。

2 *Ibid.*, p. 416-18.

3 *Ibid.*, p. 411. 信上的日期是1899年10月26日。



末广铁肠

信集》中最后一封信的时间要晚许多。¹（但本章后面会考察 215
它产生的影响。）庞塞请译者将黎萨尔的绝命诗的西班牙语
原文收录进去 [书中这首诗的标题是“我最后的思绪”（Mi
Último Pensamiento）]。他这么做，也许是因为相信这是第一
次将这位小说家殉道士引介给日本公众。如果他真的这么以

1 在书内书名页上写的是 *Cuestion Filipina: una exposition (原文如此) histórico-crítica de hechos relativos á la guerra de la independencia*, H [eikuro] Miyamoto 和 Y. S. Foudzita 译。出版社是东京专门学校（早稻田大学早年的名字）。

为的话，那他应该是错了。1888年初，黎萨尔从马尼拉前往伦敦之际，曾在日本待了六周（2月28日—4月13日）。这个国家十分令他着迷，所以他不仅立即开始学习日语，还学起了日本绘画和书法。¹在前往旧金山的船上，他结识了末广铁肠，并与他成了好友。当时，末广不会任何外语，在船上感到极其孤独。两人一起穿过了美国，随后经由利物浦到达伦敦，在那里道别。

末广是位颇能吸引眼球的人物。他长黎萨尔12岁，出生在传奇的海盗城市、四国西南海岸的宇和岛，属于底层武士阶级。1875年，26岁的末广在自由主义报纸《东京曙新闻》（*Tokyo Akatsuki Shimbun*）入职，最后升到了主编位置。由于批评政府镇压民主运动和言论自由，他一度被关入监狱。他在狱中健康恶化，获得了保外就医的许可，但在病床上他写了一部政治小说《雪中梅》，在年轻人当中产生了极大的反响。1888年，他用这部小说赚来的版税前往美国和欧洲进行“政治学习”。黎萨尔的生平、语言学造诣以及政治理想，都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在他的旅行笔记（题目很有趣，叫作“哑的旅行”）中，这位菲律宾小说家是核心人物。这本书也非常畅销，1889—1894年出了六版。此外，在《煽动者》出版的同年，末广也出版了两部小说，分

1 黎萨尔以日本风格创作的优美的书法和令人印象深刻的毛笔画，参见 Caesar（原文如此）Z. Lanuza and Gregorio F. Zaide, *Rizal in Japan*（Tokyo: C. Z. Lanuza, 1961）。

别是《南洋的大波澜》和《暴风雨的残余》。¹ 三年后，他将这两部小说合在一起，以“大海原”为名出版。²

小说的主人公是一位叫作高山菲律宾人。他住在离马尼拉不远的山田村，与待他不错的老板泷川（Takigawa）的女儿兴世（Okiyo）订了婚。但是，有个名叫庄司（Joji）的监狱官员也爱上了兴世，而且认为婚约是泷川搞的鬼。根系颇深的庄司于是指示津山（狱中一位臭名昭著的囚犯）去杀了老人，但要把现场伪装成普通的（虽然比较血腥）抢劫案。这也就是为什么泷川收藏的两把名刀中有一把在谋杀的同时被偷走了。作为回应，小说的英雄在殖民地首都发动了一场起义。所幸，一场大地震破坏了监狱，让他得以潜逃。他和兴世受到殖民地警方的搜捕，两人计划逃亡海外。在遍布鳄鱼的海岸沼泽，他们找到了一艘小划艇。正在此刻，警察追了上来，但鳄鱼帮上了忙，吞食了追捕者。高山和兴世的小船在疾风暴雨的海洋上倾覆，两人再也寻不见对方的踪影。

217

1 *Ibid.*, chapter VII. 这个文本错误很多，感谢施蕴玲和白石隆对其做了修正。据我所知，奇怪的是黎萨尔在通信中只提到未广一次，是在1888年7月27日从伦敦寄给庞塞的一封信中。信中有这样两句略显唐突的话：“我认识了一个正要去欧洲的日本人，他曾因为身为激进分子和一份独立期刊的负责人而遭到关押。由于这个日本人只会说日语，我在轮船抵达伦敦以前，一直帮他做翻译。” *Epistolario Rizalino*, 1887-1890, p. 34.

2 后文有关《大海原》的内容，我需要感谢梅森直之教授的指点。他告诉我，1900年以前的明治时代小说家通常会给外国人物和绝大多数外国地名起日本名字，而不论这些人或地方是否真的与日本有联系。欧洲文学大家（如左拉）的译者都是如此。他们考虑的是让作品更容易被普通日本读者接受。

高山被一艘英国船只救起，在一位善良的商人的保护下到了伦敦。他以为兴世一定已经死了，但其实她被菲律宾同胞救起，安置在一艘前往香港的轮船上。到香港以后她得到了一所女修道院的庇护。

在伦敦，高山因为写了一部严谨的马尼拉历史而成了知名作家。与此同时，庄司发现了兴世的所在。他伪造了高山的信，信中称他被囚禁在马德里，处境绝望。他安排兴世以前的仆人九藏（Kyuzo，此人是他的眼线）捎了这封信去。随后，两人动身前往帝国首都，在那里见了庄司。庄司迅速将兴世关入了郊外一栋与外界隔绝的房子里。通过一个偶然的时机，她扫到报纸上一篇文章，讲的是《马尼拉殖民地政府史》的作者。她当即明白，原来高山还活着，此时正在伦敦。她给高山写了信，托九藏转交。九藏告诉高山，兴世现在在巴约讷，病得厉害。起初，高山有所犹豫，因为巴约讷离西班牙边境很近。但最终他还是选择随九藏前往。坐上了巴黎出发的夜间火车后，九藏偷偷给小说主人公下了镇静剂。所以待高山醒来的时候，火车离边境只有几英里了。他明白自己上当了。所幸，列车遭遇了严重事故，所以他得以再度逃出。没过几天，兴世在马德里的报纸上读到了这场灾难，报纸还讲到警察正在圣塞瓦斯蒂安寻找高山的遗体。遗体还没找到，但他肯定和那节车厢的其他乘客一样未能幸免于难。在一位热心仆从的帮助下，兴世逃了出去，最后到了巴黎，偶然撞见了已经完全康复的高山。两人立即去了伦敦。

在大英博物馆的日本区，他们发现了泷川遗失的那把剑。从馆长处他们得知了这把剑的出售者，并成功将杀手绳之以法。他们也找到了一位能够解读高山继承下来的一份古老的家族文书的人。原来，这份文书的作者是著名的“基督徒大名”高山右近。1614年，他被德川幕府的创始人德川家康流放到马尼拉。文书中也说到，右近将两把宝刀送给了一位忠诚的家臣，名字叫作——泷川！

218

他们快乐地发现了这来龙去脉后不久，这位年轻的菲律宾爱国者得知家乡爆发了大规模起义。他决定在最好的（菲律宾）伙伴松木（Matsuki）的陪同下回菲律宾。松木为他招募了40位“真正的”日本壮士。¹在这些人的奋战之后，高山成功驱逐了西班牙人，并当选元首。就任时他向菲律宾人提议，让菲律宾成为受日本保护的国家。他的提议得到了民众的完全支持，于是他致函明治天皇，请求他接受这个方案。小说结尾，马德里也承认了日本对马德里的保护。

小说前言中，末广写到，若干年前他在西方认识了一位菲律宾绅士，小说是以这位不知名姓的绅士所讲的故事为基础的。但在两篇讲他在美国和欧洲游历的文章中，他笔下这位“绅士”的名字是黎萨尔。确实，如果没有其他历史证据的话，安东尼奥·德·莫尔加和大名高山右近差不多是

1 虽然壮士一词在20世纪有了“政治恶霸”的贬义含义，末广用的还是它更早、更积极的意思，指的是“人民权利的捍卫者”。参见 Saniel, *Japan and the Philippines* 附录7中的讨论。



末广的政治小说《大海原》中的菲律宾英雄高山在书斋中熟睡。他的故事有一部分来源于黎萨尔的生平和经历

同时代的人物，而年轻的高山发现自己祖上的历史，以及黎萨尔对自己民族起源的探求竟也——在大英博物馆——完美重合！

值得注意的是，在《大海原》中被放到一起的这两部小说都写于开启日本帝国主义扩张的中日战争以及马蒂和博尼法乔起义之前。黎萨尔很有可能曾和末广讲过自己目前的个人计划，讲过他的同胞们是多么期望摆脱西班牙的枷锁。很显然，这番话极大地引起了这位曾经的政治犯的同情。如果他希望展现给读者的，是菲律宾爱国者和此前受迫害的日本

受害者之间的血脉联系，是他们希望得到日本志愿者的无私帮助以及日本政府的保护的话，他这么做也是在使自己个人的同情心得到更广泛的受容。¹ 我们也许可以说，这也正是布卢门特里特在奥匈帝国所做的事。

但不管怎么说，旅行结束后，末广如愿以偿进入政界。他作为（由衷的）自由民主党议员进入国会，甚至做过一段时间的议长。可惜的是，就在黎萨尔被处决的没几个月前，他因为癌症去世。²

219

与中国的联系

庞塞在第二封写给阿吉纳尔多的信（1899年6月8日）中写道：

中国的改革家给了我很大的帮助，他们的领袖孙逸仙博士在各色事务上都是我的伙伴和帮手。^{3*}

孙比庞塞小两岁，他的人生波澜万丈，但不算非常成功。1894年他离开中国，在夏威夷创办了兴中会；随后，1895年，他将兴中会总部转移到香港。同年10月，他与各

1 我们看到，两年后卡提普南恰恰会向日本寻求支援。

2 Lanuza and Zaide, *Rizal in Japan*, chapter VII.

3 Ponce, *Cartas*, pp. 353-4.

220 个地方帮派联手，在广东发动了一场起义，但以失败告终。香港已经容不下他，于是他前往欧洲。次年在伦敦，清政府的特工试图绑架他，未果。这事让他成了国际闻名的人物。此后他基本居住在日本，在广大中国留学生、政治流亡者和商人群体中进行宣传和组织。

庞塞第一次见孙逸仙是在1899年3月初。此时正值菲律宾—美国战争爆发之初，菲律宾人还在坚持奋战。在平田兵卫（Hirata Hyobei）的引介下，孙逸仙造访了庞塞在横滨的住宅。平田是东京的律师，也是位政治调停者，早先曾帮助何塞·拉莫斯入籍日本。¹两位青年民族主义者（分别只有35岁和33岁）用英语交谈，一拍即合，成了终生的朋友。²值得一提的是，庞塞也许有华人血统，而即便没有，他在马尼拉的学生时代就对中文颇为熟悉。所以，对于这位新同志他并不觉得奇怪或异类。不到四个月之后，孙尝试了一次大批量的武器偷运，是众多次数中唯一一次近乎成功的。他委托自己的一位富人朋友万迟（Wan Chi）与日本民族主义者中村弥六（Nakamura Yaroku）协作买了一艘船，然后将这

1 庞塞在3月6日给阿帕西夫莱的信中写道，孙和平田正在他家做客。那张著名的合影无疑是在此期间拍摄的。相片中庞塞穿着洋服（除了那双非常奇怪的鞋子），蓄着打理精致的八字须。孙则身穿和服，胡须甚至比庞塞打点得还要精致。同上书，第292—296页的信中插入了这幅照片。

2 1914年，庞塞出版了孙逸仙的传记。他正要去拜访自己的老朋友，但在路上突然病倒，于1918年5月23日在香港病逝。参见《历史上的菲律宾人》第二卷第115—116页庞塞一条。

艘船租给了菲律宾革命者。这艘船名叫布引丸，在长崎装箱，大小箱子里有 600 万个弹药筒，一万支村田来复枪，一门固定大炮，十挺野战炮，七副望远镜，一台火药压制机，还有一台制造弹药的机器。¹ 船员中有精通炮术、工程和弹药制造的日本军人。² 从长崎出发后，为了避免引起怀疑，船先绕道上海，但在途中遇到了台风，并于 7 月 19 日在距离上海 100 英里的鞍岛沉没。³

孙逸仙为什么为菲律宾如此不辞辛劳？除了两人之间的真挚友谊外，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中正在进行一场革命也是重要的原因。关于这场思想革命，雷别卡·卡尔有过精彩的描述。原先的中国知识分子习惯于认为中国远远“落后于”西欧、美国和日本，但 1895 年起，电报将世界各地反帝国主义斗争的报道和图片传到了中国的地方报纸：古巴起义（1895—1898 年）、菲律宾革命以及反抗美国帝国主义的战争（1896—1902 年），还有抗击英帝国殖民扩张的布尔武装斗争

221

1 村田来复枪以他的发明者村田经芳得名。村田出身萨摩低层武士，他创造性地将最新的法国和德国来复枪取长补短、合二为一。这款枪后来又做了改良，是 1895 年日清战争中的一个决定性因素。1897 年它被有坂成章的改良毛瑟枪取代。这也就是为什么黑市上有大量弃置的村田来复枪流通。感谢土屋健一郎在这个主题上的研究。

2 白石隆告诉我，整个事件背后的主使者至少是日本军队中的参谋长级别。正是在他的命令下，那些不幸的士官登船起航。庞塞的通信无法证明他对此有所了解。

3 对此的简述，参见 Silvano V. Epistola, *Hong Kong Junta* (Quezon City: University of the Philippines Press, 1996), pp. 123-4。这里的叙述以 7 月 25 日、26 日庞塞写给阿帕西夫莱的信为基础 (*Cartas*, pp. 364-81)。美国人在日本布置了间谍，而且在菲律宾海域实施有效的海军巡逻。

(1899—1902年)。也就是说，在三大洲上，先前被中国文化人鄙弃的一些小民族，以他们的团结和勇气远远走在了中国的“前头”。卡尔给出了令人信服的史料依据，证明了在菲律宾起义结束后没过多久，有一部分知识分子开始认为他们对满族人的斗争是反殖民主义运动，并第一次开始设想“革命”。¹ 庞塞是个谦虚的人，看到自己的书的日文版很快就被翻译成中文，并迅速卖了数版，他也许惊讶了一阵子吧。但这样的情形，其实没什么好惊讶的。

帕瓦：战争的国际化

1898年2月19日，庞塞从香港给“Ifortel”写了一封信，信中称，抵港的阿吉纳尔多的随从中有三位人物对军事革命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其中两人众所周知，是受过教育的民族主义者米格尔·马尔瓦尔（Miguel Malvar）和德尔·皮拉尔的外甥格里高里奥·德尔·皮拉尔。但第三位人物却并不像前两位那么声名显赫。庞塞带着尊敬的语气，如此描述了此人：“帕瓦上校，没有辫子的中国人，勇武胜过希德，且怀着一颗热诚之心。”² 何塞·伊格纳西奥·帕瓦1872年出生在

1 参见 Rebecca Karl, *Staging the World* (Durham, N. C.: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2), 尤其是第四章, “Recognizing Colonialism: The Philippines and Revolution”。

2 Ponce, *Cartas*, pp. 190–91.

福建一个贫困的村庄，中文名是刘亨贲。¹18岁时，他随叔叔移民马尼拉，成了一位技艺精湛的铁匠，平日也操习中国武术。革命爆发后，他很早就积极应召入伍，颇受阿吉纳尔多的喜爱。阿吉纳尔多还在甲米地战斗的时候，这位24岁的移民招募了一批华人铁匠朋友，组建了一所兵工厂，为装备短缺而且劣质的菲律宾军队制造武器。洪玉华是这样描述他的活动的：

在他的悉心督造下，从敌人那里俘获的旧大炮和坏毛瑟枪又能重新使用。他们用铁丝捆竹子制造出了大型的火炮，造了不少帕尔提克[一种简陋的火器]，并给数千个弹药筒填充了现做的火药。

帕瓦也指导了菲律宾人如何熔化金属物件（尤其是教堂的大钟！），用来铸造武器；他在战场上也是位非常机智、勇敢的指挥官。菲律宾律师特奥多罗·冈萨雷斯在自己未出版的回忆录中这样写道：“他在军营中是道奇怪的风景——活跃在战场上的上校，身着上校军服，但留着一条辫子。他的士兵是塔加洛人，都久经沙场，但无不服从于他。他们以在他麾下服役感到自豪，丝毫没有因为他是华人而有异样的感

1 施蕴玲在汇报中国学者最近研究时告诉了我这个名字。下面对帕瓦的描述，主要基于 Teresita Ang See, "The Ethnic Chinese in the Filipino-American War and After," *Kasaysayan*, 1:4 (December 2001), pp. 83-92.



何塞·伊格纳西奥·帕瓦——“活跃在战场上的上校，身着上校军服，但留着一条辫子。”

觉。”¹最后，他受阿吉纳尔多的派遣前往比科尔，在当地华
223 人和华人混血中为革命筹集资金。他成功地筹集到了 38.6 万
银比索——这个数目真可谓惊人。

虽然帕瓦有颇为辉煌的人生经历，但他只不过是出于各种原因参加或支持革命的非菲律宾人当中的一员。受到殖民地政府歧视和压迫的华人移民想要赶走西班牙人在情理之

1 如果这一描述准确的话，帕瓦肯定是在抵达香港时剪掉了辫子（阿吉纳尔多需要他做翻译）。他大概只说福建话，也许会点粤语和塔加洛语。所以与他在一起阿吉纳尔多觉得很轻松。

中。在美国征服古巴之后，大量年轻西班牙军官决定加入阿吉纳尔多的军队“继续作战”。总参谋长安东尼奥·卢纳愉快地利用这些受过专门训练的士官，让他们做私人秘书、教官或者防御工事工程师，其中不少人在菲律宾—美国战争爆发期间也担任了战地指挥官。也有少数西班牙军队中的古巴人加入了革命事业，与法国人、意大利人（包括一位后来加入布尔战争中克鲁格一方的军官）、少数英国人、为数不少的日本人，甚至美军中的叛逃者（主要是黑人）并肩作战。¹

马拉泰斯塔在马尼拉

在同期的马德里，伊萨贝洛·德·洛斯·雷耶斯设法筹集了一笔钱，开始出版一份双周刊。他给它起名为“欧洲之前的菲律宾”（*Filipinas ante Europa*），卷首语也完美得很：“反对北美，非也；反对帝国主义，正是，且至死不渝。”² 德尔·皮拉尔曾带有恶意地说这位民俗学家“多产得令人感到悲哀”，但这个本事现在正派了用场，因为杂志的大部分内

1 Dery 对此有精彩的细节描写，但遗憾的是本段落只是对其的浓缩。细节参见 Dery, “When the World Loved the Filipinos”, 第 3 章, 注释 43。

2 《欧洲之前的菲律宾》在 1899 年 10 月 25 日和 1901 年 6 月 10 日共出了 36 期。也许是因为马德里警方的干扰，杂志被迫停刊。但之后它又以《菲律宾捍卫者》（*El Defensor de Filipinas*）的面孔重新出现，变成了一份月刊，从 1901 年 7 月 1 日起到了 10 月 1 日。

容都出自伊萨贝洛之笔。¹ 西班牙不仅丧失了帝国地位，而且还被华盛顿羞辱了一番。这在根本上改变了西班牙的公共舆论，对于美国人的愤怒使得不少人开始同情菲律宾独立事业。这改变与伊萨贝洛的书结合得很好，因为他有许多西班牙朋友，不久前也刚迎娶了一位西班牙女记者为妻；更重要的是，一直以来，有关殖民统治的邪恶，他都将其归咎于修会的专权霸道。因此，他做这份双周刊的目的，就是强化这一结合，批判美帝国主义，及其背后的贪婪（*la codicia*，这是个颇为迷人的用词）。麦金利是杂志最喜爱的靶子。麦氏用答尔丢夫式的语言宣称，征服是为了给菲律宾人带去自由。² 伊萨贝洛不断攻击美国的种族主义和私刑，并一针见血地指出，这必然会影响到非白人的菲律宾人将会受到的待遇。³ 但他也会离题去写美国反帝国主义运动的报道，而且写得激动人心。伊萨贝洛的另一个靶子是那些富有的开化人，他认为他们在排挤掉马毕尼以后，最先跳上了船，向新的殖民地主子卑躬屈膝。⁴ 他一直拿马毕尼作为爱国者拒绝向美

1 参见 Scott, *The Unión Obrera Democrática*, p. 13, 引用 *Epistolario de Marcelo H. del Pilar* (Manila: República de Filipinas, Dept. de Educación, Oficina de Bibliotecas Públicas, 1955), vol. 1, p. 20.

2 典型的标题当属“麦金利，骗子还是罪犯？”，《欧洲之前的菲律宾》，1900年3月10日。

3 “Negro Porvenir de los Filipinos bajo la dominación imperialista” [帝国主义统治下的菲律宾未来一片黑暗]，同上期刊，1899年11月（确切日期未明）。“至于黑人，如果不幸地爱上了白人女子，会像野兽一样在大街上被猎杀”。

4 唉，这群人中有先前返回菲律宾做共和国立法委员的帕多·德·塔维拉。（转下页）

国佬屈服的闪亮例子。我们这位民俗学家也没有忘记强调，古巴“独立”只是一个假象。在这种种议题的间隙，他仍然找出了空间，写了一篇有关布尔人的文章：他们从菲律宾游击战士那里学到了多少东西，菲律宾人又能够从布尔人严格的纪律中学到什么。¹

但到了1901年夏天，随着阿吉纳尔多被捕后迅速向华盛顿宣布效忠，革命宣告失败。那些拒绝宣誓的要人（包括残疾的马毕尼）被一起发配到了新近设立的热带西伯利亚：关岛。²伊萨贝洛判断，在西班牙继续待下去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他已经四年未见前妻为他生的六个孩子了。与1892年的黎萨尔一样，他会回国直面殖民者，礼貌地向他们通知

225

（接上页）后来，他为自己投靠美国人辩护，称元首已经肆无忌惮，如果不成熟地独立，菲律宾人会遭受南美一样的命运。唉，还有年迈的巴萨和雷希多尔，他们也站到了美国一边。伊萨贝洛通常称他们为“犹太”。其痛烈的修辞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即“反对背叛”，同上期刊，1990年2月10日。

1 “布尔军队的组织”，同上期刊，1900年9月10日。

2 马毕尼于1899年12月10日被捕，关押在马尼拉。在监狱里他写下了反对美国政策的最为有力的文章，有几篇实在太激烈，连报纸都拒绝刊登。1900年6月21日，政府宣布大赦政治犯，条件是向新殖民地政府宣誓效忠。但马毕尼仍然拒绝了。10月3日，他一度短暂获释，但获释期间仍然继续攻击菲奸还有美国殖民政权的政策。1901年1月15日，这位日后总督威廉·霍华德·塔夫脱口中“最难收编的菲律宾名人”被送上了船，次日起程前往关岛。同船的还有大约六十人，包括民族主义活动者——以及他们的私人仆从（马毕尼没有仆从）。1902年7月4日，罗斯福总统又发布了一道大赦，赦免令被送到了关岛。最终，1903年2月9日，马毕尼得知自己不再是战俘了，可以自由地去自己想去的地方，但如果想回菲律宾，就一定要宣誓效忠。感到没有选择的他在抵达马尼拉时同意宣誓。三个月后的5月13日，他因霍乱去世。他的葬礼规模之大，在首都已经是多年未见了。参见Majul的《马毕尼》最后一章。



布尔人：伊萨贝洛的一篇文章提到了他们。伊萨贝洛在文中强调了菲律宾游击队和布尔人相互学习对方的斗争方法给各自带来的益处

自己的到来，看看大体在法律下，他能够在政治上实现些什么。¹ 伊萨贝洛 1910 年初乘船前往马尼拉。² 行李里打包了几

1 他的理由谨慎而有说服力，参见“A mi casa [回家]”，*El Defensor de Filipinas*, October 1, 1901。

2 接下来讲述伊萨贝洛在返回菲律宾之前活动的部分参考的是司各特那本出色的著作。弗朗西斯科·费雷尔·瓜尔迪亚（这是至今仍有争议的人物）差不多是伊萨贝洛回国前最后会见的人。费雷尔 1859 年出生于一个富裕的加泰罗尼亚人家庭，14 岁为了躲避“令人窒息的宗教氛围”而离家出走，并最终到了巴黎，长期担任老练的共和派阴谋家索里亚的秘书。在法国待了 16 年后，他成了坚定的无政府主义者。费雷尔 1901 年回到巴塞罗那，创办了颇有影响力的无政府（转下页）

本书，组合颇为奇特：阿奎那和伏尔泰，蒲鲁东和《圣经》，达尔文和马克思，克鲁泡特金和马拉泰斯塔。我们有充分理由认为，这是马克思、前沿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家乃至达尔文的著作第一次进入菲律宾。人还没到，他作为坚定的反美帝国主义人士的名声早已传到了菲律宾。美国商业利益的喉舌《马尼拉时报》立即指责他为危险的煽动分子、沾满鲜血的无政府主义者。时候也正巧：就在一个月前，麦金利在布法罗遭到一位 28 岁的波兰裔美国人、无政府主义者、铁匠列昂·佐

(接上页)主义刊物《总罢工》(*La Huelga General*)。据说办刊物用到的钱，是他一位法国学生的百万法郎遗产。他也创办了堪称世俗主义和进步主义学校典范的“现代学校”(Escuela Moderna)。伊萨贝洛对这所学校非常感兴趣。后来，费雷尔被认为唆使了两次对阿方索十三世的暗杀(均失败。1905年5月31日，巴黎；1906年5月31日，马德里)而遭到起诉，但被无罪赦免。1909年7月，为了应对西班牙出兵摩洛哥而在巴塞罗那引发的大规模抗议活动，安东尼奥·毛拉的保守派政府宣布全城戒严，关停了所有左翼俱乐部和进步主义世俗学校，并禁止无政府主义者和共和主义者结社。费雷尔此际再度被捕，被军事法庭判为煽动罪。他于10月13日被处决。12天后，毛拉政权垮台。参见 J. Romero Maura, "Terrorism in Barcelona," pp. 141-2, 182-3; 以及 Núñez, *El terrorismo*, p. 66。Núñez 还为行刑做了一个令人不安的注脚。1909年12月12日，也就是处刑的一个月后，乌纳穆诺向他的朋友冈萨雷斯·特里亚写道：“我亲爱的朋友，实际上是西班牙，是那个合法的西班牙，是西班牙民族性杀死了费雷尔。杀得好。费雷尔是个白痴，是个罪犯，而不是什么良知唤醒者。他的学校是噩梦，教学方法令人厌恶。他的教导空洞得可怕，也不怎么可信。他的文章之愚蠢，让人看得毛发悚立。既然法庭判定他私人参与了放火(而不是以煽动为罪名)，他不应该得到任何宽恕。这事关西班牙的精神独立，政府务必不能向所谓的‘欧洲浪潮’的压力屈服——无政府主义者、共济会士、犹太人、科学家还有傻子们——他们自以为是，要把自己的想法强加于人，即使在宣判前，就已经扬言他们有权利修改法庭的决定。他们预先就宣布费雷尔无罪。”* 后来，乌纳穆诺据说为自己写了这样一封每日电报体的信感到后悔(Núñez, p. 150)。

227 戈尔茨枪杀。新殖民地政权立即查封了伊萨贝洛原计划办的报纸《菲律宾捍卫者》，并禁止他组建他所提议的民族党。

但他不是轻言放弃的人。老年时他曾回忆道，自己“借此机会将我从巴塞罗那无政府主义者那里学到的好点子付诸实践。我是在与他们被一起关押在臭名昭著的蒙胡伊克要塞时向他们讨教的”。所以他在清教徒征服者的眼皮底下，着手鼓动和组织马尼拉的工人阶级。做这事他也许有一些意想不到的优势。他一直以来都处在开化的民族主义知识分子圈子外围，而那个圈子里基本上都是塔加洛人：这些人算不上贵族，因为菲律宾本土从未出现过封建国家；但他们对贵族充满向往（尤其是他们当中的土地所有者）——特别是看到西班牙帝国主义时：它既有很强的封建根源，又继续穿着封建时代的华丽服饰来装点自己，即使现实是赤裸裸的腐败、阴暗的党魁政治以及修会的地主所有制。伊萨贝洛与这群人正相反：老实的商人，出版家，印刷商，记者。他手下都是雇员，而没有仆人，他对待他们也是抱着一种民主的精神。更好的一点是，他是吕宋岛北部的内陆人士，来自伊洛卡诺人的家乡，这个种族素来节俭、勤劳、言辞质朴——而且氏族团结。（伊罗戈至今仍是菲律宾除黎萨尔的卡兰巴南部丘陵之外的这样一个地方：每栋简陋的农舍周围都有一个狭小但打点得很漂亮的花园。）他并非民族主义精英当中唯一一位伊洛卡诺人，但他是他们当中唯一的一位外省人。卢纳兄弟也是伊洛卡诺人——画家胡安因为忌妒心谋杀了自己的妻

子和丈母娘，在情感犯罪频发（尤其是艺术家当中）的巴黎躲过了重刑，在香港凄惨死去；还有安东尼奥，专业学的是化学，是抗美战争中最为杰出的将领，因为阿吉纳尔多的亲信进了谗言而遭到暗杀。但两人都在马尼拉长大，自身均已融入了西班牙—塔加洛精英文化。

关键在于：就如黎萨尔曾颇带鄙夷地向布卢门特里特讲述的，19世纪晚期马尼拉的佃农大多是从土地贫瘠的伊罗戈来的勤劳的移民。最初的工人阶级也是伊洛卡诺人，不过在阅读《不许犯我》和《煽动者》的时候读者绝不会想到这一点。伊萨贝洛可以用家乡的语言和这些人交流，而在那个时代，受过教育的塔加洛人中几乎没人懂伊洛卡诺语。（黎萨尔有见过菲律宾劳工，和他或她讲过话吗？他的小说中没有工人的身影。）伊萨贝洛也深谙他们当中顽强的街头和区镇文化。伊萨贝洛用的是很经典的手段。他首先组织了印刷工人。在他成功地组织了罢工以后，其他部门的工人也加入其中，颇为迅速地形成了巴塞罗那式的、无拘无束的中枢——工会民主联盟。这个民主的组织也许会让不带形容词的无政府主义的设计者塔里达欣喜不已吧。美国统治者带着怀疑地看着这一切，警告在马尼拉及其周边会有大波罢工爆发。不少罢工成功了，因为资本家和政府官员都没能预料得到。¹伊萨贝洛的一些手段也迷惑了美国人。街头游行，这是他在勒卢统治

228

1 参见 Scott, "The Strikes", *The Unión Obrera Democrática*, pp. 34-41.

下的巴塞罗那，在那些挥舞着左轮手枪的日子里学到的。但在为罢工者和自己的组织筹钱时，他则举办了一系列大众舞会，伴有讲座和戏剧，反对美国和与他们串通的菲律宾精英。他精明地将菲律宾人对庆典、舞蹈、戏剧和音乐的喜爱，与运动宣传结合在一起。¹ 不过最终，统治者们找到了若干将伊萨贝洛与工人隔绝开来的途径。1902年6月末，他遭到逮捕，以“工人阴谋”的罪名受审。但由于许多公诉证人是在做伪证，甚至连法官对此都看得一清二楚，所以他只被判入狱四个月。入狱前他在工人阶级聚居区通多（Tondo）一个新近成立的工人俱乐部举办了大型聚会，在聚会上辞去了自己的领导职务。接替他的首先是多米纳多尔·戈麦斯。此人也是从西班牙回国，在《团结》的圈子里活跃，与伊萨贝洛合作办过《欧洲之前的菲律宾》，不久便成了伊萨贝洛的忠实帮手²；后来，出任领导职务的是伊萨贝洛的秘书埃梅内希尔多·克鲁斯（Hermenegildo Cruz）。克鲁斯12岁的时候还是位不识字的贫民窟男孩，但他在伊萨贝洛的小图书馆读书，进而成了令人敬佩的觉醒工人。除了组织活动以外，克鲁斯还为勒克吕的无政府主义著作《人与大地》（*L'Homme et la terre*）的西语译本以及帕布洛·伊格莱西亚斯（西班牙马

1 伊萨贝洛直白地称这些活动为“寓教于乐的晚会”。

2 戈麦斯也是少数去了古巴的菲律宾人。他最初在马德里学医，随后和黎萨尔的原计划一样，去古巴的西班牙部队中做了军医。Schumacher, *The Propaganda Movement*, p. 190, n. 12.

克思主义社会党的元老创始人)《工人画报》(*La Ilustración obrera*)的塔加洛语节译本做了详尽的注释并将其出版。与此同时,有人提醒伊萨贝洛,美国人有可能会将革命没收的地产还给修会。于是他转而抨击天主教游说团体,投身组建“脱离教会的”民族主义阿里白教会。这个教会是伊洛卡诺人、革命派神父格雷戈里奥·阿里白(Gregorio Aglipay)在第一共和国时期创办的。¹ 工会民主联盟在1903年解散,但从它的余热中生发出了许多其他的劳动者组织,最终形成了一个社会主义党和一个共产主义党。两党于1938年合并,领导了反对日本侵略者的人民抗日军(Hukbalahap)游击运动,并在美国扶持的第二共和国于1946年7月4日(还会在其他日子吗?)成立后继续革命战争。

229

1912年,也许是为了减轻第二任妻子去世的悲痛,伊萨贝洛宣布参与竞选,成功地进入了一个受美国人控制的马尼拉市议会。² 他利用自己的权能坚持为马尼拉的穷人服务。1922年,他回到伊罗戈,作为独立人士竞选参议员议席。一

1 阿里白愤怒于梵蒂冈无条件支持西班牙殖民统治的立场,也痛恨半岛当地统治阶级对革命运动的强烈敌视。他的支持者中有马毕尼,马氏希望打破罗马对土人群体中更为传统的那部分人的控制。如果我们去伊罗戈北部的萨拉特看1815年起义的遗址,我们会发现紧邻着的是一座西班牙风格的天主教教堂,和不远处的阿里白宗教堂在相互竞争。第一座教堂洋溢着反宗教改革的氛围,十字架上的基督鲜血淋漓地受难,身上只缠着一条褴褛的灰色腰带。在第二座教堂里,基督正宁静地承受着苦难,身材修长,几乎看不到鲜血,穿的是一条天蓝色绸缎短裤,做工典雅,上面还有刺绣。这喜人的对比也许出自伊萨贝洛之手。

2 本段文字参考了Llanes, *The Life*, pp. 22-32。

如既往，他像那些无政府主义故友一样，称自己既是个人主义者又是集体主义者。令他也感到惊讶的是，他胜出了，而对手是曼努埃尔·奎松组织强大、居于统治地位、受权贵把持的民族党。他坐着马车赶到会场时，其他的参议员都惊呆了。但他说，与其花钱买车和汽油，资助美国人的生意，不如把钱给马车夫。与此同时，他坚持要在工人阶级居住的通多度过余生。在那里他建起了一栋公寓，租给信用良好的穷人。1929年后，他因为中风而不幸半身不遂，所以将精力集中在阿里白教会。他于1938年10月10日去世。

西边的晚霞：伊萨贝洛·德·洛斯·雷耶斯

黎萨尔不喜欢伊洛卡诺爱国主义，而且认为伊萨贝洛写作太多、太快、没有深度，所以伊萨贝洛时常不得黎萨尔待见。但这位民俗学家是位心胸宽广的人物，他对黎萨尔的成就大体上都极为尊敬。《欧洲之前的菲律宾》经常有文章描述黎萨尔为模范爱国者（尽管提到小说的次数很少）。但表象总是具有欺骗性的。早在1899年，《不许犯我》的第一个非西班牙语译本就在巴黎出版（这肯定让我们这位九泉下的殉道者感到高兴吧）。¹要说此事完全与伊萨贝洛无关是不太可能的，因为两名合译者当中有他在蒙胡伊克的狱友拉

1 我手头的是1899年印刷的版本，但它的版权页信息表明这已经是第三次印刷。所以，1898年初版是有可能的。

蒙·森保，另一位则是法国人亨利·路加（Henri Lucas，此人大概也是无政府主义者）。不过，这个译本的标题令人略沮丧：修道士的国度（Au Pays des Moines）。第25期《白色杂志》为皮埃尔-维克托·斯托克（Pierre-Victor Stock）的社会学丛书做了广告，这本书也列在其中。斯托克继承了一家1708年创办的出版公司，于1892—1921年在这个丛书名下出版了一长串无政府主义著作。书目很引人注目。第一辑（1892年）是克鲁泡特金的《面包的征服》，随后是让·格拉夫的《将死社会与无政府》（*La Société mourante et l'anarchie*, 1894年）、法国无政府主义者夏尔·马拉托的《从巴黎公社到无政府》（*De la Commune à l'anarchie*, 1895年）、巴枯宁的《全集》第一卷（1895年）、格拉夫的《未来社会》（*La Société future*, 1895年）、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它的哲学与理想》（*L'Anarchie: sa philosophie, son idéal*, 1896年）、乔治·达利恩的《毕里比：非洲军队》（*Biribi: armée d'Afrique*, 1898年）、荷兰人费迪南德·多美拉·纽文胡伊斯（Ferdinand Domela Nieuwenhuis）的《处于危险的社会主义》（*Le Socialisme en danger*, 1897年）、塔里达的《西班牙的纠问官：蒙胡伊克，古巴，菲律宾》（*Les Inquisiteurs d'Espagne: Montjuich, Cuba, Philippines*, 1897年）、勒克吕的《进化，革命与无政府理想》（*L'Évolution, la révolution et l'idéal anarchique*, 1897年）以及路易斯·米歇尔的《巴黎公社》（无年份）。接下去是黎萨尔的小说，它完全没有无政府

主义色彩,夹在意大利历史学家古列尔莫·费雷罗 (Guglielmo Ferrero) 的《军国主义与现代社会》(*Le militarisme et la société moderne*, 1899年)和夏尔·阿尔贝的《自由爱情》(*L'Amour libre*, 1898年)之间。

我们是否应该为《煽动者》这部至少是有无政府主义倾向的小说没有出现在这个书单中感到惊讶?也许不必。正如约维塔·卡斯特罗指出的,路加-森保的《不许犯我》译本绝非忠实的翻译。他们删去了叙事者所有的俏皮话,以及对菲律宾民间故事和传说的引用,而且只要带点情色色彩的文字,都消失得无影无踪。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对修会的尖刻批判也不见了。¹这样做的结果就是,这部小说成了对“殖民地社会”的平淡的社会学描述。这样的任意删改无疑是出于有益的目的。《不许犯我》之所以会有这样的译本,也许是由于其煽动性的续篇已经不太能被人们所接受,因为无政府主义(与工团主义一道)——至少在法国——已经靠它背后的行动,脱离了依靠宣传的时代。

东边的晚霞：马里亚诺·庞塞

231 今天,有数百座黎萨尔的雕像装点着菲律宾各城镇的广场。其中最令人瞩目的,是美国统治时期在他被处决的地方

1 参见约维塔·卡斯特罗为她翻译的《不许犯我》所作的序言,第31—35页。

竖立起的纪念碑——但不是美国人发起的。在西班牙和西班牙美洲，以他命名的街道并不少见。不过，在美国，只能在旧金山和西雅图的僻静处找到他的小雕像，还有一座在芝加哥，略大些。我们的这位小说家本人对这个上帝的国度并不关心，也知之甚少。也许，美国的这种无视和冷漠，可以被解读为是这个世界霸权在无意识间回应着小说家对它的态度。¹

不过，最近在厦门新建了一个大型的黎萨尔主题公园，出资的是富裕的福建籍华裔菲律宾人。除却商业动机不谈，这里边还有其他一些很有意思，甚至可以说很感人的东西——尤其是当我们发现，黎萨尔的绝命诗几乎有40个中译本，而且译者大多是福建人。

不过，最初翻译的不是别人，正是大名鼎鼎的梁启超（早在1901年）。也许令人略为吃惊的是，梁启超比黎萨尔小12岁，黎萨尔被处决时梁启超不过23岁。与黎萨尔一样，他是位青年才俊，在清政府惨败给日本之后，写了大量有关中国现状的论述。这些经历让他成了1898年著名的“百日维新”

1 黎萨尔简洁地记述了1888年晚春穿越美国的旅行。看看他是怎么写的也很有趣。在旧金山湾隔离了一周后，他花了三天时间在城里观光，然后坐船到位于奥克兰的跨洲轨道起点。次日（5月7日，星期一），他启程经由萨克拉门托和摩门教的盐湖城抵达丹佛（5月9日）。火车于11日清晨抵达芝加哥，晚上又发车开往纽约。黎萨尔对芝加哥仅有的评价是“每个烟草店门口都有一个印第安人[原文如此]塑像，而且各不相同”。5月13日他抵达曼哈顿，并于16日登船前往欧洲。他对这个矗立着自由女神像的地方没有什么想说的。参见 Rizal, *Diarios y Memorias*, pp. 217-20。

当中的关键人物。但由于慈禧太后的反击，梁启超和其他许多自由主义者和进步主义者一起，不得不开始流亡生涯——去日本。他为什么翻译黎萨尔的诗作，我们还没有一个确切的答案。但有几件事是确信无疑的。梁启超是广东人，不是福建人；十几岁起就一直住在北京。因此，厦门不太可能对他的写作有多少影响。从雷别卡·卡尔信息详尽地写到的报纸上，他也许曾读到过黎萨尔之死，但报纸通常不会发表长诗，更不会发表一首用很少有读者看得懂的语言写的长诗。

232 与事情有关的证据大体如此。庞塞是黎萨尔的密友，对黎萨尔怀着深切的缅怀。1898年10月13日，他给柏林的爱德华·佐勒（Eduard Soler）博士（此人应该懂西班牙语和德语）写信，感谢后者将黎萨尔的绝命诗翻译成德语，并在黎萨尔曾经加入过的人类科学协会的公报上发表。¹1899年2月28日，庞塞写信给阿帕西夫莱，讲了在日本重印黎萨尔著作的计划，并提到最便宜的印刷商是集英社。他还指出，如果用手稿而不用现有版本的话，会花费额外的时间和成本。²此外我们还知道，早在1898年11月，也就是在他认识孙逸仙以前，庞塞就与中国的“改革家”保持着联系。1898年11月19日的信中，他向阿帕西夫莱说道，昨晚他见

1 Ponce, *Cartas*, pp. 210–11. 庞塞补充道，他是从布卢门特里特处得知这个译本，而布卢门特里特也肯定是这个译本背后的推动者。

2 *Ibid.*, p. 288–9. 这也许可以说明，庞塞手头有手稿，或者知道哪里可以看到手稿。这些书将用西班牙语而非日语出版。

了“阮鉴光”(Lung Tai-kwang)，一个自称是中国改革派领袖康有为的私人秘书的人。此人5月25日抵达日本，正在策划让光绪皇帝复辟的运动。¹“阮鉴光”肯定是福建人，因为庞塞发现此人与帕瓦有私交。最后，能够体现庞塞的文学趣向的，还有连续三封寄给德·迪奥斯的信。他在信中反复要求德·迪奥斯给他寄来左拉最新的小说《巴黎》。他的趣向在西班牙的开化人当中应该算相当罕见的。²另外，庞塞还要求将黎萨尔绝命诗的西班牙语原文收入他那本菲律宾问题的日文译本中。这个版本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特点，即虽然正文是汉字和假名混杂的写法，序言却完全用汉语文言写成。这反过来说明，既然两人中至少有一人能够写流利的古汉语，因此两人也负责做了中译本——它和日文译本几乎同时出版。如果我的这一猜测正确，那么梁启超的版本或是直接参考了宫本和藤田的翻译，或更有可能是对他们的“汉语”翻译做了润色。我们难以回避的一个问题是，尽管梁启超和庞塞当时肯定都在日本，但后者似乎对此完全不知情，也从未在信中提到梁启超的名字。

1901年11月和12月，也许是在梁启超（不过更有可能是报纸）的催促下，宣樊子³在《杭州白话报》发表了连载文章《菲律宾民党起义记》。1903年他又在梁启超主编、在

233

1 *Ibid.*, pp. 223-5.

2 *Ibid.*, pp. 162-4, 232-5, 244-5.

3 本名林獬，原文记为 Ma Hsün-wu。——译者注

日本出版的颇有影响力的《新民丛报》上发表了黎萨尔的传记。这些文章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后来鲁迅会提到《我的诀别》和《不许犯我》，为什么他会将黎萨尔与裴多菲还有密茨凯维奇这些伟大的诗人—爱国者联系起来，以及为什么在20世纪20年代，鲁迅的学生李霁野会重新翻译黎萨尔的绝命诗。¹ 一代人之后，在20世纪40年代，又出现了一位帕瓦转世，名叫曹传美。他为华侨支队游击军战斗。这支部队与土人菲律宾左派部队人民抗日军并肩作战，抗击日本侵略者。他晚年回到中国，用笔名杜埃将自己的战斗经历写成了小说。在这部《风雨太平洋》里，他有至少四次全文或大段引用了黎萨尔的绝命诗，而“第一位菲律宾人”和约瑟芬·布拉肯（作为女战士登场）也会零星出现。² 这一切看上去多少有些讽刺，因为黎萨尔虽然有部分福建人血统，却未能超脱于一定程度上对华人的温和的种族歧视。（但已经比裴多菲对“匈牙利”少数民族的恶毒攻击要进步多了。）

伊萨贝洛·德·洛斯·雷耶斯和马里亚诺·庞塞：即使在菲律宾，也已几乎被人遗忘的两个好人——在历史上却无疑是全球化时代早期无限复杂的洲际网络中的关键节点。

1 有关黎萨尔作品在中国的早期流传情况，我要感谢汪晖。

2 第一卷1983年在广东出版，第二卷1991年在北京出版，一年后他便去世了。由他的遗孀校对的三卷成套的版本，在2002年才在珠海出版。感谢施蕴玲提供了这则重要的信息。

后记

2004年1月，我受邀在以激进民族主义传统闻名的菲律宾大学就本书中的若干主题做一个初步的演讲。至今，（伊洛卡诺人）何塞·马里亚·西松（José María Sison）于1968年末组建的毛派“新”共产党在这个学校的影响仍然颇为强大。因为到得太早，我便到校园里一处露天咖啡铺消磨时间。这时一个年轻人过来向顾客分发传单。等他走了以后，大多数顾客立即把传单捏成团丢掉。正当我也要这样做的时候，我猛然看到了这一页篇幅的文章的标题。“没有领袖的组织！”原来，传单的内容是在以“横向”组织的社会团结为名义，批判这个国家的等级制——老大主导的政党政治、大企业资本家，还有毛派共产主义者也未能幸免。传单没有署名，但附上了一个网址，供深入阅读。这笔意外的财富可不能自己独享。讲座上我为听众朗读了这个文本，但令我惊讶的是，几乎所有人看上去都为此吃了一惊。但当我的演讲结束以后，许多人兴冲冲地问我要复印件。我不能确定黎萨尔是否会对厦门的主题公园感到高兴，但我敢肯定，伊

234

萨贝洛肯定会迷上这张传单，立马打开笔记本电脑，输入网址 manila.indymedia.org。他一定会注意到，这个网站与全球各地其他十几个类似的网站链接在一起。这可不可以说是晚期全球化呢？

参考文献

- Adam**, Jad. "Striking a Blow for Freedom," *History Today*, 53:9 (September 2003), pp. 18–19
- Agoncillo**, Teodoro. *A Short History of the Philippines* (New York: Mentor, 1969)
- *The Revolt of the Masses* (Quezon City: The University of the Philippines Press, 1956)
- Akihisa**, Matsuno. "Nihon no okeru Malay go no kaishi to tenkai." In Kondo Tatsuo, ed., *Wagakunini okeru gaikokugo kenkyu/kyoiku no shiteki kosatsu* (Osaka: Gaikokugo Gakko, 1990)
- Anderson**, Benedict R. O'G. "Forms of Consciousness in *Noli me tangere*," *Philippine Studies*, 51:4 (2000), pp. 505–29
- *Imagined Communities* (London: Verso, 1991)
- *The Spectre of Comparisons* (London: Verso, 1998)
- Avrich**, Paul. *An American Anarchist, The Life of Voltairine de Cleyr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8)
- Balucan**, Celerina G. "War Atrocities," *Kasaysayan*, 1:4 (December 2001), pp. 34–54.
- Baudelaire**, Charles. *Oeuvres complètes* (Paris: Louis Conard, 1933), vol. 7
- Bécarud**, Jean and Gilles Lapouge. *Anarchistes d'Espagne* (Paris: André Balland, 1970)
- Bernheimer**, Charles. *Figures of Ill Repute: Representing Prostitution in Nineteenth Century Franc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 Betances**, Ramón Emeterio. “La autonomía en Manila.” In Haroldo Dilla and Emilio Godinez, eds, *Ramón Emeterio Betances* (Habana: Casa de las Americas, 1983)
- *Las Antillas para los antillanos*. Ed. Carlos M. Rama (San Juan Puerto Rico: Instituto del Cultura Puertorriqueña, 1975)
- Blumentritt**, Ferdinand. “Una visita,” *La Solidaridad*, January 13 and 31, 1893
- Bonoan**, SJ, Raul K. *The Rizal–Pastells Correspondence* (Quezon City: Ateneo de Manila Press, 1994)
- Bory**, Jean-Louis. *Eugène Sue, le roi du roman populaire* (Paris: Hachette, 1962)
- Bosch**, Juan, *El Napoleon de las guerrillas* (Santo Domingo: Editorial Alfa y Omega, 1982)
- Casanova**, Pascale. *La République mondiale des lettres* (Paris: Éditions du Seuil, 1999)
- Clark**, T.J. *Farewell to an Idea*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9)
- Coates**, Austin. *Rizal–Philippine Nationalist and Patriot* (Manila: Solidaridad, 1992)
- Comín Colomer**, Eduardo. *Historia del anarquismo español* (Barcelona: Editorial AHR, 1956)
- Cook**, Bradford. Trans. *Mallarmé: Selected Prose Poems, Essays and Letters*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56)
- Corpuz**, Onofre. *The Roots of the Filipino Nation* (Quezon City: The Aklahi Foundation, 1989), 2 vols.
- Culler**, Jonathan, and Pheng Cheah, eds, *Grounds of Comparison* (New York: Routledge, 2003)
- Dallas**, George. *At the Heart of a Tiger: Clémenceau and his World, 1841–1929* (New York: Carroll & Graf, 1993)
- Daniel**, Evan. “Leaves of Change: Cuban Tobacco Workers and the Struggle against Slavery and Spanish Imperial Rule, 1880s–1890s” (unpublished paper, 2003)
- De la Costa**, SJ, Horacio, ed. and trans. *The Trial of Rizal: W.E. Retana’s Transcription of the Official Spanish Documents* (Quezon City: Ateneo de Manila Press, 1961)

- De Ocampo**, Esteban. *Rizal as a Bibliophile* (Manila: The Bibliographical Society of the Philippines, Occasional Papers, No. 2, 1960)
- Dery**, Luis C. "When the World Loved the Filipinos: Foreign Freedom Fighters in the Filipino Army during the Filipino-American War," *Kasaysayan*, 1:4 (December 2001) , pp. 55-69
- Epistola**, Silvino V. *Hong Kong Junta* (Quezon City: University of the Philippines Press, 1996)
- Esenwein**, George Richard. *Anarchist Ideology and the Working Class Movement in Spain, 1868-1898*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9)
- Estrade**, Paul. "El Heraldo de la 'Independencia Absoluta.'" In Felix Ojeda Reyes and Paul Estrade, *Pasión por la Libertad* (San Juan, P.R.: Editorial de la Universidad de Puerto Rico, 2000)
- *Solidaridad con Cuba Libre, 1895-1898. La impresionante labor del Dr Betances en Paris* (San Juan, P.R.: Editorial de la Universidad de Puerto Rico, 2001)
- Farwell**, Byron, ed. *Encyclopedia of Nineteenth Century Land Warfare* (New York: Norton, 2001)
- Fernández**, Frank. *La sangre de Santa Agueda* (Miami: Ediciones Universal, 1994)
- Ferrer**, Ada. *Insurgent Cuba: Race, Nation and Revolution, 1868-1898*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99)
- Flaubert**, Gustave. *La tentation de Saint-Antoine* (Paris: A. Quentin, 1885) .
- Footman**, David. *Red Prelude* (London: Barrie & Rockleff, 1968)
- Fowlie**, Wallace. *Rimbaud: A Critical Stud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5)
- González** Liqueste, L. *Repertorio histórico, biográfico y bibliográfico* (Manila: Impr. Del Día Filipino, 1938)
- Guerrero**, Leon María. *The First Filipino, a Biography of José Rizal* (Manila: National Historical Institute, 1987)
- Hall**, D.G.E. *A History of South-East Asia* (London and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68)
- Halperin**, Joan Ungersma. *Félix Fénéon, Aesthete and Anarchist in Fin-de-*

- Siècle Pari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8)
- Hanson**, Ellis. *Decadence and Catholicism*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 Herbert**, Eugenia. *The Artist and Social Reform: France and Belgium, 1885–1898*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1)
- Huysmans**, Joris-Karl. *À rebours* (Paris: Charpentier, 1884; Fasquelles: c. 1904) . Translated into English as *Against the Grain* (New York: Lieber and Lewis, 1923) , and *Against Nature* (London; Penguin Classics, 1959) .
- Ileto**, Reynaldo Clemeña. *Pasyón and Revolution: Popular Movements in the Philippines, 1840–1910* (Quezon City: Ateneo de Manila Press, 1989)
- James**, C. L. R. *The Black Jacobins*, rev. ed. (New York: Vintage, 1989)
- Joaquín**, Nick. *A Question of Heroes* (Manila: Anvil, 2005)
- Joll**, James. *The Anarchist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 Karl**, Rebecca. *Staging the World*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2)
- Lanuza**, Caesar Z. and Gregorio F. Zaide, *Rizal in Japan* (Tokyo: C.Z. Lanuza, 1961)
- Laqueur**, Walter. *A History of Terrorism*, rev. ed. (New Brunswick, N. J.: Transaction, 2000)
- Lete**, Eduardo de. “Redentores de Perro Chico,” *La Solidaridad*, April 15, 1892
- Llanes**, José L. *The Life of Senator Isabelo de los Reyes* (monograph reprinted from the Weekly Magazine of the *Manila Chronicle*, 1949)
- Maitron**, Jean. *Le mouvement anarchiste en France* (Paris: Maspero, 1975) , 2 vols.
- Majul**, Cesar Adib. *Mabini and the Philippine Revolution* (Quezon City: University of the Philippines Press, 1996)
- Martín** Jimenez, Hilario. *Valeriano Weyler, de su Vida y personalidad, 1838–1930* (Santa Cruz de Tenerife: Ediciones del Umbral, 1998)
- May**, Glenn Anthony. *Battle for Batangas: A Philippine Province at War*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1)
- Mojares**, Resil B. *Brain of the Nation: Pedro Paterno, T.H. Pardo de Tavera, Isabelo de los Reyes and the Production of Modern Knowledge* (Quezon City: Ateneo de Manila University Press, 2006)

- Moret**, Segismundo. "El Japón y Las Islas Filipinas," *La España Moderna*, LXXIV (February 1895)
- Naimark**, Norman. *Terrorists and Social Democrats: The Russian Revolutionary Movement under Alexander III*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 National Historical Institute**. *Filipinos in History* (Manila: NHI, 1990–96) , 5 vols.
- Nitti**, Francisoc. "Italian Anarchists," *North American Review*, 167:5 (November 1898) , pp. 598–607
- Nuñez** Florencio, Rafael. *El terrorismo anarquista, 1888–1909* (Madrid: Siglo Vein-teuno de Espana, SA, 1983)
- Ocampo**, Ambeth. *Rizal without the Overcoat* (Pasig City, Manila: Anvil, 2000)
— *The Search for Rizal's Third Novel, Makamisa* (Pasig City, Manila: Anvil, 1993)
- Offord**, Derek. *The Russian Revolutionary Movement in the 1880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 Ojeda** Reyes, Félix. *El desterrado de París. Biografía del Doctor Ramón Emeterio Betances (1827–1898)* (San Juan: Ediciones Puerto Rico, 2001)
— "Ramón Emeterio Betances, Patriarca de la Antillanía." In Félix Ojeda Reyes and Paul Estrade, eds. *Pasión por la Libertad* (San Juan, P. R.: Editorial la Universidad de Puerto Rico, 2000)
- Ortiz** Jr., David. *Paper Liberals. Press and Politics in Restoration Spain* (Westport, CT: Westwood Press, 2000)
- Palma**, Rafael. *Biografía de Rizal* (Manila: Bureau of Printing, 1949)
- Pardo** de Tavera, Trinidad. "Las Nihilistas" (typescript, n.d.)
- Pernicone**, Nunzio. *Italian Anarchism, 1864–1892*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3)
- Poe**, Edgar Allan. *Tales* (Oneonta: Universal Library, 1930)
- Ponce**, Mariano. *Cartas sobre la Revolution, 1897–1900* (Manila: Bureau of Printing, 1932)
— *Cuestion Filipina: una exposition historico-critica de hechos relativos á la guerra de la independencia*. Trans. H [eikuro] Miyamoto and Y.S. Foudzita

- (Tokyo: Tokyo Senmon Gakko, 1901)
- Quinn**, Patrick F. *The French Face of Edgar Poe* (Carbondale: 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1954)
- Raynal**, Guillaume-Thomas and Denis Diderot. *Histoire philosophique et politique des établissements & du commerce des Européens sans les deux Indes* (Geneva: Libraries Associas, 1775)
- Retana**, W.E. *Vida y escritos del Dr José Rizal* (Madrid: Victoriano Suarez, 1907) , with “Epilogo” by Miguel de Unamuno
- Reyes**, Isabelo de los. *El Folk-Lore Filipino* (Manila: Tipo-Lithografía de Chofré y C., 1899)
- *El folk-lore filipino*. English translation by Salud C. Dizon and Maria Elinora P. Imson (Quezon City: University of the Philippines Press, 1994)
- *La sensacional memoria de Isabelo de los Reyes sobre la Revolución Filipina de 1896–1897* (Madrid: Tip. Lit. de J. Corrales, 1899)
- Reyes** y Sevilla, José. *Biografía del Senador Isabelo de los Reyes y Florentino* (Manila: Nueva Era, 1947)
- Rizal**, José. *Cartas á sus Padres y Hermanos* (Manila: Comisión del Centenario de José Rizal, 1961)
- *Cartas entre Rizal y el Profesor Fernando Blumentritt, 1888–1890* (Manila: Comision del Centenario de José Rizal, 1961)
- *Cartas entre Rizal y los miembros de la familia, 1886–1887* (Manila: Comision del Centenario de José Rizal, 1961)
- *Cartas entre Rizal y sus colegas de la propaganda* (Manila: José Rizal Centennial Commission, 1961) , 2 vols
- *Diarios y Memorias* (Manila: Comision del Centenario de José Rizal, 1961)
- “Dimanche des Rameaux” (unpublished ms., 1887)
- *Dr. José Rizal’s Mi Último Adiós in Foreign and Local Translations* (Manila: National Historical Institute, 1989) , 2 vols
- *El Filibusterismo* (Manila: Instituto Nacional de Historia, 1990)
- *El Filibusterismo* [facsimile edition] (Manila: Instituto Nacional de Historia, 1991)
- *Epistolario Rizalino*, ed. Teodoro Kalaw (Manila: Bureau of Printing, 1931–

- 35), 4 vols
- “Essai sur Pierre Corneille” (unpublished ms., n.d.)
- *Noli me tangere* (Manila: Instituto Nacional de Historia, 1978)
- *Noli me tangere*, with introduction by Leopoldo Zea (Caracas: Biblioteca Ayacucho, 1976)
- *N’y touchez pas!* Jovita Ventura Castro’s translation of *Noli me tangere*, with introduction (Paris: Gallimard, 1980)
- *One Hundred Letters of José Rizal* (Manila: National Historical Society, 1959)
- *The Rizal–Blumentritt Correspondence, 1886–1896* (Manila: National Historical Institute, 1992), 2 vols
- Robb**, Graham. *Rimbaud* (London: Picador, 2000)
- Rocker**, Rudolf. *En la borrasca (Años de destierro)* (Puebla, Mexico: Edit. Cajica, 1967)
- Rodrigues**, Edgar. *Os Anarquistas, Trabalhadores italianos no Brasil* (Sao Paulo: Global editora e distribuidora, 1984)
- Romero** Maura, J. “Terrorism in Barcelona and its Impact on Spanish Politics, 1904–1909,” *Past and Present*, 41 (December 1968)
- Ross**, Kristin. *The Emergence of Social Space: Rimbaud and the Paris Commune*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8)
- Roxas**, Félix. *The World of Félix Roxas*. Trans. Angel Estrada and Vicente del Carmen (Manila: Filipiniana Book Guild, 1970)
- Saniel**, Josefa M. *Japan and the Philippines, 1868–1898*, third edition (Manila: De la Salle University Press, 1998)
- Sarkisyanz**, Manuel. *Rizal and Republican Spain* (Manila: National Historical Institute, 1995)
- Schumacher**, SJ, John N. *The Propaganda Movement, 1880–1895*, rev. ed., (Quezon City: Ateneo de Manila Press, 1997)
- Scott**, William Henry. *The Unión Obrera Democrática: First Filipino Trade Union* (Quezon City: New Day, 1992)
- See**, Teresita Ang. “The Ethnic Chinese in the Filipino-American War and After,” *Kasaysayan*, 1:4 (December 2001), pp. 83–92

- Sempau**, Ramón. *Los victimarios* (Barcelona: Manent, 1901)
- Serrano**, Carlos. *Final del imperio. España, 1895–1898* (Madrid: Siglo Veintiuno de España, SA, 1984)
- Sichrovsky**, Harry. *Ferdinand Blumentritt: An Austrian Life for the Philippines* (Manila: National Historical Institute, 1987) . Translated from the German
- Sue**, Eugène. *The Wandering Jew* (London: Routledge and Sons, 1889)
- Sweetman**, David. *Explosive Acts. Toulouse-Lautrec, Oscar Wilde, Félix Fénémon and the Art and Anarchy of the Fin-de-Siècle* (London: Simon and Schuster, 1999)
- Tamburini**, Francesco. “Betances, los mambises italianos, y Michele Angiolillo.” In Félix Ojeda Reyes and Paul Estrade, eds, *Pasión por la Libertad* (San Juan, P.R.: Editorial de la Universidad de Puerto Rico, 2000)
- “Michele Angiolillo e l’assassinio di Canovas del Castillo,” *Spagna contemporanea* [Allessandria, Piedmont] IV:9 (1996) , pp. 101–30
- Tarrida** del Mármol, Fernando. “Aux inquisiteurs d’Espagne,” *La Revue Blanche*, 12: 88 (February 1, 1897) , pp. 117–20
- “Un mois dans les prisons d’Espagne,” *La Revue Blanche*, 11:81 (October 15, 1896) , pp. 337–41
- Thomas**, Hugh. *Cuba: The Pursuit of Freedom* (New Brunswick, N. J.: Harper and Row, 1971)
- Tortonese**, Paolo. “La Morale e la favola: Lettura dei *Misteri di Parigi* como prototipo del *romain-feuilleton*” (unpublished ms., n.d.)
- Urales**, Federico (Joan Montseny) . *Mi Vida* (Barcelona: Publicaciones de La Revista Blanca, 1930) , 3 vols
- Vincent**, Paul. “Multatuli en Rizal Nader Bekeken,” *Over Multatuli*, 5 (1980) , pp. 58–67
- Wionsek**, Karl-Heinz, ed. *Germany, the Philippines, and the Spanish–American War*. Translated by Thomas Clark (Manila: National Historical Institute, 2000)
- Wolff**, Leon. *Little Brown Brother* (New York: Doubleday, 1961)

索引

- About, Edmond 埃德蒙·阿布 30
- Abreu, José 何塞·阿波罗 125n
- Acheh* 亚齐 42n
- Adam, Paul 保罗·亚当 30, 114, 177, 182
- Adawa* 阿达瓦 184
- Aden* 亚丁 42n, 62, 159
- Aeschylus 埃斯库罗斯 36n
- Africa* 非洲 3, 54, 66, 68, 155n, 167, 175, 180, 184
- Aglipay, Gregorio 格雷戈里奥·阿里白 228, 229
- Agoncillo, Francisco 弗朗西斯科·阿贡西约 207
- Agoncillo, Teodoro 特奥多罗·阿贡西约 157n, 203-4, 212
- Aguinaldo, Emilio 埃米利奥·阿吉纳尔多 195-6, 197, 201, 203-6, 208, 212-14, 221-3, 224, 227
- Alarcón, Pedro de 佩德罗·德·阿拉贡 30
- Alas, Leopoldo (aka Clarín) 莱奥波尔多·阿拉斯 (即克拉林) 49n
- Albert, Charles 夏尔·阿尔贝 230
- Alejandro, José 何塞·亚历杭德里诺 125n, 135, 136n, 188
- Alexander I 亚历山大一世 82
- Alexander II 亚历山大二世 3, 52n, 69, 70, 71, 80, 89
- Alexander III 亚历山大三世 52n
- Alexander of Serbia 塞尔维亚的亚历山大 75
- Alfonso XII 阿方索十二世 84, 115n
- Alfonso XIII 阿方索十三世 192, 226n

- Algeria* 阿尔及利亚 72n, 82
- Algiers* 阿尔及尔 195
- Alsace* 阿尔萨斯 66, 112
- Amadeo of Savoy 萨伏伊的阿马德奥 57, 84
- Amoy* 厦门 231, 234
- Amsterdam* 阿姆斯特丹 7
- An Jung-geun 安重根 75
- Ancona* 安科纳 193n64
- Andalusia* 安达卢西亚 6, 82, 86, 89-90, 109, 112, 173, 209
- Andersen, Hans Christian 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德森 29
- Anderson, Perry 佩里·安德森 32
- Andre, Armando 阿曼多·安德烈 194n
- Andreyev, Leonid 列奥尼德·安德列耶夫 30
- Angiolillo, Michele 米歇尔·安焦列洛 7, 75, 189-94
- Angola* 安哥拉 82
- Antignac, Antoine 安托万·昂提涅克 193
- Antilles, The* 安第斯群岛 7, 35n, 180n, 185, 210-11
- Anzin* 昂赞 181
- Apacible, Galicano 加利卡诺·阿帕西夫莱 207, 212, 213, 214, 220n, 232
- Aquinas, Thomas 托马斯·阿奎那 226
- Arabi Pasha 帕夏·阿拉比 52n
- Aragon* 阿拉贡 56
- Aranjuez* 阿兰胡埃斯 82
- Argentina* 阿根廷 4, 72n, 78, 115n, 119, 146n, 155n, 184
- Arisaka Nariakira 有坂成章 220n
- Armagnac, Abraham 亚伯拉罕·阿尔马涅克 88n
- Artacho, Isabelo 伊萨贝洛·阿塔乔 203-4
- Ascheri, Thomas 托马斯·阿谢里 155-6, 184
- Asia* 亚洲 3, 167, 180, 209
- 'Astoll' (José Lacalle y Sánchez) 阿斯托尔(何塞·拉卡勒·伊·桑切斯)
13, 18
- Asturias* 阿斯图里亚斯 99n

- Atchinatski, Mikhail 米哈伊尔·阿钦那斯基 80
- Austria* 奥地利 3, 4, 90
- Austro-Hungary* 奥匈帝国 3, 54, 66, 91, 184, 208, 218
- Ávila* 阿维拉 64
- Ayacucho* 阿亚库乔 90
- Azcárraga, Marcelo de 马塞洛·德·阿斯卡拉哈 154, 194
- Báez, Buenaventura 布埃纳文图拉·巴埃斯 192-3
- Bagumbayan* 巴共巴延 163, 164
- Bakunin, Mikhail 米哈伊尔·巴枯宁 69, 71-2, 73n, 88, 105, 175, 230
- Balaguer, Vicente 韦森特·巴拉格尔 132n
- Balintawak* 巴林塔瓦克 157
- Baltimore* 巴尔的摩 33, 36n
- Balzac, Honore de 奥诺雷·德·巴尔扎克 29, 30, 43, 47n
- Banville, Theodore de 西奥多·德·班维尔 30
- Barbusse, Henri 亨利·巴比斯 30
- Barcelona* 巴塞罗那 5, 7, 27, 60, 64, 88-9, 97, 187, 228
 anarchists 无政府主义者 96, 226n, 227
 bombings in 在~的爆炸 6, 113, 115-16, 117, 155-6
 homosexual bars 同性恋酒吧 43n
 Isabelo deportation to 伊萨贝洛引渡至~ 198
 martial law in ~的戒严令 6, 116, 156, 159, 160, 167, 172, 190, 192
 Ponce's correspondences 庞塞的书信 208
 Tarrida 塔里达 169, 171
- Baroja, Pio 皮奥·巴罗哈 30, 49, 89n, 194
- Barrantes, Vicente 韦森特·巴兰特斯 107
- Barrès, Maurice 莫里斯·巴雷斯 30
- Barthou, Jean-Louis 让-路易·巴尔杜 171
- Basa, José Maria 何塞·马利亚·巴萨 56, 58, 103-4, 123, 130n, 137, 148, 224n
- Basle* 巴塞尔 71
- Basora, Francisco 弗朗西斯科·巴索拉 185n
- Batangas* 八打雁 205

- Batavia* 巴塔维亚 42n
- Baudelaire, Charles 夏尔·波德莱尔 32, 33, 39, 52
- Bauer, Henri 亨利·鲍尔 187
- Bayonne* 巴约讷 82, 217
- Belfast* 贝尔法斯特 132n
- Belgium* 比利时 4, 28, 67, 72n, 80, 124, 180-2, 183, 188, 191
- Belgrade* 贝尔格莱德 75, 76, 209
- Benevento* 贝内文托 72
- Bengal* 孟加拉 28
- Bentinck, William 威廉·本廷克 48n
- Berlin* 柏林 43n, 44-5, 53, 91, 167, 208, 210
- Bern* 伯尔尼 186
- Berriz, Miguel Rodriguez 米盖尔·罗德里格斯·贝里斯 139
- Betances, Ramón 拉蒙·贝坦西斯 7, 35n, 173, 174, 183n, 184-9, 191-2, 194n, 208, 211, 212
- Biak-na-Bató* 比亚克纳巴托 197n, 201, 203, 204
- Bibesco, Princess 比贝斯科公主 30
- Bicol* 比科尔 207, 222-3
- Bilbao* 毕尔巴鄂 110n
- Binondo* 岷伦洛 11, 137
- Bismarck, Otto von 奥托·冯·俾斯麦 3, 6, 52n, 54, 57n, 66, 67, 92n, 107, 121, 174
- Black Sea* 黑海 3
- Blackburn, Robin 罗宾·布莱克本 96n
- Blanco, Ramón 拉蒙·布兰科 60n, 148, 149, 154-5, 156-60, 161, 165, 166, 194-5, 199
- Blanqui, Auguste 奥古斯特·布朗基 174, 175
- Blasco Ibañez, Vicente 韦森特·布拉斯科·伊巴内斯 30, 37, 49, 89n
- Blum, Léon 莱昂·布鲁姆 182
- Blumentritt, Ferdinand 费迪南·布卢门特里特 45, 58, 82n, 90-1, 99, 218
 conditions for revolution 革命的条件 124-5, 148, 154, 156
 correspondent with Isabelo 与伊萨贝洛的通信 95n

- letter to Pardo de Tavera 给帕多·德·塔维拉的信 209-10
- Nihilism 虚无主义 118n
- Ponce's letters to 庞塞给~的信 207, 213
- Rizal's letters to 黎萨尔给~的信 44n, 51n, 63, 102-3, 107
- Bo y Singla, Ignacio 伊格纳西奥·波·伊·辛格拉 198, 199n
- Bogrov, Dmitri 德米特里·博格罗夫 75
- Bohemia 波西米亚 22, 90
- Bolívar, Simon 西蒙·玻利瓦尔 82, 90, 185n
- Bologna 博洛尼亚 64n
- Bonifacio, Andrés 安德雷斯·博尼法乔 119, 129n, 130-1, 137-8, 141, 149-50, 152, 154, 156-8, 160, 163, 165-6, 189, 195-6, 203
- Bordeaux 波尔多 67, 88
- Borneo 婆罗洲 6, 126, 128, 132, 139
- Bory, Jean-Louis 让-路易·波利 46n
- Boston 波士顿 36n, 184
- Bourdieu, Pierre 皮埃尔·布尔迪厄 171
- Bourget, Paul 保罗·布尔热 30
- Bracken, Josephine 约瑟芬·布拉肯 132n, 155, 233
- Brazil 巴西 4, 72n, 78, 115n, 142, 146n
- Brenton, Daniel 丹尼尔·布兰顿 210n
- Bresci, Gaetano 加埃塔诺·布雷希 75
- Briand, Aristide 阿里斯蒂德·布里昂 183n
- Brook, Ferdinand 费迪南·布鲁克 188n
- Brooke, James 詹姆士·布鲁克 126
- Brousse, Paul 保罗·布鲁斯 74
- Brunei 文莱 126
- Brussels 布鲁塞尔 71, 100n, 181, 209
- Buencamino, Felipe 费利佩·布恩卡米诺 214
- Buenos Aires 布宜诺斯艾利斯 2, 78
- Buffalo 布法罗 75, 76, 78, 226
- Buiça, Manuel 曼努埃尔·布伊萨 75
- Bulacan 布拉干 201, 206

Bulgaria 保加利亚 124

Bulwer-Lytton, Edward 爱德华·布尔沃·利顿 29

Buonaparte, Joseph 约瑟夫·波拿巴 82

Burgos, José 何塞·布尔戈斯 58

Burma 缅甸 94, 132

Byron, George 乔治·拜伦 184

Cabo Rojo 卡波罗霍 184

Cádiz 卡的斯 5, 82, 113

Caesar 凯撒 36n

Cafiero, Carlo 卡尔洛·卡菲耶罗 72

Calamba 卡兰巴 51n, 60n, 92, 94, 100, 109, 128, 160, 227

Cambodia 柬埔寨 94, 132

Canada 加拿大 208

Canovas del Castillo, Antonio 安东尼奥·卡诺瓦斯·德尔·卡斯蒂约 6, 84-6,
87, 103, 159, 160, 187, 192, 197

assassination of ~ 被暗杀 7, 75, 164, 184, 193-4

Cuba 古巴 145-7, 166

Montjuich 蒙胡伊克 184

protest against 反对~的示威 171, 172-3, 191

repression under ~ 统治之下的镇压 85, 89, 112, 113, 156

Canton 广州 53, 219, 233n

Caribbean 加勒比 54, 59, 82, 171, 180n, 184-5

Carlos of the Carlists 卡洛斯派卡洛斯 56

Carlos III 卡洛斯三世 86n, 139

Carlos IV 卡洛斯四世 82

Carlos of Portugal 葡萄牙的卡洛斯 75

Carmaux 卡尔莫 182

Carnot, Lazare 拉扎尔·卡尔诺 116

Carnot, Sadi 萨迪·卡诺 72n, 75, 77, 116, 182

Carolines, The 加洛林群岛 53, 66, 67, 81, 92n, 121, 151n, 206

Cartagena 卡塔赫纳 62

- Casanova, Pascale 帕斯卡尔·卡萨诺瓦 28-9, 43
- Caserio, Sante Jeronimo 圣·热罗尼莫·卡泽里奥 75, 77, 116
- Castile 卡斯提尔 19, 173
- Castlereagh, Robert Stewart 罗伯特·斯图亚特·卡斯尔雷 82
- Castro, Jovita Ventura 约维塔·文图拉·卡斯特罗 62n, 230
- Catalonia 加泰罗尼亚 115, 121, 143, 171, 173, 209
- Cavendish, Lord 卡文迪许勋爵 75n
- Cavite 甲米地 2, 57-8, 133, 141, 157, 195, 197, 206, 221
- Cavour 卡福尔 73n
- Cayenne 卡宴 67
- Cayo Hueso 骨头礁 5, 126, 139, 187
- Centeno Garcia, José 何塞·森特诺·加西亚 91-2, 97, 108
- Cervantes, Miguel de 米盖尔·德·塞万提斯 29, 49, 50, 51
- Céspedes, Carlos Manuel de 卡洛斯·米盖尔·德·塞斯佩德斯 57, 58n, 59, 84, 93n, 115, 131, 141-2, 157n, 160, 171n, 186
- Ceuta 休达 170-1
- Ceylon 锡兰 53, 94
- Chateaubriand, François-René de 弗朗索瓦-勒内·德·夏多布里昂 29
- Chekhov, Anton 安东·契诃夫 30
- Chicago 芝加哥 5, 8, 113n, 117, 231
- Chile 智利 72n
- China 中国 3, 4, 53, 68, 75-6, 132, 150, 175, 208-9, 214n, 219-23, 231-3
- Chuhai 珠海 233n
- Cicero 西塞罗 36n
- Clarín *see* Alas, Leopoldo Clark, T. J. 克拉林, 见 T. J. 雷奥波德·克拉克 176n
- Clémenceau, Georges 乔治·克列孟梭 7, 117n, 173-5, 179, 180, 182, 183, 184, 209
- Clement XIV 克莱芒十四世 86n
- Clichy 克里希 114
- Coates, Austin 奥斯丁·科茨 132n
- Cohen, Alexander 亚历山大·科恩 178n
- Coimbra 科英布拉 64n

- Colombia* 哥伦比亚 119
- Comin Colomer, Eduardo 爱德华多·科明·科洛梅尔 183n
- Conan Doyle, Arthur 亚瑟·柯南·道尔 30
- Congo* 刚果 180
- Conrad, Joseph 约瑟夫·康拉德 28, 75n
- Constantinople* 君士坦丁堡 53
- Cook, Bradford 布拉福德·库克 32n
- Cork* 科克 42n
- Corneille, Pierre 皮埃尔·康乃伊 29
- Corregidor* 克雷西多 56
- Costa, Alfredo 阿尔弗雷德·科斯塔 75
- Costa, Andrea 安德里亚·科斯塔 74
- Courbet, Gustave 古斯塔夫·库尔贝 68
- Crete* 克里特 124
- Crisólogo, Mena 梅纳·克里索洛戈 10
- Crispi, Francesco 弗朗西斯科·克里斯皮 188, 189
- Cruz, Hermenegildo 埃梅内希尔多·克鲁斯 228
- Cuba* 古巴 2, 4, 6, 7, 53, 119, 121, 131-2, 228n
- anarchism 无政府主义 72
 - Betances 贝坦西斯 35n, 188, 191
 - Blanco appointment 布兰科任职 194-5
 - Céspedes insurrection 塞佩德斯起义 57, 58n, 84, 93n, 115, 141-2, 160, 186
 - concentration zones 集中营 146, 207
 - decline of Spanish Empire 西班牙帝国的衰落 23, 81
 - as example for Filipino nationalism ~作为菲律宾民族主义的榜样 129, 153, 166, 210
 - Ferrara 费拉拉 190
 - imperial soldiers in ~的帝国士兵 158n
 - martial law 戒严令 156
 - nationalism 民族主义 94
 - New York delegation 纽约代表团 211, 212
 - representation in the Cortes 在国民议会上的代表 97-9, 103

- Rizal's attempted departure to 黎萨尔尝试前往 ~ 148-9, 154-5, 165
 slavery abolition 废除奴隶制 90, 99, 129
 struggle in 在 ~ 的斗争 54, 140-7, 153, 154, 167, 221
 Tarrida 塔里达 59n, 170, 171
 US invasion of 美国入侵 ~ 206
 Weyler 韦勒 108n
see also Havana 亦见哈瓦那
- Curaçao* 库拉索 186n
 Czogolsz, Leon 列昂·佐戈尔茨 75, 78, 226
- Dáet* 达特 207
- D'Angiò, Roberto 罗伯特·德安吉奥 190
- Daniel, Evan 埃文·丹尼尔 96n
- Dante Alighieri 阿利盖利·但丁 60n
- Dantès, Edmond 埃德蒙·唐泰斯 60n
- Dapitan* 达皮丹 132n, 137n, 138-40, 147, 152-4, 158-9, 164
- Darien, Georges 乔治·达利恩 230
- Darwin, Charles 查尔斯·达尔文 226
- Daudet, Alphonse 阿方斯·都德 29, 52n
- Davis, Jefferson 杰弗森·戴维斯 60n
- De Gaulle, Charles 夏尔·戴高乐 82
- De la Peña, Nicolás 尼古拉·德·拉·佩纳 163
- de las Casas, Bartolomé 巴托罗姆·德·拉斯·卡萨斯 86
- De Ocampo, Esteban 埃斯特班·德·奥坎波 29n, 33, 36n, 37, 118n
- Debussy, Claude 克劳德·德彪西 50
- Defoe, Daniel 丹尼尔·笛福 29
- Degas, Edgar 埃德加·德加斯 180n
- Del Pan, Rafael 拉斐尔·德尔·潘 207
- Del Pilar, Gregorio 格里高里奥·德尔·皮拉尔 97, 221
- Del Pilar, Marcelo 马塞洛·德尔·皮拉尔 96-104, 107, 110, 124, 135-6, 155n, 166, 173, 195n, 202-3, 223
- Delcourt, Pierre 皮埃尔·德尔库尔 33n

Denver 丹佛 231n

Despujol, Eulogio 欧洛希奥·德斯普赫尔 60n, 123, 133, 137, 138-40, 148, 155, 159-60

Devil's Island 恶魔岛 182, 187

Devonshire 德文郡 115n

Dewey, George 乔治·杜威 204-5

Dickens, Charles 查尔斯·狄更斯 5, 29

Diderot, Denis 德尼·狄德罗 23, 184, 193

Dien Bien Phu 奠边府 82

Dios, Vergel de 贝赫尔·德·迪奥斯 207, 232

Diponegoro, Prince 迪波内戈罗王子 87n

Dominican Republic 多米尼加共和国 93n, 185, 186, 193

Dostoevsky, Fyodor 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 28, 30, 69, 118n, 175

Douwes Dekker, Eduard 爱德华·陶威斯·德克尔 28, 29, 45-6, 49-50, 51, 65, 109n, 178n, 182

Dresden 德累斯顿 210

Dreyfus, Alfred 阿尔弗雷德·德雷福斯 7, 175, 182-4, 209

Dumas père, Alexandre 大仲马 29, 46, 48, 49, 51, 52, 187

Egypt 埃及 53, 72n, 78

Eisenstein, Sergei 谢尔盖·爱森斯坦 5

Elizabeth, Empress 伊丽莎白女王 75

Ellis, Havelock 哈弗洛克·埃利斯 37n, 40n

Ems 埃姆斯 57n

Engels, Friedrich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2, 69, 73n

England 英国 28, 29, 30, 67, 78, 80, 93, 119, 124, 183n

see also London; United Kingdom 亦见伦敦；英国

Ensor, James 詹姆士·恩索尔 45, 181

Ephesus 以弗所 37n

Esenwein, George Richard 乔治·理查德·埃森魏因 113n, 155n

Esterhazy, Marie-Charles 马里-夏尔·埃斯特拉齐 182

Estrada Palma, Tomás 托马斯·埃斯特拉达·帕尔马 188, 189

- Ethiopia* 埃塞俄比亚 4, 188
- Europe* 欧洲 22, 41, 42n, 51, 54, 69, 94, 108, 112, 119, 121, 123-5, 167, 209
- Evangelista, Edilberto 艾迪贝尔托·埃万杰利斯塔 125-6, 128n, 135, 188, 195
- Fanelli, Giuseppe 朱塞佩·法内利 88
- Farrère, Claude 克劳德·法莱尔 30
- Felipe II 菲利普二世 86
- Fénélon, François 弗朗索瓦·费内隆 34n
- Fénéon, Félix 费利克斯·费内翁 7, 170, 175-80, 181, 182
- Fernando VII 费尔南多七世 51, 56, 82
- Ferran, Dr 费朗博士 15
- Ferrara, Oreste 奥莱斯特·费拉拉 190
- Ferrer, Ada 阿达·费热 143
- Ferrer, Félix 费利克斯·费雷尔 203-4
- Ferrer Guardia, Francisco 弗朗西斯科·费雷尔·瓜尔迪亚 173, 183n, 225n
- Ferrero, Guglielmo 古列尔莫·费雷罗 230
- Flaubert, Gustave 居斯塔夫·福楼拜 30, 39
- Florence* 佛罗伦萨 73n
- Florentino, Leona 利昂娜·弗洛伦蒂诺 9-10
- Florida* 佛罗里达 6, 189
- Foggia* 佛吉亚 189
- Foucault, Michel 米歇尔·福柯 33
- 'Foujita Sonetaka' 藤田则义 208, 213-14
- France* 法国 3, 4, 28, 53, 54, 67-8, 78, 81-2, 111, 124, 208
- anarchists 无政府主义者 72, 114n, 225n, 230
 - anti-Spanish publications 反西班牙出版物 184
 - Betances 贝坦西斯 186-7
 - bombings in ~ 的爆炸事件 113, 115n, 116
 - Dreyfus affair 德雷福斯事件 182-4
 - literature 文学 29-30
 - radicalism 激进主义 173-80, 181
 - see also *Paris* 亦见巴黎

France, Anatole 阿那托勒·弗朗士 30

Frankfurt 法兰克福 75n

Franz Ferdinand, Archduke 弗朗茨·斐迪南大公 75, 79

Franz Joseph 弗朗茨·约瑟夫 91

Fujita Sonetaka 藤田则义 232

Fukumoto Makoto 福本诚 151n

Galdos, Benito Pérez 贝尼托·佩雷斯·哈尔多斯 30, 49, 51

Galicia 加利西亚 19

Galliéni, Joséph 约瑟夫·加利埃尼 187

Gana, Francisco 弗朗西斯科·加纳 191

Garcia, Neil 尼尔·加西亚 33, 35

Garfield, James 詹姆士·加菲尔德 71

Garibaldi, Giuseppe 朱塞佩·加里波第 52n, 88n

Garnier, P. P. 加尔尼埃 33n

Geneva 日内瓦 72n, 75, 76

George of Greece 希腊的乔治 75

Germany 德国 4, 28, 53, 64n, 75, 111, 167, 206, 208

anarchism 无政府主义 80, 117

anti-Spanish publications 反西班牙出版物 184

imperialism 帝国主义 54, 66, 67

literature 文学 29, 31

see also Berlin 亦见柏林

Ghent 根特 5, 45, 104, 125

Girardin, Émile de 埃米尔·德·吉拉尔丹 47n

Girault, Jean 让·吉洛 155n

Godebska, Misia 米希亚·哥德夫斯卡 170n

Goethe, Johann 约翰·歌德 29

Goldenberg, Grigori 格里高利·戈登伯格 71

Gómez, Dominador 多米纳多尔·戈麦斯 228

Gómez, Mariano 马里亚诺·戈麦斯 58

Gómez, Maximo 马克西莫·戈麦斯 144, 146-7, 150, 166, 190, 211

- Gómez, Pancho 潘乔·戈麦斯 146
- Goncharov, Ivan 伊万·冈察洛夫 28
- González, Teodoro 特奥多罗·冈萨雷斯 222
- Gonzalez, Matias 马提亚斯·冈萨雷斯 209
- Gorki, Maxim 马克西姆·高尔基 30
- Granada 格兰纳达 64
- Grant, Ulysses 尤利西斯·格兰特 142
- Grave, Jean 让·格拉夫 72n, 172, 182, 184, 190, 230
- Greece 希腊 3, 124
- Grinevitsky, Ignatei 伊纳台·格里涅夫斯基 71n
- Guam 关岛 205, 224
- Guatemala 危地马拉 72n
- Guerrero, León Maria 列昂·马利亚·格雷罗 44n, 57n, 95n, 129n, 130n
- Guesde, Jules 朱尔·盖德 181
- Guiné-Bissau 几内亚比绍 82
-
- Haggard, H. Rider H. 里德尔·哈加尔德 30
- Hague, The 海牙 71
- Hahnemann, Christian 克里斯蒂安·哈涅曼 33n
- Haiti 海地 1, 4, 82, 93n, 142, 185
- Halévy, Daniel 丹尼尔·哈勒维 182
- Harar 哈勒尔 5, 42n
- Harbin 哈尔滨 75
- Hardie, Keir 基尔·哈迪 183, 209
- Hartmann, Lev 列夫·哈特曼 71
- Havana 哈瓦那 60n, 96n, 126, 146, 148, 156, 160, 171, 192, 194, 198, 208-9
- Hawaii 夏威夷 66, 219
- Hearst, William Randolph 威廉·兰多夫·赫斯特 195
- Hebel, Johann Peter 约翰·彼得·赫布尔 29
- Heidelberg 海德堡 91
- Heine, Heinrich 海因里希·海涅 29
- Henry, Émile 埃米尔·亨利 116-18, 156n, 178, 179, 180, 182

- Henry, O. 欧·亨利 30
- Herculaneum* 赫库兰尼姆 60n
- Herder, Johann 约翰·赫尔德 104, 112n
- Herrera Sotolongo, Pedro 佩德罗·赫雷拉·索托伦哥 188, 189
- Hidalgo, Manuel (Philippines) 曼努埃尔·伊达尔戈(菲律宾) 109
- Hidalgo y Costilla, Manuel (Mexico) 曼努埃尔·伊达尔戈·伊·科斯蒂亚(墨西哥) 82
- Hirata Hyobei 平田兵卫 220
- Ho Chi Minh 胡志明 82
- Hödel, Max 马克思·赫德尔 75n
- Hoffmann, Ernst 埃尔内斯特·霍夫曼 29
- Hong Kong* 香港 2, 5, 7, 68, 103-4, 123-8, 132n, 133, 137-9, 166, 188n, 203-4, 207-8, 212, 219-21, 222n, 227
- Horace 贺拉斯 36n, 48n
- Hugo, Victor 维克多·雨果 29, 30, 46, 49, 52n, 174
- Hungary* 匈牙利 22, 124, 233
- Huysmans, Joris-Karl 约里斯-卡尔·于斯曼 37-44, 51, 52, 121, 171n, 176, 181, 182
- Ibsen, Hendrik 亨德里克·易卜生 176, 201n
- If* 伊芙 60n
- Iglesias, Pablo 帕布洛·伊格莱西亚斯 96, 228
- Ilo-Ilo* 伊洛伊洛 137
- Ilocos* 伊罗戈 11, 14, 16, 17, 19-21, 227, 229
- India* 印度 3, 48n, 72n, 94, 132, 209
- Indochina* 印度支那 68, 175
- Indonesia* 印度尼西亚 87n, 122
- Inoue Tetsujiro 井上哲次郎 214n
- Ireland* 爱尔兰 3, 22, 75n
- Isabel, Queen 伊莎贝拉女王 56, 57, 84, 88, 171
- Istanbul* 伊斯坦布尔 167
- Italy* 意大利 3, 4, 29, 67, 68, 72, 75-8, 124, 184, 188, 189-90

- Ito, Hirobumi 伊藤博文 75
- Izquierdo, José 何塞·伊斯基耶多 208, 210-11, 212
- Izquierdo, Rafael de 拉斐尔·德·伊斯基耶多 57-8, 88, 97, 104, 121
- Jacinto, Emilio 埃米利奥·哈辛托 152, 195n
- James, Henry 亨利·詹姆士 75n
- Japan* 日本 3-4, 6, 7, 28, 53, 121, 150-2, 233
 imperial competition 帝国宪法 54, 167
 Ponce 庞塞 208, 209, 213-15, 220, 232
 Rizal in 黎萨尔在~ 68, 93
 Suehiro Tettyo 末广铁肠 215-19
see also Tokyo 亦见东京
- Jarry, Alfred 贾里·阿尔弗雷德 182
- Jaurès, Jean 让·乔尔 181
- Java* 爪哇 42n, 43, 46, 48, 50, 209
- Jerez* 赫雷斯 112, 113, 115n, 117, 169
- Jimaguayú* 希马瓜尤 203-4
- Jolo* 霍洛岛 126
- K'ai Chung-mei 曹传美 233
- Kalaw, Teodoro 西奥多罗·卡劳 207
- Kaliayev, Ivan 伊万·卡利亚耶夫 75, 79
- K'ang Yu-wei 康有为 232
- Karakozov 卡拉柯佐夫 69
- Karl, Rebecca 雷别卡·卡尔 221, 231
- Kawit* 卡维特 195, 205
- Kazan* 喀山 80
- Keats, John 约翰·济慈 175
- Kern, R.A. R. A. 凯恩 210n
- Khalturin, Stepan 史蒂芬·哈尔图林 71
- Kharkov* 哈尔科夫 71
- Kipling, Rudyard 鲁德亚德·吉卜林 30

- Koenigstein, Francois-Claude (aka Ravachol) 佛朗索瓦-克劳德·克尼格斯泰因 (人称拉瓦肖) 113-14, 156n, 180
- Königgrätz* 克尼格雷茨 54, 66
- Korea* 韩国 150, 152, 214n
- Korn, Alfred 阿尔弗雷德·科恩 3n
- Kravchinski, Sergei Mikhailovitch 谢尔盖·米哈伊洛维奇·克拉夫钦斯基 71, 72-3
- Krilof, Luise Ivanova 路易丝·伊万诺夫娜·克里洛夫 80-1
- Kropotkin, Dmitri 德米特里·克鲁泡特金 71
- Kropotkin, Pyotr 彼得·克鲁泡特金 2, 7, 71, 74, 105, 115, 175, 178, 226, 230
- Kruger, Paul 保罗·克鲁格尔 223
- Kuang-Hsü 光绪 232
- La Pérouse, Alphonse Gallaud de 阿方斯·加洛·德·拉·佩鲁兹
see Zo d'Axa 见佐·达克萨
- Labra, Rafael 拉斐尔·拉布拉 99n, 149
- Lafargue, Paul 保罗·拉法格 88-9
- Laforgue, Jules 儒勒·拉佛格 175-6, 182
- Laguna* 拉古纳 212
- Lamartine, Alphonse de 阿方斯·德·拉马丁 48n
- Laos* 老挝 132
- Lares* 拉雷斯 186
- Larra, Mariano José de 马里亚诺·何塞·德·拉腊 30, 50-1
- Lassalle, Ferdinand 费迪南·拉萨尔 106, 107
- Lavelaye, E. de E. 德·拉夫莱 106
- Leclerc, Charles 夏尔·勒克莱克 1
- Lee, Robert E. 罗伯特·E. 李 60n
- Leiden* 莱登 91
- Leitmeritz* 莱特莫里茨 5, 90, 91, 125
- Leo XIII 列奥十三世 138, 139
- Leopold II 列奥波德二世 180
- Leopold, Prince (Hohenzollern) 列奥波德王子 (霍亨索伦) 57n

- Lerroux, Alejandro 亚历山大·勒卢 201, 228
- Lesage, Alain 阿兰·勒扎奇 29
- Lessing, Gotthold 戈特霍尔德·莱辛 29n
- Lete, Eduardo de 爱德华多·德·莱特 101, 135n, 136
- Li Chi-yeh 李霁野 233
- Liang Ch'i-ch'ao 梁启超 231, 232, 233
- Liaotung Peninsula* 辽东半岛 150
- Libya* 利比亚 53
- Liège* 列日 170n
- Lima* 利马 62
- Lisbon* 里斯本 64n, 75, 76, 82, 209
- Livy 李维 36n
- Lombardy* 伦巴第 88n
- London* 伦敦 2, 4, 5, 7, 82, 186, 209, 217
 - anarchists 无政府主义者 191
 - bomb plots 爆炸阴谋 75n
 - homosexual bars 同性酒吧 43n
 - Orsini 奥西尼 115n
 - Rizal in 黎萨尔在 ~ 53, 68-9, 91, 94-5
 - Tarrida 塔里达 183
- López Jaena, Graciano 格拉西亚诺·洛佩斯·哈耶那 103n
- López, Narciso 洛佩斯·纳西索 59n, 60n
- Lorrain, Jean 让·洛兰 30, 182
- Lorraine* 洛林 66
- Los Baños* 洛斯巴诺斯 206
- Louis Napoléon 路易·拿破仑 46, 47, 57n, 66, 67, 68, 115n, 173, 174
- Louis XVI 路易十六 193
- Lu Hsun 鲁迅 233
- Lucas, Henri 亨利·卢卡 230
- Luccheni, Luigi 路易·卢克尼 75
- Luce, Maximilien 马克西米利安·卢切 178
- Lucretius 卢克莱修 36n

Luiz of Portugal 葡萄牙的路易斯 75

Lujine, Maria Michaelovna 玛利亚·米哈伊洛夫娜·卢季娜 80-1

Luna, Antonio 安东尼奥·卢纳 125n, 126, 127n, 128n, 135, 206, 223, 227

Luna, Juan 胡安·卢纳 18, 44, 95n, 105-7, 108, 173, 227

Lung Tai-kwang 阮荃光 232

Luperón, Gregorio 格雷戈里奥·鲁佩隆 192

Luzon 吕宋 6, 9, 11, 82, 148, 150, 158n, 206, 207, 227

Lyon 里昂 75, 76, 116

Ma Hsün-wu 宣樊子 233

Mabini, Apolinario 阿波利纳里奥·马毕尼 205-6, 211, 212n, 214, 224, 229n

Macao 澳门 208

MacDonald, Ramsay 拉姆塞·麦克唐纳德 183

Maceo, Antonio 安东尼奥·马塞奥 142, 144, 146, 150

Machado de Assis, Joaquim 约阿希姆·马查多·德·阿西斯 28, 50

Machado, Gerardo 赫拉尔多·马查多 190

McKinley, William 威廉·麦金利 75, 78, 195, 205, 223-4, 226

Madariaga, Salvador de 萨尔瓦多·德·马达利亚加 85

Madrid 马德里 49n, 51, 57, 82, 101, 110, 208, 223

bombings in 在~的爆炸事件 113

Cuban insurrection 古巴起义 141, 144, 152-3, 166

Lafargue 拉法格 88-9

Ponce 庞塞 202

Rizal's university days 黎萨尔的大学生涯 60-5

Maeterlinck, Maurice 威廉·莫里斯 181

Malabon 马拉翁 11

Málaga 马拉加 84

Malatesta, Errico 埃里科·马拉泰斯塔 2, 7, 72, 73, 78, 113n, 169, 172, 189, 209, 226

Malato, Charles 夏尔·马拉托 183n, 187, 191, 192, 200, 230

Malaya 马来亚 87n, 94, 126, 132

Mallarmé, Stéphane 斯蒂芬·马拉美 32, 33, 39, 42, 52, 114, 173, 177, 179, 182

- Mallorca* 马略卡 60n
- Malolos* 马洛洛斯 206
- Malta* 马耳他 159
- Malvar, Miguel 米格尔·马尔瓦尔 221
- Manila* 马尼拉 4, 5, 32, 51, 56-7, 59, 110, 119, 208
- Blanco appointment 布兰科任职 148
 - homosexuality 同性恋 33, 34-5
 - Isabelo de los Reyes 伊萨贝洛·德·洛斯·雷耶斯 10, 11, 13, 225-9
 - Jesuits 耶稣会士 140
 - Kapitunan uprising 卡提普南起义 156-60
 - Luna 卢纳 127n
 - Mabini 马毕尼 224n, 225n
 - Novales mutiny 诺瓦雷斯兵变 84
 - Polavieja appointment 波拉比耶哈任职 160
 - Rizal's return to 黎萨尔回到~ 128-9, 133, 137
 - Spanish Church 西班牙教会 86, 87
 - Tarrida 塔里达 192
- Mantua* 曼图亚 115n
- Manzoni, Alessandro 亚历山大·曼佐尼 29
- Marianas, The* 马里亚纳群岛 35n, 58, 66, 81, 97, 206
- Marikina* 马里基纳 157, 158
- Mármol, Donato 多纳托·马尔默尔 171n
- Márquez, Dr P. L. P. L. 马尔奎斯博士 133
- Marseilles* 马赛 60, 92, 132, 190, 191, 203
- Marshalls, The* 马歇尔群岛 66-7
- Martí, José 何塞·马蒂 4, 6, 65, 119, 126, 131, 140-5, 150, 166, 173, 183, 187-8, 194, 211
- Martínez Campos, Arsenio 阿塞尼奥·马丁内斯·坎波斯 115, 145, 148, 149, 158
- Marx, Karl 卡尔·马克思 2, 7, 54, 71, 73n, 88, 104, 106, 107, 226
- Maupassant, Guy de 居伊·德·莫泊桑 30
- Maura, Antonio 安东尼奥·毛拉 85n, 226n
- May, Glenn 格伦·梅 207n

- Mazzini, Giuseppe 朱塞佩·马齐尼 73n, 115n
- Mella, Ricardo 里卡多·梅拉 172-3
- Melville, Herman 赫尔曼·梅尔维尔 1-2, 28
- Mendizábal, Juan 胡安·门蒂萨瓦尔 86
- Menelik 梅内利克 42n, 184
- Mercado, Paciano 帕西阿诺·梅尔卡多 46n, 58, 60, 109, 123
- Mercado, Trinidad 特立尼达·梅尔卡多 163
- Messina* 梅西纳 184
- Metternich, Clemens von 克莱门斯·文策尔·冯·梅特涅 82
- Mexico* 墨西哥 4, 82, 208, 211
- Meyer, A. H. A. H. 梅耶 210n
- Mezentsov, General 梅曾佐夫将军 71
- Miami* 迈阿密 126
- Michel, Louise 路易斯·米歇尔 174-5, 176, 182, 187, 230
- Michelet, Jules 儒勒·米舍莱 12
- Mickiewicz, Adam 亚当·密茨凯维奇 233
- Mindanao* 棉兰老岛 66, 130, 132n, 135n, 138, 148, 149, 153
- Mindoro* 民都洛 123
- Mirbeau, Octave 奥克塔夫·米尔博 177, 183
- Miura Arajiro 三浦荒次郎 208
- Miyamoto Heikuro 宫本平九郎 232
- Mojares, Resil 雷希尔·莫哈雷斯 81n, 84n
- Molière 莫里哀 30
- Mollet, Guy 吉·莫列特 195
- Moluccas, The* 摩鹿加群岛 53, 119
- Monaco* 摩纳哥 72n
- Montjuich* 蒙胡伊克 6, 155, 156, 159, 173, 183-4, 188, 190, 193
 executions 处刑 115, 116
 Isabelo de los Reyes 伊萨贝洛·德·洛斯·雷耶斯 7, 27, 199, 201, 203, 227
 Tarrida del Marmol 塔里达·德尔·马尔默尔 169, 170, 171, 172, 192
 torture 刑讯 191
- Montmartre* 蒙马特 7, 174, 175

- Montreal* 蒙特利尔 208
- Montseny, Joan *see* Urales, Federico 霍安·孟西尼, 见费德里科·乌拉雷斯
- Monza* 蒙扎 75, 76
- Morayta, Miguel 米盖尔·莫莱塔 64, 159, 201
- Moret, Segismundo 西斯蒙多·莫雷特 57, 151, 159, 194, 201
- Morga, Antonio de 安东尼奥·德·莫尔加 95, 218
- Morocco* 摩洛哥 81, 145, 226n
- Morriones, Domingo 多明戈·莫里奥内斯 35n
- Morris, William 威廉·莫里斯 181
- Moscow* 莫斯科 214n
- Mozambique* 莫桑比克 82
- Murata Tsuneyoshi 村田经芳 220n
- Musil, Robert 罗伯特·穆西尔 91
- Mussolini, Benito 贝尼托·墨索里尼 68
- Nagasaki* 长崎 220
- Nakamura Yaroku 中村弥六 220
- Nakpil, Julio 胡里奥·纳克皮尔 130n, 131n
- Naples* 那不勒斯 5, 72, 73n
- Napoléon, Emperor 拿破仑皇帝 1, 56, 82
- Napoléon, Louis 路易·拿破仑 46, 47, 57n, 66, 67, 68, 115n, 173, 174
- Natanson, Alexandre 亚历山大·纳坦松 170n
- Natanson, Thadée 塔戴·纳坦松 170n
- Natsume Soseki 夏目漱石 28
- Navarre* 纳瓦拉 56
- Nechayev, Sergei 谢尔盖·内查耶夫 69, 70, 118
- Netherlands, The* 荷兰 29, 72n, 124, 208, 210
- Netherlands Indies, The* 荷属印度群岛 42n, 87n, 109n, 132
- New Caledonia* 新喀里多尼亚 67, 175, 187
- New Guinea* 新几内亚 67
- New Jersey* 新泽西 4
- New Orleans* 新奥尔良 7, 59n, 208

- New York* 纽约 2, 6, 7, 65, 184, 187, 188-9, 208, 211, 212, 231n
- Nicaragua* 尼加拉瓜 59n
- Nicholas II 尼古拉二世 81
- Nietzsche, Friedrich 弗里德里希·尼采 182
- Nieuwenhuis, Ferdinand Domela 费迪南德·多美拉·纽文胡伊斯 230
- Nitti, Francesco 弗朗西斯科·尼蒂 78n
- Nobel, Alfred 阿尔弗雷德·诺贝尔 6, 54, 69, 71
- Nobiling, Karl 卡尔·诺比灵 75n
- Novalés, Andrés 安德烈斯·诺瓦雷斯 84
- Nozaleda, Bernardino 贝尔纳迪诺·诺撒雷达 138-9, 158
- Oakland* 奥克兰 231n
- Ocampo, Ambeth 安贝斯·奥坎波 106n, 127n, 132n, 139n, 163n, 195n
- Oceania* 大洋洲 3, 4, 58, 66, 68, 175
- Ojeda Reyes, Félix 费利克斯·奥黑达·雷耶斯 94n, 185n, 186
- Oliva, Juan 胡安·奥利瓦 115n
- Olivé, Francisco 朗西斯科·奥利维 160
- Oller, Cayetano 卡耶塔诺·奥耶尔 190, 191
- Oriente* 奥连特 2, 171n
- Orsini, Felice 菲利斯·奥西尼 115n
- Ortiz, Antonio 安东尼奥·奥梯斯 86, 87, 96n
- Ostend* 奥斯坦德 45
- Otero, Francisco 弗朗西斯科·奥特罗 115n
- Ottoman Empire* 奥斯曼帝国 75, 76, 94
- Ovid 奥维德 36n
- Oviedo 奥维多 64
- Pallás, Paulino 保利诺·帕亚斯 115, 116, 145, 146n, 199
- Palma, Rafael 拉斐尔·帕尔马 130n
- Palmerston, Henry Temple 亨利·坦普尔·帕莫斯通 115n
- Pampanga* 邦板牙 136n
- Paraguay* 巴拉圭 3, 146n

- Pardo de Tavera, Joaquin 华金·帕多·德·塔维拉 56, 58, 81n
- Pardo de Tavera, Trinidad 特立尼达·帕多·德·塔维拉 29-31, 37, 44, 49, 80-1, 209, 224n
- Paris* 巴黎 2, 4, 5, 7, 53, 72n, 80-1, 108, 117
- Betances 贝坦西斯 186, 187
 - bombings in 在~的爆炸事件 113-14, 116
 - Cuban exiles in ~的古巴流放者 183
 - homosexual bars 同性酒吧 43n
 - Huysmans 于斯曼 43-4
 - Ponce's correspondence 庞塞的通信 208
 - radicalism 激进主义 173-80, 181
 - La revue blanche* 《白色杂志》 170n
 - Rizal in 黎萨尔在~ 65
 - siege of ~被围困 67, 174
 - student protests 学生抗议 64n
 - Sue 苏 52
 - Tarrida 塔里达 169, 172, 183
 - Treaty of 《巴黎条约》 206, 212
- Passanante, Giovanni 乔瓦尼·帕萨南特 74
- Pastells, Pablo 帕布洛·帕斯特尔斯 139, 140
- Paterno, Pedro 佩德罗·帕特尔诺 28n
- Pau* 波城 171
- Pawa, José Ignacio 何塞·伊格纳西奥·帕瓦 221-3, 232, 233
- Peking* 北京 150, 231, 233n
- Pennsylvania* 宾夕法尼亚 208, 210
- Pernicone, Nunzio 努恩齐奥·佩尼科内 73n, 75
- Perry, Joséph 约瑟夫·佩里 191
- Persia* 波斯 53
- Peru* 秘鲁 53, 90, 119
- Pétion, Alexandre 亚历山大·佩蒂翁 185n
- Petőfi, Sándor 山德尔·裴多菲 233
- Philippines, The* 菲律宾群岛 2, 4-7, 31, 81, 86-8, 188, 195-207

- Blumentritt 布卢门特里特 90-1, 125, 210
 and China ~与中国 220, 221, 231
 Del Pilar 德尔·皮拉尔 97-103
 early written records 早期文献 94-6
El Filibusterismo 《煽动者》 53-4, 59, 108-9, 110, 112, 121
 Filipinos in Spain 在西班牙的菲律宾人 61-4, 96, 104
 homosexuality 同性恋 33-6
 Isabelo de los Reyes 伊萨贝洛·德·洛斯·雷耶斯 9-25, 223-30
 and Japan ~与日本 150-2, 213-18
 Katipunan underground and uprising 卡提普南地下党和起义 130-1, 149-50,
 152-3, 154, 155, 156-60, 166, 189, 195-6
 libraries 藏书 29n, 51n
 literacy 识字率 65n, 212-13
 oppression of creoles and mestizos 弹压克里奥人和混血人 56-8
 Ponce's correspondence 庞塞的通信 208, 211-12
 revolts and mutinies 叛乱与兵变 57-8, 82-4, 132-3
 Rizal's return to 黎萨尔回到~ 133-8
 statues of Rizal 黎萨尔的塑像 231
 Tarrida 塔里达 170, 171
 US colonial regime 美国殖民政权 223-9
see also Manila 亦见马尼拉
- Pi y Margall, Francisco 弗朗西斯科·皮·伊·马高尔 107, 159, 184, 199n, 201
Pisa 比萨 64n
 Pissarro, Camille 卡米列·比萨洛 180
 Pissarro, Lucien 吕西安·比萨洛 68, 180n
 Pius VII 庇护七世 86n
 Pius IX (Pio Nono) 庇护九世 68
 Plato 柏拉图 36n
 Plautus 普劳图斯 36n
 Plehve, Vyacheslav von 冯·普列维 75
 Plutarch 普鲁塔克 36n
 Poe, Edgar Allan 埃德加·艾伦·坡 32-3, 39, 51, 52

- Poland* 波兰 28, 53, 111, 112, 124
- Polavieja, Camilo 卡米洛·波拉比耶哈 60n, 160-1, 163, 166-7, 193n, 194n, 195-8, 199, 205-6
- Pompeii* 庞贝 60n
- Ponce, Mariano 马利亚诺·庞塞 5, 7, 50n, 103n, 173, 188n, 197-8, 201-3, 207-16, 219-21, 231-3
- Port-au-Prince* 太子港 5, 185n
- Portas, Narciso 纳西索·波尔塔斯 200, 201
- Portugal* 葡萄牙 3, 23, 82, 119, 184
- Potosi* 波托西 86
- Pouget, Émile 埃米尔·普杰 72n
- Prague* 布拉格 90
- Prévost, Antoine 安托万·普雷沃 30
- Prim y Prats, Juan 胡安·普利姆·伊·普拉茨 57, 84
- Primo de Rivera, Fernando 费尔南多·普里莫·德·里维拉 197, 198, 203, 204
- Primo de Rivera, Miguel 米盖尔·普里莫·德·里维拉 204
- Princip, Gavriilo 加夫里洛·普林西普 75, 79
- Proudhon, Pierre 皮埃尔·蒲鲁东 105, 107, 175, 226
- Prussia* 普鲁士 54, 124
- Puerto Rico* 波多黎各 4, 7, 23, 81, 99n, 142n, 170, 171, 184-6, 188, 212
- Pugadlawin* 普加德拉文 157
- Quezada, Gonzalo de 贡萨洛·德·克萨达 212
- Quezon, Manuel 曼努埃尔·奎松 229
- Quiroga Ballesteros, Benigno 贝尼尼奥·胡伊洛哈·洛佩斯·巴列斯特罗斯 92, 97
- Ramos, José 何塞·拉莫斯 152, 220
- Ravachol *see* Koenigstein, Francois-Claude 拉瓦肖, 见弗朗索瓦-克劳德·柯尼希斯泰因
- Reclus, Élie 艾利·勒克吕 172
- Reclus, Élisée 埃利泽·勒克吕 114, 178, 182, 187, 228, 230

- Regidor, Antonio Maria 安东尼奥·马利亚·雷希多尔 56, 58, 148, 165, 224n
- Reinsdorf, August 奥古斯特·莱茵斯多夫 75n
- Renoir, Auguste 奥古斯特·勒努瓦尔 180n
- Resurrección, Félix 费利克斯·雷苏莱西翁 18
- Retana, Wenceslao 温塞斯劳·雷塔纳 129n, 138, 139n
- Reyes, Isabelo de los 伊萨贝洛·德·洛斯·雷耶斯 5, 7, 9-25, 130n, 139n, 149n, 233, 234
- contrast with Rizal 与黎萨尔的对比 27, 51
- imprisonment of ~被囚禁 129n, 197-201, 203
- Rizal's view of 黎萨尔对~的看法 94-5, 229
- translation of *Noli me tangere* 对《别碰我》的翻译 230
- US colonial regime 美国殖民政权 223-9
- Ricord, Philippe 菲利普·里克尔 33n
- Rimbaud, Arthur 阿尔蒂尔·兰波 42-3, 60n, 68, 176
- Rio de Janeiro 里约热内卢 5
- Rio de Oro 里奥德奥罗 23, 81, 200n
- Rizal, José 何塞·黎萨尔 5-6, 9, 27-52, 68-9, 123-38, 164-7, 173, 187n, 227, 234
- Blumentritt friendship 与布卢门特里特的友谊 90-1, 210
- China 中国 231-3
- commemoration of 纪念~ 206-7, 231
- and Del Pilar ~与德尔·皮拉尔 97-104
- early Spanish records 早期西班牙记录 14
- El Filibusterismo* 《煽动者》 31, 33-7, 38-46, 53-6, 58-9, 65, 91, 101, 103, 107-22, 165
- execution of ~被处决 163-4, 191, 193n
- exile in Dapitan ~流放至达皮丹 138-40, 147-9, 152-4, 158-9
- French literature 法国文学 29, 46-8
- Huysmans' *À rebours* comparison 与于斯曼《逆天》对比 37-42
- imprisonment of ~被囚禁 159, 161, 169
- influence on Suehiro 对末广的影响 216, 218, 219
- on Isabelo de los Reyes 论伊萨贝洛·德·洛斯·雷耶斯 95n, 229

- last poem 绝命诗 163, 189, 215, 232, 233
- La Liga Filipina 菲律宾协会 129-33
- Madrid University 马德里大学 60-5, 202
- “manifesto” 《宣言》 161-3
- Noli me tangere* 《别碰我》 16-17, 28, 30-2, 39, 44-6, 49-50, 51, 53, 107, 165, 230
- political outlook 政治前景 78-80, 82, 94-6, 104-8
- return to the Philippines 返回菲律宾 92-3, 94, 133-8, 164-5
- Russian Nihilists 俄国虚无主义者 81
- Tagalog spellings 塔加洛语拼写 212
- trial of ~ 被审判 153-4, 155, 160, 161, 163
- Robespierre, Maximilien 马克西米利安·罗伯斯庇尔 67
- Rocheftort, Henri 亨利·罗什福尔 174, 182, 183n, 184, 187, 192
- Rocker, Rudolf 鲁道夫·罗克尔 191
- Roig, Enrique 恩里克·罗伊格 96n, 143
- Rome 罗马 64n, 68, 78n, 88n, 92, 184, 209, 229n
- Roosevelt, Theodore 西奥多·罗斯福 3, 195, 204, 205, 224n
- Rousseau, Jean-Jacques 让-雅克·卢梭 52n, 104
- Rovira y Muñoz, Manuel 曼努埃尔·罗维拉·伊·穆尼奥斯 212
- Roxas, Félix 费利克斯·洛克萨斯 34n
- Roxas, Francisco 弗朗西斯科·洛克萨斯 195
- Rumania 罗马尼亚 22, 72n, 124, 184
- Rumpf, Police Chief 朗夫警长 75n
- Russia 俄罗斯 3, 4, 6, 30, 53, 69-72, 74, 80, 111, 124
- Sabah* 沙巴 126
- Sacramento* 萨克拉门托 231n
- Saddle Islands* 鞍岛 220
- Sagasta, Práxedes 普拉希德斯·萨加斯塔 84-5, 89, 90, 91, 93-4, 96, 103, 107, 113n, 116, 144, 146, 148, 194, 201
- St Louis* 圣路易斯 10
- St Petersburg* 圣彼得堡 70, 71, 75, 76, 80, 82, 167

- St Thomas* 圣托马斯 35n, 185, 186n
- Saint-Domingue* 圣多明戈 141
- Salonika* 萨洛尼卡 75, 76
- Sait Lake City* 盐湖城 231n
- Salvador, Santiago 萨尔瓦多·圣地亚哥 115-16, 146n
- Samoa 萨摩亚 67
- San Francisco* 旧金山 4, 68, 95n, 231
- Sandakan* 山打根 126, 127-8, 133, 135, 137, 139, 165
- Saniel, Josefa M. 约瑟法·M. 撒尼尔 150n
- Santa Águeda* 圣阿奎达 75, 76, 184, 193
- Santa Fé* 圣塔菲 115n
- Santana, Pedro 佩德罗·桑塔纳 93n
- Santiago de Cuba* 古巴的圣地亚哥 144
- Santo Domingo* 圣多明戈 60n, 185
- Sarajevo* 萨拉热窝 75, 76
- Sarrat* 萨拉特 82, 229n
- Satsuma* 萨摩 220n
- Savoy* 萨伏伊 57, 84
- Sazonov, E.Z. E. Z. 萨佐诺夫 75
- Schiller, Friedrich 弗里德里希·席勒 29
- Schinas, Alexander 亚历山大·希纳斯 75
- Schumacher, S.J., John S. J. 约翰·舒马赫 65n, 85, 99n, 101n, 213
- Scott, Walter 沃特尔·司各特 44n, 46
- Scott, William Henry 威廉·亨利·司考特 58, 225n
- Sedan* 色当 54, 66, 67, 68, 71, 174
- See, Teresita Ang 洪玉华 222
- Semarang* 三宝壟 42n, 43
- Sempau, Ramón 拉蒙·森保 71n, 89n, 114n, 155n, 190, 200-1, 230
- Serada, Captain 世良田船长 152
- Serbia* 塞尔维亚 3, 22, 124
- Sergei, Grand Duke 谢尔盖大公 75, 79
- Seurat, Georges 乔治·瑟拉 171n, 176

- Sevilla* 塞维利亚 64, 89
- Shanghai* 上海 7, 208
- Sheffield* 谢菲尔德 115n
- Sherman, William 威廉·谢尔曼 94n, 142
- Shikoku* 四国 216
- Shimonoseki* 下关 6, 150
- Siam* 暹罗 132
- Siberia* 西伯利亚 69, 80
- Sicily* 西西里 88n
- Signac, Paul 保罗·西涅克 176, 177
- Sinclair, Upton 亚普顿·辛克莱尔 30
- Singapore* 新加坡 5, 7, 132, 159, 208
- Sison, José María 何塞·马利亚·西松 233
- Sjahrir, Sutan 苏丹·夏赫里尔 122
- Smolensk* 斯摩棱斯克 5, 69
- Soler, Eduardo 爱德华·佐勒 210n, 232
- Solomons, The* 所罗门群岛 67
- Soloviev, Alexander 亚历山大·索罗维夫 71
- Sophocles 索福克勒斯 36n
- South Africa* 南非 4
- Spa* 斯帕 170n
- Spain* 西班牙 3, 4, 6, 28, 81-90, 103, 124, 159-60, 231
- anarchism 无政府主义 72, 172-3, 191
 - Betances 贝坦西斯 185-6
 - bombings in ~ 的爆炸 113, 155-6
 - Canovas assassination 卡诺瓦斯暗杀 193, 194
 - and Cuba ~ 与古巴 141-5
 - decline of Empire 帝国的衰落 23, 54, 81
 - Del Pilar 德尔·皮拉尔 96-7, 99-100
 - dynastie crisis 王朝危机 56
 - El Filibusterismo* 《煽动者》 111, 112, 121
 - Filipinos in 菲律宾人在 ~ 61-4, 96, 104

German imperialism 德国帝国主义 67

Isabelo de los Reyes 伊萨贝洛·德·洛斯·雷耶斯 13, 14, 23-4, 224-5

Italian anarchists in 意大利无政府主义者在~ 78

literature 文学 29, 30, 31, 49-51

newspapers/periodicals 报纸/期刊 184

Ponce's correspondence 庞塞的通信 208, 210

Rizal's university days in 黎萨尔在~的大学岁月 60-5

US war with ~与美国的战争 204-5, 206

see also *Barcelona; Madrid* 亦见巴塞罗那; 马德里

Spencer, Herbert 赫伯特·斯宾塞 104

Stock, Pierre-Victor 皮埃尔-维克托·斯托克 230

Stolypin, Pyotr 彼得·斯托雷平 75

Sue, Eugène 尤金·苏 5, 29, 46-8, 49, 51, 52, 114n

Suehiro Tetsyo 末广铁肠 215-19

Sulu 苏禄 126

Sun Yat-sen 孙逸仙 202, 219-21

Swift, Jonathan 乔纳森·斯威夫特 29

Switzerland 瑞士 69n, 71, 72n, 78, 92

Tacitus 塔西佗 36n

Taft, William Howard 威廉·霍华德·塔夫脱 224n

Tagawa, Moritaro 田川森太郎 152

Tagore, Rabindranath 拉宾德拉纳特·泰戈尔 28

Taiwan 台湾 6, 150

Takayama Ukon 高山右近 217-18

Tampa 坦帕 5, 126, 128n, 184, 187

Tardieu, Dr 塔蒂厄博士 80

Tarragon 塔拉贡 115n

Tarrida del Mármol, Fernando 费尔南多·塔里达·德尔·马尔默尔 6-7, 59n,

113n, 160, 169-72, 182-3, 190-2, 193n, 200-1, 209, 228, 230

Taufer, Mr 陶菲尔先生 132n

Tejeros 特赫罗斯 196

- Tell, Wilhelm 威廉·泰尔 116n
- Tenerife* 特内里费 131n
- Terrero y Perinat, Emilio 埃米利奥·特雷罗·伊·佩里纳特 91, 93-4, 97
- Thackeray, William 威廉·萨克雷 29, 30
- Thiers, Adolphe 阿道夫·梯也尔 187
- Thomas, Hugh 休·托马斯 94n, 143n, 146
- Thoms, William 威廉·汤姆斯 12, 17
- Thucydides 修昔底德 36n
- Tirona, Daniel 丹尼尔·提罗那 152
- Tjeenk Willink, A. A. 金克·威林克 210n
- Tobolsk* 托博尔斯克 81
- Tokugawa Ieyasu 德川家康 217-18
- Tokyo* 东京 6, 7, 150, 151, 208, 214n, 216
- Tolstoi, Lev 列夫·托尔斯泰 28, 84, 105
- Tondo* 通多 228, 229
- Torre, Carlos Maria de la 卡洛斯·马里亚·德·拉·托雷 56-7
- Toulouse* 图卢兹 184
- Toussaint L'Ouverture 杜桑·卢维杜尔 185n
- Trepov, Fyodor 费奥多尔·特雷波夫 71
- Tunisia* 突尼斯 72n, 78
- Tuntang* 屯唐 42n, 43
- Turgenev, Ivan 伊万·屠格涅夫 28, 30, 69, 118n
- Turin* 图灵 175
- Tz'ü-Hsi 慈禧 231
- Ubaldo, Silvestre 西尔维斯特·乌巴尔多 109
- Umberto I 翁贝托一世 73-4, 75
- Umemori Naoyuki 梅森直之 213n, 214n, 216n
- Unamuno, Miguel de 米格尔·德·乌纳穆诺 64, 110n, 202, 226n
- United Kingdom* 英国 4, 67, 72n, 75, 85, 184
see also *England; London* 亦见英国；伦敦
-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美国 1, 2, 4, 36n, 41, 68, 93, 124, 150

- anarchists 无政府主义者 7-8, 72, 78
 anti-Spanish publications 反西班牙出版物 184
 civil war 内战 3, 94n
 and Cuba ~与古巴 57n, 59n, 131, 195, 206, 223
 imperial competition 帝国竞争 54, 167
 and the Philippines ~与菲律宾 204-7, 210, 211-12, 223-9
 Ponce's correspondence 庞塞的通信 208
 Rizal in 黎萨尔在~ 231
 spies in Japan 在日本的间谍 220n
 see also New York 亦见纽约
- Urales, Federico 费德里科·乌拉雷斯 191, 199, 200, 201
 Uruguay 乌拉圭 72n, 146n
 Uwajima 宇和岛 216
- Vaillant, Auguste 奥古斯特·瓦扬 116, 156n, 180
 Valencia 巴伦西亚 64, 113, 131n, 173
 Valenzuela, Pio 皮奥·巴伦苏埃拉 152, 153-4, 156, 165, 166
 Valéry, Paul 保罗·瓦莱利 179-80
 Valladolid 巴里亚多利德 64, 212
 Vandervelde, Emile 埃米尔·范德费尔德 180-1, 191, 209
 Vatsyayana 筏蹉衍那 33n
 Vaughan, Ernest 欧内斯特·佛汉 175
 Venezuela 委内瑞拉 119, 185
 Ventura, Valentín 瓦朗坦·文图拉 104n, 187
 Verhaeren, Emile 埃米尔·维尔哈伦 177, 181
 Verlaine, Paul 保罗·魏尔伦 42-3
 Versailles 凡尔赛 66, 67
 Vico, Giambattista 詹巴蒂斯塔·维科 12
 Vienna 维也纳 82, 167, 209
 Vietnam 越南 94, 132
 Vigan 维甘 9, 10n
 Vincent, Paul 保罗·文森 46

- Viola, Máximo 马克西莫·维欧拉 44-5
- Virgil 维吉尔 34n, 36n
- Virgin Islands* 维珍群岛 35n
- Vo Nguyen Giap 武元甲 82
- Voltaire 伏尔泰 29, 52n, 104, 226
- Walker, William 威廉·沃克 59n
- Wan Chi 万迟 220
- Washington, D.C.* 华盛顿特区 94n, 204, 206, 209, 223
- Weyler, Valeriano 巴莱里亚诺·韦勒 60n, 110, 116, 151n, 154, 173, 195
 in Catalonia ~在加泰罗尼亚 200
 in Cuba ~在古巴 145-7, 149, 156, 159, 166, 172, 187, 194, 198, 207
 in the Philippines ~在菲律宾 93-4, 97, 103, 108, 121, 123, 128n, 137
- Whitman, Walt 沃特·惠特曼 175
- Wilhelm I 威廉一世 57n, 75n
- Xenophon 色诺芬 36n
- Yap 雅浦 67
- Yara 亚拉 157n
- Yokohama 横滨 5, 7, 152, 208, 212, 220
- Zambales* 三描礼士 11
- Zamora, Jacinto 哈辛托·萨莫拉 58
- Zanjón 桑洪 115, 142, 149, 195, 204
- Zaragoza 萨拉戈萨 64
- Zasulich, Vera 薇拉·查苏利奇 71, 121
- Zea, Leopoldo 莱奥波尔多·赛亚 64n, 110n
- Zo d'Axa 佐·达克萨 177, 178
- Zola, Émile 埃米尔·左拉 29, 30, 43-4, 52n, 180, 181-3, 194n, 216n, 232
- Zorrilla, Manuel Ruiz 曼努埃尔·路易斯·索里亚 84, 126n, 173, 225n
- Zulueta, Clemente José 克莱门特·何塞·苏卢埃塔 204



三辉图书

一项连接菲律宾、古巴、中国、日本、美国的广阔研究

《想象的共同体》作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深度论述全球化时代的民族主义

19世纪晚期，电报、万国邮政联盟、铁路与蒸汽船使得跨国连接成为可能，早期全球化已然发端。人口迁移与观念传播同时进行，无政府主义与民族主义相遇，其信奉者实施了目标和次数都引人注目的暗杀行动，引发了早期的“反恐怖主义”立法；古巴与菲律宾作为西班牙帝国仅存的两处重要殖民地，几乎同时爆发民族主义起义，其间革命者互通有无、协调行动，成为世界历史上第一次全球性合作。本尼迪克特·安德森从菲律宾下笔，逐渐向欧洲、美洲和亚洲发散，聚焦于以菲律宾国父、小说家何塞·黎萨尔为代表的一批民族主义者，再现了“一战”前的世界政治与文化图景。在此基础上，他试图阐明早期全球化时代无政府主义如何影响了民族主义，而全球组织网络又如何塑造了世界各地的民族主义运动。

如果读者发觉书中的故事与我们这个时代有若干相似和共鸣，那么，这个感觉并没有错。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

聚焦一批非凡人物与决定性的年代，既具有强烈的、动情的地方性，又具有广阔的全球性。

——《伦敦书评》

上架建议：人文社科 政治理论

ISBN 978-7-100-16664-5



9 787100 166645 >

定价：75.00元